巴哈马群岛史

〔英〕迈克尔·克拉顿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巴哈马群岛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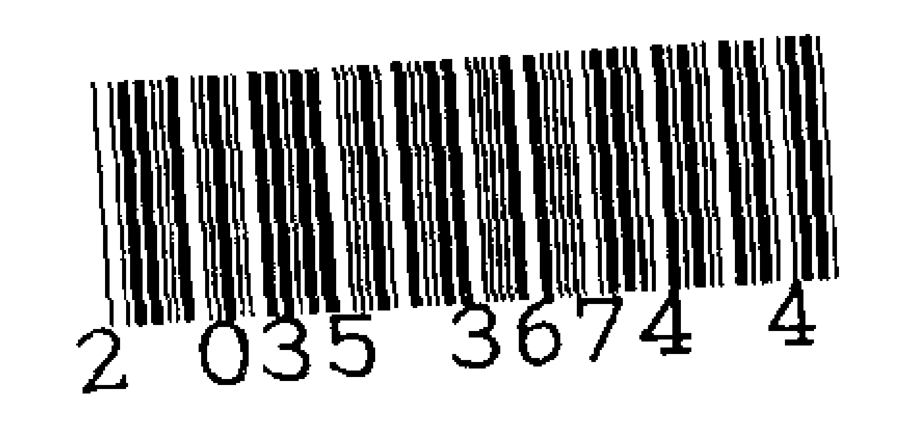
上　册

〔英〕迈克尔·克拉顿著

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译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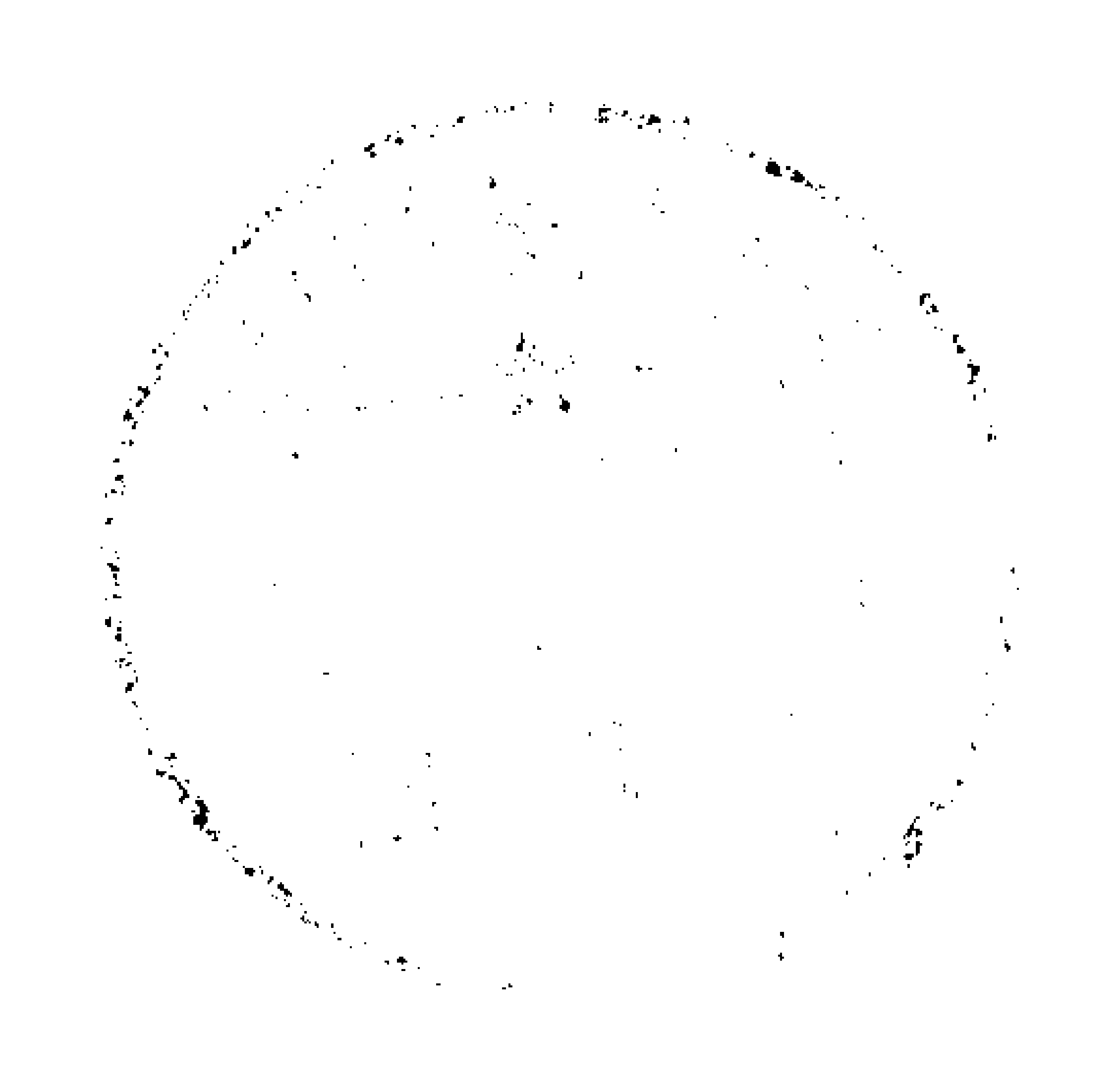
巴哈马群岛史

下册

〔英〕迈克尔·克拉顿著

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译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

Michael Craton

A HISTORY OF THE BAHAMAS

Collins

London, 1962

根据倫敦柯林斯出版社1962年版譯出

内部读物

巴哈马群岛史

（上、下册）

〔英〕迈克尔·克拉頓著

天津师范学院外語系
南开大学政治經济学系 譯校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張 18 5/8　插圖 7　字数260,000

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0

統一书号　11072·6

每部(二册)1.66元

出 版 说 明

巴哈马群岛（现称巴哈马群岛联邦）位于西印度群岛的最北部，其中华特林岛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第一个登陆地点。

《巴哈马群岛史》是英国人迈克尔·克拉顿写的。本书叙述了巴哈马从古至今的历史概况，尤其是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站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多方面为殖民主义制度辩护，为奴隶制度开脱罪责，掩盖民族矛盾的实质，歪曲阶级斗争的真相；但是，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灭绝印第安民族以及后来的英国海盗及英美殖民主义者掠夺、奴役和压迫当地人民的罪恶还是有所揭露，对巴哈马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有所反映，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概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

本书于1961年写成，1962年出版。书中所附地图均按原图译制，另有图片十三幅则予从略。

1973年1月

序　言

在开始编写本书时，曾经暗自担心，主要的困难将是缺乏资料。忙碌的四年过去之后，现在可以真实地讲，情况全然相反。这并不是说，在一架架书籍和一堆堆文件中进行探索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巴哈马的历史编写工作，存在着意想不到的特殊困难。主要的资料分别地存在伦敦和拿骚两地，相隔四千哩重洋，而保留在巴哈马首府的那一部分，尚未经过分类整理。在巴哈马群岛上，既没有档案馆，又没有足以适用的博物馆；收藏在拿骚公共图书馆的珍贵的巴哈马文物，还没有经过细致的编目，因而难于查找使用；巴哈马群岛历史学会至今还没有实现其1959年创立者的宏伟愿望。此外，在巴哈马群岛，人们的偏见是很难避免的。这个群岛不是一点没有宗派，而各派都有各自喜爱的神话。

因此，到现在才出版第一部通史，这也许不致

使人吃惊。具有不同程度差误的概要，已在几种旅游指南上出现过，但是，较长篇幅的著述似乎都是在酝酿中就夭折了。1903年，詹姆斯·赖特陷入了史料记载的烟海之中，他原来计划编写的一部历史书，后来成了一本关于短短的奴隶解放时期的难以领会的论述。据说玛丽·莫斯利曾经准备多年，想编写一部完善的历史，但是她死了，书却没写成，而她1926年所写的旅游指南成了她唯一的纪念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议会曾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编写一部“官方历史”。他的两名研究助手先在伦敦工作了两年，嗣后，他自己来到拿骚着手编书，过了六个星期，就与世长辞了。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曾尽量做到依靠自己。但是，我仍然应当对下述的人士致以真诚的感谢：议会议长阿萨·H·普里查德，他曾允许我使用议会图书馆；议会秘书乔治·约翰逊，他给过我以很大的帮助；过于劳累的拿骚公共图书馆管理员们，特别是格里芬小姐，他们都给予了热情的协助；开发局的执事们，他们准许我使用照片；公共工程处处长理查德·雷和城市设计处

前处长威廉·洛斯，他们各自给我提了意见。我并愿对我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如：刘易斯·摩根为这本书绘制衬页地图；塞西尔·贝瑟尔提供了一些新奇的建议；吉廉·贝恩代为校对一部分底稿。还有几位学生和同事，特别是朱丽亚·史密斯，在索引工作上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协助。

由一个英国人来编写巴哈马群岛及其人民的第一部完整历史，这好象是个讽刺。可是，我愿把长期支配着我的这本书，看作是我在"六月之岛"①上度过的六年愉快时光的一种报偿。我常常意识到，自己对研究工作缺乏完全的信心。在勘查未开垦的地区时，对随处所瞥见到的那些河流，必须自信地以地图表示，即使后来的旅行者可能发现，这些河流描绘得不精确，甚至把流向都弄反了。因此，我愿在此对任何错误和曲解一并表示道歉，并且希望，在激起人们对这些错误和曲解反驳的过程中，至少可以促进对这样一个十分有趣但被忽视的题目的研究。

1962年4月，于拿骚

---

① 六月之岛（Isles of June）：巴哈马群岛之别名，参阅本书第3页。——译者

目　　录

地 图

第一章 开 端 11

巴哈马群岛，起自佛罗里达半岛外的曼萨尼拉沙洲，向东南延伸大约五百九十哩至海地尼古拉斯角附近的大伊纳瓜岛，形成一个庞大的群岛。最宽的地方是从古巴附近的萨尔岛沙洲到大西洋边缘上的圣萨尔瓦多岛，宽达三百八十哩。很少有人不厌其烦地去计算岛屿的数目，但是，据说共有二十九个岛屿、六百六十一个珊瑚岛和二千三百八十七个岩礁。陆地总面积估计有四千四百零四平方哩，与牙买加岛或半个威尔士的面积几乎相等。

大约三十个左右的岛屿和珊瑚岛有人居住，然而人口分布却很不平均。总人口估计为十万七千人，半数以上居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拿骚，这个小岛面积仅有五十八平方哩，人口密度几乎达到每平方哩一千人。在其余地区，人口密度大体为每平方哩十一人。最大的安德罗斯岛共

一千六百平方哩，面积远远大于其他岛屿，但人口却不足七千人。除拿骚有五万五千人以外，再没有超过一千居民的居留地了。

巴哈马群岛人口稀少的原因是由于土地贫瘠。所有岛屿的地形几乎是完全平坦的，卡特岛上的山丘最高，其高度也不足四百呎，多数岛屿都没有超过海拔一百呎的土地，此外，岩石都多孔。由于这两个原因，岛上就绝对找不到河流或小溪。土壤是肥沃的，但土层极薄，都附着在崎岖不平的石灰岩低洼地和所谓的“香蕉洞”里。有些地区，地面被那深达六十呎的连锁岩洞和壶
12 穴所割裂，以至不能横越，更谈不到耕种了。只有在接近地面的地方才有淡水，似乎由于大自然的戏弄，淡水蓄存于土地的表层，以咸水为其基础。井掘得太深，排得过猛，就会涌出带有咸味的水和咸水。“海穴”，即地下与海洋相接的小咸水湖（通常被说成是“无底洞”），普遍地存在，常常深入内陆很远。

这种严酷的、有时几乎是阴暗的景色，为这里的世界上一种最美好的气候所缓和。巴哈马群岛与北美大陆之间隔着佛罗里达海峡，夏季又受

着凉爽的东北信风影响，因此，这个群岛不为酷热或严寒所苦。虽然夏季几个月里空气湿度大，但气温却很少高过九十度①，冬季气温最低纪录为四十九度。五个最凉爽月份的平均气温为宜人的七十度。年降雨量为四十至六十吋，但霜雪是想象不到的，虽然在1798年偶然有一次降过几片奇异的雪花。一个十九世纪的探访者，给这个群岛赠送了“六月之岛”的美称，的确是名副其实。

飓风是巴哈马群岛的主要灾害，幸而不经常发生。这股凶猛的热带气旋，通常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以东的大西洋上形成，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风势逐渐加大，横扫之地出现着广达一百哩、甚至最大每小时速达一百五十哩的暴风。特大的飓风往往能波及美国的东海岸，直到相当于百慕大的纬度上，甚至到更北的一些地方才消失。经过一百多年的精确测绘统计，知道飓风通常的轨道是沿着巴哈马群岛的中轴线一直向前。自从1926年和1929年两次风灾以来，拿骚没有再遭到飓风的袭击，但是几乎每隔一年，某些岛屿就要

① 温度度数一律按原书所用华氏度表示，下同。——译者

遭受一次西印度“热带暴风”的破坏，这种暴风每年发生十几次。泛美气象局依字母顺序给每次暴风起了生动的别名。

观察巴哈马群岛最好的方式是从空中俯瞰。在这方面，在巴哈马群岛有史以来可能要算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陆军中校约翰·格伦是最幸福的人了，他于1962年2月20日乘坐圆锥形宇宙飞船，在大特克岛附近海面降落，在这之前，在其高气层的航程中，曾三次飞越巴哈马群岛。在这次以
13 时速一万七千五百哩，离地面一百哩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中，他一定看到了整个巴哈马群岛象链条般地展现在下边，也一定会对这宝石般五彩缤纷的景色赞叹不已，因为这个群岛是以它瑰丽的色彩见称的——深海是苍蓝，珊瑚礁是浓紫；沙洲上清波浅沙呈现着蓝绿、葱绿、金色、黄色、银色，浮光耀影，相映生辉，构成一幅浅色而悦目的光谱；海岛及其四周散布的岩礁尽是斑斑驳驳的褐绿和铅灰。

从海面上看去，这个群岛则不那么动人了，长长的海岸长着一带树林，后面几乎没有山峦的衬景。哥伦布称赞过这里生长的植物，但他是别

有企图的。棕榈树是近年引入这个群岛的，现在还不很茂盛，但是却使某些岛屿带有一种“南海”风味。只是在变了样的新普罗维登斯岛及其他发达的居留地，如哈伯岛和总督港，才见有繁茂的植物。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想象巴哈马群岛是近乎一个人间乐园，这里有发微响的、网状的木麻黄和古怪奇趣的木棉树；彩虹般的巴豆和蔓延的各种藤枝；开着嫣红花朵的凤凰木和一品红；紫色和石竹色的九重葛以及与其争艳的木槿和夹竹桃。在果园里，交杂地结着丰硕的外来品种的水果；菠萝和朱栾（一度曾被称为“禁果”）；马尾藻、番荔枝和人心果；芒果、番石榴以及百余种其他水果。在夜晚，空气芳香扑鼻，日间则蜂鸟在树上歌舞。颜色鲜明的蜥蜴在布满阳光的岩礁间到处穿来穿去，鸟类中最美丽而又最缺鸟类性习的粉红色的火鹤，在拿骚温顺地被圈养着，在伊纳瓜和南安德罗斯岛上则还是野生的。

离开海岸，在珊瑚礁地带清澈的海水里，有着天然的珊瑚花园，比陆地上任何花园都美。因为没有泥沙俱下的河流，巴哈马群岛的海洋是世

界上最清澄的。在六十呎深的海水中，可以象透过水晶一样看见海底。对于轻装潜水员①和配有潜水望远镜装备的探险者，这里是一个奇异的新世界，有各色各样的珊瑚，摇曳多姿的海草以及五颜六色的鱼族。1957年，议会宣布把项链似的埃克苏马礁的大部分地区辟为巴哈马国立公园，这的确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措施。

从地质学观点来看，巴哈马群岛是非常之简
14 单，从未引起专门的研究。这些岛屿基本是由第三纪石灰岩构成，在强烈的珊瑚作用下稍有变化，但是其实际形成的过程仍然引起揣测。有些地质特点还有待于解释。

在巴哈马群岛上，除了石灰岩以外找不到任何别的岩石，而且在萨尔岛和其他地方，经过钻探的结果，发现下面的岩层厚达几千呎。很显然，这个群岛是在佛罗里达和尤卡坦②两地所见到的美洲石灰岩“海岸地”的突出部分；是较古

① 轻装潜水员(skin-diver)：指潜水时不着潜水衣帽，只戴面罩背系压缩空气筒，能在水中潜游的潜水员。——译者

② 尤卡坦是墨西哥东南部的一个半岛，临墨西哥湾。——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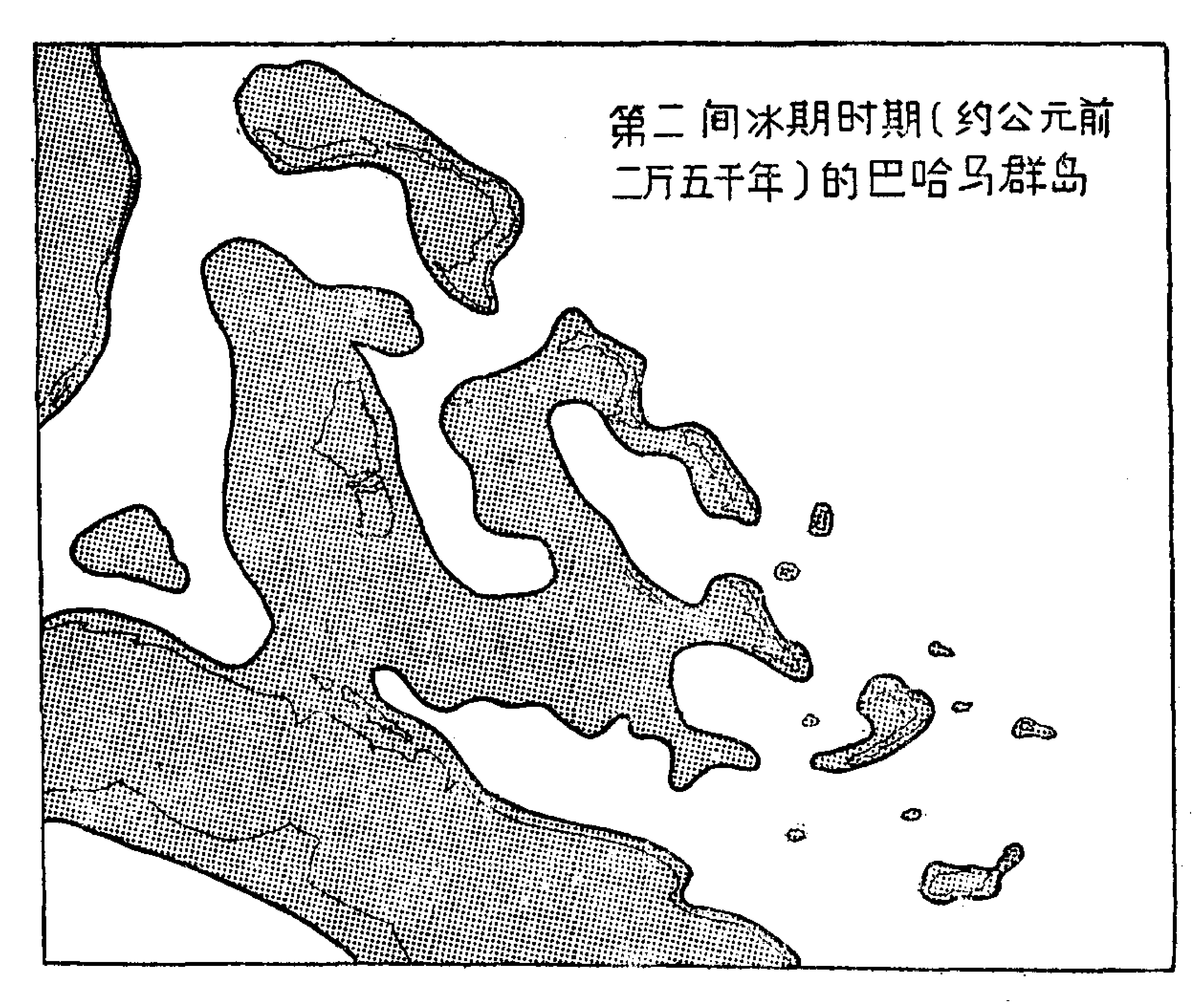
老岩石的外壳。然而，与两个大石灰岩半岛不同，巴哈马群岛看来似乎是一个海底山脉的残余，岛屿和沙洲是变平了的山峰；渊深的海峡是广阔的山谷，某些地方斜入海底，深达万呎。

在七千五百万年至一百万年以前，通称第三纪的漫长地质时期内，基础的石灰岩是作为风成堆积物而奠定的。这种堆积物经过逐渐的几乎是极细微的积累过程，形成了一个四周环海的高地，又由于海浪侵蚀而变成岛屿，并且被大峡谷所割裂开来——如佛罗里达海峡、普罗维登斯海峡、舌形海峡（Tongue of the Ocean）以及克鲁克德岛海峡等。表层的起伏和不高的山丘可能是在飓风袭击时期沙丘建造的结果。然而，巴哈马群岛目前地形的许多特点，都是在地质上的晚期，即在四个冰期和间冰期，由于珊瑚建造所产生的。

实际上，巴哈马群岛是名副其实的珊瑚群岛。外层石灰岩让海水浸蚀得如刀刃般锋利，在内地则成蜂窝状的壶穴和岩洞，这种岩石，直到其很深之处都含有珊瑚形骸的化石。这个群岛的气候和海水，很适宜于珊瑚的建造，阳光充足，而且毫无冲积作用。水温从不低于珊瑚的最低温度

即七十度，几乎总在七十五至八十五度的理想幅度之内。洋流替饥饿的珊瑚带来了必需的食物，盐分是在千分之二十五至四十的理想幅度之间，而且在大片的浅水区里，海水竟浅于珊瑚所适应的最大深度，即一百五十呎。

由于具备着一切有利因素，三种类型的珊瑚建造都能在巴哈马海洋中找到：岸礁、堡礁和环礁。岸礁紧靠海岸并依附于被海浪冲击的台地外缘而形成，它在巴哈马群岛极为普遍。几乎所



第二间冰期时期（约公元前二万五千年）的巴哈马群岛

有的巴哈马群岛，在沿大洋的一面，都有岸礁分布着，在新普罗维登斯岛的北边海上和大埃克苏马岛以东一带，都可找到典型的例子。堡礁与陆地之间相隔着一条宽阔的礁湖，这种礁并不那么普遍，但是在小巴哈马沙洲北缘和大巴哈马沙洲的西缘以及阿克林湾的外缘，都可以识别出来。环礁聚成一个圆堆，中间逐渐下沉，留下了一个圆形礁湖，象这样真正的环礁在巴哈马群岛只有两个典型：霍格斯提礁和萨尔岛沙洲。

R·A·戴利在他的《冰川控制学说》中谈到珊瑚建造时，指出了冰川移动对珊瑚构筑的作用。在每一冰川时期由于冰川的进展，世界海洋的水平面曾下降到比目前水平面低三百呎的地方。每次冰川后退时，其融化之水逐渐注入海洋，直至洋面比目前水平高出一百五十呎。随着上升的气温，促使巴哈马群岛一带珊瑚的旺盛生长，尽管它被慢慢上涨的海水淹没着。 16

每一冰期都发生这样一次循环，但是，每一新的循环使上一次的发生变化，直至早期形成的状态几乎完全无从辨认。巴哈马群岛目前的地质构造，大部分是由于据信发生在距今六万四千年

至一万一千年的最近冰期——威斯康辛冰期——冰川作用的结果。在威斯康辛冰期的高峰时，海洋的水平面大概至少比今天的洋面低二百五十呎。这可能使巴哈马的整块陆地面积大大增加，把大多数岛屿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大于古巴、而且可能与古巴相连接的大岛或半岛。如果对水下的地形做一简单的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罗伯特·汉龙先生不久前曾在小小的新普罗维登斯岛上的香蕉洞里发现了关于这方面的确实证据：现今只在大陆才能看到的陆上动物以及只能在大片陆地上生存的食肉鸟的骨骼。长岛的淡水龟、最近时期广泛出现的旱地大蜥蜴以及新普罗维登斯的浣熊，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奇怪得很，最早的居民似乎也曾传说过，这里有一大片连接大陆的土地。彼得·马特在1511年曾记述道："土著人自己声称，他们的祖先也曾留传给他们这样的传说。猛烈的暴风雨逐渐地淹没了这些陆地，并由海湾把它们一个又一个地隔开来。"

当然变化的过程远不会象传说的那样急剧。海水不易察觉地上涨，与珊瑚生长的速度大致相

同，终于使巴哈马群岛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样子：岩礁遍布，珊瑚丛生，不明情况的航海者往往葬身于此。

尽管有过这种传说，但人类总不是这个过程的见证者。当新石器时代的人在最后的冰期经过多佛尔海峡踏进不列颠的时候，还没有人从大陆移居到巴哈马群岛。巴哈马群岛被现代人看作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天然住所，但是，在人类进入有史时代很久以后，这个地方还是绝无人迹的。

17 第二章　卢卡伊人

在巴哈马群岛的源远流长的地质学史上，现代的居民不过是今天早晨才到达的游客。无论他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十七、八世纪的非洲无名奴隶的后裔，还是冒险家和保王党人的白种后裔，没有一个家庭能够自称在这些岛屿上有过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那么，究竟谁是巴哈马群岛最初的居民，他们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最初的居民可能是西博内人。这个蒙昧的原始渔民，沿着佛罗里达和尤卡坦半岛南移，跃过珊瑚礁而到达古巴、海地和牙买加。根据他们在那些地方的零星遗迹来推断，他们后来似乎成了去得较晚的印第安移民的奴隶。的确，由佛罗里达海岸到大巴哈马岛的西端城和安德罗斯群岛的北端，比基韦斯特到古巴还要近一些。

1952年，J·M·戈金博士勘查过安德罗斯南

山洞窟里的一个史前“贝冢”。在那里，他发现了贝壳器具和土著人的头盖骨。但他未能寻获确切的居住遗址，而不得不断定西博内人要么为数不多，要么只是暂时到过巴哈马。巴哈马的北部岛屿，很可能曾一度稀稀疏疏地住过这个脆弱的土著部落。但是，由于缺乏比较确切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得而知。不幸得很，西博内人未曾在木头或石块上雕刻过什么。

晚在1926年，有过恼人的谣传，说什么安德罗斯的内地住着一个不定居的原始人部落。就在那一年，玛丽·莫斯利小姐希望通过空中考察来 18
解开这个谜。然而，关于这个部落的传说，已被证实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事隔很久的今天，空中飞行和空中考察已经成为常事，我们不妨怀着莫斯利小姐当年的心情，期望空中考古这门惊人的新科学将会帮助我们找到戈金博士所未能寻获的那种古代村落遗址。

哥伦布注意过，他在巴哈马群岛南部所遇见的那支自称为卢卡伊人的“印第安人”，有几个特征和加那利群岛的古安车人相同。加那利群岛

是当时探险家们最后发现的一块土地。某些近期的作者甚至提示过，卢卡伊人是来自加那利群岛，因而也就是最初来自非洲，顺着东北信风驾着独木舟到了巴哈马群岛。但是，只要对卢卡伊人的习俗和特点进行最肤浅的考察，就可发现这种奇谈怪论是漏洞百出的。

卢卡伊人就是阿拉瓦克人。他们是西班牙人在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等地所发现的印第安人的一支亲族，他们的文化被人类学家称为泰诺人文化。他们的后裔仍可在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穷乡僻壤里找到。

当温和的阿拉瓦克人越过南美大陆向小安的列斯群岛移动的时候，大概是由于他们受到强悍的加勒比人的逼迫而前往的。的确，当他们到达这些岛屿的时候，遭到了食人的加勒比人的袭击和入侵，而加勒比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杀死阿拉瓦克人的男人，使他们的女人沦为奴隶。加勒比人的宗教，甚至许诺勇士们死后进入天堂，在那里将受到阿拉瓦克奴隶的侍候；而懦夫则注定要下地狱，在那里则将成为阿拉瓦克主人的奴隶。

为了寻求安定的生活，阿拉瓦克人驾着独木舟往前猛进。大约在公元一千年，正当古代北欧人来到格陵兰和拉布拉多半岛时，阿拉瓦克人已经到了海地。从海地，他们移居到古巴和牙买加，不久之后，他们又到达巴哈马群岛南部。这是他们大移徙的最后一次波动。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被称为拉库—凯里（Lukku-Cairi），即“岛民”。而他们的大陆起源却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加勒比人相隔仍不很远。1492年西班牙人发现美洲的时候，加勒比人已经征服了链条似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全部岛屿，并用他们自己部族的名字来称呼这些群岛所环绕的海域。那 19
时，他们经常侵袭并蹂躏波多黎各和伊斯帕尼奥拉的东端。在巴哈马群岛的卢卡伊人对加勒比人的威胁非常警觉，有些人或许同他们有过接触。哥伦布写道：“我看见有些人的身上带着伤疤，我用手势问这些伤疤表示什么，他们也用手势来回答，说附近岛屿的人曾要掳掠他们，他们进行了自卫；因此，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加勒比人从大陆到那里去，为的是俘虏卢卡伊人当奴隶。”

卢卡伊人没有铁器，所以不懂得铁的用途，竟赤手去抓西班牙人的锋利剑刃。他们一般不随身携带武器，也不擅长射箭投矛，因此很容易被嗜血成性的加勒比人所掳获。

若不是欧洲人的到来，加勒比人很可能把卢卡伊人追逐到大西洋海岸，最终将其消灭在那里。照这样来看，我们必须把阿拉瓦克族的卢卡伊人看作当然的最初巴哈马人，而不是加勒比人。

要想综合我们现有的关于卢卡伊人的知识，正象把益智分合图不够数的图片拼成整图一样，是徒劳而无功的。彼得·马特说道，卢卡伊人说着一种“柔和悦耳的与拉丁文同样流畅的”语言，并且现代英语字典里大约有十六个阿拉瓦克语的单词及其派生词：avocado(鳄梨)，barbecue（烧烤全牲），buccaneer（海盗），canoe（独木舟），Carib（加勒比人），cannibal（食人者），cay（珊瑚岛），guava（番石榴），hammock（吊床），hurricane（飓风），iguana（蜥蜴），maize（玉米），manatee（海牛），perogue（独木舟），potato（马铃薯），tobacco

（淡巴菰或烟草）。虽然如此，阿拉瓦克人并没有文字，可供考古的遗物也极少。关于巴哈马工艺品方面，独立的考察虽然有过十次之多，同时，象西奥多·德·布埃，W·K·布鲁克斯和H·W·克里格那样的专家也对其进行过多次研究，但在那个领域里，真正有系统的工作却没有开始。除了拿骚公共图书馆和华特林新近建成的新世界博物馆所存有的若干工艺品以外，其余的都已经流散或遗失。

一个完备的集藏，就要求对阿拉瓦克工艺品的标本加以相当全面的精选。大部分的出土物，是在比米尼至伊纳瓜之间的大约十二个洞窟以及
一些所谓的“香蕉洞”里掘获的。这些出土物一 20
般总是和阿拉瓦克人的骷髅混埋在一起，这表明了某种形式的葬仪。例如，1912年，在比米尼发掘出一枚钻了孔的玉耳环和一具宗教用的珊瑚制的物神象。有的陶器已经由德·布埃在凯科斯群岛上进行了详细研究，并认定别处的卢卡伊人还未曾使用过，而它们却是近年来在长岛汉密尔顿洞群和伊纳瓜盐池山岩洞里被发掘出来的。这些出土陶器的残片上面绘刻着各种粗糙的图案：连环

形，有核心的圆形，蹄形，以及断续的缺刻纹。有一宗出土的残片，还显示出模制的小人头象。很显然，有些器皿是薄壁的，以简单的把耳代替把手。

在腊姆岛哈特福特洞窟里，曾发掘出一些具有鱼、半人半兽和纯属装饰图案的粗石雕刻。当地通称为“箭石”的硬石“凿子”是非常普通的。还有几块磨盘石。硬木的箭头在埃留特拉，带把的木碗在几个岛屿都被发现。在安德罗斯群岛的蒙戈罗夫岛有被假定是出土物的一只大独木舟，船桨齐全，可惜还未能加以鉴定。

最引起兴趣的出土物，或许就是六条卢卡伊人的杜侯（duho），即仪典上用的石凳或木凳，其中最好的一条是1935年在汉密尔顿洞群里发现的，附有马德拉木① 曲形的靠背。大多数杜侯，形状与海龟相似。鲁思·沃尔珀新近在华特林的瓜纳礁所发掘出来的一条杜侯，显然是模拟着该岛已经绝迹了的巴哈马蜥蜴而制成的。

如果有一批专家对巴哈马的考古文物进行系

---

① 马德拉木，产于大西洋葡属马德拉群岛，因以得名。——译者

统的编目，就必然会对卢卡伊人的分布状态，他
们的风俗习惯以及岛屿之间的往来情况，得出某
些新的结论。对于大安的列斯群岛中某些人口稠
密的岛屿上的村落遗址、贝冢和洞窟，已经有人
做了形式上的调查；对于残留在南美洲的阿拉瓦
克人，研究工作也正在进行着。在现有的情况
下，我们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这些方面的成果。
通过那些调查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适用于
卢卡伊人的推断，虽然当时在瘠薄的巴哈马群岛
上的生活一定是艰难得多，并且更加依赖于海洋。
当地没有合适的粘土，一切陶器都是从海外带
来。有些物品必须从外地运进岛内，如金饰、硬
木及软玉、翡翠一类的硬石，因而也一定是相应 21
地缺少的。此外，某些适合于较大岛屿耕种的农
作物，在巴哈马群岛也一定是找不到的。然而，
有一种农作物似乎是巴哈马的特产。由于黑色的
垆坶土在华特林、腊姆岛和长岛被发现，这些岛
屿似乎出产过阿拉瓦克人所知道的最优质棉花。

卢卡伊人是一支处于欧洲人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即发展阶段的原始农民和渔民。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天写道：“他们赤身裸体地在外走

动，连妇女也是如此。我只看见一个姑娘，其他都是年轻男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三十岁以上的。他们体型匀称，身躯娇雅，容貌清秀。他们的头发象马尾毛那样既粗又短，披散在眉毛上方，只有一小束垂在脑后，长而从来不剪。他们当中，有些人在自己身上涂了黑色（那是一种加那利群岛人涂的非黑非白的颜色），有些人涂了白色；有些人涂了红色，也有些人找到什么色，就涂什么色；有些人涂面，有些人涂全身，有些人只涂眼睛，有些人只涂鼻子。”

关于卢卡伊女人，彼得·马特能比哥伦布介绍得还要详细。他写道："据说，卢卡伊群岛的女人非常漂亮，邻近地区的无数居民迷于她们的美色，为了求得她们的爱，便背井离乡，在她们那里定居下来。又据说，卢卡伊群岛的岛民和远离比米尼、佛罗里达的开化地带的人相比，男女之间更有仪文礼节。”

卢卡伊人脸庞宽阔，面貌和东方人极为相似，前额通常在幼时用两块小平板夹得扁平。这种奇风异俗，不仅要在他们的脸上增添点特征，而且这种夹得变厚了的骨骼可以抵得住敌人的弓

箭，甚至能防御西班牙人的利剑。卢卡伊人常常用棉线带子缠绕那纤弱的胳臂和小腿，这样就使四肢受损，达到了丑恶的程度。

卢卡伊人如果穿上衣服，也只是围一条用叶子编织的或用染色布料缝缀的腰布，而彼得·马特所叙述的一种裤子，只是非处女的青年妇女们 22
穿的。不论男女，都喜好装饰，他们除象哥伦布所叙述的那样，在自己身上涂色以外，还在身上刺绘各式各样的花纹，有时还戴着项圈、手镯和用贝壳、骨头和羽毛制成的头饰，有的时候，还在一个鼻孔里嵌着一颗小金豆。

卢卡伊人是一支值得称赞的民族，和那些鲁莽而贪婪的卡斯提尔人[①]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谁都说，他们是温和而豁达，爱好和平的生活与纯朴的娱乐。正如波得·马特所说，“他们似乎住在古代作家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黄金世界里。在那里，人们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争吵，没有法官和诉讼，顺应自然而享其乐。”

---

① 卡斯提尔人（Castilians）指西班牙人。——译者

哥伦布向他的君主写道，“他们非常慷慨大方，非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他们所有的东西，一旦有人要，就不但不会拒绝，相反的，还主动地让别人来分享，以表示他们的一片诚意。不管你给什么样的物件，贵重的或微小的，他们都乐于接受。我曾禁止把一些琐碎的东西给他们，如残破陶器、绿玻璃和针结花边之类，但是当他们得到这些物件时，总认为得到的是世界上最珍贵之物。”

卢卡伊人喜好唱歌和舞蹈。这两项他们统称之为阿里托（arieto）。在象酋长举行婚礼那样的节日里，便举行部落歌唱，诗歌吟诵，男女舞蹈，一般是单人舞，有时也有集体舞。逢到这种节日，他们喝大量的由玉米和木薯①酿成的啤酒。

阿拉瓦克人有一种相当普及的球赛，叫做贝托斯（batos）。为这项球赛，每个村落都开辟了一块专用的球场，四周有为观众而设的石板或石凳。球队队员多少不一，一方最多可达三十

① 产于美洲热带。有毒，去毒后方可食用。——译者

人，但两队人数必须相等。男女都参加比赛。球是用一种坚硬而有弹性的物质，或许是橡胶制成的。球从一方打到另一方，用头部，肩膀，臀部或膝盖把球在空中打来打去，但不准用手打。象打排球一样，球落在哪一方地上，那一方就输了。至少在较大的岛屿上，村落之间常常互相比赛。除了村落节日中的歌唱，舞蹈和饮酒之外， 23
球赛要算阿拉瓦克人最喜好的了。

最初让西班牙人看到有吸淡巴菰——这种植物被称为科希巴（cohiba）——这种奇怪的习惯的，就是古巴的阿拉瓦克人。所谓淡巴菰，原来是阿拉瓦克人给他们的古怪的Y形烟斗所起的名称。至于卢卡伊人是否也吸淡巴菰，我们还不知其详。但是哥伦布曾记述过，他看到一个卢卡伊人用独木舟装运一种显然为土著人所珍视的叶子，往来于两岛之间。

印第安人吸着用叶子卷成的管子，形状很象雪茄烟，起初西班牙人把它误认是衔在牙齿间的点着了火的火把。可是他们比较喜欢使用烟斗，常常在仪典中用来吸烟。他们将Y形烟斗的两个枝管插在鼻孔里，把烟，或烟草末，深深吸进去

之后，便昏迷起来了。不久以后，西班牙人也染上吸烟的习惯，但还没有达到麻醉的程度。过了几年，吸淡巴菰这种烟草，风靡于全欧洲。这种嗜好所造成的恶果，也许可以算作阿拉瓦克人的复仇吧！

卢卡伊人的房屋是圆形的，上有圆锥状的屋顶，形状颇似南非克非人① 的茅屋(kraal)。虽然没有使用泥浆和砖瓦，这种房屋的结构倒是很牢固的，除了最强劲的暴风以外，一般的大风都能经受得住。卢卡伊人建造房屋时，首先在中央竖起一根高大的柱子，然后在大柱子周围栽上一圈较短的细柱子。他们用藤子、蔓草和树枝条编成墙壁，中间留一个门道。屋顶上敷盖着棕榈叶。

在小屋里，家具极少，只有几个珍爱的陶罐，一两条小凳和家庭每个成员自用的吊床。这些吊床是用棉线网或染色棉布制成，对西班牙人来说，却是一种新奇的物件。在五十年之内，全欧洲的水手们都采用了这种吊床。1492年以前，欧洲出海航行的普通海员，能找到什么地方，就

① 克非人（Kaffir），是南非说班图语的一种民族。——译者

在那里睡觉。遇到晴天，便露宿于甲板上，否则睡在舱底的污水飞溅、滑虫侵蚀的木板上面。

阿拉瓦克人的村落没有一个是大的。古巴境内的那座古巴纳康（Cubanacan）“城”，即哥伦布期望他的使节在那里找到忽必烈汗金殿的地方，仅仅有五十间肮脏的茅屋。在人口更少的巴哈马群岛，哥伦布看见过的最大村落也仅仅有 24
十五间左右的房屋。其他地方往往是住着单独一户人家。

阿拉瓦克人的酋长称作卡西克（cacique），他们的地位高低是根据他们所统辖的地区大小而定。卢卡伊人似乎不象海地的印第安人组织得那样严密，海地的印第安人分成五个“王国”，那里的酋长的确都是非常高贵显赫的野蛮人。正如斯文·洛文所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卢卡伊人的酋长权力曾经扩展到其村界以外的地区。但是，卢卡伊人的酋长确实比他们的同僚更享有特权，虽然也和他们的同僚一样，参加打猎、捕鱼和田地劳动。在农作物收获之后，这些酋长将一切庄稼收存于大谷仓里，再根据需要把粮食分配给每个家庭。纵然法律上的争端极少，但酋长的

话就是法律；他们既是统治者，又经常兼任祭司。

在举行仪典时，酋长们都穿着华丽的衣着。1496年，哥伦布把酋长的某些装饰品带回西班牙，借以给君主以印象。安德烈斯·贝尔纳尔德斯描述这些装饰品时写道："……王冠、假面、腰带、项圈和许多棉织品，在所有这些物件上面，把物神表现为猴子或猫头鹰的头，或另外更加丑陋的模样；有的是用木头雕刻的，有的是用同色棉布缝缀的，有的是用宝石琢磨的。他带来一些四周有金眼的带翼的王冠，其中特别是一顶大而高的王冠，据说是属于酋长卡奥纳博的，四周有盾形的帽翼，附着象小酒杯那么大、半马克①重、以稀奇而巧妙的样式镶嵌的一些金眼，好象珐琅那样灿烂夺目。物神的表象也装饰在那顶王冠上面。我相信，在他们心目中，物神就是那个模样；他们是偶象崇拜者，将恶魔奉若天神。"

卢卡伊人村落的大小是由食物获得的可能性

① 马克，是欧洲古代的重量单位，用以衡量金银。——译者

而定。阿拉瓦克人似乎吃得很少，菲迪南德·哥
伦布记载说，一个西班牙人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将
足够供一个普通阿拉瓦克人吃一个星期的。因为
可耕地的土质贫瘠，又因为除了金子外，没有别
的金属可供制作鱼钩和长矛，所以这样节制食
欲，与其说是出于自愿，不如说是迫于必要。卢
卡伊人种植的农作物，有玉米、山药、甘薯和木
薯，木薯去毒后，用来制成“丝兰”面包。虽然 25
西班牙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认得了卢卡伊人所广泛
耕种的棉花，但对上述那些农作物却是陌生的。
必须牢记的是，西印度群岛的现代食用植物，诸
如可可、甘蔗和香蕉之类，都不是本地的土产，
而是西班牙人从非洲输入的。

卢卡伊人用古老的方法耕地，这种方法现在仍在外围小岛①使用着。首先，把田地里的杂草及树丛焚烧干净。根菜作物种于土岗上，玉米种于田地或蜂窝状岩石的土穴里。妇女们携带着一袋浸湿的谷种和一把当作“小锹”用的尖头木棒来从事播种。随后，孩子们也起着稻草人的作

① 外围小岛，指巴哈马群岛中拿骚所在地新普罗维登斯岛之外的其他岛屿。——译者

用，负责保护成长的庄稼。

有一种卢卡伊人称之为乌提阿（utia）的野兔，类似于仍可在特克斯群岛和牙买加所看到的刺鼠①，是巴哈马土生的唯一陆地哺乳动物。印第安人视乌提阿为上等食物，他们带着埃尔科（alco）去追捕。埃尔科是一种不会吠的黄色小狗，他们有时也把这种狗烤熟来吃。随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米歇尔·德·库内奥，曾尝过这种哑犬的肉，并宣称“一点也不好吃”。卢卡伊人迫于食物不足，连蜥蜴、黄蛇、海牛都吃。虽然如此，他们却不象加勒比人那样采取同类相食的办法，以补充肉食不足。这一点可能使人感到意外。

卢卡伊人时常用套索捉鹦鹉，用线网捉野鸽。但是，他们食物的最丰富的来源当然是海洋。阿拉瓦克人村落遗迹中的贝冢，基本上总是由软体动物的贝壳、鱼骨和海龟的甲壳所组成。正如现今的巴哈马人喜食海螺一样，海螺或许也是卢卡伊人所珍重的食物。他们捕鱼是使用网、

① 刺鼠，形如豚鼠，较兔略大，为中、南美洲特产。——译者

棉线绳和骨钩或龟甲制的钩，或用装有骨尖的鱼叉。他们也可能仿效过古巴人，用一条捕获的小鱼为钓饵去捉大鱼。

很自然，岛民是完全娴熟于海上生活的。哥伦布记载道，这些岛民无所畏惧地泅水，甚至凫出海岸一里格①之远，并且非常熟练地驾驭独木舟。这类独木舟大小不一，小的可容纳一名桨 26
手，而在牙买加所看到的是一条长九十六呎、正横八呎的特大型独木舟。特大型的能容纳一百五十名桨手，所使用的桨形似面包师傅的铲子，当桨手们人人使劲划的时候，船行的速度能超过欧洲最快的帆船。每个桨手随身携带一个小葫芦瓢，一旦不太安稳的小船颠翻或沉没，就可供戽水之用。

独木舟通常是用一整棵木棉树的树干制成的。首先，巧妙地把篝火放在选定的木棉树的底部，将其烧焦后再行砍倒，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将树干挖空。仅仅在最后修整的过程中，才使用石斧和石凿。独木舟是阿拉瓦克人苦心孤诣地建

① 一里格相当于三哩。——译者

造的，因而成了他们最贵重的财产，在雕刻上显出高度的技巧。哥伦布向贝尔纳尔德斯报告说："每一个酋长都有一条自用的大独木舟，他以此而感到自豪，正如卡斯提尔人的绅士因拥有一艘优良的大船而骄傲一样，独木舟从船首到船尾都刻绘着彩饰，精致得十分惊人。"

表现着阿拉瓦克人木刻和石雕技巧的一些艺术品，已经保留了下来，无疑还有许多有待于发现。但是，他们的最精致的出品，可能已经被毁坏了。经他们细心制作的、镶嵌着金子的装饰品，都被西班牙人熔化净尽，西班牙人就是用阿拉瓦克人崇拜偶象这个脆弱的藉口来掩盖自己的贪婪。

最初西班牙人不愿意承认阿拉瓦克人信仰任何宗教。哥伦布把这点看作是相信阿拉瓦克人容易成为基督徒的理由。但是，后来的调查表明，阿拉瓦克人有一种高度发展的宗教，直到现在，一些落后地区仍存留这种宗教的某些特点。

祭司是部落神话的维护者。因为没有文字，祭司便以歌曲的方式把神话流传下来，这种情况在新西兰的毛利人中也存在过。阿拉瓦克人对世

界和人类起源的解说，在信奉印度教的人听来，一定会感到它不比圣经里的《创世纪》那样更为荒诞无稽的。传说太始之初，全人类都关在一个洞窟里，日月星辰关在另一个洞窟里，由一个监护人看守着。有一次，这个监护人睡着了，太阳和它的侍从便跳进了天空。一队精选的男女由英雄瓜古吉昂纳率领，跨入了光天化日之下。

看望太阳是这些原始人的禁忌。凡是胆敢去 27
看望可怖的阳光的人，就变成了走兽、飞鸟或树木。陆地就是这样地充集了生物。一个装满着水和骨头的葫芦瓢偶然翻倒，于是就创造了海洋以及海里的各种生物。

阿拉瓦克人信奉两个至高无上的天神，一个是男的，另一个是女的。他们还相信人类有灵魂，死后要进天堂——科雅巴（coyaba）。在那里，无始无终的宴饮和歌舞使人们忘记了干旱和飓风，痛苦和疾病。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又因为感到人世间的苦楚，他们便把生命看得很轻了。他们竟冷酷无情地把生病的亲属抬进丛林去，听任其在自己的吊床上死去。患病的酋长要被勒死，使其能尽早地奔赴科雅巴，借以表达尊敬之

意。

阿拉瓦克人的宗教，其最邪恶而且最顽固的一点，大概就是对物神幽灵的信奉。这些物神的幽灵附于圣树、雕象或死者遗物之中。疾病和灾难是埋怨或发怒的物神的动作。好运是物神喜悦的一种征兆。很自然，必须使这些神灵心情舒畅，为此举行了极为隆重的祭典，借以劝解部落的物神，或仅仅向他们表示虔诚。

在举行这些祭典时，每个人都要穿上盛装，酋长就要敲着板鼓领队游行。他们用木薯制成的祭品来祭祀物神，并且把祭品象符咒一样保存下来，用以防御威胁着阿拉瓦克人生存的四大灾害：火灾、飓风、疾病和加勒比人。

由阿拉瓦克人的祭司们代代相传下来的神话和预言，是丰富而多样的，只有民间口头的传说才能与之比拟。在这些预言中，有一个和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所传布的相仿佛，那就是说什么将来有一天，一个半人半神的种族要跨过东方大海而来，他们身穿盔甲，以雷霆闪电为武器。对待他们，正如对待物神一样，没有抵抗的可能，只有谦恭和顺从，才能够躲避恶运。

第三章　哥伦布 28

在中世纪，欧洲的每一航海民族，都有他们自己关于西方岛屿的各种传说。最早绘制地图者或听凭想象，或轻信传说，除此之外，别无依据。在爱尔兰人中流传着关于公元六世纪僧侣圣布伦丹的夸张的故事，据说他曾经发现过三个地势低下的岛屿：洛沃岛、卡普拉利亚岛和圣博罗敦岛。后来，他们坚信在亨利—巴西那边有一海岛，但1480年有一些布里斯托尔人进行了探察，结果一无所获。在亚瑟王的传说中提到在锡利群岛之外有里昂尼斯；传说中沉没的海岛阿特兰蒂斯位于布列塔尼的外面。1436年，德国的一位制图家大略在纽芬兰的位置上，画上了一个海岛，名为斯托加菲斯加。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则把这个位于西部的想象中的海岛称为安蒂利亚岛，据传说，有七个葡萄牙主教曾在公元八世纪移民到那里，以后又有形形色色的迷航的水手去探访

过。

公元1000年，古代北欧人利夫埃里克森曾经越过冰岛，最远到达了文兰（可能是马萨诸塞），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代北欧人的实际的发现竟丝毫没有传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南的国家。不过那时的北欧人自己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除了发现近北极圈的不引人注意的群岛之外，还发现过什么别的地方。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寻找亚洲，同时也绝不会向南航行到巴哈马那么远。

大约在1430年，当有几只葡萄牙船被暴风向西吹去的时候，亚速尔群岛九个岛屿中的第一个才被他们发现了。虽然在那一纬度的地带，西来的劲风使从亚速尔展开的探险工作受到阻碍，但是在那里已经出现了迹象，证明再往西和往南远行，还会发现更多的陆地。偶而发生的暴风将没有见到过的浆果、或小树枝吹到那些岛屿的海岸上，一个名叫文森特的舵工还拾到了一块雕刻的
29 木头。甚至传说在弗罗勒斯曾发现两具东方扁平面型的尸体被海水冲到岸上去。然而，每年从遥远的南方返航、绕过非洲回到里斯本的船舶，都

满载着贵重货物如象牙、金砂、胡椒以及奴隶，因此，上述的那些琐物也就被人们忽视了。这些琐物只好等待着哥伦布的天才去探求。

克里斯托佛·哥伦布是一个中产阶级热那亚织工的儿子，他在航海和纺织业方面都当过学徒。1476年，他无意中来到葡萄牙，参加他弟弟巴塞洛缪在里斯本开设的绘制地图的店铺的工作。在葡萄牙居住八、九年的期间，他学会了一手绘制地图的好技术，曾经远航到过非洲和冰岛，并同亨利王子的一个船长的女儿结了婚。在此期间他曾抱有“去印度冒险”的宏伟幻想。

哥伦布当年的画像，现在已不存在了，但是，从所有的描写中共同得出的特征是：宽阔而坚实的下腭，一双敏锐的蓝眼睛，显示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物的形象。早在1484年，他就对于葡萄牙取道非洲探索东方的缓慢进度，感到很不耐烦。他向国王约翰二世以及任何愿意听的人提出过建议，其建议同1884年有人所持的，人可以飞行的想法一样异想天开。他要求那些讲究实际的人相信，到东方的捷径就是向西航行，这甚至比穿过君士坦丁的那条受到阻隔的旱路还要近。

有人浪费了不少笔墨，描写关于哥伦布在说
服人们相信他的“去印度冒险”计划切实可行时
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自古希腊以来的学者，以及
那些亲眼见到船只和陆地在圆圆的地球边缘上消
失的那些无知的水手们，都相信地球是圆形的。
果真是如此，那么，不论向东或者向西旅行，都
可以到达亚洲。按照佛罗伦萨的托斯坎内里①
1474年的论述，哥伦布的任务是说服有钱的赞助
者们相信，向西航行“遇到顺风，几天之内”就可到
达西潘古②和中国。他把最乐观的估计降低以后，
日本与里斯本相距顶多不过三千哩。事实上，空中
航线的距离也超过了一万一千哩。哥伦布就是这
样地企图说服怀疑者们相信自己的谬误主张；因
30 为他判断错误的结果，导致了美洲的再发现，而
他的谬误主张这个事实却很容易地被人遗忘了。

约翰二世深为哥伦布所感动，但还未曾给以官方支持。一方面，因为国王曾经资助过驶往亚速尔群岛以西的传奇性的岛屿安蒂利亚的航行，

① 托斯坎内里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地理学家，他认为从大西洋向西航行便能到达亚洲。——译者

② 西潘古（Cipangu）是意大利人从前对“日本国”的称呼。——译者

并且那次航行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又因为1488年巴托洛梅·迪亚斯从好望角方面成功地归来，所以，国王把葡萄牙人的到西方探险的任何建议都置诸高阁了。其实，华斯哥·达·加马后来在1497年仍然替葡萄牙发现了急于寻求的一条通往亚洲的航路。当未知的世界于1493年被瓜分的时候，葡萄牙人分得了非洲及其以东的土地，而西班牙人则分得了西方的土地①。

哥伦布既对葡萄牙绝望，便把最大希望寄托于邻国西班牙。1485年，他的妻子死后，他离开了里斯本来到加的斯附近的帕洛 斯。在 六 年 之内，哥伦布断断续续地跟随西班牙朝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走遍了全国。就在这个期间，他的弟弟巴塞洛缪觐见了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和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可是无论哪一国君主都不对这伟大的冒险事业感到兴趣，因此，无意识地把建立十六世纪美洲帝国的大好机会让给了西班牙。

---

① 1493年，教皇为了解决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关于殖民地的争端，下了特别敕令，规定在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穿过南北两极为一界线，在该线以西归西班牙，在该线以东归葡萄牙。——译者

自从1474年以来，西班牙在亚拉冈的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卡斯提尔的伊萨贝拉的联合统治下，已成为欧洲的第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它的创立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虽然西班牙当时还未曾定都，但是国内一切权力却已经集中了。一切事业，诸如农业、工业、商业、军事、航海和贸易等，统统集中在王权之下。到了后来，在西班牙向外扩张的时期，各种殖民事务很自然地划归于国家的中央政权管辖。

当哥伦布到达帕洛斯时，西班牙在扩张方面仍存在着一个很显著的障碍。从西班牙领土上赶走穆斯林摩尔人的收复失地战争已进行了几个世纪。恰在这个时候，将摩尔人从他们的最后据点格林纳达驱逐出去的战役正达到了高潮。虽然伊萨贝拉对哥伦布颇加器重，并且一年提供了一万二千铜币的少量津贴，但是，她的全部精力和物力都集中于应付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直到1492年4月，即攻下格林纳达三个月之后，伊萨贝拉才依照哥伦布的要求给予帮助。那时的哥伦布
31 已经四十一岁了。摩尔人刚被驱逐后不久，接着就是美洲的发现。这两件事未必是出于巧合，

在收复领土之后，自然会紧接着出现对外征服的时代。

伊萨贝拉赐给哥伦布大约等于一万英镑的费用，以用于远征探险；还配备了两艘西班牙轻快帆船“尼尼亚号”和“平塔号”，每艘大约六十吨，并宣布其所雇用的水手由王室负担俸给。一旦大功告成，1492年4月30日所立条款的价值就将更甚于此了。条款规定：以唐·克里斯托瓦尔·德·科伦命名的哥伦布将被封为世袭的“海上大将”，并在其所发现的土地上充任世袭总督，分享全部产品的十分之一的权利，同时可在任何一笔航海贸易中享有八分之一股份的特权。

哥伦布的著名旗舰“圣玛丽亚号”是从桑托尼亚的胡安·德·拉·科萨手中租赁来的，这艘加利西亚式的大船载重量大约是一百吨。他招募了九十人作这三条船的水手，又任命了马丁和维森特·平松弟兄二人分别充当“平塔号”和“尼尼亚号”的船长。除了两名意大利人和一名葡萄牙人之外，大多数船员都是从帕洛斯及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城镇招募来的。他们个个都是身体健壮，具有水手气魄的人，而决不是一种象谣传

所说的一群地方监狱里的游荡儿。

经过十个星期的准备之后，哥伦布于1492年8月2日拂晓，从帕洛斯启航。他向南航行，直到发生东北信风的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以便避开他所熟悉的亚速尔群岛间强烈的西风。船队在戈梅腊暂停了三周，在此期间"尼尼亚号"上的三角帆的主帆换成横帆，最后于9月6日起锚，向海洋图上未经标记的茫茫大海横渡而去。

三十三天航行的故事曾经为人们千遍万遍地反复传述。这次航海很顺利并且没出事故，相对来讲哥伦布航海术的错误要算是最不平常的事了。他只试用一次凭天体"定位"的方法，便测定"圣玛丽亚号"位于拉布拉多的纬度上——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按照"推测航海法"①来说，他所估计的船队进度也超出实际情况的百分之十，因此，他为了激励水手奋勇前进而公布的"假"纪录(在纪录上少报行程——译者)，却比他在航海日记中所记载的更加真实。

除去低低的云片使船队误认为陆地而几次发

① 这种"推测航海法"，系指因不能观测天体仅据方位速力而测定船之位置的方法。——译者

出错误的警报以外，船队始终连传说中的安蒂利亚的影子也未看见。9月16日，船队却进入了神 32
秘的藻海①中，成为探险北大西洋藻海地区的首批水手。在那十九天探险中，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入越来越厚的不可能穿过的大片海藻之中。不断吹来的东风使船队的水手开始担忧，只怕不能顶风返回西班牙了。一天之内，他们至少航行一百八十二哩，但是，仍然看不见陆地的形影。

10月8日夜间，哥伦布趁着月光看见了一大群候鸟，他便立刻命令改变航线，转向西南偏西的方向，跟随候鸟朝着陆地前进。这一偶遇在历史上关系重大。假如船队继续西行，就很可能在埃留特拉的北部着陆了。接着穿过墙洞②和普罗维登斯海峡驶进墨西哥湾流③，船队就有可能顺海流向北行驶，到达北美洲海岸。那么，首先到这些地带殖民的就可能是西班牙人而不是英国人了。

可是这三条小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正朝着

① 北大西洋北纬20°—35°、西经40°—75°间广大的海区，丛生以马尾藻为主的藻类，又名马尾藻海。——译者

② 在大阿巴科的南端。——译者

③ 自墨西哥湾向北流的大海流。——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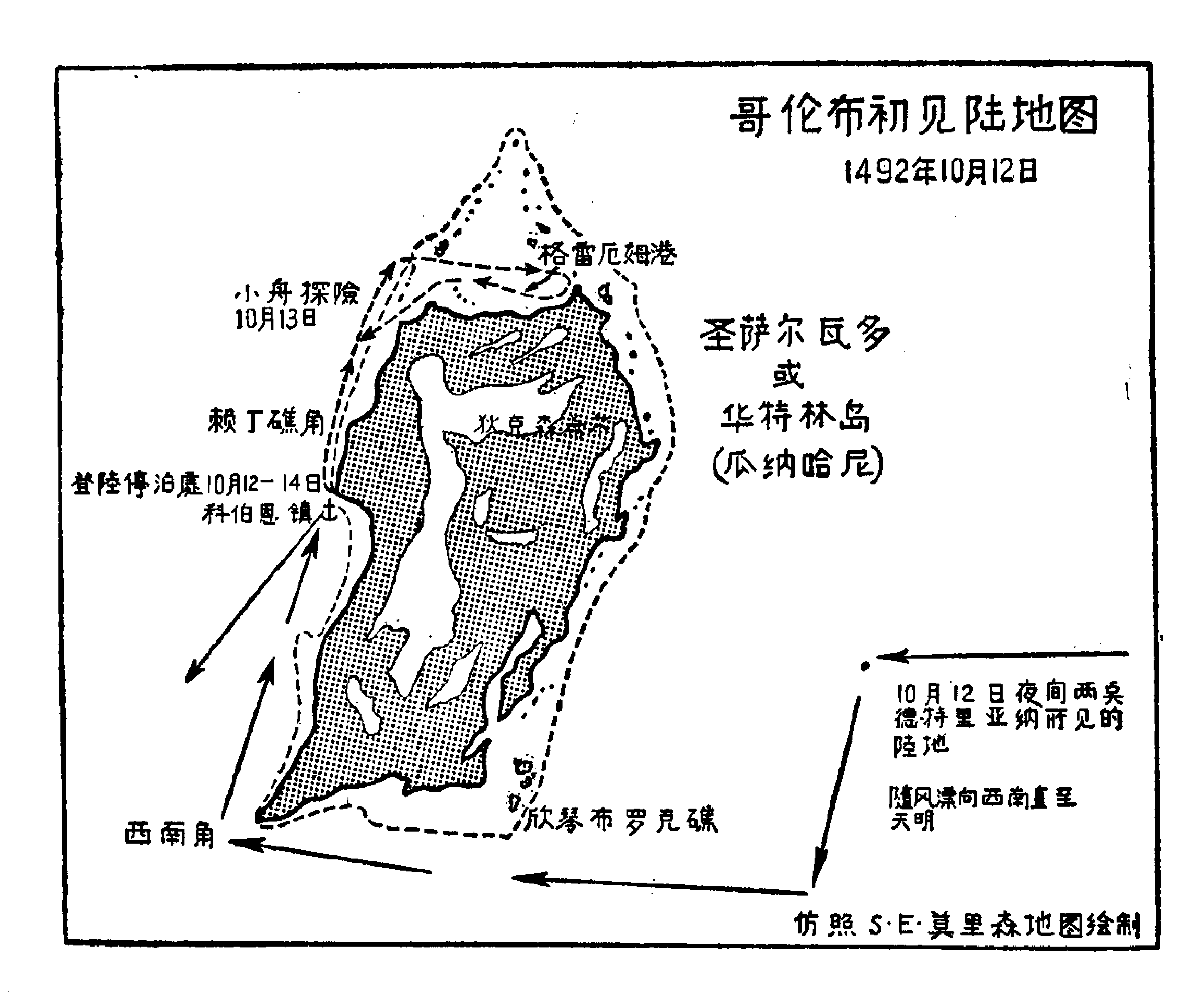
巴哈马南部飞驶。在海上度过了三十一天之后，于10月10日，旗舰上发生了哗变。在海上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而见不到陆地的水手还能活着回去叙述自己的经历，这是以前还没有过的。哥伦布曾经用好话来说服怨言不止的水手们，劝其安于职守，但到了这时，甚至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不知何时才能望见西潘古。他许诺三天内如还见不到陆地，就要返航。

不久，情况就开始好转了。11日那一天，发现了有接近陆地的可靠迹象：一根带着花朵的树枝、一根甘蔗、一块雕刻的木板。那是整个船队惊喜若狂的一夜。

夜晚10点，月亮还没升起，三条船乘着时速达九浬以上的东风向前猛进，当时哥伦布认为他看见前面有一道亮光，“仿佛忽明忽暗的蜡烛之光”，两个海员也自称看到了。其实，他们都看错了。“圣玛丽亚号”与陆地相距大约还有三十五哩之多，同时卢卡伊人也不会在这样的狂风之夜到三千呎的深海去捕鱼。女王伊萨贝拉许诺赏给第一个发现陆地的人每年一万铜币，这虚幻的亮光就是哥伦布个人期望成功地获得这笔奖金的

依据。

这项奖金照理应属于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他是“平塔号”船楼上的瞭望人。“平塔号”当时是走在另外两只船的前面。夜间两点钟，他看见了一线黑暗的陆地，在月光下从一条沙滩里泛着隐约可辨的银光。他不禁大声喊出十分紧 33
要的词语：“陆地！陆地！”



船队停止开驶以便变换方向，一直到了天明，这时才发觉他们漂到了一个小岛东南角那一

边去，这小岛周围是珊瑚礁。这三只船又扬帆前进，到该岛的西面去探索，最后发现了珊瑚礁中的一个缺口，他们就在那里登陆。

西班牙人登陆的岛，当地土人称之为瓜纳哈尼，毫无疑问，该岛就是华特林岛，1926年以后官方也使用哥伦布当初的命名：圣萨尔瓦多。但是，在巴哈马历史上，围绕这一事件引起过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为无意义的激烈争论。主张大特克岛、卡特岛、腊姆岛、萨马纳礁或马亚瓜纳为哥伦布初见陆地之处者大有人在。但是，穆尼奥斯（1793年）、比彻船长（1856年）及鲁道夫·克罗诺（1890年）等人的论证——他们的论证又得到莫里森在他为这位探险者所写的完善的传记（1941年）中的研究资料所补充——明确地证实了，最先见到西班牙人的是华特林岛，而不是任何其他岛屿。

34 几乎可以肯定，哥伦布确实是在华特林岛的费南德斯，即长湾某处，在王室公证人罗德里戈·德·埃斯科维多以及罗德里戈·桑切斯和平松兄弟俩的陪同下，首先上了岸……他们“举着远征探险队的旗帜，上面画有绿色十字架，在其

一翼上写着F，另一翼上写着Y，在每个字母上方又画有国王或王后的皇冠。他们全体跪在地上感谢上帝的恩赐，并含着喜悦的热泪伏抱大地，为着他们能够终于踏上这片土地而感到无限幸运。随后，海上大将站起身来，命名该岛为圣萨尔瓦多岛。于是……在聚集一起的当地居民面前，以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名义，用恰如其分的言词和礼仪占领了那个岛……”

起初被“天上的来人”的降临吓得逃跑到森林里的土人，很快就受到玻璃珠、手摇铃以及红帽子的引诱而出来了。这些土人不管他们有什么可怜的物品都拿来交换，他们拿着绿鹦鹉、长矛和一团团棉花向西班牙的船游去。

经过两天贸易之后，哥伦布带着两条小船到这个岛上进行探查。“黎明，我命令全装帆船和轻快帆船各准备一条小船，我于是沿该岛向东北偏北的方向前进，以便探查该岛的其他部分，也就是岛的东面。这样做，使我很担心，因为大群的岩礁团团地围绕着这个岛。虽然礁群以内有个又宽又深的港湾，足以容纳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全部船舶，但是入口处却非常狭窄。的确，在港湾里

有些岩礁，可是海水却象池塘般平静。今晨，我对这一切进行了观察，以便能上书禀奏殿下，以及寻找修建炮台的部位。我发现了一块看来似乎象个岛的土地，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岛……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从相连的土地切开，而改变成一个岛。”

1890年，克罗诺按照哥伦布航海日记中的详细记载，对华特林岛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探查。他驶入岛的北端即现在叫做格雷厄姆港的礁群以内的平静而广阔的水面，并且注意到发现者所描写的那些岩礁。他也看见了被选作炮台地基的海岬，它事实上由于后来海水的冲击，已经与本土
35 分离开来了。在这个以后形成的小岛上，克罗诺找到了一尊生锈的十八世纪大炮，这表明了，有人曾与哥伦布不谋而合地选定这个地点设防。克罗诺还注意到，哥伦布曾有这样的记述，圣萨尔瓦多岛内有个大湖，在各个被称为第一个被发现的陆地的诸岛中，唯有华特林岛才有这个独特的地形。唯独引起人们争议的一点是：哥伦布曾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是从圣萨尔瓦多朝着不同的方向来瞭望许多岛屿的，而实际上最靠近华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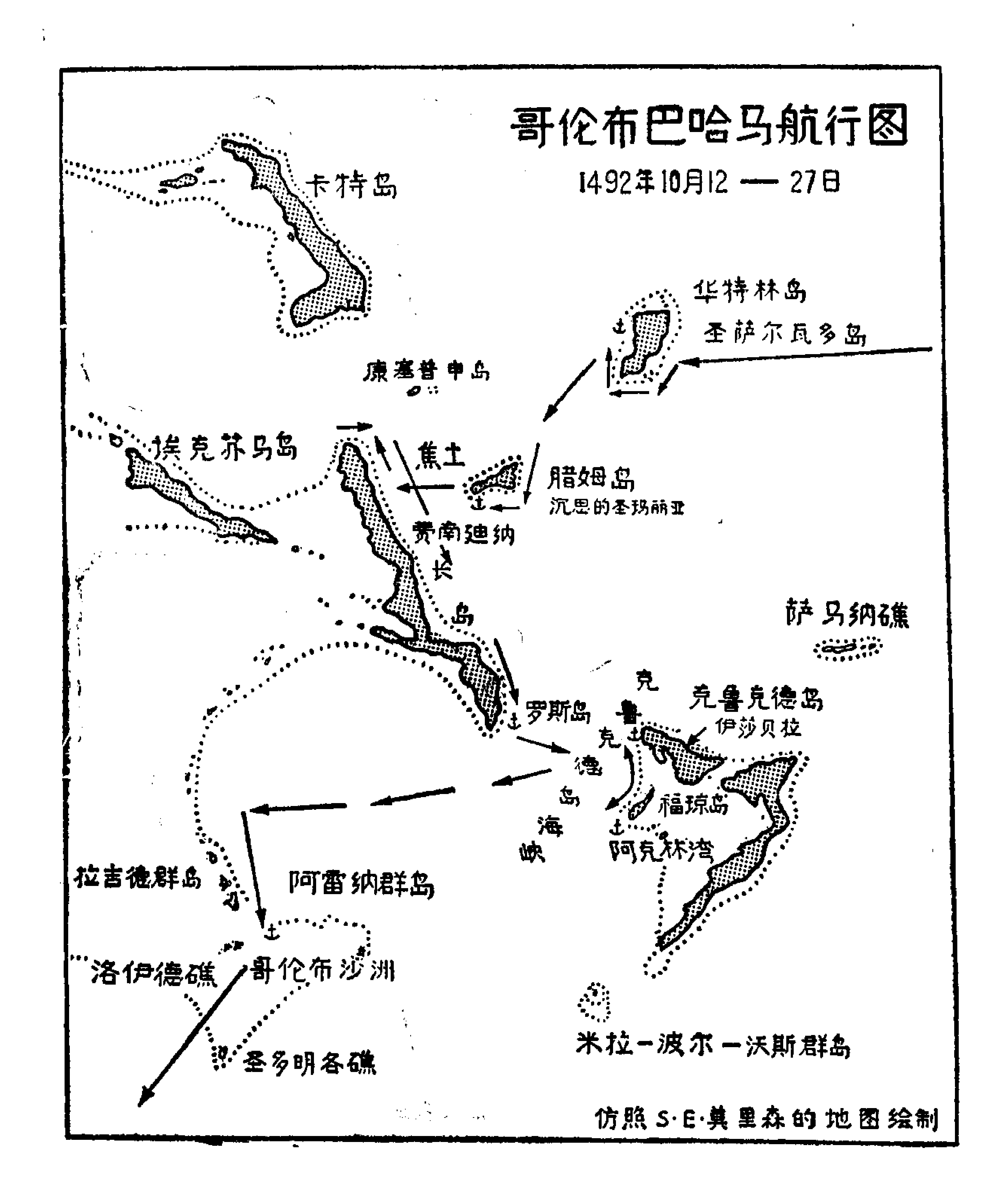
林的只有两个岛；一个在西南二十哩，另一个在西南偏西三十五哩，其实二者均在视野之外。

10月14日下午，大将哥伦布和他的船队出发驶向上述的前一个岛，即现在的腊姆岛，他给这个岛起了一个更加高贵的名字，即“沉思的圣玛丽亚”（Santa Maria de la Concepción）。土人热情地打着手势为哥伦布引路，可是这些土人不明白哥伦布是要寻找黄金和大城市，而误认为他要询问去往象他们所占有的那样岛屿和村落的道路。单纯的卢卡伊人起初没有想到西班牙人对他们身上带的那点小金属饰物比他们自己看得更加珍贵。同时，哥伦布也似乎没有想到，他从圣萨尔瓦多以及其他岛上所带走作为向导、人质和向君主供作实证的那些卢卡伊人，会持有任何正当理由来反对西班牙的寻求黄金。他写道：“他们应当是很好的奴仆并且能学会很好的手艺，因为我发觉，他们能很快地重述对他们所说的一切；我相信，很容易使他们成为基督教徒，因为，据我看，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求上帝保祐，我将带走他们之中的六名，以便教他们说话……”

10月16日，船队从腊姆岛出发，航行了二十

二哩，到达了哥伦布曾见到过的位于西部的一个小岛。因为最先出现在天边的是一些矮山的山顶，它们互相连接地形成一线，所以哥伦布开始时竟以为这是一连串的小岛。这个岛就是长岛，哥伦布当时把它命名为费南迪纳。他沿该岛六十哩的海岸航行了三天，在北部和南部的几处土著村落上了岸。这些地方就在现在名为焦土和罗斯岛
36 的居留地附近。在那里，他获得了巴哈马最珍重的必需品——淡水。虽然在费南迪纳，水手们第一次看到了吊床、烟草、玉米以及一种奇怪的树，这种树“从一个树干上长出各种不同的分枝”，但是，显而易见地仍然没有黄金。那时西班牙人才明白，在东南方向有一个被土人称为萨莫伊特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找到大量黄金。

西班牙人立即出发，穿过很深的克鲁克德岛海峡，来到了长礁，即哥伦布为其命名的伊萨贝拉。哥伦布为了寻找一条穿过阿克林湾的浅滩、通向在想象中那里必然存在的金色城市的道路，曾经沿着福琼岛和克鲁克德岛的海岸往来徘徊四天之久。哥伦布和他的船长们再度上岸，他曾用生动的词句描绘那里翠绿的草地，成群的飞鸟，奇异的



花卉，以及他们所捕杀的大蜥蜴。当时巴哈马的树 37
丛，远比现在茂盛，而哥伦布在他对该岛热情的赞扬中，确是言过其实的。他命名长岛南端为绿角，

福琼岛南角为奇观角，这无非是向君主做宣传。

探险者们天天盼望能发现一些象马哥孛罗所描述的那样居住遥远、肤色浅淡、衣着华美的日本人。但是，他们到处所见到的，都是一样贫穷的野蛮人，兴致勃勃地打着手势，指向前方幻想的黄金。这时他们指着西南方向，呼喊着“Colba”（古巴）。哥伦布以为他听到的是忽必烈汗这个富有魔力的名字。他满怀信心地命令船队再一次出航，10月24、25两天，船队穿过大海，到达大巴哈马沙洲的险峻的岩礁和浅滩。

对卢卡伊人说来，这条通到古巴的路线是最安全不过了，他们驾着独木舟，跨过一岛又一岛，中间最多不过是三十哩的深水地带。但是，哥伦布驾驭的是大船，那就要求他施展全副航海的技术，使船队安全地沿着锁链般的拉吉德群岛航行。他当时命名拉吉德群岛为阿雷纳群岛。10月27日，他终于经由洛伊德礁和圣多明各礁渡过大巴哈马沙洲的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湾，最后离开了巴哈马水域。

总计起来，哥伦布在巴哈马群岛仅仅呆了十五天。这次穿过这些岛屿的短途航行，和后来的

探险宏图相比较，就显得十分渺小了。虽然他绝不会相信自己没有发现通往亚洲的西行路线，但是他的四次航行却使西班牙以后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帝国，并且开辟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对于巴哈马人来说，由于他们的一个小岛的发现，促进了这样巨大的事态发展，这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引起自豪的事实。因此，1492年10月12日——海上大将在华特林岛登陆的日子——对于巴哈马儿童来说，恰恰象1066年对于英国人，7月4日对于美国人①那样的众所周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① 1066年9月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译者

38 第四章　西班牙殖民地

哥伦布航行之后，紧接着的是西班牙人对殖民地的开拓。拓殖权是随着发现权和征服权而俱来，1493年罗马教皇的敕令，实际上把西半球全部划给了西班牙。纳维达德——欧洲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殖民地，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建立在伊斯帕尼奥拉①的海地角附近的。到1506年，当这位探险家去世时，大约已有两万西班牙人移居在美洲了。

卢卡伊群岛土地瘠薄，没有矿产资源或任何重要的物产，与伊斯帕尼奥拉、古巴、墨西哥、秘鲁相比，自然是不会使西班牙人发生兴趣的。尽管十九世纪初期流行着各种传说，但还没有什么证据说明西班牙人确实在巴哈马建立过固定的居留地。彼得·亨利·布鲁斯于1782年所提到的

① 伊斯帕尼奥拉（即西班牙文Española）是海地岛的旧名称。——译者

卡特岛上西班牙人的遗迹要么是消失了，要么当初就是臆想的。

在其他民族来到加勒比海之前，巴哈马群岛在西班牙的帝国计划中还是无足轻重的，一直到了其他民族来到这里，其战略地位才赋予巴哈马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这些岛屿所具有的、也是西班牙人所期望得到的一种商品，就是那里的卢卡伊族居民。居住在比较富庶岛屿的阿拉瓦克族居民人数太少、体质太弱，并且不愿意替他们的新主人劳役。此外，他们数以十万计地死于疾病、饥饿和虐待，有的甚至服木薯的毒汁而自杀。拉斯·卡萨斯写道："我发现许多人死在路上，有的人在树下喘息着，还有的人在死亡的剧痛中低声地喊着：'饿呵！饿呵！'不少人在绝望中自杀身死，甚至连母亲们都压抑了强烈的自然本性，39
毁掉了怀抱中的婴儿，免得使他们活着受罪。"

西班牙殖民者的立场可以从中得到某种解释。特别是在1502年尼古拉斯·德·奥万多作为伊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直辖总督来到以后，矿山、种植场的"大授地制"（又译"监护制"——译者）使劳动力的需要不断增长；同时，土著的人口却

在令人惊异地下降着。西班牙移殖者被授与大片土地和庞大的权力，去统治那一大群实际上要充作奴隶使用的土人；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又没有足够的土人用来耕种土地。积极大胆的水手、商人和垦殖者们便着手补救这种不足，这样一来，使巴哈马的整个群岛经受了严密的探查，并使当地人口也濒于灭绝了。早在1513年彼得·马特就写道：“在古巴北部海岸附近的水域中有许许多多的岛屿，有大有小，尽管人们不断地告诉我关于所有这些岛屿的发现经过，我却很难相信有关这些岛屿的传说。据西班牙人宣称，在他们来到此地以后的二十年中间，他们已经踏勘了其中的四百零六个岛屿，并把四万男女居民运走为奴，去满足他们抑制不住的寻金欲望。”

确实的细节材料还很缺少，但可以肯定，自1500年至1520年间，整个巴哈马的居民即大约两万卢卡伊人已经被运走了。根据拉斯·卡萨斯的夸张估计，通过这种方式已使五十万卢卡伊人不见了，他记载道：“经过西班牙人践踏之后，一些虔诚的人士乘船到这些小岛去，当时他们发现岛上只剩下了十一个人。”1513年，彼得·马

特写道："不论在西班牙殖民地，或是在群岛本身，今天他们中间只剩下为数极少的人了。"同年，庞塞·德·莱昂在旅行中走遍这些岛屿，也只能发现一个孤零零的龙锺老妪。后来的西班牙作家们，提到这些岛屿时都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地方。

按照一位作者的说法，西班牙奴隶主利用了卢卡伊人的宗教迷信对他们进行欺骗。卢卡伊人不知不觉地追忆着他们的南美洲原籍，从而相信在他们死后灵魂是会迁回到南方去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诱引乘船到陌生的地方去，以为到了那 40
里就可以会见他们的已故父辈和祖先。

彼得·马特和拉斯·卡萨斯所描绘的奴隶船的情景预示了后来一个世纪的废奴主义者所叙述的情况。卡萨斯这位道严望重的恰帕 (Chiapa) 的主教写道："有人确实告诉我说，一条船从伊斯帕尼奥拉开往卢卡伊岛，航行不带罗盘仪，而靠海面上浮沉的尸体来测定方向。"彼得·马特更善于想象地叙述了亡命在伊斯帕尼奥拉的卢卡伊人逃至北部山里的情形，"在那里，他们可以呼吸从故乡吹来的空气，他们伸出了双臂，张开嘴巴，好象

是在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到了悲惨的环境弄得他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便栽倒在地上而死去。”彼得·马特还讲到一个机敏的卢卡伊人，他制做一只独木舟，同两个伙伴一起去巴哈马，航行到离伊斯帕尼奥拉海岸二百哩的地方就被捉了回去。

除了种植场和金矿以外，卢卡伊人作为特立尼达附近的马加里塔采珠业中的潜水者也是特别需要的。在拉斯·卡萨斯著作的一个十七世纪译本中写道："通过这类渔业，西班牙人毁掉了卢卡伊群岛所有的人民，而这个民族在采珠业中是最熟练的、最有经验的。为什么这些印第安人每人能卖五十克朗或更多，有时甚至竟卖一百克朗，这是因为他们在游泳和潜水方面的动作敏捷得出人意外。”在渔场上，卢卡伊人在各个方面受到强取豪夺的西班牙人的虐待。他们过度地劳动，仍不得温饱，许多人被淹死或被“海怪”吞掉。拉斯·卡萨斯愤怒地写道：“他们的食物仅仅是鱼类，即恰恰是含珠的鱼类，再加上那个国家所提供的一小部分面包。”卡萨斯梦想不到，有朝一日牡蛎竟会成为老饕的嗜好，海螺也会成为现代的巴哈马人的美餐。善良的卢卡伊人，由于从

事劳役，被弄得象野兽似的。“他们本来是黑色的头发也因而改变了颜色，变成和海狼的鬃发一样，他们的躯体也被海水的泡沫浸染，与其说象人，不如说象魔怪。”

跟随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尼尼亚号”船长维森特·平松，于1499年在埃克苏马群岛损失了两只船，可是，最先使我们对其发现得到极其详
尽了解的巴哈马探险者，要算是胡安·庞塞· 41
德·莱昂。虽然德·莱昂后来受命到各处去征服和招募加勒比人，但是他在巴哈马的兴趣，显然不在于兜捕奴隶，而在于追求更富有魔力的东西，寻找“比米尼”和传奇的不老泉。

庞塞·德·莱昂，大概是1460年生于西班牙的圣特瓦斯·德坎波斯，在哥伦布1493年第二次航行时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他是波多黎各的第一个殖民者、总督和审判长，那时波多黎各叫做圣胡安·德·波林宽。但是，该岛一经全部征服，他就很快失宠了，这是当时征服者的典型下场。作为奥万多的亲信，他于1511年受迭戈·哥伦布① 及其副手们的排挤而失去了权力。庞塞·

①迭戈·哥伦布是克里斯托佛·哥伦布的长子。——译者

德·莱昂返回西班牙后，被准许在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以北的不知名的岛屿上，开辟他个人的领地。

关于这些岛屿，西班牙人已听到过诱人的传说。据卢卡伊人说，比米尼的大地上有一个具有奇异性质的泉水，与据说在普雷斯特·约翰的非洲领地所发现的泉水很相似。伊登所译的彼得·马特著作（1612年）中提到，“某岛，距伊斯帕尼奥拉大约三百二十五里格，据说他们也寻找过这样的泉水，名叫鲍渥卡或阿格南尼奥，不断地涌出具有如此神效的流水——饮了这种泉水，或者配合某种食物，就可以使人返老还童。”同一作者的著作的哈克卢伊特译本中也提到，古巴的盎格里安纳斯副主教有一个卢卡伊人奴隶，叫做安德烈亚斯·巴伯特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胞，他留着胡须），他的父亲就是喝了这种泉水而返老还童的，并且晚年得子。其他的传说还提到了某块土地，富饶肥沃，人口稠密，急待着西班牙人来开发和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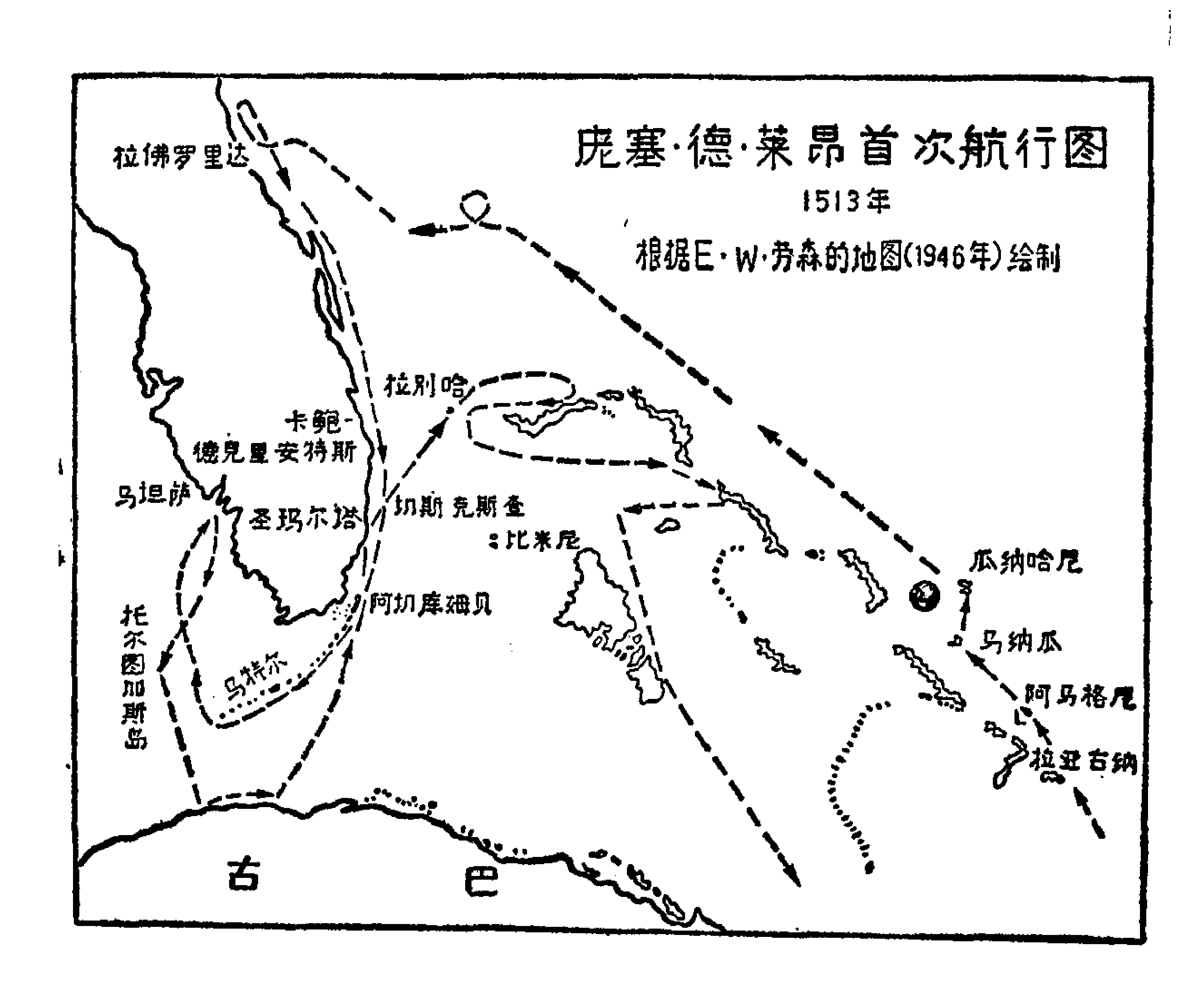
国王斐迪南于1512年2月23日在布尔戈斯①

① 西班牙北部一城市。——译者

签署的文件规定，只要庞塞·德·莱昂能够付出这次探险远征的费用，就将在他所发现的一切地方，授权由他充任终身总督和司法长官，并在开始十二年内分享所得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任何炮台一经建立均可由国库支付费用。虽然国王放弃了开始六年所索取的五分之一传统赋税，但他却保留了分配印第安人为移殖者服劳役的权力。 42
该文件又规定，其他国家的人不得移居到这些新的领土。

庞塞·德·莱昂于1513年3月3日率领三条船从波多黎各的圣哲门出航，虽然关于这次重要航行的唯一详细记载迟到1601年才由埃雷拉写出，但该作者有机会去参阅当时的航海日志，因而我们也能对这条航线有比较准确的了解。3月9日船队抵达凯科斯群岛，然后继续航行五天，到达三个岛屿，名为拉亚古纳、阿马瓜约[①]和马内瓜，这可能就是那时西班牙人所熟悉的马亚瓜纳、萨马纳和腊姆岛。3月14日到达瓜纳哈尼，即哥伦布命名的圣萨尔瓦多，“在那里他们装备好

① 即60页地图中的阿马哥尼（Amagney）。——译者



一只船，横渡过卢卡伊群岛的向风海湾”。随后，他们逐步地向西北航行，一直没有看见陆地，直到3月27日星期天复活节，在他们西边几
43 哩的地方才看见了一个小岛，但并未停下来。这个小岛肯定是阿巴科东部的埃尔鲍礁。

两天后，对梦寐以求的比米尼，还未见到一点迹象，庞塞·德·莱昂便朝东改变了几度航向，直到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之后，他才于1513年4月2日望见了陆地。他们就在这里登陆，并停

留了六天，把这个葱绿的土地称为拉佛罗里达，而土著人则称之为考提亚。人们一度认为，他们这次登陆点是卡纳维拉尔角附近的某地，但是E·W·劳森却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认为此地更处于北部，接近今天的圣奥古斯丁的方位，北纬30度08分。必须记住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欧洲人发现佛罗里达海峡，其海潮向北流着，速度很急，每小时达四点五浬，而庞塞·德·莱昂的领航员无法改变这个流向。因此，三艘船的航位比他们所估计的远远偏北了。只有在沿着海岸向南航行的时候，西班牙人才很惊奇地观察到那嘲弄着风力的潮流的动向。

庞塞·德·莱昂沿着佛罗里达群岛附近的海岸航行，在同森密诺尔人① 多次打交道中发现，他们远不如阿拉瓦克人那样温顺。于是，他花了4、5、6三个月的时间来探索他的新领地，但也没有发现比米尼和难于捉摸的泉水。在6月24日，他们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多山的岛屿，大失所望地发现这原来是古巴。他们回过头来，再度向北

① 印第安人的一族，居住在佛罗里达半岛南部及附近岛屿。——译者

航行，在阿切库姆贝（马塔库姆贝礁）和切斯克斯查（迈阿密的特克斯塔角）停泊，然后转向东北，驶往尚待探查的巴哈马群岛。埃雷拉写道："他们航行到了卢卡伊沙洲靠西部的一些小岛，并于7月18日停泊在这些小岛之中，在那里给船供水，他们只看见了一个印第安老妇人，再也没有见到其他人，因而给这个地方起了拉别哈①这个名字，他们停泊的位置是北伟28度。"这可能就是小巴哈马沙洲西部边缘上的那两个珊湖岛：沙岛和纪念礁，因为"25日他们从这些小岛出发去寻找比米尼，在一些他认为是被水浸着的岛屿中航行，并且发现这就是巴哈马"。这段记载充分地描写了巴哈马沙洲的浅滩和被水冲击"哗哗作响"的栲树滩，它们与海峡中一些张着大口似的蓝色深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有趣的事是巴
44 哈马(bajamar)在西班牙文里是浅滩的意思。埃雷拉可能没有引用卢卡伊人使用的名字，而是用了1513年至1601年西班牙人给这个岛屿所起的名字。

① 拉别哈即西班牙文La Vieja，意为老妇人、老太婆。——译者

经过小心谨慎地对大巴哈马的北部海岸进行探查之后，庞塞·德·莱昂于8月6日又回到了拉别哈，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他又穿过巴哈马群岛，返航到达波多黎各，当时一只船遇难损失，但其船员得救未死。从力所能及搜集到的相当复杂的叙述来看，庞塞·德·莱昂曾到过阿巴科、北埃留特拉、贝里群岛和安德罗斯等地，然后，于1513年10月15日返回了他的出发地。

即使庞塞·德·莱昂确实到过土著人称为比米尼的两个小岛，他自己也并没有领会到。他把两个探险者奥图比亚和阿拉米诺斯留在这些岛屿上，命令他们继续寻找比米尼。几个月后，这两个人带回了关于他们找到了传奇的岛屿的信息，但他们似乎对自己的显得微小的发现进行了掩饰。庞塞·德·莱昂为了替自己土地取得更确实的所有权，于1514年初满载着描写这些地区的优美和前景的夸张故事回到了西班牙。

国王深受庞塞·德·莱昂的故事所感动，于是赐给这位探险家以“唐”的称号和佛罗里达、比米尼总督的职位，要求他在三年之内前去建立一个殖民地。此外，他还得到了布尔戈斯主教的准

许，为了维护天主教可向土著人发动战争并征服他们，换句话说，在未来的种植场强迫他们从事劳动。1514年9月27日疯癫女王霍安娜为佛罗里达和比米尼签署了一系列敕令，仿照伊斯帕尼奥拉的先例，最初的五百个移殖者得到了特惠待遇，为期十年。受过宗教法庭判罪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准移民；犹太人即使改信天主教，也和任何“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或我们领土以外的外国人”一样，没有移民的资格，“如若违法则要驱逐出境；同样如此，也不许他们通过其代理人或仆人，或伙同任何西班牙人，往上述的岛屿输入任何商品，如若违法则使之失去这些商品。”首批五百个移殖者，每人有权使用八十个印第安人为奴仆。

很明显，佛罗里达及其尚未开发的内地，比
45 起荒凉人稀的巴哈马群岛来说是大有前途的。但是，庞塞·德·莱昂注定不可能充当北美大陆或巴哈马群岛的第一个殖民者。他在波多黎各耽搁了数年，而未曾出航去建立他的殖民地，一直到了1521年，即他六十一岁时，才率领着两只船出发，去进行最后一次冒险。这位年迈的探险家在

埃斯特洛湾登陆，在其与印第安人的一次冲突中，受了致命伤，只得被运回古巴去，后来死在那里。

当德·莱昂死时，其他西班牙探险者如德·阿里昂、格里哈尔瓦和科尔多瓦已经揭开了藏匿美洲海岸的朦胧帷幕。举例说，彼得·马特就曾出色地记述了德·阿里昂的一次航行（1515年?），在这次航行中他带领着两只船，去为伊斯帕尼奥拉寻找奴隶。德·阿里昂在巴哈马未曾找到一个奴隶，于是继续航行，到达美洲海岸与弗吉尼亚同纬度的某地，并带回了许多有关土著人和他们风俗的奇异故事。佛罗里达被发现是个半岛而不是个海岛。从墨西哥湾横穿半岛到达大西洋，比经过惊涛骇浪的巴哈马海峡这一路线要平稳得多，因而人们比较乐于按这方向航行。可是，鉴于纳瓦埃斯等早期大陆探险者遇到的可怕灾难以及阿拉米诺斯于1519年从南穿过海峡的成功航行，佛罗里达海峡因而被看作是由加勒比海返回西班牙的固定航线了。

绘有巴哈马群岛的最早地图标示了该群岛的初期探险情况。胡安·德·拉·科萨所绘制的第

一张《新世界》地图（1500年），笼统地绘出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北边群岛的轮廓，标着哥伦布给它们所定下的名称：阿巴科阿（阿巴科）、尤梅（埃克苏马）、瓜纳哈尼（圣萨尔瓦多）、马马纳（腊姆岛）、萨马纳(长岛)、索梅托（克鲁克德岛）和尤卡约（凯科斯）。彼得·马特的《新世界》（De Orbe Novo）（1511年）第一版的地图中没有标出巴哈马诸岛的具体名称，只用一些不加区别的小点点把它们表示出来，但是佛罗里达却画成为一个大岛，比古巴还要大，称之为德·贝梅尼岛。1523年的《杜尔林地图》更加明晰，它列出了十二个岛屿。和巴哈马一样，比梅内也被画出来了，阿巴科阿改成为尤卡伊内克，而尤梅改成为苏马，埃留特拉被称为西瓜特奥(后来又叫做锡加提奥、塞加图和埃加特亚)。卡特岛叫做瓜尼马，瓜纳哈尼再一次被标出来，
46 马马纳则改成了马尼瓜。长岛被称为尤卡纳坎，索梅托被称为苏梅特，伊纳瓜和马亚瓜纳则按现代的拚法命名了。一直到怀特和胡德两人1590年和1592年的地图和德·拉埃特1630年的地图的出现，再没有一幅比1523年的地图绘制得更精确

了。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

随着时间的消逝，作为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大本营，伊斯帕尼奥拉已经失去了它的最高地位。古巴于1511年第一次被迭戈·贝拉斯克斯所征服，在自己的大总督治理之下，它在财富和地位方面成了一个竞争者。哈瓦那早在1514年就兴建起来，它是商业中心以及返回西班牙的航线上的金银集中点，同时也是商船队(Flota)和舰队(Galleon)的集合地。巴哈马群岛在法律上是隶属于古巴的一个省，但实际上却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只有那里的岩礁和浅滩为人们所熟悉，对航海者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障碍，因而对这个地方见而生畏了。譬如，在1595年，一个由十七艘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就在阿巴科附近遇难，遭到了全部覆灭。只有到了崛起竞争的民族——先是法国人、后是英国人——在控制着海峡[①]的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寻找居留地的时候，上述的情况才有了改变。

① 指佛罗里达海峡。——译者

47 第五章　英国人的到来

英国的探险者并未远远落后于西班牙人，但是由于缺乏财政上的支持，以及官方不愿触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势力，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抑制。直至1534年为止，英国仍属于罗马天主教会，1493年的教皇敕令明确禁止西班牙以外所有国家“为了贸易或其他理由前往上述被发现的岛屿和国家”。甚至在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即位以后，英国的航海者仍然未能获准对任何“基督教王公”占领的地区要求占有或移居，不过天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敕令曾多次被拒绝承认，同时自从1567年起直到1604年英国曾主动地但非正式地与西班牙交战。

事实上，继古代北欧人之后首先到达美洲大陆的欧洲人是一个为亨利七世从事航海的威尼斯人约翰·卡伯特。1497年，他在“纽芬兰”和“巴卡拉奥”（新斯科舍）登陆，比阿美利哥·

味斯普奇① 或克里斯托佛·哥伦布在南美初见大陆时，要早几个月。卡伯特沿着北美东海岸向南航行，如果不是由于供应不足迫使他返回英国，那么，他的“马修号”可能就成为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的第一艘英国船只了。显然，后来英国人对佛罗里达以北的美洲东部沿海地区要求占有，就是以约翰·卡伯特的发现作为依据的。

一个未经证实的西班牙报告说，1500年在南
美海岸附近出现过一艘英国船只，这可能是指
塞巴斯蒂恩·卡伯特的船只；但是，1527年乘着
“玛丽·吉尔福德号”航行的约翰·拉特，却是 48
我们对其航行细节有所了解的到加勒比海航行的
第一个英国人。拉特沿北美海岸向南航行，大概
是穿过巴哈马群岛到达了波多黎各和伊斯帕尼奥
拉的圣多明各，1527年，从11月19日至26日在
那里进行了贸易。英国人用布匹来交换当地土

① 阿美利哥·味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曾到美洲探险，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说，哥伦布所发现的根本不是欧洲人久已知道的东方，而是一片新发现的大陆，后来这片新大陆便因他而得名为阿美利加。——译者

产。虽然地方当局及时向塞维利亚[1]作了报告，但是为了防范货物被没收或罚款起见，当时交易的详情被掩蔽起来了。西班牙的殖民者因为缺少来自家乡的货物，不顾西班牙政府的法令，迫不及待地想与任何欧洲船只进行贸易。1563至1568年间，在约翰·霍金斯[2]三次著名的加勒比海贸易航行中，这种怀有二心的态度是特别明显的。

约翰·霍金斯是第一个贩卖非洲奴隶的英国人，当时，非洲奴隶是一种几乎无法满足需求的商品。霍金斯的目的无疑是要替英国在加勒比海的贸易获得官方的许可，为了这一目的，他竟然在1563年把两船食糖和皮革运往西班牙的桑卢卡尔去销售。然而这是一种无望的探求；货物被没收了，接着，1568年西班牙舰队在圣胡安—德乌洛亚对霍金斯船队无故地进行袭击，从而引起了在加勒比海夺取贸易和殖民权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

① 塞维利亚（Seville）：西班牙西南部城市，当时为西班牙政治中心。——译者

② 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英国的黑奴贩卖者及海盗，因掠夺殖民地“有功”，被授与爵士位。——译者

霍金斯大概对巴哈马群岛很熟悉，而且也一定很了解佛罗里达海峡的艰险。这条西班牙贸易生命线成了法国和英国海上冒险家们注意力的焦点，他们试图以此与更著名的横越巴拿马地峡的路线相竞争。的确，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的海盗船已经开始在古巴北面的旧巴哈马海峡往返航行，他们威胁着哈瓦那，并且对佛罗里达本土也显得有兴趣。早在1561年西班牙就已发出一道训令，禁止任何商船在没有舰艇护送的情况下驶入巴哈马群岛周围的水域。1583年，约翰爵士之弟，威廉·霍金斯巡航于古巴和巴哈马群岛之间，在哈瓦那引起了惊慌。

英国人尽管行动稍慢了一步，但对殖民地的开拓，象对贸易和掠夺一样，也开始显得有兴趣。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授权给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让他在北美洲任何未经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拓殖过的地方建立居留地。他于1583年动身前 43
往纽芬兰建立居留地之前，又被赐与占有整个北美洲——大概也包括巴哈马群岛在内——的若干权力。当他在这次灾难性远征的归途中溺死之后，他的同母异父兄弟沃尔特·雷利爵士继续从事

英国的殖民事业。在1584年3月25日签署的一份专利特许状中，伊丽莎白一世授权给雷利——她当时的宠臣——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其所有权的管辖范围定为，从授地起三年之内所建立的任何居留地南北各扩延六百哩。假如雷利把他的殖民地建立在现在的卡罗来纳，他就会成为巴哈马群岛的第一个地权所有者，而事实上他在劳诺克艾兰所建立的弗吉尼亚殖民地，距离最靠近的巴哈马陆地，则稍稍超过了六百哩。

由于女王阻止其亲自前往，沃尔特·雷利爵士乃派出阿马达斯和巴洛去勘察一个基地，并劝说理查德·哈克卢伊特撰写其第一部鼓吹英国殖民的著述，这就是《论西方的垦植》（1584年）那一部具有首创精神的作品，其中提出了许多后来具体化为重商主义的观念。在哈克卢伊特的论证中有一种意见，主张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应该成为攻击西班牙人的根据地，而可惜的是，那些探险家对巴哈马群岛缺少充分的认识，以致没有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至少可以说，这个群岛的土地肥沃程度不亚于帕姆利科泄湖（Pamlico Sound）中的一些沙洲，而且具有许多更好的港湾。

阿马达斯和巴洛是沿着通常路线前往新世界的，他们经由加那利群岛和波多黎各，然后驶过佛罗里达海峡到达克普—菲尔地区。他们这次航行显然很慌张，一到最北的西班牙居留地圣埃累纳(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就远远地离开了，最后只带回几份关于劳诺克适于建立殖民地的夸张报告。第一批殖民者在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的指挥下，于1585年4月9日从英国出发，确实驶过了巴哈马群岛。假如他们没有误信巴洛的报告，并且能够预见首批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不幸遭遇的话，他们就很可能选择巴哈马群岛而居留下来了。

事实上，西班牙人很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当这支仅由七艘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过葡萄牙时，唐·阿尔瓦罗·德·巴桑从里斯本写信给贸易署，称“他们的意图不详，只知他们在期待着更多的船 50
只，并且似乎蓄意前往殖民。据揣测，他们将驶往佛罗里达或巴哈马(海峡)中一个长达三十里格的海岛，那里是一切船队必经之路。”

格伦维尔的计谋使西班牙人不断地揣测着。他从普利茅斯出发，取道加那利群岛，花了惊人

的二十九天时间，航行到达多米尼加，然后绕过圣克鲁斯岛驶往波多黎各的塔拉博阿湾。为了使耽误在后边的船只便于会合，格伦维尔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宿营地，而当那些西班牙的侦察队出现的时候，他又扬帆起航了。接着格伦维尔穿过了莫纳海峡，驶往伊斯帕尼奥拉岛北部的伊萨贝拉，路过莫纳海峡时捕获了两艘较小的船只。他在伊萨贝拉停留了一周，受到当地总督热情而谨慎的款待，出席一次宴会并观看了斗牛戏，与此同时，约翰·怀特曾记录了当地的植物和动物，那些移殖者也收集了香蕉树的插枝，以备带往弗吉尼亚。

1585年6月7日，格伦维尔动身向西北航行，随行的船只仍然仅有三艘。这位海上将军在特克斯群岛附近海面猎捕海牛时几乎溺死。船员们曾在凯科斯群岛登陆寻找食盐，但是没有找到。旗舰“猛狮号”的一个不知名的船员——很可能就是阿瑟·巴洛——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通过巴哈马群岛东部的旅程，可惜内容过于简单。

“12日，在瓜尼马停泊并登陆。

“15日和16日，在锡加提奥停泊，随后又登

陆。

“20日，我们偶然驶近佛罗里达本土。”

显然，这些殖民者是经由卡特岛和埃留特拉，驶过普罗维登斯海峡而到达佛罗里达海峡的，但是我们多么想更多地知道这八天的航行情况——特别是关于西班牙人从事移殖和劫掠的痕迹啊。

1586年，正当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结束其对西印度群岛所进行的大袭击的时候，他进入了旧巴哈马海峡，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攻哈瓦那。他的舰队于6月4日在布卡拉涅奥（比米尼？）附近停泊了一夜，然后继续前进，去劫掠圣奥古斯丁和圣赫勒拿。次年，在把移殖者运往雷利在弗吉尼亚的第二殖民地之际，约翰·怀特从伊斯帕尼奥拉航行到了凯科斯群岛。在那里他仍未找到食盐，只看到大群的“天鹅”（红鹤？）。然而，他却小心地避开了巴哈马群岛，直接向劳诺克前进。怀特多少是一个艺术家兼制图家， 51
他在1590年出版了一份弗吉尼亚和巴哈马群岛的地图，图中标出了巴哈马、锡加提奥、雅尼、雅博、马亚哥拉和瓜尼马，以及许多无名的岛屿和

一大片浅滩和岩礁区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英国人对巴哈马群岛已经形成了当时西班牙人所持的相同意见：本来是无利可得的群岛，再加上四周环绕着虚实莫测的沙洲，就更不引人注目了。

虽然在整个西班牙战争的后期，英国的私掠船如“纽波特号”，“米德尔顿号”，“弗罗斯特号”，“伍德号”，“国王号”和“罗伯茨号”，正象黄峰围着果酱罐一般，都麇集在佛罗里达海峡的入口处，但是英国的殖民活动却仅仅局限在切萨皮克湾（这个地方在1607年曾建立一个固定殖民地）、百慕大和新英格兰。一直到了1629年，英国才对巴哈马群岛提出正式的占有要求。

1629年10月30日，查理一世把美洲大陆上一个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授给总检察长罗伯特·希思，(如1632年该授地状的一份摘要所记述的）这个地区是在“北纬31度及36度之间，包括31度及36度在内，（到那时为止，还未经我国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王、王公或国家的臣民耕种或者居住过；但在某些地区居住着一些野蛮人，他们对神

圣的上帝是一无所知的。）他将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笃信真教的移民队前往该地；勤勉地、刻苦地在上述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及商业，靠勤劳及他自己或以他为榜样的别人出资以实现之……此外还包括我们巴哈马诸岛以及南部其他大小岛屿……”

罗伯特·希思爵士是一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人，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同国会的律师们进行斗争的艰难岁月中，他曾因保卫王室特权而扬名。1575年他出生于肯特郡的勃拉斯特德，曾在汤布里季学校受过教育，后于1591年进入克利弗德律师协会。1603年他获得了律师的资格，后来在法律界连续升职，到1621年充任副检察长，同年被授与爵士位。1625年，即查理一世即位那年，他升任为检察长。在担任检察长期间，希思曾费尽心机地攻击“权利请愿书”（1628年），并出庭不得人心的星室法庭，积极地参加起诉活动，包括对议会英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的起 52
诉。到1629年他已飞黄腾达到了极点，倍受王室恩庞。尽管他出身贫贱，但他在美洲被授与的特权，甚至比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和沃尔特·雷

利爵士所享有的还要多。

罗伯特·希思在卡罗来纳（查理一世准许那个新领土使用此名）和巴哈马群岛享受的所有权，将与达拉姆郡这个有王权的伯爵领地的主教们所享受的权利相类似。这项土地将由希思及其继承人或受托者所占有，他们仿佛是旧封建制度下的大佃主，下面有隶属于他们的、服骑士役的小佃主。上缴给国王的名义地租是一种用二十唡纯金制成的项圈，上面刻有 Deos Coronet Opus Suum（大意为“上帝赏其造物以荣冠”——译者）字样；但仅当国王巡幸该领土时才进行缴纳。

地权所有者享有各种权力，其中包括诸如捕捞鲸鱼及鲟鱼之类所有王产的特许权；控制“生产或蕴藏金、银、宝石以及其它诸物的矿脉、矿山或矿井”的权力；庇护和推荐所有教堂教职的权力；修筑炮台、建造战舰及征集兵员或宣布戒严令的权力；授与爵位和颁发特许状的权力。

希思及其继承人得“根据该地区的不动产自由所有人或其中大部分人的合理监督并经由他们审议、同意和许可”，以其个人的签印颁布“任

何可能涉及该地公益或一切人私利的法令”。作为司法长官，地权所有者享有使人损失生命及身体之权、赦免权和任命所有必要的司法官员之权。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训令，但这种法律一般应是“合情合理，而且与我英国本土的法律、法规、习惯法及公理（尽可能地做到）一致，而不致相抵触甚至背道而驰”。

所有卡罗来纳和巴哈马群岛的臣民都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所有英国臣民均都享有在海岸附近免税捕鱼、腌鱼及晒网之权。除此以外，所有关税及租税都由地权所有者颁布和征收。希思受到这样许诺：对所有从卡罗来纳运往英国的货物，除了通常的王室关税之外，将不附加任何其 53
他赋税。他还得到了保证：在任何争端发生时，将在法庭上获得有利于他的解释。

仅有的王室附加条件是，国王保留对所有金银按值征税五分之一的权力，并且该殖民地一经建立，就有权对希思及其继承人颁发各种指示。

可惜，这些包括无遗的所有权条款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和同年关于批准卡莱尔伯爵为“加勒比群岛土地贵族”及将普罗维登斯岛授与沃里

克伯爵的条款极为相似。在1629至1640年间，即在“王室专政”的年月里，陷入困境的国王的许多事件，使希思终日操心，无暇他顾。1642年，他随着查理一世逃离伦敦，不久充任了牛津的王座法院审判长。在他将激进派的约翰·利尔伯恩当作战俘审讯之后，英国国会对他进行了缺席弹劾，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1646年，国王的图谋失败之后，希思便逃往国外，三年后死于加来。因此，他未能建立他曾一度梦想的海外殖民地。尽管如此，1629年10月30日巴哈马群岛被正式地归并这一事件，仍铭刻在拿骚议会外边的一块磁匾上作为纪念；一帧罗伯特·希思爵士当年穿着法衣的精致画像，现在仍然陈列在议会附近的公共图书馆里。

希思的后期授地历史是很复杂的，当该地区于1663年和1670年重行授与的时候，不得不对许多争执加以调解。一个著名商人——也是一个议员——塞缪尔·瓦萨尔(1586—1667年)，声称自1628年以来他在弗吉尼亚及佛罗里达之间的地区就有过利害关系，而且他曾计划“率领一支人数众多，笃信真教的殖民队前往该地”。很显然，

他曾向希思请求授地，但未能获准。尽管如此，他仍然于1632年派了一个名叫亨利·塔弗纳的人到圣赫勒拿河一带，去寻觅适当的基地。次年，他与爱德华·金斯韦尔签定了合同，由后者带领移殖者前往卡罗来纳，但金斯韦尔并未履行合同，瓦萨尔的探险事业也就因之失败了。1663年，当他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受审查时，这项要求被宣告无效了。

另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是诺福克公爵，他在 54
1663年宣称，罗伯特·希思曾于1632年将“卡罗来纳地区”的土地所有权授与他的父亲亨利，即马尔特拉弗斯勋爵（名字与瓦萨尔的亨利·塔弗纳非常相似）。可惜，他提不出证明文件来，不过，马尔特拉弗斯曾计划向那里派送移殖者，同时查理一世曾交给他一封信，令弗吉尼亚的移殖者给予协助，这是无可怀疑的。1638年，弗吉尼亚总督哈维曾发给他一份“半独立所有权”的专利特许证，马尔特拉弗斯乃委任一个船长威廉·霍利为其代理人，并把一万噘土地授给他。接着，由于内战发生，加上马尔特拉弗斯之长子患了精神病，因而实际上没有做出什么事来。

1660年复辟①时，希思的长子爱德华被授与巴斯爵士位，他父亲的财产及世袭地也被发还，这样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据揣测，1629年所授与的土地也可能包括在内。一个多世纪之后，一个名叫丹尼尔·考克斯的人于1768年提出要求，声称其同名祖先曾于1696年从爱德华·希思手中购得这项授地。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当这一要求于1769年受英国枢密院审查时，竟作出肯定的判决。考克斯及四个亲属在纽约内地获得了土地十万嗽作为补偿。

这些争执似乎与巴哈马群岛都没有直接关系。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把贪婪的目光集中于大陆上一片片广阔的肥沃土地上。纯粹由于漠不经心，才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危险：法国人可能比英国人先行下手，而成为巴哈马群岛上的第一批欧洲移殖者。

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不得不首先击败并歼灭那些在让·里博和勒内·德·洛多尼埃指挥下，在佛罗里达居住已达三年

① 指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即位。——译者

之久的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然后，才能建立三个西班牙居留地：圣奥古斯丁、圣马特奥和圣埃累纳。这三个孤立的据点，有其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作用，这就是保护这个海峡内的西班牙船舶。那时象“多米尼克·德·古尔戈号”一类的法国海盗船至少是和1568年与十七世纪中叶之间的英国海盗船一样活跃，为数也是一样众多。1758年，一位法国作家M·贝兰记载过，1625年法国企图在巴哈马群岛进行殖民，在全体船员组成之后，一艘乘载着殖民者的船只被派往卢卡伊内克（阿巴科），那是一个有着优良的港湾和淡 55
水的岛屿，并且岛上还有盐池和野猪。可是，派出的一艘救援船并未找到这批移殖者的踪迹，他们也未曾给后来人留下任何线索。

更确实的是，1633年红衣主教里舍利厄曾把几个指定的巴哈马岛屿授与另一胡格诺派新教徒纪尧姆·德·康，这些岛屿是阿巴科、伊诺瓜、马里瓜纳、瓜纳哈尼及“吉拉特”，随同这些岛屿一起，路易十三还授与德·康以巴哈马男爵这一独特称号。然而，对于他来说，很可惜的是，当时并未准许他派遣他的新教教友前往建立殖民

地，且该项授地也没有包括课税及征收关税的权力。尽管如此，当时具有远见的英国人应该清楚地看到，法國人在巴哈马群岛取得立足点，从而插入大西洋海岸英國殖民地与加勒比海西班牙殖民地之间，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危险怎样自行消失，而实际上并未加以防范。

第六章　冒 险 家 56

1640—1670

巴哈马的第一批英国移殖者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百慕大，领导者是一位出色的人物，名叫威廉·塞尔。

到了1640年，百慕大已经成为萨默斯群岛公司经营的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小自治殖民地了，它主要靠种植烟草，捕鱼和捕鲸维持生存，并充当了所有航行于英国和弗吉尼亚之间的船只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站。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与国会之间、英国国教与刚强的非国教教徒之间的争执使整个英国蒙受灾难，这种风波在小小的百慕大也有了反应。在那里，这种争执变成了占居民大多数的保王党人与占居民少数的独立教派清教徒之间的令人痛心的冲突，前者忠于英国国教，后者追随时代精神而倾向于共和政体。少数派领袖为该派教士纳撒尼尔·怀特、帕

特里克·科普兰和威廉·戈尔丁，他们于1643年（即英国国会与苏格兰之间缔结“庄严同盟和圣约”之年）与英国国教断绝关系，并宣称自己为“基督教会的牧师”。

在宗教方面，威廉·塞尔本人名义上是独立教派，但他绝不是象戈尔丁或科普兰那样的极端分子。对于一个新兴的殖民地来说，他是一个更加可贵的典型人物：一位实践家、有经验的水手和当然的领袖。他不下三次地被选派为百慕大总督，头两次的任期是在1641至1642年之间和1643至1644年之间。

到1645年，百慕大的宗教争执已经发展成危
57 机了，百慕大的行政长官威廉·雷纳在一封写给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的信中提到，在这一年里，为了替处于困境的独立教派寻找避难所，曾经有两艘船到过巴哈马群岛。不幸得很，一艘船遇难，招致了全船人员的丧命，另一艘因未找到适当土地，而转头回来。几乎与此同时，威廉·塞尔被推选和威廉·戈尔丁同往伦敦，与国会磋商关于解决争执的办法。他们带回了一项宣布“信教自由”的文书，也就是宣布所有百慕

大居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文书。

但是，这项文书与所花费的精力相比，似乎是得不偿失的。1647年春，塞尔又回到伦敦，他这次并不是去寻求抽象的自由，而是去寻求必需的资财，从而建立一个能够享受真正自由的殖民地。结果搞出了一份《埃留特里亚及巴哈马群岛广告传单》（1647年，伦敦），这份广告传单导致了“埃留特里亚冒险家公司”的组成及1648年巴哈马群岛第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建立。

这种传单是一种钉在墙上或手头传阅的宣传品，是报纸出现之前最有效的宣传手段。1647年的《巴哈马传单》大概是在伦敦的酒馆和礼拜堂、甚至议会的休息室附近传递的，而且被热烈地议论着。政治争论在当时颇为风行，用美国历史家富尔默·穆德的话来讲，这份《传单》的匿名创始人是一个“新生的、有特别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不仅与他同时代的有抱负的人并驾齐驱，而且确实远远地走在他们的前面”。这项文献鼓吹共和政体、议会一院制及宗教信仰自由，但不主张废除财产和特权。它预示了1656年出版的詹姆士·哈林顿的《大洋》一书中的“贵族的

共和政体”，它可能是主要受到托马斯·鲁宾逊的思想影响，鲁宾逊的著作《贸易扩大对英国安全的保证》一书出版于1641年，是为重商主义学说进行辩护的早期理论著述之一。

这份《传单》未敢冒然对巴哈马群岛作真实
的描写。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关于这类的报道大多
都不引人注目。例如1644年，威廉·卡斯特尔在
他根据荷兰人德莱特的记叙所写成的《美洲海岸
58 及大陆简论》中写道：“卢卡伊群岛，彼此相距
甚近，致使海面波涛汹涌，令人头晕目眩，而且
十分险恶，此外，岛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
西。”佩克姆的乔治·加德纳恰好在这时做了比
较乐观的报道，他后来自称早在1644年就鼓吹过
建立一个卢卡伊殖民地，并于1647年在建立殖民
地方面是塞尔的一个竞争对手。他在其所著《新
世界述描》（直到1651年才出版）一书中写道：
“目前这些岛屿上没有居民，过去确曾住过一个
善良纯朴的民族，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更易于被
西班牙人掳走，使这些岛屿变得极为荒凉，其中
许多岛屿的土质似乎很不错，而且从纬度来看一
定相当肥沃。空气确实很新鲜，且有益于健康，

并不象其他同纬度地方那样酷热。除一种尾巴象老鼠的兔子外，在这些岛屿上几乎没有其他走兽，但鸽子与鸟类为数甚多；其颜色大都是浅绿的。

“那里出产着质量最优及最劣的安息香树胶，瓜科（Guacom）和菝葜（Sasaprila）以及黄樟，有的岛上还出产红木及龙涎香。虽然英国水手年年围绕这些岛屿航行，但他们对那里的情况很不熟悉……

“大多数岛屿的海岸十分险恶，不容易靠近，如若使船只接近或航行其间，则必须时刻不离前导，但是如果有一名小心谨慎的领港员，并注意与岛屿保持相当距离，也能够顺利地驶过这些岛屿。

“西班牙人对此地颇为熟悉，每年均前往该地进行贸易，购买上述商品，在这些岛屿中间漂流着他们若干失事船只的遗物。”

由于《传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647年7月9日签订的著名的《埃留特里亚岛冒险家公司条例及规则》得到二十六人的签名。这项文献，象巴哈马历史上许多文献一样，其所规定要做的

事情，比起其实际成果更足以引人注意，也显得更有其重要性。如果有效地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巴哈马群岛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理想的殖民地，也就是有史以来在海外建立开明的立宪共和国的第一个范例。

这项文献一开始就谴责派别活动，然后宣布埃留特里亚殖民地将是共和政体，并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当时选择“埃留特里亚”这一词，就因为它在希腊语中是自由的意思。

59 每一个投资者出资一百镑，就被称之为冒险家，投资者人数限定为一百，每人在居留地本部授与三百嗽土地，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则增加三十五嗽。此外，在居留地本部之外，每一冒险家将再被授与土地，多达二千嗽。契约满期的雇仆每人授给土地二十五嗽。殖民地建立之后，开始对全部土地共同经营三年，或经大多数人同意后缩短其期限。

在巴哈马群岛的天然产品（看来条例的制定者对这方面的了解相当模糊）当中，金、银、铜、铅或黄铜等矿产品，“失事船的遗物，龙涎香、金属、食盐及森林”规定予以出售，扣除成

本后，其收入之三分之一划归发现者，三分之一划归首创的冒险家，三分之一则划归公库。打捞的枪支被充作公共防卫之用。

事实上，防卫开支占公共财政支出的第一位。凡年龄为十五至五十岁的男子均得从军，参加公共防卫，但并未规定他们逾越居留地本部去服役。防卫开支项目下剩的钱款，充作办理慈善事业及促进移民之用。凡留居在各岛屿上的土著人都要受到良好的待遇，同时也要尽力赎回那些被西班牙人运走的人。

为该殖民地所拟定的政体体现了该条例的最激进的一面。虽然在1649年以前英国的贵族院尚未被革命党人废除，但巴哈马的立法机构却要实行一院制。这个立法机构被称作参议院，由一百个首创的冒险家组成。当其中某一成员死亡时，其席位将用互选方法补充之，用“检查票数及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从二十名被提名人当中，首先初选四人，然后再选定一人。

国会权力至上的观念毫不犹疑地被采纳下来了，而这种观念在1647年的英国仍属于激进的思想。埃留特里亚参议院，在指派司法官，分配公

共土地，管理公共建设工程及一切金融事宜等方面，都有其绝对的权力。

行政长官称为总督，第一任总督由英国选派，任期三年，继任总督则每年由殖民地的全体
60 自由民选举。这种具有革命性的普选，规定在每年12月第一个星期二举行，与此同时，从参议员中选出十二人来组成咨询委员会。

1647年条例的最后一项条款规定，任何人必须首先赞同该条例中所述的条件，才得准许去埃留特里亚定居。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人当中，有三个人两年后也在处死查理一世的执行令上签了字，其中一人，即格雷戈里·克莱门特，在复辟时被处决了。签名的股东包括克伦威尔的司库约翰·布莱克韦尔和后来充当查理二世医生的彼得·钱伯伦在内。很显然，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真正移居到巴哈马去。的确，缺少实际的支持，是这个抱着奢望的殖民地失败的主要原因。

1647年冒险事业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埃留特里亚冒险家从未真正把特许状领到手。关于组织公司的议案，英国下议院曾于1649年8月22日进行了辩论，8月31日做了第三次宣读。该项议案

规定，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为北纬24度与29度之间，也就是所有巴哈马群岛北部诸岛；但是，很显然，不但未曾印行过法案，也未曾起草过特许状。1660年复辟以后，对于冒险家来说，已经没有获得官方批准的希望了，到了1666年，甚至连威廉·塞尔也放弃了获得特许状的希望。

然而，在1647年间，塞尔显得十分乐观。在返回百慕大之前，他出现在萨默斯群岛公司的董事们面前，宣扬他在伦敦所拾起的激进派见解，彻底地把他们恐吓一番。董事们急忙写信给百慕大的代理总督特纳，告诫他提防塞尔。但是这一对抗行动仅仅加速了为这个新的殖民地招募百慕大的那些愤懑的独立教派的过程。自从1645年以来，塞尔曾经与约翰·特里明厄姆及另外四人伙有一艘叫做“威廉号”的船只，1648年夏天，他乘坐这艘船和一只专门建造的六吨“轻舟”，扬帆驶往巴哈马群岛。和他一同前往的大约有七十个移殖者，包括八十岁的牧师帕特里克·科普兰。另外有两个百慕大独立教派首领，威廉·戈尔丁及纳撒尼尔·怀特，留下未去，不久戈尔丁便死去了。

61 关于这一重要航行的记载，已经通过温思罗普总督的日记留传给我们了。这个幼稚的殖民地一开始就受到挫折。那两只船平安地到达锡加提奥岛，即塞加托岛——他们重新命名为埃留特里亚①——大概是在总督港登陆。但是，塞尔却同一个叫做巴特勒的船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巴特勒倾向于无政府状态，他结成一个集团来反对塞尔。塞尔便带领着大多数移殖者，动身去埃留特里亚的另一地区——大概是西班牙井，但是“快到港湾时，船忽触礁沉没”。虽然只有一人被溺死，但所有必需品却损失净尽，于是这些不幸的冒险家不得不象埃留特里亚的克鲁索②那样，远离陆地而生活在孤岛上。

塞尔一向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乘了那只轻舟，带领着八个人驶往弗吉尼亚去求援。九天之内到达那里，他得到了供应品并借到一艘二十五吨的快帆船。他几乎说服了几个弗吉尼亚人到巴

① 后来简称埃留特拉（Eleuthera）。

② 英国小说家迪福（Daniel Defoe，1661—1731）所著《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一书中的主人公，参看本书171页。——译者

哈马群岛去碰运气，但是他们写信告知约翰·温思罗普，从而受到了劝阻。然而，那些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人则更加热心于提供援助，大约在下一年内，他们对其埃留特里亚的精神弟兄提供了价值达六百至八百镑的谷物和生活必需品。这个殖民地就这样勉强地渡过了第一个灾难。

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斩首于伦敦白厅，但是这一事件仅仅增强了百慕大的保王党人的忠贞。他们宣布拥护查理王子为查理二世，并着手把更多的独立教派排挤到埃留特里亚。1649年10月，大约有六十个不愿宣誓效忠新国王的清教徒，在两个教士——斯蒂芬·佩因特及赫赫有名的纳撒尼尔·怀特——率领下，动身前往巴哈马群岛。六个月之后，英国国会命令乔赛亚斯·福斯特总督取消对那些清教徒的放逐，这个总督于是惶恐地派出了一艘船，在P·克拉多克船长率领下，接回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他的政务会向萨默斯群岛公司的董事们写道："除非他们确实地顺从政府，否则我们不知道接纳他们能有什么安全保证。可是如果他们感到兴趣，我们仍愿意继续接纳，敬候阁下提出有关他们的其他指示。"一直到 62

了1652年，对怀特的放逐才被取消，1656年以前，他不敢重返百慕大。

移殖者们的一个坚强核心，继续留在埃留特里亚，其所过的悲惨生活是勉勉强强地靠着巴西木和龙涎香的输出、失事船遗物的搜集以及其他殖民地不时给予的慷慨援助来维持的。为了报答马萨诸塞人民的及时帮助，这些殖民者把一批十吨巴西木运送到波士顿——正如随货的附函中所说的——“以避免为上帝所嫌弃、人类所憎恶的忘恩负义罪”，并请求货物出售后把货款收入交给哈佛学院。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有威廉·塞尔、纳撒尼尔·怀特、罗伯特·比德莱及乔纳森·英斯，信上注明“1650年5月17日发自埃瓜提阿”。这批货物出售所得的货款达一百二十四镑，除了创办时的四百镑补助金和哈佛本人的八百镑遗赠外，这笔捐款到那时为止要算是对该学院为数最大的赠礼了。

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以外，时常也有因其他问题被放逐的百慕大人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例如，百慕大政务会的记录记载着，1656年的反叛失败之后，“祝福号”船上有七个黑人被开

除，1660年，一个名叫内普丘纳·唐汉的，因为在她丈夫外出期间与一个“外科医生”，约翰·摩根私通有了孩子，被遣送到埃留特里亚去。四年以前，殖民者托马斯·威尔逊及弗朗西斯·伍德，由于在他们离开百慕大去埃留特里亚作安家准备期间，他们妻子的行为不正，经过请求而获准离婚。

这个殖民地在开始的十年中，与《条例》的理想相差有多么远啊！我们没听到关于模范的共和政体，甚至关于种植场的议论，只听到许多关于放逐、争吵以及生活在死亡边缘、分散而居的殖民者的苦难遭遇。巴西木——一种贵重的染料木——每吨可以卖到十二镑，龙涎香——抹香鲸的分泌物，用于制造香料和烹调——每盎斯可卖到四镑，但是它们的货源供应有限，而且逐渐下降。1657年7月曾有一艘沉没的西班牙运载珍宝船只在阿巴科被海浪冲到岸上，售得货款达二千六百镑之多，但是，单靠这种失事船货物也是不行的。1656年12月23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枢密院曾命令牙买加（它是前一年由佩恩海军大将及维纳布尔斯将军占领的）代理总督，将埃留

特里亚的六十多个英国人，接到牙买加去，在那
63 里“供给他们衣、食、住”。但是当采取实际措施时，发现多数移殖者已经迁往百慕大去了。曾与塞尔争夺过阿巴科失事船遗物份额的理查德·理查森，曾描写过他在1657年7月刚刚到达时那个“埃莱特亚”的居留地的情况。那时所有留下来的居民都住在塞尔本人的房子里，用一个岩洞举行礼拜仪式，召开会议。

百慕大的政治气候，对于独立教派来说，已较以前适宜得多了。事实上，塞尔于1658至1662年第三次就任总督，在查理二世复辟的困难时期，他使百慕大顺利渡过，甚至在领取五十镑退职金卸任之后，他仍然是百慕大议会中的一名有威望的议员，继续提倡造船、探险、贸易及殖民事业。虽然他的活动集中在百慕大并扩展到巴巴多斯，以至最后远到卡罗来纳，但是塞尔始终热中于巴哈马群岛的所有权。

1658年6月威廉·塞尔在伦敦时，曾委任几个代理人组织百慕大、埃留特里亚、巴巴多斯和伦敦之间的四方贸易，使用他的船只“威廉号”，由其子托马斯·塞尔指挥。“威廉号”把

供应品运给巴哈马群岛的移殖者，然后把海豹油、食盐、巴西木、龙涎香及失事船打捞货物运载到“加利巴”（巴巴多斯），在那里出售或继续运往伦敦，大概同时还装运烟草和食糖。除“威廉号”外，还有两艘小船“詹姆斯号”及“希望号”，依旧定期航行于百慕大与埃留特里亚之间，然而，大约在1662年间，一个叫做爱德华·阿特伍德的却不得不装备一艘“托马斯和玛丽号”去解救埃留特里亚人的“大苦难”。

塞尔一家——除了威廉和托马斯之外还包括纳撒尼尔及詹姆斯——的另一活动是捕鲸，活动范围从百慕大一直扩充到整个巴哈马群岛。纳撒尼尔·塞尔曾于1665年请求承认威廉·塞尔对埃留特里亚的所有权，这样做大概主要是为了维护捕鲸的权利和防止竞争。纳撒尼尔提出了一份1661年12月签署的、盖有“华丽的印章”的文件，宣告威廉·塞尔曾指派他为埃留特里亚的总督，副职由托马斯·赫特及托马斯·海斯充任。这项要求曾经由百慕大的政务会审查，然而，由 64
于未能提出国王的任命状或国会通过的法案，终归未得实现。

但是威廉·塞尔活的时间较长，因而能够看到他对巴哈马群岛前途所抱的期望是正当的。在复辟之后，英国的情况比较安定下来，殖民活动得到积极鼓励，尤其是在1660年国外种植场委员会建立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涌向美洲的殖民潮流较以前强大了。百慕大变得拥挤不堪，巴哈马群岛从其过剩人口中得到好处，这时，第一批试验性的种植场跟着建立起来。大约在1666年前后某个时期，塞尔的海岛第一次有了定居的移民，并重新命名为新普罗维登斯，在五年之内有了九百以上的移殖者。到了1670年，巴哈马群岛的总人口包括奴隶在内，几乎达到一千一百人。但是这些刻苦耐劳的移殖者没有政府或者法律保护。通常他们仰赖百慕大来解决争端，百慕大政务会在这时也常常要求对巴哈马群岛的管辖权，但这种管辖权并没有法律根据。迫切需要的倒是巴哈马群岛内部存在的某种公认的权威、控制力量和有组织的发展。

那些冒险家失败了，同时他们自己作为地权所有者的权利也被批驳了，塞尔于是转向其他地方去寻找支持了。这时他已接近八十岁，开始

对卡罗来纳感兴趣，而这个地方已经由查理二世于1663年授与八个土地贵族了。1670年9月9日，威廉·塞尔和一个名叫弗洛伦修斯·奥沙利文——这个名字有点不可信——的人（他是土地贵族的总检查员）一同写信给阿什利，要求卡罗来纳的土地贵族们把巴哈马群岛包括在他们的授地范围之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尤曼斯爵士正在统率着到南卡罗来纳去的第二批殖民远征队，他在百慕大推荐了这位年迈的威廉·塞尔来充当这一新殖民地的总督兼团长。显然，塞尔接受了这个职位，但是在他去世以前已经不能前往接任了。到1671年3月3日，他死于阿尔比马尔角，“深受我们人民的哀悼”，到了这时，巴哈马群岛已经被土地贵族们接收，显得有更加光明的前途。

65 第七章　土地贵族

1670—1684

在巴哈马历史上，如果1647至1670年这段时期能够称作百慕大时期，那么，在其后四十八年内，巴哈马的事务就是与卡罗来纳的事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663年3月24日，查理二世颁发了美洲北纬31度与36度之间的一些土地的授地状，其条件与他的父亲所颁发给罗伯特·希思爵士的相类似，只是未曾把巴哈马群岛包括在内。这一地区最初在一百年以前法国曾要求占有，并依照卡特琳·德梅迪奇的儿子查理九世的名字，被命名为卡罗拉纳；现在为了纪念英王查理，又把它改名为卡罗来纳。分享土地所有权的那八个“贵族”，为阿尔比马尔公爵，克拉伦登伯爵，克雷文伯爵，伯克利伯爵，阿什利勋爵，乔治·卡特莱特爵士，约翰·科莱顿爵士以及伯克利勋爵之弟威廉·伯

克利爵士。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或保王党人，当时最重要的人物阿尔比马尔不是别人，正是促成1660年复辟的乔治·蒙克将军。

因为大多数土地贵族都是国王枢密院成员，
所以土地贵族们的决定常常有可能立即成为法
律。土地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明，
为什么由地权所有制过渡到直辖殖民地是这样逐
渐地完成的。从某方面来看，这对历史学家是幸
运的，因为收进《政府公文编年目录（殖民地部
分）》中属于土地贵族时期的巴哈马群岛文件，
仅在1670至1718年期间就大约有二百五十件。假
如这些土地贵族象宾夕法尼亚的佩恩那样是私人
个体，或者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家族那样与英国 66
断绝了关系，那么，这个时期内所保存的文件就
要比上述数目少得多了。然而，有些时候，例如
在沙夫兹勃里的失宠时期，土地贵族受到贸易及
国外种植场委员会（此时为枢密院的一个分支机
构）委员们的冷落，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
事。

在建立殖民地的实际事务中，1663年授地的那八个土地贵族，似乎象1629年以后的罗伯特·

希思爵士一样，不愿有所作为。1665年在克普一菲尔河的入海口建立一个居留地的企图失败了，该地区仅有的一些移殖者也都越过了弗吉尼亚南部的不定边界。但到了1669年，英国国内为了建立一个殖民地，又更坚决地作出一番努力。1668年夏末曾为殖民地冒险事业募集了款项，与此同时，1668年7月11日伦敦枢密院对总检察长发了一件训令，令其为阿尔比马尔公爵及其土地贵族同僚准备一份补充授地状，授与“北纬22度至27度之间岛屿”，即大巴哈马与特克斯群岛之间的全部巴哈马岛屿。这个群岛将成为一个特殊伯爵领地，享有1663年授与卡罗来纳的同等特权。当时，此项指令似乎未曾付诸实施。

这个远征队由“卡罗来纳号”，“皇家港号”及“阿尔比马尔号”三艘船组成，装备费用共花了三千二百镑，于1669年末期从金塞耳扬帆启航。十一月到达巴巴多斯，在该地及尼维斯补充了移殖者之后，船队驶过巴哈马群岛向卡罗来纳前进。不幸，它从未到达那里，因为“阿尔比马尔号”和“皇家港号”两艘船于1670年1月12日在阿巴科海面触礁。幸存的人员乘船驶往百慕大，

一直到了后来，南卡罗来纳才有移殖者定居。

到威廉·塞尔去世的时候，有一个名叫休·温特沃思的人对巴哈马群岛有极大兴趣。他是约克郡人，与赫赫有名的斯特拉福德伯爵是间接亲戚，在1629年已随其家族迁移到百慕大。1663年他当了一名“群岛冒险家捕鲸业务管理人”，在1663年与1669年之间，他与塞尔和一个名叫约翰·达雷尔的，使用一艘称为“探险号”的船只，共同从事捕鲸事业。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曾把载满两船的移殖者运到新普罗维登斯，以减轻百慕大的人口过剩。

1670年2月17日，休·温特沃思和约翰·达 67
雷尔一起，给土地贵族寄送了一封著名的信，请求他们领取一份至少包括新普罗维登斯在内的专利特许状。此时，这个岛上的移殖者除奴隶外，已经不下五百人。信中描绘这个地方“非常有益于健康，拥有能停靠船舶的优美的港湾，环境宜人”，生产“美洲的上等棉花和优质烟草”。同时还提到甘蔗和巴西木，龙涎香及海龟。最后总结说道，“他们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步枪及弹药，一位虔诚的牧师和一个熟练的铁匠。”

那位即将晋级为沙夫兹勃里伯爵的阿什利勋爵，这时似乎已经接管了首席土地贵族阿尔比马尔勋爵死后所遗留下来的土地贵族的事务。他在10月29日的复信中称，巴哈马群岛已经正式地授与给卡罗来纳的土地贵族，并宣称休·温特沃思已被任命为总督。他的任命状及指令将随后寄发，他被要求报送有关该群岛及移殖者的详细材料。那项颁发给六个土地贵族的巴哈马群岛正式授地状，记载在1670年11月1日《专利特许状卷目》中。土地贵族们，仿照国王的东格林威治采邑的方式，按着“自由借地法”来持有这个群岛，换言之，仅仅要求缴付一笔名义上的代役租。与卡罗来纳缴纳的二十马克及马里兰缴纳的两支印第安人的羽箭相类似，这笔代役租是一磅纯银，待国王亲临该群岛时方行缴付。

六个土地贵族——阿什利，阿尔比马尔，克雷文，卡特莱特，伯克利及科莱顿——每人曾经投资二百镑。其中三个土地贵族当时指派了个人代理，负责照料他们在巴哈马群岛的利益。克雷文伯爵指派的是尼古拉斯·戴维船长，此人在该群岛一直工作到1702年。沙夫兹勃里选派了一个名

叫约翰·鲁宾逊的人，卡特莱特则选派了一个名叫理查德·琼斯的。

温特沃思总督的任命状是于1671年4月24日在伦敦签署的，其中授与他及其政务会的颇为含混的权力为“出租、确定、转让及保证”土地。随同任命状附发了一套包括十六项条款的指令。这套指令使人们感到兴趣的，主要在于它为落后的巴哈马群岛设想出一种不伦不类的政体。政府包括 68
一个由所有不动产自由所有人选举产生的二十人组成的议会。总督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五名土地贵族的代理人，但另外还设有一个“大政务会”，其中五名成员由议会推选。在这个政务会里，法定人数为六人，其中三人必须是土地贵族的代理人。

“大政务会”的职责是解决居民中间的一切争执，充当民事及刑事案件的上诉法院，并处理一切“公益事务”。唯有它及总督拥有起草议案的权利，议案起草后提交议会通过，形成法案。所有法案必须呈报土地贵族批准，然后成为法律，有效期为六十年。

议会议员，代理人和政务会顾问均须宣誓效

忠于国王及“忠诚、顺从”于土地贵族。议会，或堂皇地称之为国会，一般每隔一年于11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得增加次数。很奇异的是，还另增加了这样一项条款：为了防卫的目的，对一切来港的船只收税：“每吨一磅上等的火药”。

休·温特沃思始终未能执行这些指令，1671年11月，他在前往巴哈马途中死于巴巴多斯。他的弟弟约翰继任他的职务。约翰是一个有名的船长，在1665年第二次荷兰战争期间，曾经占领过托托拉，并且在移殖者当中似乎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休·温特沃思的老伙伴约翰·达雷尔显然心怀不满，曾向伦敦发过一封信，大讲温特沃思的坏话，并为这个殖民地提出建议。

约翰·达雷尔信中写道：“约翰·温特沃思船长生活荒淫无耻，还曾拉拢腐蚀人们喝酒。他们选他当总督，并置自己的庄稼于不顾。”那些年轻的移殖者喜欢“驾驶轻舟在海滨游荡，消磨时光，而留下老人、妇女及儿童去种地……”他建议，对“轻舟”的数目应加以限制——这样也有利于保存海龟；砍伐巴西木必须得到土地贵族的
69 许可；并且，对一切愿意耕种的移殖者授与土

地——在首创的移殖者男子中，每人授地四十嗽，妇女每人三十嗽。

这里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统治、实际的支援及财政投资。土地贵族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起草一份文件，以确定他们本身在此殖民地内的权利。1672年9月4日签署的这些条款，很清楚地描绘出巴哈马业主政体应该是什么性质的。

土地贵族有权把该殖民地（象封建采邑一样由他们从国王手中受领的）再进一步划分为州及男爵领地。他们得制定“任何法律和宪法”，只要征求该殖民地自由民的意见并取得同意。这些自由民得在土地贵族认为最合适的时间举行集会。土地贵族有权指派总督及其个人代理。

土地贵族有权建立法院，指派法官及颁布大赦令。他们可以颁布任何“合理的”政务会法令，所有法令只要与英国法律相一致，一经公布即须加以遵守。

巴哈马群岛虽然属于土地贵族，但它们必须归顺于英国国王，任何忠诚的臣民均可在该地定居。土地贵族得管制贸易，签发建港执照，并根据自由民的意见确定赋税。但是关税不属于土地

贵族，而直接归君主所有。

所有土地都是直接从土地贵族手中受领的，他们享有授与爵位和封号的权力。他们可以修筑炮台，征收赋税，以及进行海陆战争。最后，他们还可依照自己的抉择，行使准许宗教信仰自由之权。

在起草这个动听的宪法过程中，阿什利得到其友人、私人医生、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的专门帮助。曾经起草过《卡罗来纳宪法》的洛克似乎曾对巴哈马群岛抱有兴趣。1674年理查德·利尔伯恩寄给他一份关于巴哈马毒鱼的说明，他把它撰写成文章送给皇家学会。转年洛克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曾询问过彼得·科莱顿，巴哈马群岛是否适于开办种植场。科莱顿对此进行了劝阻，于是洛克乃在法国居住四年，没有到巴哈马去。

巴哈马群岛第一次户口调查的日期是1671
70 年。① 在A·T·贝瑟尔的《巴哈马初期移殖者》上面的自由民名单内，有许多至今仍是该群岛上

① 对于这些数字的可靠性，曾引起过一点怀疑。贝瑟尔引用了《户籍簿》第三册166—178页作为原始材料。在这几页当中，确实有他使用的名单，但是名单上没列标题，而且是插在

常见的姓名。在1671年的名单内所列的一百零三个不同姓名当中，不下六十个名字可以在1960年的电话簿上找到。在1671年的埃留特拉名单上出现的二十四个姓名中，有十七个至今仍可在巴哈马群岛找到。然而，很可惜的是没有确实材料证明哪些家族——如果有的话——是与1648年首创的冒险家们一同来的。在1671年的名单中提到的一个名叫彼得·桑兹的人是一个最早的移殖者，他曾在百慕大法院的一桩诉讼案件中作证，自称他是大约于1661年在纳萨尼尔·塞尔率领下前往巴哈马群岛的一个移殖者。

在1671年户口调查登记表上的一千零九十七个居民总数中，九百一十三人居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包括二百五十七个男人，二百四十三个妇女和四百一十三个奴隶。住在埃留特拉居留地的一

1730—1733 年这一时期的文件当中的。可是，《户籍簿》第三册是一个早期的转抄本，贝瑟尔在1914年可能看到过原本，其中大概有一个标题。材料的内在证据很能说明年月的正确性。没有出现晚期罕见的姓名，也没有出现1671年以后的总督的姓名。里德·埃尔丁(1699年代理总督)作为一个有一个孩子的已婚青年男子被列在名单之内。在据知1684年与1686年间迁移到波士顿的4户人当中，有3个户主的姓名也发现在埃留特拉的名单上面。

百八十四人当中，有七十七个男人，七十七个妇女和三十个奴隶。居民总户数共约一百六十八户，其中一百二十七户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四十一户在埃留特拉。登记在册的奴隶人数占人口总数的40.4%。约翰·豪厄尔是最大的奴隶主，拥有四十一个奴隶。

这些移殖者渴望土地贵族给他们带来帮助。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姓名不详的作者计算过，为改进巴哈马群岛状况并在三年内安置三百户新移殖者所需要的费用，包括“运输、衣食、工具、奴隶、黑人、货物、工资及筑城等等”在内，共为六十三万三千镑。事实上，根据现存的确实记载，土地贵族最初几年开支的总额为四百九十五镑二先令。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无间断的通信，并一个又一个地派送腐化无能的总督。当时牙买加总督对巴哈马群岛及百慕大的业主总督所持的意见，即使有些偏见，但仍值得引用，
71 他写道：“……这些小总督统治着一些赤足的、为了逃债而跑到这些地方来的百姓，他们挂上总督阁下及都督的头衔，为了维持这些头衔，他们压榨和损害国王陛下的臣民及威信。我不知道他

们是否有资格充当这些角色，但是我敢肯定这确实贬低了那些光荣的称号。”

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仗。1672年8月，约翰·温特沃思总督写信给牙买加总督托马斯·林奇爵士，报怨英国给予的支援太少。虽然那时与西班牙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但是在这个殖民地的二百个健壮的男人当中，仅有六十人有武器。缺乏用于防御的火炮，弹药也仅仅有三十磅。温特沃思迫切要求一百只步枪，三百颗火石，二百磅铅，若干火炮，两面大鼓，四把戟和几面旗帜。林奇虽然将温特沃思的信件及巴哈马移殖者的请愿书转送给伦敦的贸易及种植场委员会，他自己却不能给以很大的帮助，只送去了一点弹药。他说：与西班牙的战争尚未成为事实，而且即使打起仗来，贫穷的巴哈马群岛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引起西班牙人的注意。定居在卡罗来纳的移殖者倒都比较富裕些，也比较安全些。

事情确实显得不妙了。龙涎香和巴西木逐渐减少，失事船遗物也不足依赖，特别是因为这些岛屿跟船舶运输最频繁的航线有着距离。林奇认为，这些地方由于气候不够炎热，因而不能出产

那些促使牙买加兴旺起来的农作物，如：棉花、木本靛青、姜、可可及食糖。而且由于土壤贫瘠，在烟草贸易方面，巴哈马群岛也无法与弗吉尼亚竞争。

此时已经成为沙夫兹勃里伯爵的阿什利，赶忙对温特沃思及移殖者进行鼓舞。在致林奇的复信中，他简略地提出在巴哈马群岛种植可可及牙买加胡椒的计划，并请求林奇给提供籽苗及培植方法。他在1672年年末写信给温特沃思，对他的办事能力表示信任，许诺他在该殖民地的收益中和他自己一样，享受同等的十分之一份额，甚至令人眼馋地暗示，要在巴哈马群岛建立一种世袭的贵族等级。他以一段惑人的文字向温特沃思提示，与西班牙人进行“秘密贸易”，就可能得到
72 厚利。1672年11月13日，枢密院授权军械局长托马斯·奇切里爵士，向巴哈马群岛提供四门“米尼昂”式小炮及其装置。接着，1673年1月沙夫兹勃里的秘书给托马斯·林奇爵士写了一封感谢信，宣称那个为巴哈马群岛装运供应品及递送总督任命状的船只“现已启航”。

1673年末，沙夫兹勃里指示温特沃思要对巴

西木的砍伐加以控制，并保证龙涎香及其他“王产”不至暗中流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夫兹勃里对温特沃思的信任似乎逐渐消失，至少在沙夫兹勃里的私人事务方面是这样。他已经指派一个名叫艾萨克·拉什的为他在群岛的私人代理，1675年5月17日他写信给温特沃思，就他与巴巴多斯的彼得·科莱顿爵士及约翰·达雷尔之间的关系表示极大的怀疑。据他说，他曾经把温特沃思视为好友，但目前如果他想继续当总督，则必须停止与他们通信往来，并且更加专心致志地照料土地贵族的权益。

温特沃思大概看出了在巴哈马群岛上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因而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外地的活动。关于他以后的情况，我们只知道他被查尔斯·奇林沃思所接替，后者于1676年7月1日从土地贵族方面接到任命状。但是温特沃思并未完全失宠，1677年5月他被指派为沙夫兹勃里的代理人，接替了艾萨克·拉什。在1677年5月22日签发的一大批书信中，有一段记载提到价值八千六百九十五镑的“军事物资”已运往巴巴多斯及巴哈马群岛。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控告，拉什被解除了

职务，由温特沃思取而代之，同时他接到指示，命他向拉什收回某些货物。

可惜，在1677年至1682年期间，巴哈马群岛的对外联系是一个空白点，我们只好借助于1708年问世的、最早提到巴哈马群岛的一部历史，即约翰·奥尔德米克逊所著的《普罗维登斯史》，来了解关于查尔斯·奇林沃思任总督期间的施政情况，以及这一时期巴哈马群岛生活的其他详情。

根据推断，这一时期国民的议会在该殖民地具有相当势力，不过它的组织规定还极不具体，
73 我们对它的审议事项也知道得很少。在解除约翰·温特沃思的总督职务之前，沙夫兹勃里在一封训诫信中曾警告过温特沃思，指出其过分重视民主的危险倾向：

“我想知道，你所担任的总督职位究竟是民众选出的还是我们指定的；假如你是在担任民选总督，我们将立即设法将你的岛屿置于另一……之下，以观安全之效……你信中表示，你的议长曾以你所谓的国家名义告诉你说，你所担任的总督职位是他们推选的……这是共和政体下的一

种称呼，不适用于按国王陛下授与土地贵族的专利权建立的政府中的个人。”

按照奥尔德米克逊的说法，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当奇林沃思接替温特沃思时，他们大为不满。他们“不耐烦于受管辖，奇林沃思先生也无法说服这些难以理喻的人们，他们吵吵闹闹地集合在一起，把他抓起来，用船运往牙买加，于是这些居民，人人又过着他们所追求的富于乐趣的生活”。

在这个时期，那些总督们不能指望从外部得到什么实际帮助。彼得·科莱顿爵士至少还曾关心过那些移殖者，可是他这时已到康沃尔隐居去了，那些土地贵族多半已成为年迈的“隐名合伙人”，甚至精力充沛的沙夫兹勃里至少在英国也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他激烈地反对查理二世的亲法国政策和他的“天主教”倾向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约克公爵的野心。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发生的大事有多佛尔密约①、天主教徒阴谋②、排斥法

① 多佛尔密约：为英王查理二世与法王路易十四于1670年订立的秘密条约，规定查理保证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参加对荷兰的战争；路易允诺出兵镇压英国国内可能发生的骚乱。——译者

② 天主教徒阴谋（Popish Plot）：1678年，有一个曾为

案③以及“阿布萨朗和艾基托弗尔”④ 的发表。由于这一斗争而出现了辉格党及托利党的名称，“托利党的反动”又产生了德赖登的诗，之后，沙夫兹勃里于1681年被捕入狱，两年后死于放逐之中。

在1681年前的某一时间，查尔斯·奇林沃思的总督职位由罗伯特·克拉克接替。在克拉克任职的短暂时期内，他几乎完全是在对付着一种新的、但不久即为人们所熟悉的难题，他被指控与一个名叫约翰·考克森的罪恶昭著的海盗同谋，随即被别人所接替，最后被关押起来了。

这时，英国与西班牙尚未交战，但是，只要

耶稣会天主教徒的泰特斯·奥茨，利用当时英国人民反对天主教的心理宣誓称，4月24日耶稣会在伦敦的“白马酒店”秘密集会，阴谋杀害查理二世和恢复英国的天主教。这一根据想象的说法，曾引起一时的恐怖。——译者

③ 英王查理二世无嗣，王位的法定继承人詹姆士即约克公爵，是公开的天主教徒，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坚决反对。1679年5月间，国会提出“排斥法案”，要求取消他的王位继承权。由于查理二世解散国会，这项法案没有在国会通过，1685年查理二世死后，詹姆士就作了国王。——译者

④ 阿布萨朗和艾基托弗尔(Absalom and Achitophel)：英国诗人德赖登(John Drydon，1631—1700)的讽刺诗。——译者

双方的船只相遇，就会激起两国旧时的仇恨。虽
然在1670年的马德里条约中，西班牙人已经有限 74
度地承认英国在加勒比海进行贸易和建立殖民地的权利，但是亨利·摩根爵士的海盗式袭击在西班牙人心目中仍然引起痛恨。没有英国船只能安全地接近“哈瓦那”，也很少有西班牙船只敢于冒险穿过巴哈马群岛。

牙买加总督托马斯·林奇爵士对待海盗，比其副总督亨利·摩根爵士更加严厉。在马德里条约签订之后，他确实曾接到特别指示，派他前往镇压海盗，当他听说考克森正持克拉克总督发给的“捕拿特许证”袭击贝略港①及巴拿马地峡两侧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便立即写信汇报给伦敦贸易及种植场委员会。这种类型的委任令在作战时才能生效，而克拉克大概是根据土地贵族所制订的条款中关于准许他们酌情决定战争这一条款来行事的。但是，在国与国间的和平事态中，克拉克显然应该有所克制。

克拉克于1682年7月6日写信给林奇，为自

① 贝略港（Porto Bello）：巴拿马中部港口名。——译者

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信中引用了西班牙劫掠两艘英国船只并把英国垦植者从南部巴哈马群岛放逐到古巴的事例。克拉克写道，西班牙人才是真正的海盗。信中并声称他自己的用意是“对那些及其他将侵犯我们的海盗”作战，“这种战争根据自然法及国际法来看，永远是正义的。”克拉克还将他发给考克森的委任令抄件送给贸易委员会，但是等到他们1682年8月收到此件时，克拉克已被解职了。事实上，由于土地贵族害怕触犯枢密院，他们听到关于签发捕拿特许证的消息以后，不到几天之内便撤了克拉克的总督职务，指派罗伯特·利尔伯恩来接替他。

然而，这一事件却远远没有结束。1683年1月18日贸易委员会经过辩论后作出决定，宣称对克拉克发给考克森的委任令，是不能以土地贵族的条款作为依据来辩解的，甚至考虑到是否撤销土地贵族的专利权。一周之后，他们决定不撤销专利权，但下令要逮捕克拉克。2月17日贸易委员会写信通知林奇，克拉克已被召回国并受到监禁。可是直到1684年1月，克拉克仍然呆在新普罗维登斯，看来他实际上并未回国。

林奇总督仍然未感到满意。在他接到伦敦的 75
信札之前，他曾写信给一个名叫威廉·布拉思韦特的人说过，利尔伯恩在海盗问题上与克拉克表现得同样恶劣，只是他没有正式签发捕拿特许证罢了。

大概由于受到了贸易委员会的告诫，土地贵族们于1683年10月10日给利尔伯恩总督发了一道严厉的训令，但是这一行动已经无效了，也可以说是太迟了。假如土地贵族送去的是金钱及“军事物资”，那就比这一道训令适时得多了。这是因为西班牙人于1684年1月袭击并洗劫了新普罗维登斯。

西班牙人进犯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关于佛罗里达海岸附近海面上一艘失事船的争执。巴哈马群岛的海上流寇航行到该地，同西班牙人互相竞争，打捞失事船所沉没的金银，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1683年3月，有一个名叫托马斯·佩因的人做得过了头，竟然携带了林奇发给的委任令去镇压海盗，他与另外四名船长打着假国旗在佛罗里达登陆，洗劫了圣奥古斯丁一带的居留地。当他返回新普罗维登斯时，利尔伯恩总督既不

能、也不愿对他加以惩处。接着，在六个月内就发生了西班牙人的袭击。

我们现在至少有三种当时的记载，并且能够对于事件的经过综合出一份详细的记录。正当圣诞节的前夕，一支西班牙武装力量在安德罗斯附近的海域袭击了英国的船舶，俘虏一个名叫威廉·贝尔的人，强迫他充当领港员。1月18日，唐·胡安·德·拉尔科带领着至少一百五十名精选的男子，乘坐两艘"青年印第安人"式的船驶往新普罗维登斯南海岸。他们是由脖子套着缰绳的贝尔引导着，绕过该岛的东端，在当时称为查尔斯镇的一个居留地靠东半哩的地方登了陆。这相当于今天拿骚的东校场附近某地。

罗伯特·克拉克及其子朱达率领一些人出来查究，但是他们被步枪所击退，罗伯特·克拉克受伤被俘，在被俘期间死去。后来有人控诉说，他被西班牙人用铁叉穿身置于火上活活烤死，虽然奥尔德米克逊援引过特罗特总督亲口讲述的故事，但此事并无确实证据可考。

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袭击者向镇内进攻，劫掠货物及金银器皿，价值达两万镑之多。

拥有十门火炮的“善意号”快速艇可耻地逃跑 76
了，利尔伯恩总督也未曾显示出勇敢。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在“命运”旅店里听到枪声时企图鸣发警报，但是由于身受西班牙人的包围，他被迫跟其余的居民一起，潜逃于森林之中。

西班牙袭击者在黄昏前离开了查尔斯镇，移殖者乃从“灌木丛”中爬出来，悄悄地回到劫后的镇里去估算损失。损失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第二次西班牙人的袭击，使该镇蒙受了更加彻底的损失。这一次伦敦接到的报告称，全镇化为灰烬，男人被剥光，妇女、儿童及黑人则被劫运到哈瓦那去。1684年12月一个名叫马修·考德威尔的人估计，两次袭击使他个人的损失至少达五千镑。在既穷困又不安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移殖者都离开该殖民地前往牙买加去了。8月间，托马斯·林奇爵士记载道，艾萨克·拉什及二百个移殖者满怀悲伤的追忆从新普罗维登斯来到此地。另外一些人前往马萨诸塞，1686年，那里曾有三个来自埃留特拉的避难者，名叫戴维斯、桑德斯和艾伯里，请求安德罗斯总督给予帮助。1684年11月，一个名叫托马斯·莱西的

人请求枢密院向西班牙人讨还他被掠夺的船只。最使他气愤的是总督曾阻止他对西班牙人进行报复或抵御，因为认为英国与西班牙在法理上还是和平相处的。

枢密院成员们感到左右为难。尽管受到西班牙人武装行动的侵害，他们仍然极不愿意激起全面的战争，因而采取了一条轻易的途径。1684年12月17日，即第一次袭击十一个月之后，他们命令那些遭受损失者在海事法庭上“提出控诉”，损失一经证明属实，就可向西班牙大使提出申诉，并要求赔偿。

罪咎大部分归于古巴总督身上。据说第一次袭击的获利完全落到他的私人腰包去。利尔伯恩总督曾派乔纳森·伊莱特森到哈瓦那去讯问两次袭击的理由。总督的答复极为直接了当：组织袭击是为了还击，因为新普罗维登斯的居民都是“证据确凿的海盗”。说句公正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总督阁下的话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八章 海寇 77

1684—1694

在西印度群岛的历史中——从埃斯昆梅林于1678年所写的名著算起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别的题目比猎牛海寇及海盗的故事写得更加透彻的了。从丰富的资料中很容易追溯海上流寇从捕捉野牛的海寇和战时从事私掠商船活动的船员堕落成为彻头彻尾的海盗的转变过程；同时也很容易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如何落脚拿骚并据以为巢的。

初期的野牛捕猎者（boucanier），即“海岸帮”的前辈，来自伊斯帕尼奥拉北部地方。这些穿着鲜艳服装的放荡之徒来自法国、荷兰及英国，他们捕捉岛上不很凶野的牛，在称为熏肉站的露天烤炉上烤干了牛肉，然后将这种制成品连同牛脂及牛皮出售给过往的船只。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野牛群的逐渐稀少、西班牙人的纷至沓来及其强加阻挠，使这些猎牛海寇所赖以为生的

手段逐渐由捕捉野牛而转向对西班牙进行贸易；最初使用的是独木舟，接着是大船，最后是有组织的小船队。

在1629年以后的十几年期间，英国的猎牛海寇由沃里克伯爵组织成一个公司，以尼加拉瓜附近的普罗维登斯岛为基地袭击西班牙船舶。该岛于1641年5月被西班牙人蹂躏之后，活着的人大多数迁移到伊斯帕尼奥拉北岸附近一个岩石累累的岛屿托尔图加岛①，普罗维登斯公司对该岛提出了某种管辖权的要求，甚至任命了一名总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650年。托尔图加岛大约长二十五哩，位于巴哈马群岛的伊纳瓜东南偏南仅五十五哩的地方，对猎牛海寇来说甚为理想，因为一般船只难于开到那里，它本身又靠近重要的
78 古巴与伊斯帕尼奥拉之间的向风海峡。猎牛海寇带着该岛“总督”发给的“任命状”及规定税款、奖金、报酬分配额的称为“狩猎待遇”(chasseparties)的条例，从托尔图加岛出发，到海上航行。这个国际帮会事事都要遵守一种虽然有

① 即托尔提岛。——译者

些特异但很严格的、被称作《海岸习惯》(la coutume de la côte) 的社交惯例。

一个曾与猎牛海寇相处六年之久的荷兰医生埃斯昆梅林，曾对上述惯例及狩猎待遇作过十分有趣的详细介绍。尽管有这种惯例及狩猎待遇存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也还是争吵不休。牙买加于1655年被夺取之后，与金斯敦对峙的皇家港很快成了声名狼藉的英国海盗的大本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大约二十年之久。在托马斯·莫迪福德爵士及亨利·摩根爵士的指挥下，他们的活动达到了顶点。但是，1670年与西班牙签订的马德里条约，托马斯·林奇爵士任总督期间（1670—1684年）的严厉统治，1688年摩根之死以及最后皇家港于1692年之毁于地震，使牙买加的猎牛海寇始而悲观沮丧，继而全部溃散。

此时，托尔图加岛的英国海上流寇不得不依靠法国当局的保护，他们的人数逐年增加。由于牙买加和卡罗来纳的立法机构通过一些对他们日益严厉的法案，他们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虐待其受害者了。到了1685年，甚至连他们本国人也称他们为海盗了。

从这时起，海盗们对驶往附近的特克斯群岛及伊纳瓜去运盐——这是百慕大与大陆殖民地间三角贸易之一部分——的百慕大船只就开始采取放肆的态度了。只要再进一步，他们便要劫掠大陆殖民地本身的船只了。虽然英国的海盗比较中意于托尔图加岛的人多势众，但是他们却逐渐地扩大了对南部巴哈马群岛的利用。在他们的印象中，业主殖民地总督是那样弛缓无力，他们甚至开始对新普罗维登斯有所觊觎。1689年奥伦治的威廉登英国王位，号称威廉三世，紧接着爆发对法国的战争，从此开始了持续一百二十六年之久——仅有一个较长的间断——的英法战争。从此，忠于本国的英国人在伊斯帕尼奥拉不再受欢迎。当1691年英法战争波及加勒比海时，最后一批英国海盗离开了托尔图加岛，而开始在巴哈马群岛盘踞。

79 这里的环境至少暂时是很理想的。正如一个船长所说，“有角落和裂缝的地方一定有很多蜘蛛，同样地，只要有具备港湾、浅滩、海岸地、岩礁和珊瑚礁，总而言之，能提供潜伏、偷袭、进攻及逃跑等等便利的一群小岛，也就一定有海

盗出没。”海盗几乎可以潜伏在这里所有的岛屿上，劫掠任何国家的过往船只；因为他们熟悉这里的水域，所以没有遭受报复的危险；同时，由于他们知道存在于新普罗维登斯的任何政府即使不是百依百顺的，至少也是没有效能的，这也使他们具有安全之感。

有许多讲述这些巴哈马海盗残酷行径的故事流传着，看来他们连初期猎牛海寇的侠义之风都丧失殆尽了。1714年当查尔斯·万恩掳掠百慕大人塞缪尔·库珀的船只时，他曾把一名船员吊在帆桁端上，还没有吊死就把绞索砍断，又用短剑刺死。当他登上爱德华·诺思船长的单桅帆船时，曾把一名船员绑在船首斜桅上，把点着的火绳吊在他的眼睛旁边，并用荷弹的枪对准他的嘴，逼他揭露船上藏钱的地方。海盗斯普里格斯做得更有甚于此了。当他因劫掠一艘船只无利可获而感到失望时，竟命令把俘虏高悬到大桅楼上，然后迫使他们跳到甲板上。没有摔死但已成残废的人允许离船他去。

新普罗维登斯在遭受西班牙人1684年的袭击之后，便没有移殖者久住在这里，这种情况一直

延续到1686年。这一年12月，一艘单桅帆船满载着殖民者从牙买加冒险回到了新普罗维登斯，首领是一名“独立教派的秘密传教师”托马斯·布里奇斯以及威廉·帕蒂森和约翰·格雷夫斯。牙买加的政务会听说新移殖者已经推选布里奇斯为“调解员”，害怕他们是反对君主政体的，于是在1687年2月21日，副总督亨德·莫尔斯沃思召唤他们全部返回牙买加。正如莫尔斯沃思向贸易及种植场委员会委员所解释的那样，当时存在着两种危险：不是西班牙人并吞新普罗维登斯，就是这个地方将完全落入海盗的魔掌。

召唤的命令未被置理，布里奇斯反而提出把巴哈马群岛置于牙买加保护之下的要求。同一封信还报告说，从百慕大流入少数新移殖者，并且建立了一座炮台。1688年4月，百慕大的大陪审
80 委员团要求将新普罗维登斯与百慕大合并，认为这个地方是由百慕大人最先发现并最早移民的。但是，无论牙买加或百慕大的政府都不愿做出努力去接管巴哈马群岛，于是那些陷入困境的移殖者就不得不自谋生路。1687年7月，经过公众选举产生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政务会，以协助“调

解员”布里奇斯调停争端，处理有关公益的问题并防止骚乱和派别活动。

政务会一开始就对海盗的行径产生了顾虑。布里奇斯在报告中说，他曾经无法阻止象约翰·瑟伯、托马斯·伍利和克里斯托弗·戈夫那样明显的海盗到巴哈马群岛去补充淡水；由于某些移殖者本身的行为也不是无可非议的，因而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棘手了。1688年4月，斯普拉格船长和莱恩汉姆船长在新普罗维登斯登陆，并用高压手段把嫌疑分子运回牙买加。

同时，在巴哈马群岛南部海域正在进行着寻找沉没的西班牙掠夺物的活动，这一活动颇值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①花费一些笔墨。1684年和1685年期间，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船长曾经向土地贵族之一，阿尔比马尔公爵第二报告称，有一艘满载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在托尔图加岛和特克斯之间失事。阿尔比马尔好容易才筹集

①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是英国小说家，其所著《宝岛》（Treasure Island）是一部以海盗寻找匿藏黄金的故事为题材的著名小说。——译者

了八百镑，并派出“詹姆斯与玛丽号”及“亨利号”两艘船，在菲普斯船长的率领下，去进行一种半贸易半打捞失物的冒险。我们可以在英国博物馆所藏埃杰顿文件中看到它们的航海日志。

这两艘船首先把货物售出，随后由约翰·史密斯引路，于1687年1月13日驶达沉船的出事地点。船员中有三个熟练的潜水员，他们使用了一种由百慕大人发明的水桶式的“潜水钟”。海上风平浪静，三天之内便发现了那艘沉船，次日便打捞上来“四个金锭，一根金条，一块衔铁及两个浮标和二千多枚银元”，船员们看了张口发呆。潜水活动一连进行三个月，除了星期日之外几乎没有间断，一直到两艘船装满金银为止。1687年6月6日，这两艘船满载着轰动社会的货物驶回英国肯特郡船只停舶处。

这批财宝共重二十六吨，阿尔比马尔自己得到的份额达九万镑。每一百镑的股份拿到一百倍利润。菲普斯被授与了爵士位，他的妻子得到一个
81 价值一千镑的金杯。股东之一理查德·哈多克爵士，因为在船只归来之前售掉股本，没有碰上这份运气。由于约翰·史密斯事先没有签订条款，

所以他似乎一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是当他向枢密院辩诉时，他被授给十六分之二的份额，包括应付给贪得无厌的阿尔比马尔的25%佣金在内。

在1720年的“南海之梦”①之前，伦敦出现了空前的黄金热。大量专利状被发给寻宝者，可是效果都不大。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巴哈马群岛却成为引人注目的黄金国（El Dorado）。

这大概可以说明阿尔比马尔——他已于1687年当了牙买加总督——为什么在这时希望接收土地贵族的租地权为期九十年，而这一要求最终于1688年7月被批驳。次月，国王詹姆士二世竟命令总检察长撤销土地贵族的特许状，这一措施只是由于同年稍迟一些时候国王逃跑及宣告退位而失效。

这笔西班牙失事船的巨大财富一点也没有流回新普罗维登斯。居民仍然一贫如故，而且迫于形势不得不与海盗更加靠拢了。1688年7月，土地贵族推定布里奇斯为总督，但是维持不很久，

① “南海之梦”：1711年在英国组成了一个“南海公司”，以南美贸易为名，进行大规模行骗投机活动，1720年它的阴谋被戳穿，一时引起了金融界的危机。——译者

威廉和玛丽即位后九个月，他便被卡德瓦拉德·琼斯“上校”所接替，琼斯携带着拥护新君主的命令于1690年6月来到这个殖民地。

根据奥尔德米克逊的记载及一个名叫托马斯·巴尔克利的人的控诉，琼斯似乎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可以说是巴哈马群岛的独裁者。与他所受的委任相反，他不但没有宣布威廉和玛丽的即位，却在自己的总督和总司令的官衔上加添了司库、保安司令及殖民地秘书等头衔。此外，奥尔德米克逊写道：“他对到普罗维登斯来的海盗备加爱抚”，而且“在未取得其政务会的建议、或与其建议相违背的情况下发给海盗任命状”。巴尔克利讲述过他向海盗售卖火药以及拒绝对“十四门大炮”的盗窃案进行起诉的事。

如果他的对手们的话可以相信，那么卡德瓦
82 拉德·琼斯及其代理人约翰·格雷夫斯曾对老实的公民实行了恐怖统治。这包括不经审讯的监禁，一种普遍检查制度以及对合法贸易商的压迫。他尽可能地拖延议会的召开，然后让其子将其船上的大炮从港口地方对准会议厅，迫使议会将他以前公布的事项定为法律。

这种“可恶的奴役行为”引起了暴动。琼斯被捉，带上了手铐、脚镣，1692年1月24日，政务会的一名成员叫做吉尔伯特·阿什利，被推选接替他的职务。这项公告由土地贵族的两个代理人及政务会五名成员签署。琼斯被控犯有叛国罪，巴尔克利被指定为此案的起诉人。

然而琼斯也有其支持者。根据奥尔德米克逊的记载，2月27日，“一伙带有煽动性的无知暴民……用武力救出总督，重新宣布对他的拥护，让他行使专制权力”。这次巴尔克利也被送入监狱，他带着手铐脚镣关了四百八十五天。当有人到他家强暴地进行搜查证据时，他的妻子简直被吓死了。约翰·格雷夫斯到英国去了，土地贵族在那里任命他为巴哈马群岛秘书，他又回到新普罗维登斯去对巴尔克利进行起诉。

据巴尔克利讲，宣判他有罪并又把他送入监狱的大陪审团包括六名海盗、两名酒徒和一名被控犯有鸡奸罪的男子。审判长杰克逊是营救卡德瓦拉德·琼斯的暴民首领。如果这是完全属实的话，而那个不法的总督竟能够完成大陪审团的审判手续，这可以说是令人惊愕的事了。

巴哈马群岛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带有滑稽戏
的趣味。控诉与反控诉掩盖着事实真象。舞弊丑
行是这个地方特有的，虽然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
来看，巴尔克利似乎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卡德瓦
拉德·琼斯显然是不称职的。1693年1月，土地
贵族撤了他的职，派尼古拉斯·特罗特取代了
他，不过特罗特很快又任命琼斯为政务会的成
员。约翰·格雷夫斯充当了检察长。1694年巴尔
83 克利一经获释出狱，他和琼斯都回到英国。巴尔
克利在那里一直向土地贵族及国王本人提出申诉
并要求赔偿。经过无数次拖延之后，他的案件于
1697年2月才被提交贸易委员会审议，但是1697
年4月该委员会不得不承认，那个不幸的人此时
似乎已经精神错乱了。

第九章　海盗 84

1695—1717

尼古拉斯·特罗特是一个百慕大商人兼地主。1691年，为着一宗被没收充抵关税时受到损坏的烟草，他曾与艾萨克·里奇耶总督卷入了一场复杂的诉讼纠纷中。破产之后，他曾接受巴哈马总督职务，这多少算作一点补偿，不过他若想以合法手段弥补他的财产损失，那就必然要大失所望。

特罗特于1694年8月携带着土地贵族照例颁发的任命状和一套乐观的指令到达新普罗维登斯。至少他曾试图实施一次新的授地计划。总督可分得上等土地一百瞰；牧师可分得教会附属地五十瞰。1695年3月以前到达巴哈马群岛的移殖者每人可分得土地二十五瞰，外加他的妻子和孩子每人各二十五瞰。所有土地均直接从土地贵族手中领受，而土地贵族自己在每个岛上可持有土地

多达三千噉，包括巴西木、龙涎香及埃克苏马食盐等“王产”。

从多方面来看，特罗特似乎是业主总督中最强有力者。根据土地贵族1695年4月12日的训令，他重新修建了查尔斯镇，并以威廉三世的一个世袭称号①将其命名为拿骚。到1700年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一百六十所房屋和一所教堂并占有很大面积的城镇，对于它的规模，奥尔德米克逊曾在其著作中加以赞美。与此同时，特罗特开始在现在英国殖民饭店的地点修建一所控制整个港口的炮台。这座炮台于1697年2月完成，称作拿骚炮台，共拥有二十八门火炮。土地贵族做了一件有利于其声誉的事，他们把每年从巴哈马群岛获得的八百镑小额利润重新投资于这个殖民
85 地，直到偿清那座炮台的修建费为止。这一行动与他们不断争吵地要求为新普罗维登斯承受的土地交付代役租，以及取消当地的关于削减代役租

① 欧洲奥伦治家族于十六世纪衰亡，其财产传给拿骚家族，称奥伦治·拿骚家族。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50—1702年）为奥伦治·拿骚家族的后裔，在登英国王位之前为奥伦治公爵，通称奥伦治的威廉。——译者

的法案两件事相对比，则是大不相同。

在特罗特任职期间，议会，或称为“国会”，显然是在土地贵族管辖下显得最活跃的时期，不过没有什么直接的记录留给我们。我们听说有过关于管理土地出售和分配、控制食盐生产及发展新居留地的法案。看来，这一次意图又没有实现。1695年4月，土地贵族对巴哈马群岛立法机构通过的四项议案，一概宣布无效，主要是因为这些法案侵犯了他们本身的利益。特罗特本人也否决了一项关于削减国王的关税和食盐的什一税议案。

在这几年当中，英国国内殖民活动突然高涨。由于1695年组成苏格兰达连公司（英国与苏格兰直到1707年才实现联合，而且商业竞争很剧烈），结果在1696年通过了比1650年、1651年及1660年法案更加严厉的航海法案。从这时起，一切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船只必须有四分之三的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员。每个殖民地都要设立地方海事法庭，以审讯破坏重商主义的罪犯，总督有权课收一千镑以下的罚款。同年，贸易及种植场委员会改为贸易部，成为一个与枢密院分立而单

独执行职务的机构。

虽然新的贸易部的文件在业主的巴哈马群岛不会有无限权威，但是那里的关税却属于国王，另外，业主总督显然没有权力审讯违反航海法案的罪犯。因此乃在拿骚建立了地方海事法庭，并于1697年2月25日指派了第一批官员。法官为约翰·莱顿，书记官为托马斯·沃尔德克，执行官为约瑟夫·哈伍德。

与此同时，还派出了爱德华·伦道夫作为海关检查长去调查美洲的英属殖民地。他在1696年7、8月先后致贸易部及海关税务司的许多次报告，使我们对巴哈马群岛当时的情况有了更多的
86 了解。据伦道夫的估计，食盐可以发展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产业，这个群岛有足够的食盐以供应整个英国的需要。然而特罗特并没有给予伦道夫以深刻的印象，而且关于土地贵族，后者还说了一些颇为苛刻的话。他写道：“那些由土地贵族派在该群岛担任总督的人，其才能和身份普遍都很不够格。”后来他又写道：“由于土地贵族漫不经心地向其各自所属地产选派总督，从而给国王陛下的臣民带来了损失，如果他们严格地遵守约章去

弥补这种损失，他们就一定要另选高明或者将所属地产交给国王陛下直接统辖。”

这位文官的报告就这样写着。但是爱德华·伦道夫很有理由批评巴哈马群岛的业主总督政权，因为在1696年间曾经发生过艾弗里船长的丑事，再一次使拿骚声名狼藉，尼古拉斯·特罗特也因之丢了官。亨利·艾弗里是一个海盗，他的经历在一个名叫《成功的海盗》的剧本中，被描写得十分迷人。1695年，他曾在科鲁尼阿①附近海面上从一个喝醉酒的船长手中夺得了一艘名叫“查尔斯号”的船只，重新命名为“幻想号”，从此便开始了海盗的生涯。由于贼运亨通，他在印度洋上俘获了属于莫卧儿大帝的一艘大船“冈斯韦号”，船上载着十万西班牙银比索、十万威尼斯金希昆和大量宝石等战利品以及莫卧儿大帝的一个女儿！艾弗里带着那位印度公主驶向吉达②，随后又急速驶向西印度群岛，逃脱了几艘

① 科鲁尼阿（Corunna）：即拉科鲁尼阿（la Coruña），西班牙西北部一沿海城市。——译者

② 吉达（Jiddah）：沙特阿拉伯沿红海海岸一城市。——译者

派去缉拿他的联合兵舰。

1696年4月1日，“幻想号”载着四十六门火炮和至少一百一十三人在埃留特拉北面的罗耶尔岛附近海面上抛锚，船长“亨利·布里奇曼”派人去见特罗特，请求供给食粮并准许在拿骚补充淡水。实际上，艾弗里是希望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便进行分赃和资遣部下，使他们能够个个悄悄地溜回英国。

特罗特与他的政务会进行了商议。在拿骚，只有六十个强壮的人可用以抵抗外来的强行侵入。再者，如果禁止“布里奇曼”进入拿骚，他就很可能继续向前航行，靠拢托尔图加岛那里的法国人，而当时英法两国仍在交战。据报告称，法国人
87 这时刚刚用三艘船只和三百二十个人占领了埃克
苏马，并正向新普罗维登斯继续前进，在这个消息促使下，特罗特乃准许海盗停留下来。

在特罗特的继任人于1698年调查这一案件时，一个名叫约瑟夫·丹的海盗为了保全自己，曾作证检举同犯，证明特罗特向每一个在拿骚登陆的海盗收取二十个银比索，向艾弗里收取四十银比索，另外还接受价值一千镑的赃物。一个名

叫菲利普·米德尔顿的人对此提供了旁证，并补充说，在一次宴会上，该船一个水手损坏了一只玻璃杯，特罗特总督竟逼迫他为此赔偿八个金希昆。特罗特被正式地宣布无罪，据说他只收过九十镑的“茶点”费。他与理查德·托利弗两人所分沾的“幻想号”和船上的一般货物也被说成是“几近于一艘失事破船”。

海盗们分赃以后，多数人都潜逃到大陆殖民地，留下来的只是那些在拿骚赌光赃款而无从脱身的人。艾弗里手下的两名原被“强迫”服役于“幻想号”的船员，丹尼尔·史密斯和威廉·格里菲思，共同带着一千多镑的款项前往百慕大，购置了原属于尼古拉斯·特罗特的土地。艾弗里本人的命运，和那个以他为主人公的剧本的标题很不相称。他从克罗斯基斯船长手中买了一艘名叫“海洋之花号”的船只，携带着他分得的五百镑赃款和所有的珠宝，同他的十九名部众，一同启航驶往波士顿。他从波士顿又转到布里斯托尔去，并更改名姓在得文的比德福德① 定居下

① 得文（Devon）：即得文郡（Devonshire），位于伦敦西南，比德福德是该郡内一个沿海城镇。——译者

来。几年以后，他身负着重债，悲惨地死去，等待着狡猾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前来处理他不正当地得来的珠宝。

艾弗里的事件再一次引起了土地贵族事务的危机，并断送了尼古拉斯·特罗特的职位。1696年10月19日，贸易部命令土地贵族上交特许状，其意图显然是为了要修改条款。在贸易部和代表伦敦西蒂区的议员——也是“查尔斯号”船的一个最初共有人——托马斯·霍布朗的怂恿下，土地贵族们于11月9日解除了特罗特的职务，三天之后指派了尼古拉斯·韦布去接任。

特罗特后来的事业表明，即使他是一个恶棍，也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恶棍。1698年他娶了安·艾米为妻，由于她的父亲是一个土地贵族，
88 在卡罗来纳由她继承了一万二千嗽土地。事实上，托马斯·艾米死时，尼古拉·特罗特甚至曾请求承认他自己为一个土地贵族；但结果他作为“一个不适宜的人”而被否定了。他的同名堂兄弟，小尼古拉斯·特罗特，在卡罗来纳做得比较顺利，他先后充当过该殖民地的检察长、议长

和审判长，编纂过法典，掌握着“一种前所未闻的集中于一人的权力”。他在伦敦时办理而未成功的几桩诉讼案件之一，就是一桩关于一艘荷兰失事船的诉讼案件，当时他曾为大尼古拉斯·特罗特作辩护，那艘船就是在特罗特任总督时在巴哈马群岛失事的。当这艘“朱弗罗·格特鲁德号”触礁时，特罗特总督个人曾侵吞了价值二千三百镑的货物。荷兰大使向土地贵族提出控诉，他们随即命令特罗特偿还，而特罗特无力照办，经过向上院申诉失败之后，他于1702年在佛里特监狱里坐牢将近一年。在关于拿骚对面的霍格岛所有权的诉讼中，他是比较幸运的，经过判决，确定他以五十镑的代价并以每噉每年一先令的租金获得该岛的所有权。

尼古拉斯·韦布被土地贵族选定为总督之后，爱德华·伦道夫建议他的任命应由国王批准。土地贵族刚受一场虚惊，此时不得不答应所求。韦布的任命于1697年2月11日得到威廉三世的批准，次月他举行了宣誓，并对国王行了吻手礼。这样，不知不觉地国王便更接近于全面统辖巴哈马群岛了。为了巩固其地位，国王又于1697年3

月宣布任命埃利斯·莱特伍德为巴哈马群岛海事法庭的法官，约翰·莱顿为检察长，约翰·格雷夫斯为关税征收员。

但是，巴哈马群岛无论在土地贵族或国王的心目中，都不是一个生财致富的捕获品。总督在所有权中所占份额被提高到五分之一，从而期望他不致因为每年仅有二百镑的菲薄薪金而不得不接受贿赂了。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与法国签订的里斯维克和约①破坏了埃克苏马的食盐贸易，而在这以前，从事这种贸易的船只一度曾达到六十艘之多。现在食盐的价格从每蒲式耳二先令九便士跌到四个半便士，与此同时，巴西木的价格从每吨六镑跌到二镑十先令。1698至1699年度的巴哈马群岛全部登记贸易额为：对英国出口一百八十四镑，进口三百零二镑。

89 韦布的幻想显然破灭了，他悲伤地埋怨这个

① 荷兰、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于1686年结成奥格斯堡联盟，反对法国路易十四的侵略计划，联盟各国于1688至1697年期间与法国交战，史称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英国站在联盟一边参加了战争。法国在战争中处于劣势。1697年在海牙附近的里斯维克签订和约而结束了这一战争。——译者

群岛的穷困，例如，他曾对一些来自海峡群岛的移殖者种植靛蓝的惨淡经营情况加以描绘。当地居民对土地贵族的苛捐杂税、过重的代役租和海事法庭的横征暴敛所提出的控诉，也就是对韦布的支持。老实人碰不到好运。因此，打捞失事船、走私和明目张胆的海盗活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韦布的说法，为了使人们抛弃海盗生涯，他曾作出认真的努力，因为连他自己也承认，巴哈马群岛已经成了“海盗及非法贸易商的共同避难所”，也是“所有歹徒的收容所”。在他的任命状中，韦布被授权召集一个由二十四人组成的议会，其成员由新普罗维登斯、埃留特拉及哈伯岛的不动产自由所有人中选举产生，并建立一个包括六名指定成员和六名选自议会成员的政务会。至于这个规定是否严格地执行过，我们则不知其详。但是，在他的任期内，确实通过了一些法案，其中包括一项防止“丑恶的男女通奸罪和未婚男女私通罪”法案，这项法案被土地贵族驳回了，“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法案与其说是要惩罚这种恶行，不如说是要鼓励这种恶行，

而且你们对妻子课处的罚款势必由丈夫偿付，因而你们所要惩罚的正是受害者。”韦布甚至于1699年敷衍塞责地促使议会通过一项反海盗法案，可是海盗本身却未受到什么打搅。

专事嘲笑的爱德华·伦道夫认为韦布并不比特罗特或琼斯好些。1700年的波士顿总督也说过，韦布在“步其前任特罗特的后尘，如果公众评论未趋于极端，那么，特罗特就要算是美洲历来最大的海盗掮客了”。

事情也可能是这样，可是1698年曾有一个名叫凯利的海盗从巴哈马的一个基地袭击向牙买加航行的船只“努力号”，正当这只船在佛罗里达触礁搁浅时，进行了抢劫。韦布发给一个名叫里德·埃尔丁的混血儿五条船和一份委任状去捕捉凯利。他没有捉到凯利，却捕捉了一艘“巴哈马商人号”船只，认为这艘船是被人“遗弃”的。起初，这艘船被宣布为捕获物，韦布开始计算他所应分到的利益。船主爱德华兹向牙买加总督控告
90 韦布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接着船员们出人意外地逃脱，于1699年2月来到拿骚。海事法庭于是撤销了原来的判决，宣布该船为“漂流货物”。因

为失事船漂流货物是国王的“王产”，倒霉的韦布一无所得，反而从自己腰包里赔了八十镑。

由于处处遭到挫折和失望，韦布自动退却，于1699年某时“弃职出走”，到特拉华的纽卡斯尔去了。但是他的困境并未就此终止。他与杰弗里·杰弗里斯伙有的船只“赌注号”，连同他的所有财物，包括七千镑现金和价值一千镑的“贵重物品”，全部被海盗所偷窃。属于国王的二百三十六镑也落到了海盗的手中，海盗们把这艘船重新命名为“巧逃号”，在“数次鸣炮并频频举杯咒骂总督”声中扬帆而去。据说不久之后，韦布因饱受震惊或者忧伤过度而死。

在离开拿骚之前，韦布曾委派里德·埃尔丁为其代理人，这个混血儿在一股热情之下，俘掳了五个声名狼藉的海盗：昂卡·吉卡斯、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约翰·弗洛伊德、约翰·范坦以及别号“母鹿”的“西印度群岛大海盗”亨德里克·范·霍文。1699年10月23至24日，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法官为理查德·托利弗。约翰·范坦申辩无罪，因为缺乏证据而被释放。其他几人被告发“和公海上一般海盗及强盗一样，打着

血旗，即他们的血色的船旗……”航行在海上，并被判定犯有抢劫一艘和烧毁另一艘单桅帆船的罪行。在枪决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之后，给予他们六天时间进行祈祷来挽救自己的灵魂，结果这几个海盗于10月30日被绞死了。大约与此同时，埃尔丁颁发一道措辞动听的布告，禁止人们与正在穿过巴哈马群岛的达连公司的苏格兰人进行任何联系。

这些行动使韦斯特明斯特① 感到满意，但是这种状态总是暂时的。1700年 4 月，另一个乐观的商人，伊莱亚斯·哈斯克特船长，请求土地贵族准许他递补总督的空缺。虽然贸易部坚决地要求开具一份为数二千镑、有可靠担保的票据，以保证哈斯克特举止检点，但土地贵族却很快就同意哈斯克特的请求了。哈斯克特于1701年初来到了这个殖民地，在很短的时间内情况又是和过去一样不妙了。

91 哈斯克特发现“愤懑不平与不安全”在拿骚已是一种常态。修建不久的炮台已经荒废；海事法

① 韦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系英国国会所在地，这里即指英国国会。——译者

庭腐败无能；海盗猖獗。居民“浮躁不安，带有宗派情绪……肆无忌惮地干着各种危害人类的罪恶勾当，并且对同犯者妄加辩护和包庇”。

哈斯克特依照特罗特总督的先例，企图对前来特克斯群岛的百慕大耙盐者征税，他至少捕捉了一艘未曾纳税的船只。他说，他“从来没有绞死过一个百慕大人，但是只要想这样做，也不过象绞死一条狗罢了”。百慕大总督愤怒地写信给土地贵族，对他们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权利提出诘难，结果仅得到了如下的答复：“我们从未听到有谁对我们在特克斯及凯科斯的权利提出过疑问，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我们可以安全地从那里获得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利益。”戴伊总督的回答是重申过去的主张，即巴哈马群岛应完全受百慕大管辖。同时授与十几艘百慕大船只以捕拿特许证，表面上是为了反击海盗，但实际上是为了抗拒巴哈马海关官员的扣压。

在拿骚，哈斯克特甚至更加不得志。有一个居民描绘他的统治是“专横和暴虐的”，1701年10月，当他企图监禁里德·埃尔丁并指控他有海盗行为时，竟激起了暴动。议会议长约翰·沃伦

率领一批群众把不得人心的海事法庭的法官托马斯·沃尔克扣押起来，接着闯进了总督的住宅。沃伦用手枪威胁哈斯克特，发生了一场扭打，手枪开火了，一个暴徒受伤跌倒，沃伦立即用手枪托“砸破了”哈斯克特的脑袋。

暴徒们把哈斯克特和沃伦关进监狱，给总督带上了手铐。一个公共法庭成立起来，宣布罢免哈斯克特，并选举埃利斯·莱特伍德为“主席”。哈斯克特仍然带着手铐，他乘着“凯瑟琳号”小双桅船被驱逐到纽约。根据他个人的叙述，他的家属被赶到丛林中去，他损失掉所有的“黄金、白银、家庭动产、餐具、家具、商品、任命状、指令、契约、票证、抵押品以及其他个人财物，共
92 值数千镑，其中一部分是国王和土地贵族的款项”。

争执的双方与伦敦通讯十分频繁。从中更加清楚地看出了哈斯克特的笨拙及其缺乏节操的性格，同时也暴露了巴哈马群岛当局堕落到何等程度。哈斯克特控告关税征收员约翰·格雷夫斯和他自己的曾参加暴动的男仆罗杰·普里多犯有叛国罪，并控告“凯瑟琳号”船长詹姆斯·克劳福

德犯有叛国罪及海盗行径，而后两人被纽约副总督约翰·南范关进了监狱。至于哈斯克特本人则受到多方面的指责，人们控告他辱骂过拿骚的教士，非法地征收捐税，垄断所有的玉米，并把它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以及侵吞诸如一个“红葡萄酒和白兰地酒邮包”之类的物品。

莱特伍德和另外七个人控告哈斯克特曾对某些人扣加海盗罪名，然后让他们用金钱来赎买自由。一个名叫塔比撒·阿尔弗罗德的女人作证称，她曾出价五十镑作为释放里德·埃尔丁的代价，但是哈斯克特索要了五十皮斯托耳①（也就是六十七镑十先令），以及“一个珍贵的戒指和一件值钱的餐具”，一个大型银啤酒杯，几件布匹绸缎，“一付金钮扣和三个金豆”。

一个名叫科尔的船长曾控诉哈斯克特非法扣压信件的行为，他描绘这位总督与莱特伍德之间令人不能置信的争吵：“……莱特伍德先生说这是不正当的，总督马上走近他，骂他该死，并说要杀死他；莱特伍德先生紧握着剑柄阻挡了他，

① 皮斯托耳（pistole）为西班牙旧金币。——译者

但是他仍然大肆辱骂，并且诅咒说什么如果他们今后再在类似事情上与他对抗，不论哪一个一定要被他弄死，因为他是任意行事的”。另外有一次，哈斯克特对约翰·格雷夫斯大嚷大叫地说：“你小小的海关职员，你这个恶棍，如果你再敢抢在我的小艇人员前面登上任何大船，我就要把你这狗东西活活地烤死！”

伊莱亚斯·哈斯克特一到了伦敦，就跟债主发生纠纷。在一份上奏国王的请愿书中，他们首先控告哈斯克特曾经潜逃到巴哈马群岛。本来与债主们约定在格雷斯教堂街的大杯酒店会晤，他却往朴次茅斯去了。派去追缉他的一个法警竟被他
93 用手枪击退！1702年8月，安娜女王下令成立一个审讯委员会，但是，当该委员会尚未召开时，哈斯克特已经又一次摆脱债主而逃出英国了。

土地贵族让莱特伍德继续担任代理总督，但是，到了1702年后期，他们又派爱德华·伯奇为哈斯克特的继任人。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到达拿骚，这个殖民地就再度被毁坏了。

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702年对法国的战争重新爆发了。英国企图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

削弱西班牙，并且为了阻止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建立一个波旁王室的联合，乃加入了战争①。战火延绵不断，一直到1713年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战争才告结束。虽然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是，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的霸权，也不断地发生战斗。

巴哈马群岛本来可能成为打击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私掠船活动的极好基地，许多海盗本来也可以利用这个暂受尊重的机会，但是敌人可能深深了解这一点，因而决定先发制人。1703年10月，拿骚被来自哈瓦那的西班牙和法国联合远征队所劫掠。根据费城一个名叫夸里的陆军上校的叙述，入侵者除了劫掠了那个城镇并塞住了炮台上大炮的火门之外，还屠杀了那里的许多人。他们停留了两周之后，掳走了大约八十个人，其中包括代理总督莱特伍德。

---

① 1700年，西班牙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二世死后无嗣，法王路易十四之王后为查理二世之姊，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之王后为查理二世之妹，双方都要求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因而引起了法奥两国间的战争。英国早已觊觎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深恐法国夺走，于是英荷都加入了奥方。——译者

这个殖民地确实受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当爱德华·伯奇跟约翰·格雷夫斯一起于1704年元旦来到这里时，他发现1703年洗劫后的幸存者连“一件遮体的衣衫”都不具备了。1701年，新普罗维登斯至少还有二百五十个白种人居住，这时却几乎是荒无人烟了。同年6月，伯奇又失望地离开了这个殖民地。

有些移殖者悄悄地回到他们的首府，但是，到了次年以及1706年10月，西班牙人又重返这里，把他们在1703年未能破坏的东西彻底破坏了。1706年，约翰·格雷夫斯估计巴哈马群岛人口总数为四至五百人，但是各户人家都分散几处，在卡特岛、埃克苏马、埃留特拉或哈伯岛勉强度日。少数有胆量的人仍然留在新普罗维登斯，他们“散居在一些小棚子里，随时准备着，一旦受到袭击，便躲到树林里去保存生命”。

94 格雷夫斯写道：“我离开该岛时，那里还剩下二十七户人家，整个群岛至少还剩下四、五百人，分散在大约二百哩长的土地上，因此，不久之后，他们的境况将比野蛮的印第安人还要糟，顶多他们随时会帮助海盗并与之进行贸易；他们

还有十二或十四艘单桅小帆船未遭敌人袭劫。”

下一个十年的历史资料更为缺乏，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有组织的政府连在形式上都垮台了，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海盗们已经控制整个局面了。

约翰·格雷夫斯有资格声称自己从1686年以来就跟巴哈马群岛有着密切关系，他在那段悲惨的岁月里似乎一直坚定不移地保持着这种关系，而且自告奋勇地充当那些长期受难的岛民的代言人。1708年他向土地贵族和海关税务司提出了一份请愿书，目前所知的这份请愿书唯一抄本可以在拿骚公共图书馆里看到。

格雷夫斯认为，英国确实有控制不住巴哈马群岛，从而也控制不住佛罗里达海峡的危险。而且，他补充道，“如果西班牙人占有此地——我听说他们一定这样做——那么，所有从北美到牙买加的贸易就要遇到很大困难；卡罗来纳与牙买加之间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阻碍，因为他们到牙买加去必须从其中几个岛屿中间穿过”。“离哈瓦那仅有三天的路程”，拿骚的港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争夺目标。“由于港湾非常

宽敞便利，新普罗维登斯对于所有通过佛罗里达湾的遇难船只提供了极大的支援……”他补充道，“就我所知，每年有十四艘以上的船只到普罗维登斯港避难。”

此外，巴哈马群岛可以说是资源丰富的。格雷夫斯写道：“它们是我们所有居留地中最有益于健康的岛屿；虽然地面岩石很多，可是种植什么都有收获，包括印度群岛上最优良的棉花。主要特产有：染料木、甘蔗、靛蓝以及大量海水晒成的食盐；龟甲、鲸油、海豹油、鲨鱼油，有时还有抹香鲸的油。龙涎香时常被冲到海湾去。”他认为仅仅为着巴哈马食盐，就值得保住这个群
95 岛。这种商品是用来供应船舶食用，同时也是纽芬兰岛和新英格兰捕渔业上所不可少的。

土地贵族和政府所必须担心的不只是西班牙人的占领。伊斯帕尼奥拉的法国人也能轻易地进来控制这个群岛，而岛上所生产的染料木和棉花正在被库腊索的荷兰人或圣托马斯[①]的丹麦人向外运出。

① 库腊索与圣托马斯为加勒比海中两岛屿，前者位于委内瑞拉以北，后者位于波多黎各以东。——译者

由于缺乏英国船只往来此地，拿骚的商品价格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简直是贵得出奇。羊肉、小牛肉及猪肉每磅售价九先令，牛肉价格也相差无几。黄油每磅一先令六便士，牛奶每夸脱① 六便士，鸡蛋每个一个半便士。只有鱼类产量丰富，价格便宜。

格雷夫斯估计，有了一支小规模的卫戍部队和一艘六级快速战舰，就足够满足防卫的需要，但是，因为没有这样的防卫条件，那么拿骚不仅极容易受到外国的进攻，而且也容易听任海盗的摆布。按照他的计算，"……一个小海盗如果拥有五十名熟悉当地居民的部众（这种人太多了），就必然而且也愿意控制那个地方。"

格雷夫斯极其大胆地指责土地贵族目光短浅和疏忽大意。他们曾经以五十镑的代价将霍格岛授给蛮不讲理的特罗特，把整个埃克苏马，包括巴西木的特权，授给亨利·帕尔默先生，并且把捕鲸鱼和石鱼的权利授给另外两个人。总督们所拿到的只是巴哈马群岛收入10%的七分之一，即

① 英美量制，等于四分之一加仑。——译者

平均每年大约三十镑左右，因而必然要采取不老实的手段。“我必须指出，迄今为止，你们的总督为了获得不义之财，已经干了大量的坏事……”他们每年至少需要四百镑的薪俸才能保持奉公守法。格雷夫斯在他的朴实的请愿书中最后写道，“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仗，据我所知，虽然不断向阁下提出恳求，但是阁下从来没有给我们一点援助，无论是军械、弹药或者是军事物品……”仅仅是因为这样，拿骚已经“在最近期间受到三次劫掠并被烧成灰烬”。

格雷夫斯大概已经感到直接向土地贵族请愿是徒劳的，因为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他曾向贸易部建议，由国王从土地贵族手中接管巴哈马群岛的统治权。这大概需要两万八千镑的补偿，筹集这笔款项并非难事，例如，给伦敦出租马车夫换一次执照，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派遣一百名军
96 队去巴哈马群岛，大约要花费二千二百镑的额外开支，即使开始时岛上的赋税和收入全部投进去，但是稳定的政府一经建立起来，几年之内就又可以逐渐地获得利润了。

国王对格雷夫斯强烈恳求的直接反应，并不

比土地贵族的反应更为肯定。土地贵族最后一次行动，就是于1707年推荐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尔登的人充当总督。他在关于这个职位的申请书上说，这个群岛可与“阁下的休养名地圣赫勒拿①及百慕大群岛相媲美”。可是格雷夫斯并未受到震动，认为霍尔登对财富实际上比对健康有更大的兴趣，而且他和所有其他总督一样，渴望得到失事船的漂流货物和非法的利益。国王驳回了这项任命，因而霍尔登未曾乘船出发。

在战争期间，诸多迟误是难免的，但是，即使在1713年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以后，对巴哈马群岛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极其缓慢的。1715年，乔治一世曾亲自提出任命一个名叫罗杰·莫斯廷的人，但是，莫斯廷始终没有到达巴哈马群岛。大概他曾接到了一份关于那个群岛情况的可靠报告，但没有得到关于支持他以军队和战舰的任何许诺，因此，他不敢单独地和那些海盗打交道。

到了1713年，巴哈马群岛大概至少有一千个海盗在活跃着，他们的罪恶活动丝毫不受官方的

① 大西洋中一岛，位于非洲南部附近。——译者

约束。1714年4月，百慕大的普莱恩总督报告称，这些岛屿上二百户散居的家庭正生活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或更坏的情况中。有三伙海盗控制着那个地方。科克拉姆把哈伯岛当作基地，他在那里已经娶了一个名叫汤普森的人的女儿，巴罗和霍尼戈尔德两人则接管了新普罗维登斯，并自称总督。

根据托马斯·沃尔克自己的叙述，他曾经竭尽全力维护王权。威廉三世曾经任命他为海事法庭法官，但是他的任命没有得到安娜女王的确认。他在1715年自称，“我曾经花费时间逮捕海盗，并把他们从这些岛屿上驱逐出去”，因此至少防止了一次来自哈瓦那的报复性袭击。但是海盗的渗透活动已经太猖狂了，因而沃尔克不得不逃往阿巴科，即当时通称“阿巴凯”的地方。

97 几乎所有在约翰逊船长或菲利普·戈斯的书中生动地描写的声名狼藉的海盗，此时都潜伏在巴哈马海域内，其中有玛丽·里德和安妮·邦尼，这两个“女士”海盗与“花哥儿”拉克姆和巴巴多斯种植场主出身的海盗斯特德·邦尼特结伙航行。但是，在那些以拿骚为基地而袭击大西洋沿岸贸易的海盗当中，充当首领的似乎是本

杰明·霍尼戈尔德，当然还有号称“黑胡子”的爱德华·蒂奇。

在“黑胡子”的身上，集中表现了当时的整个不正之风。在人们的心目中，“黑胡子”实际上就是巴哈马海盗行径的同义词。和艾弗里一样，他也是十八世纪一个剧本中的主题；在二十世纪，曾经出现过一篇以叙述他的事业为主的拙劣“史诗”。在拿骚，为了纪念他，有一个酒馆、一口水井和一座瞭望塔，都取用了他的名字。至少有数百个赞颂他的业绩的故事在流传着，他大概是所有巴哈马“历史”人物中最赫赫有名的了。

把有关“黑胡子”的故事综合起来，便形成了一套讽刺的漫画，虽然它是一套有教益的漫画。在一般书中所描写的爱德华·蒂奇是一个面貌极为可憎的恶棍。他留着胡须，并把它编成辫子。在作战时，他大嚷大叫地投入战斗，在他的奇异的腰带里装着六支手枪，并且在帽带上还插着冒烟的火绳。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他的残酷行为是带有传奇性的。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大汉，据说有过十四个“妻子”，当他最后于1718年陷入绝境时，虽然已经身负五处弹伤及三处刀

伤，但仍然坚持战斗。他的酒量也是无人与之匹敌的。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有一次，在饮酒作乐达到高潮的时刻，蒂奇强迫他的伙伴们进入船舱，他在舱里事先安放好几盘点燃的硫磺。他关闭了舱口后喊道：“我们给自己制造了地狱。试看一下，谁能在这里呆得时间最长，谁就是魔鬼的近亲！”喧吵着的同伙们挨次推开舱口盖，在新鲜的空气中喘着气。无须说，胜利的“黑胡子”是最后走上了甲板，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真正的蒂奇——有时称作撒奇或塔奇——比传说中的蒂奇要矮小些。他是布里斯托尔的水手，在安娜女王的战争①时期，曾在一艘私掠船上服务过。1713年以后，他加入霍尼戈尔德一伙，可是直到1716年他才有了自己的船只。那是
98 一艘被掳获的商船，他在船上配备了火炮，补充了暴徒，并讽刺地把船只命名为“安娜女王复仇号”。蒂奇的铤而走险的生涯，仅仅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他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祸害，但

① 指英国参加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译者

是他自己却没有积蓄很多财富。此时海盗多如牛毛，分沾不到很多的赃物，只有最残暴者才免遭淘汰。蒂奇在1718年的两天航海日志中有一段常被人们引用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真实的写照：“酒已喝光了。伙伴们稍微清醒些，这里真是那么混乱不堪！小子们正在密谋策划，大谈起拆伙——因而我留心寻找下手的目标……捕获了一艘载有大量美酒的船只，伙伴们因此振奋起来，于是一切事情又都顺利了！”

在马修·马森船长1717年呈送贸易部的一份报告中，只是把蒂奇和其他四个以新普罗维登斯为基地的海盗头子（霍尼戈尔德、詹宁斯、伯吉斯和怀特）并列在一起，认定他们大约共有三百六十个部众。但是次年，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约翰逊总督则把蒂奇看作是造成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的一种祸根，他写信给贸易部道：“这个穷地方遭受的、由海盗造成的不堪言状的灾难，迫使我不能不向阁下报告，请将这一情况转奏国王陛下，并劝其支援我们一两艘快速巡洋舰，以便游弋附近海域，因为我们不断受到惊扰，船只也屡被劫持，招致贸易的彻底破坏；我来到这里以后

九个月之内，他们曾经两次停留在我们的海口沙洲附近，劫持并掠夺进出港口的船只，大约在十四天以前，四艘海盗船出现在离镇子不远的地方，抢走了我们的几只领港船，随后又有八、九艘船出现在这里，船上载着几个当地的良民，接着给我通知，如果不立即送给他们一箱药品，就要把俘虏全部弄死。为了这些居民的安全，我同意了上述的要求。那些居民被劫掠之后，几乎是被剥得精光地送上岸来。

“这一伙人由一个名叫蒂奇、别号黑胡子的人统率着，他有一艘配备着四十多门火炮的船只，还有三艘单桅帆的供应船，手下共有四百多人……”

1716年，理查德·贝雷斯福德曾经提出疑问：既然巴哈马群岛确实是海盗的理想场所，那么，为什么正式的军队在这里就无用武之地呢？弗吉尼亚总督支持这种看法，他在1717年夏写道：
99 “我相信阁下会运用您的势力，迅速派遣一支足够的军队到这些海岸来保证贸易的安全，特别是到巴哈马群岛来，把海盗从那里驱逐出去，这些海盗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总的集结点，似乎把这些

岛屿看作是他们自己的……"

争论和控告终于在伦敦开始发生作用了。书信不仅川流不息地来自各地居民和船长们，而且也来自海外殖民地总督方面，这样就甚至把懒惰的国王也激励得行动起来了。很显然，再也没有人不厌其烦地写信给名义上的土地贵族，这说明后者的权力已经削弱成为零了。对巴哈马群岛来说，幸运的是，土地贵族统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国王的全面统辖为期不远，漫长的海盗"蜜月"就要结束了。

100 第十章　伍兹·罗杰斯（一）

1717—1721

驱逐海盗，恢复贸易

国王乔治一世在1714年的即位，应该会激起一阵对付巴哈马海盗的新攻势，因为巴哈马群岛确实存在着将要成为詹姆斯党人①根据地的危险。大约在这个时期，曾有一个名叫卡莫克的船长写信给前王后玛丽——詹姆斯二世的孀妇，他在信中说，新普罗维登斯的海盗“曾经异口同声地衷心拥戴詹姆斯三世为国王”，并要求委派一名詹姆斯党人为都督，以便组织“抵抗”汉诺威派的“篡权者”。

1715年，乔治一世下令派遣六艘战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巡逻。这些舰只即使开去了，其作用

① 詹姆斯党人是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他们反对汉诺威王朝，企图复辟。——译者

也是渺小的。1717年，有人认为防胜于治，便建
议对所有海盗宣布一次大赦。于是，百慕大总督
本杰明·贝内特受命派出一名负责的人去巴哈
马，对于立即归顺的海盗，许以实行绝对赦免的保
证。他派了自己的儿子约翰·贝内特船长，乘着
一艘备有武器的船开赴巴哈马。起初，贝内特虽
然遭到射击，但他设法向集于新普罗维登斯的大
约三百名海盗宣读了国王的赦令。有些人对之表
示热情，但大多数人却都持着怀疑态度。他们提出
疑问，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的私有财物不会被夺
走或判为非法呢？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
就要“白白地冒断头之险”。只有五名海盗借此
大赦的时机到了百慕大，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威
廉·詹宁斯。贝内特总督认为，即使是悔过的人
也可能故态复萌，这是很自然的，况且查尔斯·万 101
恩、爱德华·蒂奇之流根本就是无可救药的了。

巴哈马迫切要求的，是遣派一个直辖总督，他必须是德才兼备并有武力为后盾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久就到来了，他就是伍兹·罗杰斯船长。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跟“黑胡子”一样，既是布里斯托尔人，又曾是私掠船船长。

伍兹·罗杰斯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船长，三代沿用同名。他本人大约于1679年出生在多尔塞特的普尔，幼时，其家迁居布里斯托尔。他因循祖业，于1697年当见习海员，1705年，娶大名鼎鼎的海军大将威廉·惠茨通爵士的女儿萨拉为妻，这样使他在事业上得以步步高升。

1708至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伍兹·罗杰斯驾着私掠船完成了一次环球航行，因此他在世时就已经出名。人们恰当地将他的航行与卡文迪什、丹皮尔和安森[①]的航海考察相比拟。罗杰斯在这次航行中，于1709年掳获了马尼拉·加林恩式大帆船、抢劫了瓜亚基尔[②]，并且还获得了二十余项其它战利品。正是在这次航行中，他显示出了英勇顽强的品质和善于领导的能力，这些均有助于他成为一名殖民地总督。同时，又由于在胡安—斐南德斯群岛[③]营救了亚历山大·塞尔扣克，他的这次航行更是令人难忘。

① 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1555—1592）、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2—1715)和安森(George Anson，1697—1762)，三人都是英国著名的航海家。——译者

② 厄瓜多尔西部一港口。——译者

③ 属于智利，位于圣地亚哥西边海中。——译者

伍兹·罗杰斯对此事件的记述，对于丹尼尔·迪福写成不朽的著作《鲁宾逊漂流记》(1719年)，也有很大的启发和鼓励。

尽管伍兹·罗杰斯的环球航行是很成功的，但这并未使他因此而发财致富；他不到三年就破了产，如果没有海军大将惠茨通遗留给他女儿的两幢漂亮的房子，他就很可能落得分文不名，无家可归。然而，过早的退隐决不是这样一位富有事业心的罗杰斯所能适从的。1713至1715年间，他一度驶往巴塔维亚①去贩运奴隶，1716年，他与当时闻名的好友约瑟夫·艾迪生、理查德·斯蒂尔爵士和汉斯·斯龙爵士详细地磋商过新的事业。例如1716年5月，伍兹·罗杰斯写信给斯龙，要求这位博物学家提供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详情，因为他对那儿“怀有开发一处居留地的热望”。同新普罗维登斯一样，马达加斯加也是一个出名的海盗巢穴，罗杰斯的思路是不言而喻的。

大概是汉斯·斯龙爵士使罗杰斯把注意力转

① 美国东北部一城市。——译者

102 向到巴哈马群岛，因为他曾在几年前去过牙买加，对巴哈马群岛也颇有了解。1717年初，罗杰斯力劝几名“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富豪商贾”组成公司来开发巴哈马群岛。6月，他向国王呈献“谦恭的奏闻及陈议”，又向土地贵族提出一项申请。

罗杰斯在上呈国王的奏文中，强调了别人所陈述过的许多论点，诸如：巴哈马可用作为对抗西班牙人的优良基地；该群岛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岛上完全缺乏政府组织和防御力量；该群岛充满着声名狼藉的海盗。罗杰斯虽然可以要求使用一艘备有三十四支枪炮的四百吨战船，但是他认为派出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守备队是较为适当的。

贸易部深为罗杰斯的建议所感动；国务大臣艾迪生对他朋友的计划也竭力推荐。1717年10月14日，艾迪生致书国防大臣，要求派遣至少一百人，可以“从警卫兵，或其他现役军团，或设于切尔西的英国残老军人院中选拔”。罗杰斯曾经建议每日发给军饷六便士，因而要求财政部拨款九百一十二镑十先令，充作士兵第一年的供养。

较大的困难来自土地贵族方面。直到1717年10月28日，他们才作了答复，当时显然是受着艾迪生的督促。他们将巴哈马的民政和军权向国王上交，将王产和代役租租让给该公司和伍兹·罗杰斯，为期二十一年。开始的七年，承租者每年缴付五十镑；中间的七年，每年一百镑；最后的七年，每年二百镑；全部租金额，总共二千四百五十镑，也就是平均每年缴付一百五十镑。与罗杰斯一起特别提名的租借人还有：威廉·切特温德，亚当·卡登内尔以及查塔姆勋爵的祖父托马斯·皮特。

于是，1718年2月6日，罗杰斯除了荣受步兵独立连上尉的委任状以外，又承受国王乔治一世的诏命，被正式地封为“巴哈马群岛内外大总督兼都督”，国王对他的“谨慎、勇敢和忠诚”表示“特别信赖”。罗杰斯随身带着1717年9月5日签署的大赦诏书及一系列谕旨，乘坐公司的 103
舰只“德利沙号”，于1718年4月11日扬帆启程，伴行的舰船有四艘皇家海军舰只——两艘快速舰“罗斯号”和“米尔福德号”，两艘单桅帆船“巴克号”和“夏克号”。他的职责是：公布

他的委任状；任命十二人的政务会；提出法官、行政司法长官和其他官吏的人选；详细报告关于巴哈马的形势（包括建立议会的可能性）；以及“尽环境所许可”，仿照牙买加总督的榜样，办理一切事项。

经过大约十四周的航行，这支小舰队于1718年7月20日左右到达巴哈马群岛。一些哈伯岛居民前来欢迎罗杰斯，并报告说，新普罗维登斯有一千多名海盗，至少是万恩，还没有归顺之意。但是，这些海盗也无力保住拿骚，炮台已是破旧失修，仅有一门发射九磅炮弹的炮安在架上。据认为，如霍尼戈尔德、戴维斯、伯吉斯和卡特等大部分海盗，都打算接受国王的赦免，但这事还不能证实。

1718年7月26日夜晚，罗杰斯的船只停泊在拿骚港的沙洲之外。深夜，近城地带有一片火光和爆炸声，乐观的人认为那是海盗们庆贺大赦来临的一种活动，其实是万恩放火焚烧了一艘被掳掠的法国船，同时，为了要从浅水的东湾脱逃，正在往灵便的小船上搬运他劫掠来的物资。“罗斯号”船长惠特尼派出了一条小船上岸侦察，可是

水手们遭到万恩的突然袭击，这条小船被捕获了。

拂晓，万恩升起以骷髅和交叉大腿骨为标记的海盗旗，鸣炮一声以示嘲笑，扬帆向东而去。“巴克号”奉命追踪，因感到徒劳无功，只得任其远去。万恩于绿龟礁外掠夺了一艘名为“海神号”的商船之后，便向伊斯帕尼奥拉行驶，从此在巴哈马再也看不到他了。1719年，他在洪都拉斯航行遇险，次年，在牙买加被处死刑。

留在新普罗维登斯的海盗们怀着一种近乎庆幸的悔过心情。伍兹·罗杰斯上岸时，穿过三百多夹道欢迎的居民，他们不断对空放枪，真心诚意地呼喊乔治国王“万岁”。在那破旧不堪的炮 104
台之前，罗杰斯受到托马斯·沃尔克和托马斯·泰勒的欢迎，他们自称是审判长和政务会主席。这个新任总督挥手把卷轴展开，宣读了他的委任状和大赦诏书。

这些仪式过后，伍兹·罗杰斯便聚精会神地着手工作。次日，颁布了戒严令，并授权领港长理查德·特恩利等人，在海事法庭设立之前，负责对港内的所有船货进行查封和清点。

在一周之内，罗杰斯重新建立了民政政府。他指定了六名跟随他同去的人员和六名“从未做过海盗，并享有声望”的拿骚头面人物，组成隶属于他的政务会。政务会定期开会，至今在殖民部文献中仍可见到它的大部分议事记录。在档案中，还能发现“巴哈马群岛若干有名望居民的一届议会纪要”，记事日期是1718年8月1日，这似乎不是一次正式的集会。

与此同时，罗杰斯总督指派了海事法官、保安司令、总督秘书和海军长官，并呈报伦敦当局批准。托马斯·沃尔克和约翰·格雷夫斯继续留任审判长和关税征收员，以示调解，因为他们多年来充任此职，虽然至少格雷夫斯已显得年迈力拙了。对于下一级的官员，罗杰斯又委任了治安推事、警官及“航道和公路监督”。

防卫措施是当务之急，因为西班牙人的威胁再次严重起来。拿骚炮台业经维修一新，架着几门大炮。守备队由独立连组成，他们起初就驻扎在棕榈叶覆盖的简陋茅屋里。市民组成民团，编为三个连，以守卫拿骚城。连有些以前当过海盗的人也赋予捉拿船只的使命，被派去追捕万恩和

其他海盗。

罗杰斯的政策显然是要利用当时众民的热忱 105
而使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无守卫任务的人被派去扫除街道，清理拿骚城内外的灌木丛，“因而使拿骚开始呈现出一种文明的市容”。一项开辟新居留地的计划也被提出了，新移殖者每户可得一块一百二十平方呎的土地，使用木材没有限量，但必须在一年以内平整土地并建造房屋。伍兹·罗杰斯又倡议发展捕鲸业，以及往纽芬兰岛鳕鱼渔场输出更多的食盐。

然而，烦恼的事端方兴未艾。罗杰斯的属员们刚登陆不久，便被传染病侵袭着，他认为这种疾病的滋生是由于某种腐烂皮革的气味所造成的。到了同年秋季，已有八十六人死亡，罗杰斯本人也因患病而衰弱了。

未死于传染病的幸存者也使人感到失望。随罗杰斯同去的人当中，已有十九人弃职而去，或不得不被革职。至于当地居民的状况，正如约翰逊船长所说的，“让海盗们安心做工不甚适合于他们的习性。粮食虽然很充足，白兰地等酒类的分配量也不少，可是他们却开始眷恋旧业。许多

人深夜窃船，伺机逃脱。几个月之后，剩下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伍兹·罗杰斯以痛切的言词描绘了残留者的生活情况：“开垦一块田地，只能长出马铃薯、山药，别的东西很少生长，鱼类倒是相当丰富，因此，他们当时对田间劳动深有反感，……他们这样地生活着，既穷又懒、仿佛满足于现状；整天盼望失事船货物或海盗的到来。没有什么人想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下过一种有规律的正常生活。他们宁可在酒馆里吃光花净，也不愿向我缴纳十分之一，以救助他们的家庭和任何亲人……”即使跟西班牙人的战争爆发了，并且据说西班牙人已在离拿骚仅有一百二十五哩的卡特岛进行骚扰，上述的情形仍是依然如故。

英国皇家军舰“罗斯号”船长惠特尼也不中用了。有一次他拒不从命，直到罗杰斯用枪托打他头部，他才改变了态度。事隔不久，他从巴哈马逃回伦敦，并对罗杰斯进行造谣中伤，恶意攻击。在提到关税征收员格雷夫斯时，罗杰斯曾
106 说：“他已年老体衰、无能为力了，即使办些事也离不开卧室或床榻，脾气又如此暴躁，我不愿对他过问了。”

伍兹·罗杰斯开始感到，在所捕俘的海盗当中，他的力量还不能做到惩一儆百。1718年11月，他遣送了三名去英国受审，但是，12月份，又有十名捕获归案，这就是他第一期执政的危机。一个名叫约翰·奥格尔的于7月接受了赦免，之后，罗杰斯派他出外去取运粮食，但他竟与其同伙抢劫两艘商船，又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当时派出曾当过海盗的霍尼戈尔德和科克拉姆去捉拿他们归案，结果，在埃克苏马捕获了其中十三人，有三人因负伤在返回拿骚途中死去。

罗杰斯打定了主意，坚决地并及时地采取行动。1718年12月5日，在海事法庭进行审判，出席审讯的有：托马斯·沃尔克、威廉·费尔法克斯、罗伯特·比彻姆斯、温盖特·盖尔、纳撒尼尔·泰勒、乔赛亚斯·伯吉斯、彼得·库兰特以及罗杰斯本人。尽管海盗们为自己那样辩解，声称一切罪责应归于死者之一菲尼亚斯·本奇，但他们仍然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12月10日上午10时执行正法，事前允许他们在绞刑架下唱圣歌三刻钟。在最后几分钟，罗杰斯宣布给予其中一人缓刑，此人名叫乔治·朗斯维尔，时年十八，

如罗杰斯在上呈国务大臣的公函中所述的，这是为了给他悔过自新的机会。罗杰斯又说：“他出生于多尔塞特郡的韦默思的一个忠诚善良的家庭。”无疑，他会回想起亲生的父母的故乡。“但愿这个不幸的青年将有所作为，恳求阁下高抬贵手，为他向国王代祈宽恕。”

然而，这种恩威兼施的典型行动，以及1719年5月“花哥儿”拉克姆在新普罗维登斯的归顺，也未曾消除罗杰斯所遇到的困扰。多达两千名的海盗仍然逍遥法外，西班牙人对拿骚的围困越来越紧。1720年2月，拿骚受到一支强劲的西班牙武装力量的攻击，这支武装力量是在唐·弗朗西斯科·科尔内戈的率领下，由四艘战舰、八艘单桅帆船、一千三百人组成的小舰队，它攻打着罗杰斯总共不过五百来人的力量。由于武装的
107 “迪利西亚号”和装有二十四门火炮的快速舰英国皇家军舰“弗拉姆巴勒号”的到来，西班牙人穿越沙洲的正面攻势受到了阻击，于是他们企图从拿骚的东面登陆，但是又被步枪队猛烈的火力所击退。西班牙武装力量撤退了，但威胁依然存在。罗杰斯在一封信中写道：依靠增援部队将

“等于判处五百人绞刑”。

在顺利的情况下，书信到达伦敦也须经六周，复信则非等待三个月不可。当时许多紧急函件落入敌人手里，罗杰斯便不得不复写许多份，分别交由几艘船只送递。现今在“公共档案馆里”还可以见到几十份罗杰斯于1718至1720年间写的紧急函件。罗杰斯在漫长的岁月中，等候着复信，结果却未得只字，更谈不上物资支援了。实际上，贸易部和国务大臣忙于其他事务，对罗杰斯不加理睬。甚至那个几乎被开销所压垮而无利可获的公司也更换了股东，而可怜的伍兹·罗杰斯身在国外，竟没有一个人跟他商量。

从他一系列的函件中可以想见罗杰斯从乐观转变到悲观，又从愤慨转变到失望。

1719年1月，罗杰斯怀着比较舒畅的心情，给理查德·斯蒂尔爵士写过信，信上的地址是“经由卡罗来纳州转递，伦敦，河滨马路亨格福德市场对过，教堂短街巴特拉姆咖啡馆”。罗杰斯抱怨五个月来未见一艘军舰开到拿骚，还抱怨惠特尼船长的不正当行为，但是，使他最感苦恼的大概是由一名叫普理查德的泼妇所造成的麻烦。罗杰

斯很想让这个女人尝尝浸刑椅① 的滋味，“如果我们的木匠不是忙于他事的话”。最后，他对斯蒂尔提出这样的希望：“抛开您的那个大手杖，跳起徐缓而优雅的舞吧。”

1719年5月29日，罗杰斯以更为急切的口吻给贸易部委员们写信。他写道：“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对海盗和西班牙人侵扰的忧虑，而在我们自卫力量未能增强之前，我只能把这种忧虑归咎于常驻战舰的缺乏。”信中所述的任务将是长期才能完成的，因为当地居民对罗杰斯的支持微乎其微。“……敌人在这十五年中侵袭过三十四次，虽然预料到他们还会再来，但是，这些卑贱之徒却坚持不了夜间站岗，即使有值夜的，往往
108 也是头脑不清醒，通宵保持警戒是罕见的，虽然我们的官兵常常偷袭他们的岗哨，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我差不多每天都对他们进行处分、罚款、监禁……

“我改变了生活方式，亲自同军官、士兵、水手和旅客们一起吃、喝、工作，当他们喝醉酒

① 浸刑椅是英国十五至十八世纪用于惩罚妇女的一种木制刑具。——译者

和打盹时，我坚守警戒，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的炮台就保不住守势；假如不是坚持不懈地保持着跟西班牙人作战的戒备状态，他们也许就不愿抵御海盗，保护我和他们自己。如果海盗们愿意投诚，并愿意改邪归正，愿在我们当时所称的政府管理之下生活，而我们却在为抵御这些海盗而加强防卫，若把这种意图公开宣布出去，这种行动在英国就和背叛差不多……”

1720年11月，政务会也无可奈何地向国务大臣报告说，自从1719年7月起，罗杰斯总督就没收到过他一封回信，“并且从他到达以来贸易部也始终信息杳然，这使他和我们都深感不安，我们所焦虑的是这块可怜的殖民地不再视为大不列颠国王陛下领土的一部分了。”

到了1721年2月，同西班牙的战争虽然已告结束，但是，罗杰斯却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在这冷淡、耗费和操劳的长期折磨下，他的身体再度垮下来了。25日，他写道：“自从到达以后，我被遗弃在这里，因此我确实无力再坚持下去。”他又说，他是处于“以寥寥数名病夫对抗五百名海盗”的那样窘迫的境地，人员、物资、

战舰的支援一无所有。他欠下了巨额债务，因为不得不按高涨的价格从北美购买粮食和衣着。他补充说："这块地方，这块用我的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的劳苦和健康的丧失换来的地方，竟被国内一个经理出卖了四万镑，而我本人也被他抛弃了。公司股东们在这里的一个代管者却被认为不该分沾任何份额。"相反，他一直受到恶劣的待遇，所有的经费负担都堆到他的头上。但他却表示："伦敦德里勋爵、威廉·切特温德先生和多米尼克先生是值得提起的仅留着的几位公司股东，我对他们的道义和公正寄以完全信赖。"为了拯救这块殖民地（很可能，也是为了恢复他自己的健康、财产和声誉），他宣布立刻启程返回英国。

109 罗杰斯委任威廉·费尔法克斯为代理总督，他自己于1721年3月离开拿骚前往英国，途中在南卡罗来纳州稍事停留，以便订购一批食物送到新普罗维登斯，使士兵们维持给养到圣诞节。8月间，他到达布里斯托尔，随带着一份由拿骚的重要政务会委员和当地知名人士联名提出的作证状，或称"请愿书"，签署日期是1721年3月

21日。通过这份“请愿书”，控诉了土地贵族和公司股东们的昏庸无能，并恳求给予召集议会的权利。同时还替罗杰斯说了好话，表示希望“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总督，并且当上帝保祐他到达那里时，防止国内有人再度忘恩负义地对待他，而使他不能更好地为效忠国家和保护这个居留地而努力。正因如此，除了神明助祐外，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在我们中间他忍受着不断的劳苦和艰难，毫不计较自己的特权或个人的得失。这些动机促使我们提供所了解到的那些难以逾越的困难的真实情况，他和这个殖民地为克服这些困难而奋斗，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

但是，罗杰斯在国内得到公平待遇的希望也很小。根据他自己的帐目记载，在巴哈马他花掉了他的私款，为数超过一万一千镑，因此，他在伦敦的出现使得公司股东和贸易部委员们都感到难堪。10月，他上书财政部委员，除了陈述自己取得的成就外，还对自己的贫困情况大事哀叹。他自称，是他挽救了这个群岛，“使它免于遭到西班牙人的毁坏或海盗的再次占领”。他耗尽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和货物，并弄得负债累累，狼狈

不堪。他于是恳求补偿他在过去三年中所承担的生活费用。很显然，他的请求犹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后来一段时间，罗杰斯因为债务而入狱。这就是对这位拿骚救星功绩的报答。

第十一章　伍兹·罗杰斯（二） 110

1721—1732

1721年，伍兹·罗杰斯重返巴哈马执政显然是不可能了。当时，乔治·芬尼被委派去接替他的职务，他在罗杰斯1729年返回巴哈马接受第二任之前，一直充任着这个职务。芬尼的才干很明显不如其前任，但是，他担任总督期间的政绩却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看来，他曾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去加强管理的效能，几宗关于成立立法会议的方案就是在他的任内制定的。他的主要不幸在于他那位凶悍泼辣的夫人给他造成的忧烦。

研究一下1721至1729年间的贸易部“信札原件”，就可清楚地看出芬尼充任总督时期工作的全貌。单只这些文件就值得编纂出版，自成一卷。除了1721至1723年间的政务会议事纪录以外，还有当地的财务报告，每年刊印一次，从无例外。关于海事法庭案件以及土地贵族们对司法管

理权所坚持的争论，也都刊载在饶有兴趣的报告之中。当时土地占有制的混乱状况，在很多记载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土地处理权是由土地贵族、公司和王室分享的。此外，芬尼的例行公事报告和复函也记载着有关这个群岛的有价值的细节，如：产品、货币、税收、罚款，并附有洗礼、婚姻、丧葬以及其他有关人口变动的统计报表。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巴哈马1726年的人口约为一千一百四十人，其中，新普罗维登斯有白种人五百人、黑人二百五十人；埃留特拉有白种人二百人、黑人四十人；哈伯岛有白种人一百三十人、黑人二十
111 人。根据芬尼的估计，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百一十六人可以当兵，而他们“同一时期留在家里的往往不过七十人”。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兴奋，因为随时都有和西班牙人重新开战的可能。关于跟西班牙人作战问题，芬尼在1722至1726年间与哈瓦那总督的通信以及他经常提到的有关西班牙人的动态和计谋，对于国内当局来说，一定是有很大用处的。

芬尼以乐观的心情赞赏群岛上的呈现着灰白、红褐、黑褐各色的肥沃土地，这种土壤可以

出产……“粗壮的甘蔗、世界上最优质的棉花、适于造船的上等马德拉木、桃花心木、西洋杉、松树、大戟树、王子木、愈疮木、乌木、大量的巴西木、佛提树以及其他染料木材，还有旃那、树胶榆、怪阿蔻、玛瑞脂及数种其他树胶和药材。

“这里的棕榈树提供了棕榈叶丝条的资源，其质量不亚于百慕大的产品，我已聘请了一些人来此试制。在这里，家庭用粮的多数品种均有出产，另外有各种上好的水果，所产的菠萝在美洲要数第一。

“在这些岛屿的海滩上，常可发现大量的龙涎香，去年曾拾得一块重达一百六十六磅，此外还有些琥珀。每年冬季，抹香鲸回游到此。在同一个时期里，海豹也上岸繁殖，可供猎捕，一只海豹就能取出大约二十加仑的油……

“现有的居民大多数以航海为业。

“主要营业是砍伐染料树木，这种产品连同食盐、海豹油、海龟、龟壳以及四时鲜果一起向毗邻各殖民地输出，因此，北美的船只有时载来了一些日常用品，以便进行实物交换……”

一张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拿骚风景画被断定画于“1729年或1730年”，作者是一个名叫盖斯科因的人。从这张画上，我们可以想象当年乔治·芬尼和伍兹·罗杰斯所熟悉的“城镇”面貌。尽管画师显然试图对这个地方加以美化，但它毕竟只有大约三十幢木头房子，七零八落地分布在炮台周围，仿佛一窝鸡雏围着一只母鸡一样。画面上有几处“显著景致”：小巧尖顶的教堂矗立在
112 东端边缘，也就是位于现在的罗森广场一带；法院与监狱房屋建立在海岸；托马斯·沃尔克的住宅坐落在山上，即现在政府大厦所在地；拿骚炮台、警卫室以及芬尼总督的官邸都位于西端尽头。这一簇外观平凡的建筑——由于1787年夏洛特炮台落成而灭迹——至少据有在拿骚算是最好的地势，俯览全城和港湾。芬尼和罗杰斯曾经会多少次地在门廊上遥望大海呵！切盼英国船只带来物资供应和家乡信息；担心海盗或西班牙人再来侵犯。

芬尼的最显著成就之一，就是把多事的埃留特拉居民更加牢固地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在新近与西班牙人交战时，这些人未能给予拿骚任何

支持，以后又与形形色色的外国商船暗中进行贸易。此外，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普遍存在的懈怠作风，似乎又回到了海盗时期的混乱局面。

1724年1月13日，总督对“伊斯来特”和哈伯岛的居民宣布了一项包括九条规定的政务会训令。由执政官按时主持的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必须人人参加，只有九名加尔文教派①的法国人、瑞士人和巴拉丁人经特许而免于参加；谩骂、酗酒以及“其他有辱上帝神威的无耻行径”一律严加惩处；不论奴隶或自由民的人口统计表、船舶出入海港的数字每年呈报一次；失事船必须登记；任何人非持有总督的书面许可，不得擅自离开该群岛；民团一年集中检阅四次；一旦发现海盗船或敌船近岸，必须火速报告拿骚；最后，凡是未取得特许权，就不得私占土地，持有不足二百畮土地证者不得享有议会席位，土地不满五十畮者无权投票。

关于成立议会一事，早在1718年2月罗杰斯的任命状内就有所预示，又在1721年3月的奏议

① 加尔文教派（Calvinists）是天主教的当时新教派之一，与英国国教不是一派。——译者

中提出过恳请；乔治·芬尼虽然未必比罗杰斯更能引起白厅的重视，但他对此却显得十分积极。
113 芬尼于1721年11月到任，而后不久就呈交了一份报告，列出二十七名“合适的人选向国王陛下举荐，交由公众选举，以便组成议会或其他隶属于政府的公务机构”，其中选自新普罗维登斯十五名，埃留特拉六名，哈伯岛六名。直到1722年4月26日贸易部委员们才收到了这份恳请书，5月1日经过审阅，随即被搁置起来。在这时候，芬尼已经呈递过第二份恳请书，签署的日期为1722年3月，直到1723年年中才接到了批复。批复的口气虽然温和但不能令人满意，芬尼仅被告知这个问题“正在考虑之中”。1725年，另一来文较为严厉地指责芬尼对定期呈报统计流于怠慢，但是只字没有提及有关议会的事。芬尼遮掩着内心的愤怒，于1726年遵令呈报详细的统计，但他声称炮台虽已重新修建，而武装却付诸阙如，因为申请发给火药与炮架轮，始终未得到答复。其实，几门重炮未安上架，已不下五年之久了。芬尼喋喋不休地一再恳请成立议会，认为没有议会就几乎无法进行征税。

芬尼坚持不懈的勇气得到了补偿，但是他却没有机会主持第一次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因为这个议会是于1728年12月26日在伍兹·罗杰斯第二次任期内才授权设立的。乔治·芬尼主要因为他妻子的关系，而失掉了众望。很显然，这位令人生畏的妇女强行垄断了食盐、船身外板、药用树皮、棕榈、“棕榈叶丝条”①等各项有利可图的商品，她迫使经商船主把货物直接批发给她，从中设法操纵零售市场。1728年8月，一个名叫汤森的说过：“总督独占了整个商业。连一品脱的甜酒，半个钱的饼干都要向芬尼夫人购买。”马撒·维尔夫人说得更加彻底，大约就在这时，她写道：“她掌握着支配那里每个人生命的机会。若不按她所规定的高昂价格偿付，人们便休想得到任何食粮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位总督阁下的夫人常常对陪审团施加威吓，甚至在法庭上使法官们遭受侮辱。”

尽管芬尼本人的品格颇受到公司总办约翰·马尔卡斯特，以及他的代理人卡思伯特·杰克逊 114

① 棕榈叶丝条可用于编制草帽、席、垫以及提篮等。

的称颂，但是贸易部委员仍然奏请国王派遣一个更加认真负责的总督去巴哈马，以便吸引更多的移殖者前往那里。恰好伍兹·罗杰斯当时也向国王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总督职务。这项呈文是递给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并得到了二十九名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其中有汉斯·斯龙爵士、马萨诸塞前总督塞缪尔·舒特、弗吉尼亚代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百慕大前总督贝内特和蒙塔古勋爵等，他们称道："我们从未听到对他在那里任职时有关他品格的告发，也未闻他在任内有何不正当的举动，但知其为人极端刚强与坚贞，堪称为忠顺臣民，耗尽其私产而不惜。"

于是，乔治·芬尼被撤了职，伍兹·罗杰斯重新上任。芬尼未曾因此而失体面，贸易部只批评他"对其妻的那样放肆和压制的行径，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虽然在其他方面，芬尼为人尚属正直可靠"。1731年，他受任北美南部各殖民地海关检查长职务，1733年又成为巴哈马及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其他殖民地的政务会的特别成员。

据我们所知，乔治·芬尼在巴哈马的经历中曾有一段奇趣的结尾：他设法把他的妻子留在那

个群岛，以便进行离婚。伍兹·罗杰斯在给殖民地行政官查尔斯·德拉菲的信中，曾陈述他是如何勒令这对夫妇一同离开拿骚的，尽管也曾顾虑到民法博士会馆①正在审理他们的诉讼案件。

伍兹·罗杰斯在第二任内所受到的待遇，比起第一任较为优厚。除了有权召集选举产生的二十四人组成的议会之外，还享有年俸四百镑。这可能使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在第一任内他的财产耗费一空，只得靠着独立连上尉之职的微薄半俸度过了多年。此外，他还曾充任英国政府的有关处理海事的非正式顾问，又曾可能于1724年被 115
马尔加什的荷兰人所雇用，但详情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1728年，他在五十岁时再次授职，重新使他精力饱满和情绪乐观了。

1729年8月25日，伍兹·罗杰斯到达巴哈马，他的儿子威廉和女儿萨拉随行。他的妻子留在伦敦没去。罗杰斯携带的家具什物当中，有

① 民法博士会馆(Doctors' Commons)：1768—1857年存在于伦敦，有权处理遗嘱、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译者

"两个细嘴瓶、一只圣餐杯、一个圣餐碟，还有一个收受祭品的容器，以供当地的国王小教堂举行仪典时使用"，这些器皿与他于1718年所带往拿骚的士兵和大炮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

罗杰斯到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召集议会。选举令状准备就绪，并于1729年9月8日发布了公告。选举活动在五个地区陆续展开，经历一周时间（9月15—20日）。议会于9月29日米迦勒节① 第一次在塞缪尔·劳福德先生的住宅里举行。拿骚有八名代表：约翰·科尔布鲁克、爱德华·埃尔丁、彼得·古德特、本杰明·霍尔、塞缪尔·劳福德、威廉·平德、罗杰·里丁和摩西·西姆斯；代表巴哈马东部的有：约翰·贝内特、托马斯·唐汉姆、塞缪尔·弗里思和托马斯·桑德斯；代表西部的有：雅各布·贾罗德、凯恩·贝洛、弗洛伦蒂恩·考克斯和托马斯·洛里；四名代表埃留特拉：约翰·贝瑟尔、约瑟夫·英格拉姆、保罗·纽博尔德和约翰·凯里；四名代表哈伯岛：老约翰·汤普森、小约翰·汤普

① 米迦勒节是英国人纪念圣经中米迦勒天使的节日。——译者

森、约翰·罗伯茨和西博姆·平德。在这选举出来的二十四名代表中，只有六名是芬尼在1721年所提出的二十七名"合适人选"。

约翰·科尔布鲁克当选为议长，并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以调查群岛事务。第一次会期通过了不下十二项法案，诸如：鼓励新移殖者，处理代役租的棘手问题，资助铺设道路，预防待伐的树木遭受火灾，监管奴隶，控制船身外板木料的出口，征集税收，拟定拿骚城市规划，制止偷窃散失的牲畜或果品，奖励种植棉花和鼓励外围小岛购置耕畜等。

但是盼望已久的议会远不象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是一剂万应良药。这位不幸的总督面临着重重困难。罗杰斯到达三星期以前，就刮了一场飓风，损失惨重；他发现炮台破损，贸易不振， 116
税收无着。更有甚者，海盗或西班牙人袭击的危险依然存在。1729年11月，他请求调遣百慕大独立连到拿骚来，尽管皮特总督预感到此事不妙，并从而加以反对，但这支队伍却立即调遣出来了。

到了1730年10月，伍兹·罗杰斯迫不得已地

致书贸易部，语气十分沮丧。他虽然积极鼓励种植甘蔗和棉花，经营造船和食盐业，但进展极为缓慢，令人痛心。有七条船正在建造中；种植场业已开垦，两处供制糖用，一处供酿甜酒用；派往埃克苏马的一队人，在卫队保护下已获得食盐一万八千蒲式耳。可是1730年上半年的全部税收，才达微不足道的四百一十八西班牙银比索。除了几户来自巴拉丁的德国人外，很少有移殖者被吸引到这个贫穷困苦的殖民地来。1731年的人口只有九百二十五名白种人，四百五十三名奴隶。罗杰斯写道："见这里地穷人稀，我从未为我自己或其他人提出过俸金要求。在全美洲就是这里的各级公职人员所得到的酬薪算是最低，因此，如不兼任其他差事，谁也不能靠此糊口。"他同时要求派去一名"正统派的神学者"充为牧师，以应殖民地精神教化的需要。

罗杰斯所感到的主要压力还不在于精神教化方面，而是在于议会内部所面对的反抗势力以及本身的力单势薄，与他作对的首脑人物约翰·科尔布鲁克议长似乎已成了总督势不两立的仇敌。科尔布鲁克与总督的儿子威廉·惠茨通·罗杰斯

曾经合伙经营贸易，后来，威廉·罗杰斯被任命为殖民地秘书，于1730年他们拆了伙，科尔布鲁克与伍兹·罗杰斯的对抗看来是与此有关的。拆伙意味着商业关系与正常地执行公务是互不相容的，显然，科尔布鲁克所恼怒的就在于此。不过，他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还可追溯到更早些，早到1721年，甚至1717年。

克斯兰的约翰·克尔在他的回忆录中陈述说：早在伍兹·罗杰斯第一次被委派去巴哈马之前，克尔就跟奥斯坦德公司磋商过，打算在新普罗维登斯建立一个在帝国保护下的加勒比海自由港。1721年，约翰·科尔布鲁克，“一个奸猾的
人，精于投机买卖的能手”，就出场活动，私自 117
与维也纳皇家最高当局密谋，并且窃取了真正倡导者约翰·克尔的有关自由港计划的全部功劳。由于在巴哈马顺利地确立了直辖殖民地的地位，这个计划被搁置起来。但到了1729年，科尔布鲁克又渐渐地骗取了伍兹·罗杰斯的信任，终于在拿骚当地抛头露面，目的是为了试探他那远大谋略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

布赖恩·利特尔有一段很恰当的话，他说：

“科尔布鲁克所选择的手段就是操纵新召集的议会。约翰·怀特是他的主要党羽，而天真的罗杰斯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科尔布鲁克的密友之一。因此，怀特竟能成为政务会第二个重要的成员，又兼任司库和审判长。罗杰斯的坚定盟友刘易斯·邦尼特在给纽卡斯尔公爵的秘书德拉菲的信中说：“这两个商人狼狈为奸，使可怜的罗杰斯‘为难’，更为不幸的是，许多议员不久都成了科尔布鲁克的‘傀儡’。科尔布鲁克的另一名党羽贾欧德，又名詹纳，以总督秘书的身分四出活动，密布了束缚伍兹·罗杰斯的罗网。”

1731年2月，罗杰斯写道：“在上届议会的几次会期中，我尽力（遵奉国王陛下的旨意）就防御工事的现况与设备问题同他们商议，因为这些工事确实需要尽一切可能加以修缮，起初多数议员对此并没有嫌恶之感，可是他们的善良愿望日益被这位科尔布鲁克先生——他们的议长——的阴险伎俩所转移。此人长期以来惯于利用人们的无知而进行欺骗。为了预防他的行为诱引人们接受有害于这个殖民地及他们自身安全的计谋，我不得不解散议会。最近重新选举了一届议

会，但是（我）又察觉到上述这个科尔布鲁克先生对那部分最无知的人施加影响所造成的后果，这些人在议会中占着大多数。”

当议会被解散的时候，科尔布鲁克拒绝交出总督所索取的某些文件。他很快地被逮捕了，其罪名是扰乱治安。1731年5月，审判长诺兰对他进行审讯，检察长培根负责起诉。陪审团判明他
有罪，罚以使其一蹶不振的七百五十镑巨款，并 118
命令将他无限期地拘留，直到他能具结保证书，充分担保今后举止检点为止。

1731年6月，伍兹·罗杰斯写道：“科尔布鲁克是本政府之大敌！他假借着议长的职位，想方设法对那些无知的议员，施加骗取来的巨大影响，通过那么卑鄙的手段，妄图挑起守备部队叛变，煽动居民的不满和对抗情绪。鉴于以上事实，卑职恳切请求，为了制止他继续耍弄破坏治安的罪恶阴谋，立即采取的措施将为国王陛下及阁下恩准。”贸易部委员们大概是支持罗杰斯的严厉措施的，因为他们在与上述的信同时发出的一封信中，确认了罗杰斯早先解散议会的做法。这封信签署的日期为1731年6月29日，其中有下列重

要的原则性的陈述："在殖民地现状及贵总督指示的许可下，使殖民地议会程序与大不列颠国会程序力求一致，这将是比较适当的。……英国政体之所以能保存，系有赖于立法机构两部门保持着平衡；若使两部门职权划分愈明，则愈易于互相协调，也愈有助于其本身的持久。"

但是，罗杰斯总督与科尔布鲁克及其同伙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和解的余地了。派别活动在拿骚占了上风。1731年8月，罗杰斯报告说："对于修缮防御设施，我尚不能得到居民的协助，尽管如此，我在毫无他们支援的情况下，为守备部队在炮台新建了一座兵营，又取用本地的木材竖起二十台新炮架。并且，我将继续致力于修筑工事，一俟盛夏酷暑过去，便可安排守备士兵劳作，这样才不致损害他们的健康。我将尽早在新的一届议会中做出一切努力，我虽然还是焦虑，假如科尔布鲁克先生及其在此的同谋者还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去阻止人民从事劳动的话，则不能指望议会对公益事业有所促进，而这里的人们如此贫困，他们也不可能捐助任何资金。"

约翰·科尔布鲁克甚至在国内也挑起了事

端，因此，1731年10月，伍兹·罗杰斯派他的儿 119
子去英国，并附呈了一封说明函件。“我不知道科尔布鲁克先生会如何对我诬告，因此，敢请阁下允许我派遣我的儿子，以恭候阁下就近质询，如若阁下有意了解情况，我已指示他向阁下禀报有关科尔布鲁克先生在此的行为或有关这个殖民地的一切其他事务的细节。此外，奉上政务会和议会记录副本以及敬答阁下询诘的复函，并附有尽可能精确的有关此岛各户情况的报告，我希望不久将赴哥伦巴即卡特岛巡视，该岛系本政府治下被人们赞许为最富饶的地方。有关该岛的详情，我将再向阁下报告。”

罗杰斯认为，这块殖民地上的一些困难可待王室向土地贵族赎买领地时加以解决，因为他们在巴哈马群岛仍持有土地所有权。1730年4月，土地贵族们曾提议出售他们占有地的特权，所要的代价是“付给每人一千枚金币，所有费用全部了清”。1731年10月，罗杰斯极力主张接受这一提议，以便“杜绝争夺地权的不良之风”。1733年，付给六名土地贵族每人一千镑；同时，也付给公司二千镑，作为二十一年租借权期限未满的

赔偿。然而，到了这时，作为公司的真正支柱的伍兹·罗杰斯，也结束了他的责任期限。

这位首任直辖总督似乎没有实现对卡特岛的预定巡视，因为他于1732年7月15日在拿骚去世了，毫无疑问，他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抗势力使得他耗尽心力。7月20日，政务会主席理查德·汤普森简要地向国务大臣报告："承蒙全能上帝的恩赐，前总督伍兹·罗杰斯先生之灵于本月15日归天，专此禀告阁下。"

伍兹·罗杰斯去世的确切原因谁也不会知道，他遗体安葬的地点也是如此。他在遗嘱中要求，把他的动产遗留给他的两个在世的子女，这个遗嘱于1732年11月24日在伦敦得到确认。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属也未能比他活得更长久多少。与他疏远多年的妻子萨拉·罗杰斯在1732年秋死
120 于伦敦。威廉·惠茨通·罗杰斯担任巴哈马秘书职务一直到1734年，于1735年死在非洲西部的怀达，据认为，他是在前往非洲为巴哈马获取黑奴的航程中死去的。总督的女儿萨拉·罗杰斯于1743年相继而死。威廉和萨拉都未曾结婚，因此伍兹·罗杰斯并没有留下直系后嗣。

伍兹·罗杰斯算是巴哈马首任的正直与得力的总督，也是王室首次直接任命的总督。然而，我们仍须谨防过分简单化。1718年（或1729年）往往被看作是巴哈马历史“坏”年代告终与“好”年代开始的绝对分界线。历史并不是那么样简单啊！

我们已经看到，王室对殖民地取得控制权，是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土地贵族始终没有控制过海关，而且从1697年起，王室就拥有确定总督人选及审批官吏任命之权。再则，土地所有权益的上交更形缓慢，直到1787年才算最后完成。伍兹·罗杰斯并不完全是个官吏，通过其在1718年所成立的公司，他本身在巴哈马就占有一份所有权的利益；他在拿骚所指挥的部队是一个“独立连”，而不受陆军部的直接管辖。

人们认为议会以及从1729年9月29日起几乎无间断的议会记录，都是那位首任直辖总督的创造物。这种普遍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如前所述，有某些迹象表明，早在1648年，当第一个居留地建立时，就曾有过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还不断地提到，在业主总督治理时期，曾存在过一

种制定法律的议会，并且设有议长。只是到了1703年，由于沃伦议长对莱特伍德总督的反抗，这种形式似乎才被废止。

在伍兹·罗杰斯的第一任期内，他凭着总督一政务会的训令进行治理，看来他是赞成这种政体形式，因为1729年以后，他同议会的关系几乎未曾融恰过。

人们往往把伍兹·罗杰斯描绘成一个十足的英雄。从他的个性说来，他似乎一直推崇恭顺，而不甚重视仁爱，他可能倾向于苛刻和严厉，在其
121 第二任期内，尤其是如此。有一个曾经当过海盗的人甚至称他为暴君。罗杰斯坚信，苦干能出实效，但这种态度在巴哈马总是不得人心。补救纠纷的方法，由他看来就是纪律。这是海军军官的习气，而伍兹·罗杰斯始终保持着海上船长的本色。无论如何，他引导巴哈马群岛渡过狂风怒涛的大海，进入了王室统制的较为平静的水域。

第十二章 十八世纪的政府 122

1732—1738

罗杰斯在驱逐海盗和恢复贸易方面，确实有所建树，为此，英王乔治一世于1722年赐给他一项加盖国玺的褒奖状。尽管如此，1734年初，当理查德·菲茨威廉到职接任时，该殖民地的境况一定还是令人沮丧的。由于他对罗杰斯任期以前的海盗骚扰毫无所知，他个人幻想的破灭在行动上强烈地反映出来了。他跟许多业主总督一样，不得不采取讥诮和贪婪的做法，到了后来，大失众望的必然结果，使得他被控告到了伦敦，并由别人接替其职。

但是，菲茨威廉没有觉察出，使该殖民地朝着它现行体制发展的过程已经开始了。正如十八世纪的情景所展示的，总督的个人作用是渺小的，而社会舆论，即反映着显著地方利益的情绪却占着较为重要的地位。罗杰斯死后，在四个总

督任期内所形成的体制，和现行的巴哈马体制相比较，除了1841年总督的政务会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实行分立以外，它们之间并无很大的差别。

众所周知，1718年以来，巴哈马群岛便是英属直辖殖民地。皇家谕告曾表示，总督代表国王，掌管直辖殖民地的行政、财政和司法等事务；而民选的议会则处于下层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市议会，其职责是议决适应殖民地急需的各种法令及条例。但是，巴哈马人决不认为自己完全从属于王室的特权，因而在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坚持了争取较多自治权的斗争。这两个主要
123 因素是：一、英国政府部门的无能和冷淡；二、在英国本国内对王室特权的反抗。

国王枢密院自认有全权处理殖民地事务，但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它却未设立一个相应的正式机构。在这个期间，围绕着权限问题，它曾与国会进行长期而无望的斗争，终于导致向下议院负责的现代内阁的产生。枢密院虽能规定境界和排解争议，但它的最重大的权力却是任命殖民地的官吏。英王过去和现在都通过它任命总督、秘书、检察长、司库或总收税官、审判长、保安司

令和关税征收员。这些官员始终按照英王旨意行事，并单独地向英王负责。

枢密院只能否决有关殖民地的法令，而没有议决这些法令之权。英国国会多疑善防，连枢密院的这种权力也不予以承认。据A·B·马尔科姆所述，国会本身虽然保留着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利，但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从未针对巴哈马群岛单独地制定过一道法令。这可能是由于那些岛屿的地位显得低微。事实上，英国的国内法令如果在巴哈马群岛生效，那就一定是由当地议会再用法律规定下来的。1799年的巴哈马条例，是用来确定“英国法令有多少可在巴哈马群岛施行”，其中列举了一般习惯法、特权法案、官吏宣誓及考核条例、个人自由权利法案以及一百九十二项特定的法案。那些法案是从中世纪以来就制定的，其中包括1729年以后议决的二十九项。那些可适用的法案都是被列举出来的，这样无非确认了殖民地立法机构对独立性的要求，虽然那时英国国会坚决主张殖民地的法令不得与英国法令有任何抵触——这一原则早已在1629年希思的授地状或1688年布里奇斯的委任令里有了规定。

关于殖民地事务，枢密院虽然可充作为全院委员会，负责召传证人与律师并颁布如枢密院令之类的决定，但在通常情况下，它却把殖民地事
124 务委托给贸易部、财政部、海军部或陆军部去办理。在这些部门中，1696年成立的贸易部算是最为重要的；但贸易部规模太小，且权限也太不分明，就它和殖民地的关系而论，它始终是奉行着重商主义原则。一直到了它本身扩充成为殖民部，由殖民大臣统管财政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有关殖民地的事务，它才在殖民地的非立法事务中，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内，贸易部的训令往往被视为好管闲事的讨厌东西；财政部负责殖民地一切开支，也被认为是巴哈马群岛一贯贫穷的主要原因；由于海军部和陆军部在法理上主管防御事宜，人们认为对于巴哈马群岛防御从未加强这一事实，这两个部门要承担责任。

殖民地的许多、甚至一切事情，都依靠着总督的个人因素，必须承认，英王已经尽力委派有资产和才能的人来担任此职。直到十八世纪末期，在英帝国领土内所任命的三百二十一个总

督中，有三十七个贵族，四十七个准男爵或爵士。这些人当然获得了“最好的位置”，据艾伦·伯恩斯爵士针对着后期的情况说，巴哈马群岛因为贫穷并且地位低微，以致遭了殃。无论如何，在十八世纪期间，群岛得有象伍兹·罗杰斯、约翰·廷克和威廉·谢利那样的人物充当总督，那是很幸运的。但是将近十九世纪以来，总督则换了一批庸碌平凡的人物。我们将按其所应享有的地位来看待他们。

1718年总督罗杰斯的到任，为后来的总督树立了榜样，上面已经述及。在殖民地，总督是王权的代表者。如同英王有他的枢密院一样，总督权力的主要机构就是他的政务会。政务会的成员都是由总督自己指派的。根据一个有关殖民地的谕告，政务会应由“品德优良，效忠政府，家道殷实，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组成，“不应包括贫困或负债较重的人”。在巴哈马群岛，总督的政务会按传统由十人组成，其中任何六人均可构成法定人数。这些人几乎唯总督的意图是从，结果就必然与大多数民众发生矛盾。 125

政务会既是总督的咨询机构，又充作平衡法

院与上诉法院以及立法机构的上议院。因此，在巴哈马群岛，政务会有权提出立法动议，虽然直到1841年为止，它仍兼握着立法与行政两权。1706年贸易部及1718年王室谕告先后宣称：总督的政务会应"同议会一样，有权制定关于筹款与拨款的议案"。但是，这项要求从开始就引起了争论。殖民地立法机构从来就没有不经过斗争，而承认政务会指令的合法性。1729年，巴哈马议会承袭了这种现成的态度，正象它认为当然地采纳了业成惯例的英国与殖民地议会所有议事程序和权利一样。

总督权势的最显著表现，并不在他与政务会的交往关系上，而在他能和议会保持友好这一技巧上。维持力量均势是一种微妙的伎俩，这是笨拙的人所不能做到的。总督独揽召集议会之权，由他签署选举令状，并把它交给保安司令，保安司令办理选举事宜，恰与英国郡长相同。议员一经选出，就在选举令状的背面写上他们的名字，然后交给秘书。总督随即发出委任书，议会于是就召开了。

由于议员的失去资格、辞职和死亡，补缺选举

是常有的事。在十八世纪，在议会的一个会期内，不申请总督签发令状，以便补选新议员，这是罕见的事。例如，1753年6月，议会里不下六个议席空缺，因而出席的议员不够法定人数。

只有总督有权下令议会闭会或解散议会，这跟在英国一样，是行使特权的一种抢先的手段。在1731年4月科尔布鲁克的危机中，伍兹·罗杰斯解散过议会。在1743年12月，议会召开后一个月，又被总督廷克所解散，因为它不肯通过他认为必要的防御法案。罗杰斯不急于召集议会，几 126
乎达五年之久，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只援用戒严令来管辖这个殖民地。1772年，议会搁置了一项在议会和政务会均已通过的议案，这样使托马斯·谢利不满议会的延误而把它解散。1833年，总督鲍尔弗玩弄政治手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他命令议会休会一小时，迫使议员“冷静下来”，而他却在会议室与议长下着象棋，以消磨这段时间。一休会，议案便失效了，必须在复会时重新提出。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期间，议会的任期是不固定的。为了避免大选时的麻烦和浪费，议会的

任期一般偏长。有一届“长期议会”，事实上持续了九年之久，即从1785年到1794年。现在的七年任期，是1795年的七年选举条例所规定下来的一种折衷办法。到那时，由于议会掌管着政府财政预算，总督就不得不每年至少召集一次议会。

在殖民地中，休会问题始终是一个引起总督和议会之间不和的原因。巴哈马群岛亦不例外。在十九世纪中叶，议会曾一周又一周地延长休会，迫使总督罗森不得不把它解散；但是，直至1797年末的12月份，议会却谦恭地向总督邓莫尔申请正式休会。照惯例，现在议会中若有一名议员死亡，就得自动地休会，同时也不在星期日或假日开会。可是，在1773年和1774年间，议会却在“假日”开了会；在1779年，它甚至在圣诞节那一天召开。

总督对议会选出的议长有承认或否决的权利。1734年，总督菲茨威廉的首批施政措施之一，就是驳回议会所推选的议长约翰·耶沃思，因此议会重选詹姆斯·斯科特为议长。巧合得很，1753年，当詹姆斯·斯科特任代理总督时，他被劝说而拒绝了议会选出托马斯·佩蒂为议长。

按传统，总督得任命议会的书记、信差、守卫，甚至守门人。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叶，议会赢得了自选职员的权利。这或许是因为那些职 127
员的工资由议会议决，而不归属国家岁入开支。职员的工资额，系根据会期的长短而有所不同，在议会初期的大半会期的议事记录里有过记载。1795至1846年间，议会又委任一名公职牧师，并付给他薪俸。

通过总督，英王享有决定议会议员人数以及会议地点、次数的特权。关于选举条件和议员资格，在1762年、1784年、1794年和1799年先后通过的法案中均有所规定。1784年以前，议会有二十四名议员，从五个选区选出。1784年，议员人数改为二十五名，选自十个选区；在这十个选区当中，有新增加的阿巴科、安德罗斯、埃克苏马、卡特岛和长岛。1799年，又增添了特克斯群岛、凯科斯群岛、长礁和华特林岛的议员，议员人数增至二十九名，一直到1960年都未超过此数。1730年11月，在二十四名议员中，法定人数规定为十四人，1768年，又减至十二人。法定人数始终是偏低的，这是因为外围小岛议员的定期

出席是个待决的问题。

财产和其他选举条件以及议员资格，在美洲虽然算是最低的类型，但却始终用来保证只让最显要的公民当选为议会议员，并只让少数居民投票选举。在伍兹·罗杰斯的1728年委任令中，除了规定议员和选民应是不动产自由所有人外，其他各项资格是不够明确的。因为《巴哈马法案汇编》最早的那一部（1803年）未将若干作废的法案刊入，因此，1799年法案的细则，算是我们仅有的最早一种了。

根据内容冗长的1799年法案，选民必须是男性，自由人，白种人，年龄达二十一岁。他们应是在巴哈马群岛定居一年以上的居民，同时也是在所在选区内定居半年以上的不动产自由所有人。另外，他们必须在前一年已纳完税款五十镑，并且曾向治安推事为自己的身分宣过誓。凡经理人或种植场职员如无相当于金额五百镑的资产，就不得享有选举权。每个选民只能投一张选票，并不得因争取选票而转让资产。候选人如有
128 行贿活动，则课以一百镑罚款。在选举时四十八小时内，不得因民事案件而逮捕人。

1799年以后，议会议员必须是二十一岁以上的自由男性白种人，又必须是在巴哈马群岛居住一年以上且“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就最低限度来说，他们必须拥有不少于二百嗽土地或价值达二千镑的资产。虽然于1804年降低到五十嗽或一千镑，但这仍然是一个苛刻的条件。另外，议员必须在履行议员宣誓、以及表示忠顺和确认至尊的宣誓之后，才能在议会中行使其表决权。

一直到了1807年，自由黑人才享有选举权。但黑人当选为议会议员，则是好几年以后的事。1834年，当“解放条例”颁布时，议会里有黑人议员四名。在十八世纪内，往往有赖于议员来提出种植场主和商人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因而屡次同贸易部的政策发生抵触。如：1788年，议员中有种植场主四名、商人四名和特许打捞失事船者六名。所有议员，包括那些代表外围小岛选区的议员们在内，都是来自拿骚，这个惯例是一个近代的反常事例。在十八世纪初期，代表哈伯岛和埃留特拉的议员几乎都住在当地，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有许多议员迟到或缺席的原因了。

到了1815年，现在的议会会议厅落成，在这

以前，议会是在私人住宅里召开的，后来开会地点改到监狱那边的法院，坐落于拿骚商业中心地海湾路的拐角处。在议会成立的头一个世纪内，除了频繁的休会外，议会在会期内每天都开会。在1800年以前，开会时间总是上午九点半，到了后来，才改为每周或每两周开会一次，时间规定在下午和晚上。

总督虽然不能直接地提出立法动议，但是，他在每届议会会期代表国王致开幕词时，就可以，也总会从中示意有关某些法律的制定。强有力的总督们，利用着他们的政务会所享有的提案权以及他们自己的关于休会、停会和解散议会等权力，以便使他们所倡导的议案制定为法律。一切巴哈马法律，通常称之为法案，而不称为成文
129 法，都必须经国王批准方可生效。所有议案经过议会和政务会三读通过后，国王授权总督在议案上面签署“我同意”的字样。总督也可以否决认为不合适的或与英国成文法相抵触的任何议案，但是实际上，这从来是没有必要的。没有一个直辖殖民地总督，象伊莱亚斯·哈斯克特于1701年所走的那样极端，竟命令把一项议案从会议桌上

撤下去。

当发生纠葛的时候，总督就被通知把议案交给枢密院，但这种做法也不见得经常出现。无论如何，它终归是把不称意的议案搁置起来的一种可靠手段。

在十八世纪期间，有三方面的特权的范围，各殖民地立法机构不得僭越，那就是贸易、国防和外交政策。另外，立法机构决不可侵害在一些条例上所特别保留的王权，也不可通过未经国王最后批准的法案。但是，到了1729年，殖民地议会开始有了一些真正的实权，而这些实权在整个世纪期间不断扩大着。早在1741年，彼·亨·布鲁斯宁愿做一名巴哈马议会议员，而不愿充任总督的政务会的成员，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

每届议会开幕时，议长常常要求，并且也总是获得了英国国会几个世纪以来所争取的传统特权。这些特权是：议会内言论自由，除叛逆、重罪或妨害治安外不受逮捕，自由会见总督以及总督对一切活动要作善意的解释。除此以外，议员被付给每天三先令的费用，由他们的所在选区担负，但这个惯例在十九世纪就中止了。虽然疯癫或

破产未曾使议员自动解职，但是所有议员都可请求议长准其辞职，甚至不必向总督说明他们所持的理由。这个原则于1791年在总督邓莫尔勋爵任内就最后确定下来了，那时它被宣布为这个议会的一种“不容怀疑而且不可剥夺的特权”。最后，除了那些涉及财务或属于他个人利益者外，任何一个议员都可提出议案。

议会一开始就被授与管理它自己议员的权能。最早的议会议事规则是在1734年8月26日制
130 定的。议员如果破坏规则，议长则有权让其停职，议员如果未经许可而缺席，拒绝传信或口出不逊，都得课以罚金。有些议长做得更过头了。1741年，某议员不服从命令，被监禁起来。1804年，议员弗里曼·约翰逊辱骂议长，被处罚二百镑，次年因拒付罚款，又被监禁了十天。1764年1月以后，驱逐议员意味着自动取消其资格。说来很凑巧，就在英国国会就约翰·威尔克斯案件通过决议之后的第四天，上述的那个案件也得到了类似的解决。议员如果非经允许而长期缺席，以及在会期内随时擅自离开殖民地，也要取消其资格。有些议会议长过分重视议会的尊严，竟把

非议员也传唤到议会的惩罚法庭。1768年，乔治·蒂泽德牧师在一次讲道中说过一些藐视议会的话，曾被要求作出解释。之后，他受到总督的谴责，并进行了赔礼道歉。关于检察长怀利案件（1817年），后面再加叙述。

和英国的大多数立法机构相同，在掌管财政问题方面，巴哈马议会把它自己的地位放在行政机构之上。从罗杰斯那时以来，总督的薪俸必须依靠议会表决。1741年，议会表决约翰·廷克的年俸为三百镑，该款项系对每吨巴西木木板征税一英担，对每一千个柠檬和柑橘征税一赖耳①，以及对殖民地每间房屋征税六先令来筹措。布鲁斯认为，1744年廷克之所以解散议会，不是因为议会不通过防御方案，而是因为它拒绝给予他所要求的薪俸！

在巴哈马群岛那样的一个小殖民地里，公众对任何捐税的同意对它的成就至关紧要。1753年，总督廷克为建成新教堂提请拨款，听起来很象是一种央求。他曾许给议员“在你们目前的

① 赖耳（ryal），英国旧金币。——译者

境遇下”再也不提出别的要求了。虽然总督的政务会要求享有提案权，但是，财政议案一开始就是由议会通过全议会委员会提出的。

最早的关于巴哈马岁入的议案是于1734年12
月4日提出，并在两天之后通过的。这些议案规
131 定，“白种人、印第安人、黑白混血种和黑人等
的男女，凡年在十六岁至六十岁之间者”，每人
抽人头税四赖耳；拿骚海滨的每块地皮抽税六先
令；其他地区的每块地皮抽税二先令六便士；进
口奴隶每人抽关税六先令；一切外轮每吨抽税一
先令六便士；进口货物葡萄酒、苹果酒、啤酒和
甜酒以及出口货物食盐、木板、木材和海龟均抽
关税。

议会可以要求司库，即后来的总收税官，汇报岁出入的细目。例如，1741年，在表决总督薪俸之前，就这样做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议会往往指派一个七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帐目，正如在1753年的那样，根据报告，公帐内有公务员和一个教师薪俸准备金的总数额，分别为八百六十镑十四先令十一个半便士和八十七镑十四先令四个半便士。由此可以推定，总收税官如果没有汇报

期终的决算，就不得将他撤职。1795年，菲利普·杜马雷斯克因为离职时拒绝汇报帐目而被关进监狱，直到他交出账目并向议会认错之后才获释放。

我们后来将看到，在邓莫尔勋爵的总督任期内（1787—1796年），议会对财政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议会还在别的一些方面扩大它本身的权力，以削弱政务会的地位，甚至侵犯了行政和司法领域。初期以来，议会就获得权利来开设法庭，以审理选举争议和选举中被控为不法的行为。这个制度很不健全，反而给作为一个阶级的议员以受贿和行贿的某些可乘之机。一个腐败的机构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过来的。

1741年建造蒙塔古炮台和1744年重建拿骚炮台，在这时期，议会直接颁布命令，发动各阶层市民帮助此项工作。在十八世纪内，平时议会按照大陪审团向它所提起的公诉，组成了一些委员会，以便在休会期间举行会议，并通过书记搜集了政府债务人的要求，甚至在1789年向秘书和在1790年向总收税官提供了咨询意见。

在十八世纪内，这类措施中最重要的或许

132 是：1785年11月，议会就种种事务，特别是有关帐目、通讯、学校和公共工程等方面，遴选一些委员分别地负其责任，并请代理总督鲍威尔给予正式委任。现今巴哈马政府的唯一特色——委员会制度，就是由上述那个不明显的雏型发展起来的。

议会议员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是巴哈马常驻伦敦的代办的委派。鉴于白厅各机关间的猜忌和倾轧，以及一般的效率低减，特别是贸易部人员的过劳和拖沓，象巴哈马群岛那样的一个小殖民地派人在伦敦去照顾它的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伍兹·罗杰斯在第二次任总督期间，曾雇用一个名叫约翰·伊登的人为他的私人代办。后来，理查德·菲茨威廉似乎为了同样目的，也雇用过享利·波普尔。然而，该殖民地最早的真正代办，据我们所知的是理查德·坎伯兰，他是于1760年在威廉·谢利总督任期内被委派的，年俸定为一百镑。跟他定期地保持通讯联系的，是由议长及议会与政务会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直到1833年，连续地委任了五个代办。到了1850年，委派代办被认为是巴哈马群岛负担不起的浪

费，因此，1785年所颁布的“代办条例”被废除了。

理查德·菲茨威廉虽然是在1733年1月受任，但他却于1734年6月才到拿骚就职。伍兹·罗杰斯在第一次受任之初，遇到了传染病流行，而他在第二次受任时，正值飓风刚刚过去，紧接着菲茨威廉就面临黑人暴动的爆发。8月30日，他向议会宣称：“我得悉你们的奴隶当中有个集团，定于下星期日早晨举行暴动，企图歼灭白种人居民，据这个岛屿为己有。我已下令将这些歹徒中的一些人逮捕审讯，根据他们的自供和行为，我已经完全查明了他们的血腥意图。”议会于是立即提出一项“黑人管理议案”，并起草一个热情的决议以感谢这位新任总督。菲茨威廉表示 133
“在你们稍稍解脱现在的困境之前”决不接受任何薪俸，这也博得了议员们的一致赞成。

和常有的情况相同，菲茨威廉的声望是短暂的。这个原因不难找到。他之所以失去人心，与其说是由于他的行动触犯了当地民众，不如说是

由于他那套惹祸的作风。在1730年的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土地纠纷中，理查德·菲茨威廉曾充当分界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伯德的《分界线秘史》一书里，他那样卑鄙的妄自尊大，竟被歪曲地写成"米恩韦尔先生"的品格。在巴哈马群岛，总督菲茨威廉虽然不要薪俸，但却设法使载运委托给他的货物的所有船只豁免关税。由议会看来，这和芬尼夫人囤积供应品的企图是相差无几的。较不合理的是，议会极力反对菲茨威廉向所有耙获的食盐抽税10%的要求，特别是在他任命计度员以防止瞒哄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菲茨威廉还要求对寻获的龙涎香索取其20%的权利，并强夺了一大块重三十二磅五盎斯的龙涎香充为己有。

总督菲茨威廉对人员的任用，也和他那傲慢的态度一样不得人心，这就使得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不和更加深化。带头反对的是税务官查洛纳·杰克逊与约翰·怀特，虽然可以察觉出来，躲在幕后操纵的却是那个长期的捣乱者约翰·科尔布鲁克。虽然对他政敌的言论应该加以审慎的判断，但据说，总督菲茨威廉曾当面将

这些巴哈马人称为“驮兽”，只能“用铁鞭来管制”，并曾雇用“一个名叫阿奇博尔德的人充当他的仆役，这个人经常把敢于不赞成总督措施的任何人打翻在地”。菲茨威廉又曾被控告在教堂门口用图钉钉上一张告示，通知进行调查户口，并用监禁和鞭笞来威胁那些不缴送统计表的人们。这个总督竟被那样逗人讥笑地描绘着：在审理与他有所牵连的诉讼案件时，他在法院外边悄悄地踱来踱去，时而皱眉绷脸，时而打发信差进去，致使法官与陪审员怕得发抖。至于有些诉讼案件的判决，如认为对王室不利，菲茨威廉便命令检察长向平衡法院上诉，由他亲自裁断，结果总是把原判决一笔勾销了。

对菲茨威廉还有进一步的指责，据他的政敌 134
说：“他强迫一个名叫史密斯的船长在离开普罗维登斯时宣誓：如果在海上的船只中遇有任何一个普罗维登斯的居民，或在任何一个珊瑚礁或岛屿上看到他们，就要把他们押回普罗维登斯交给他；否则，也可将他们放置于某些荒凉的地方，或遥远的、绝无人迹的岛屿。”但是，对于这个狂妄的控告，还找不到任何实据。

很显然，菲茨威廉的笨拙失智，只能使几乎无可挽回的局面更加恶化。他寄给国内的若干亲笔信，就带有沮丧绝望的口气。1734年9月，他谈到筹款的困难时说："这样一帮顽固、愚昧、难制、卑鄙的家伙，从来就没有以立法者的资格开过会。"1736年3月27日，他那支"因药品缺乏而濒于死亡，又因粮价昂贵而正在挨饿的"军队哗变了，有的跟海盗一起逃跑。后来，十二人被捕获并受处决。到这时，菲茨威廉已经到了认输的地步。由于既遭受政敌围攻，又几乎失去国内支援，他于是写道："阁下若不为这个不幸的地方排难解纷，那么，我被派至此地的目的，将不可能实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议会里事态发展到了严重关头。议长虽然声明议会与约翰·科尔布鲁克已经断绝联系，但是，杰克逊与怀特仍然向总督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连斯科特议长出售给总督一块十噉地皮，用以建造新官邸——政府大厦现址——这件事，也被看作是另一种十分微妙的阴谋。杰克逊和怀特都被逐出议会，他们直往伦敦去提起控诉。议会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到1737年初就停

了会，在1741年以前，它再没有召集过。

在1737年的时期，因受到西班牙的威胁，到向风海峡那一带的岛屿去集盐，成了一种带有很大风险的活动，以致连一点盐也未曾收集到。遭到的结果是，大陆殖民地也不肯输送原来由它们供应的食物，正如菲茨威廉在报告中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以螃蟹、鱼类和野果”来维持生活。

究竟是谁最希望菲茨威廉离开巴哈马群岛，是巴哈马人民，还是总督自己，这个问题是不易 135
解答的。不过，1738年初，他被召回国以便对杰克逊、怀特和科尔布鲁克向枢密院所提起的控诉进行答辩，那时候他必定感到心情舒畅，如释重负。他的答辩显然是十分圆满的，但他没有再回到巴哈马群岛去。1741年，他领到了由财政部发还的数达一千八百一十六镑十七先令四又四分之三便士的欠薪。

136

第十三章　廷克与托马斯·谢利[1]

1738—1767

理查德·菲茨威廉的执政又一次证明：在艰难的年代里，总督总是不易得人心的。他的继任者，约翰·廷克之所以有成就，且博得声誉，有两个跟他本人品质无关的原因：第一，他自1738年任职至1758年病逝，统治巴哈马群岛不下二十年，任期之长在巴哈马历史上是无先例的；第二，在那个时期里，英国打了至少十一年战争，而奇异得很，巴哈马群岛反而享有短暂但有点靠不住的繁荣。在兴旺的年头，非难之声多么寂然，施政多么顺利，这是常常引起史学家注意的问题。

约翰·廷克并不是一个奢求名利的人，充任

① 根据正文，此处当为威廉·谢利；又本书附录的总督表中托马斯·谢利与威廉·谢利的名字亦应互易位置。——译者

巴哈马总督是他一生经历的极致，其经历也包括南海公司驻巴拿马的代理人和皇家非洲公司驻边角堡①的总管的职位在内。由于遭受“西班牙的威胁”，英国于1739年向西班牙宣战，表面上是为着“船长詹金斯耳朵”事件②，而实际上却是为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保持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问题。约翰·廷克对此瞭若指掌。在战争期间，巴哈马群岛成为私掠船的基地，船长们可以折回那里，把捕获的敌船交给地方海事法庭去裁断。除此以外，拿骚成为大陆殖民地与法属岛屿之间旺盛的非法贸易的停泊站，货物运到法属岛屿后，再从那里转运往被包围的西
班牙殖民地。1743年法国参战之后，这种贸易便成 137
为直接叛逆的行径了，但当时它并未因此而中止；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又再度活跃起来。

---

① 边角堡(Cape Coast Castle)，现名海岸角(Cape Coast)，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之西80哩。——译者

② “船长詹金斯耳朵”事件：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海盗船船长詹金斯被西班牙捕获，割去耳朵。英国那些想保持自己在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的集团，迫使政府于1739年向西班牙开战。当时人们对这次战争起了一个讽刺的名称“詹金斯耳朵之战”。——译者

私掠船员挥金如土；法庭的诉讼费滚入国库；法律上被称为违禁的商品，在码头上堆积着；有些人在走私获利和没收充公之间走险，而发了横财。

1782年，彼得·亨利·布鲁斯私自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记述着廷克总督任内初期的轶事，虽然观点有些偏激，但仍不失为一部极其珍贵的资料。这本书以巧妙的文笔描写了1741至1745年间的拿骚生活；那里的生活是厌烦无聊和沮丧失望，只由于偶然的惊险和常有的微小争执，才稍稍激起了活气。

布鲁斯是一个祖籍苏格兰的普鲁士人，1692年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①，性情暴躁。少年时代，他在马尔巴罗公爵部下服军役，参加过拉米利和马尔普拉凯两次战役②。1711至1724年，他到俄国彼得大帝那里供职，充任技师，以后，他在苏格兰故居住了十六年，依靠薄产为生。1739年英西战争一爆发，经阿盖尔公爵推荐，被委任

① 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是德国一省名。——译者

② 拉米利(Ramillies)是比利时布拉班特省的一个村庄，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是法国北部一个小村。——译者

为技师，嗣后受军械局局长蒙塔古勋爵派遣，随总督廷克前往巴哈马群岛去修复那里的防御工事。他的工资很优厚，每日定为二十先令。

1740年11月11日，廷克与布鲁斯搭乘由七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舰队中的英国皇家军舰“罗斯号”，动身离开伦敦。在托尔贝海面上，他们捕获了一只西班牙小私掠船，在交战时，一颗步枪子弹射穿了廷克的衣裳，但他幸免于难。在可怖的严寒冬季里，他们由马德拉向卡罗来纳航行，于1741年2月初到达了查尔斯顿。布鲁斯乘单桅帆船“鞑靼人号”，继续向巴哈马群岛前进，在阿巴科海面险遭失事，于4月21日始达拿骚。没多久，总督廷克也跟踪赶到。

布鲁斯不久便在一幢年租二十镑的备有家具的大房舍里办公了。他有条不紊地对群岛的战略形势和物产加以详细的叙述，并登录了许多种类的木材、染料树、规那皮树、水果以及五十七种鱼类。他是最早提及海螺乃土产珍味的作者。他把巴哈马群岛的人口登录如下：

户主　310　138
妇孺　689

男黑奴	426
黑人妇孺	538
独立连	100
哈伯岛及伊斯拉特拉[1]	240
	2,303

其他外围小岛均无常住的居民。

布鲁斯发现，拿骚这样一个小地方仍旧残留着理查德·菲茨威廉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创伤。在那位从前当过"海盗的外科医生"的约翰·豪厄尔的管辖下，情况依然不见得好转。防御方面的情况更令人吃惊。炮台上只有十六门炮可用，其他许多门炮，有的已塞住火门，被埋于泥沙中，也有的用作压舱物了。在海港东边的入口处，"那个后大门，敌人常常从那里进来偷袭市区"，完全是没有设防的。

一位布洛克先生从哈瓦那给拿骚传来口信，说什么西班牙人正编成一个小舰队要来攻击巴哈马群岛，这个小舰队有两艘各配八十门炮的军舰和三只大木船。拿骚顿时因而喧噪起来，忙乱地

① 埃留特拉的别称。——译者

进行延误已久的备战工作。议会也许诺布鲁斯，给以任何所需的支援。首先，布鲁斯把所有被抛弃的炮收拢起来，钻通火门，以便实弹试放，然后把各门炮安置在特意从英国带来的炮架上面。转瞬间，拿骚便拥有可以自豪的从发射六磅至十八磅炮弹的各种炮三十四门。然后，布鲁斯开始建造蒙塔古炮台，这座炮台位于东海湾向里狭进而形成海港之处，距离海面停泊处尚不及大炮射程之远。1741年6月10日奠基，到1742年7月底，象现今那样的小炮台就建成了。

全巴哈马群岛连一个泥水匠也没有，布鲁斯只好从费城雇来二名砖匠，教给他们泥水工艺。他发现，当地的石灰岩质地优良，开采时，象干酪一样易于切割，硬化后却坚如燧石。向这类石头发射的炮弹，能嵌进它所命中之处，而不能把石墙劈裂或炸成齑粉。因为在群岛找不到任何运载的车 139
辆，石块只得由黑奴用头顶着从采石场运出去。

在竣工的时候，蒙塔古炮台架上了十七门炮，内有发射十八磅炮弹的炮八门。朝着陆地的一方，围绕着八呎高的乳香树木栅栏，木桩八吋见方，木桩之间的距离三吋宽。炮台整个范围以

内，有一座兵营，一间岗房，一个贮存七千加仑淡水的水槽以及一所足够容纳九十五桶火药的大军火库。同时，布鲁斯还建造了布莱登海岸防御炮台，内有一排火力很强的八门大炮警卫着拿骚的西口。

人们所预期的西班牙袭击没有成为事实，拿骚不久又恢复了麻痹的状态。布鲁斯把注意力转到当地政治方面，没多久便被卷入当时的党争之中。独立连的一位军官，威廉·斯图尔特，是总督的亲信。有一次，布鲁斯因为在酒馆里同他格斗，事后被禁闭在自己屋里达半个月之久。后来，布鲁斯同詹姆斯·欧文发生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吵，他随即绕着市镇走动，料想到可能遭受突然袭击甚至刺杀。对于上述可怕的事，他还提到了那壮健矍铄的老人查普林·霍奇斯的暴死"曾引起了各种猜测"。

总督廷克对双方都不偏袒，而自以为是的布鲁斯却把这种冷淡的态度看作是敌对的表示。他对总督的热情向来就不高，竟逐渐降低到了零点，并对那结集在行政周围的派别只有憎恨与轻蔑。廷克的两个主要助手看来就是威廉·斯图尔

特和詹姆斯·斯考特。布鲁斯记述道，斯考特于1744年被议会免去议长职务时，廷克马上委任他为“政务会的一个成员，还让他当审判长、司库、海军军官、仓库管理员等等，因而使他能够向居民实行报复了”。人们把廷克、斯图尔特和斯考特称之为“三头政治”，甚至连他们三人所共有的短艇也给起了这个名称。

西班牙战争缓和了当地的争吵。1742年，英国皇家军舰“罗斯号”押解一个名叫班德诺的人到拿骚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控于1736年割掉詹金斯耳朵的船长。他的结局到底如何，是否因该罪而受到审判，人们是不清楚的。同年9
月，两艘满载货物的西班牙船被两只私掠船从费 140
城押到拿骚，这两艘船是由船长西鲍尔德和多沃尔率领的“乔治号”和“约瑟夫与玛丽号”。捕获物的价值不下于十八万八千西班牙银比索，其中大半属于西班牙国王。总督廷克对西班牙国王的船货应课的赎金估定为九万银比索，但他的敌手却认为太低。除此之外，廷克尽可能延期偿付赎金，好让私掠船员把新近获取的钱财分散在市镇周围，这是他的一项显而易见的策略。

1743年2月，佩德罗·费隆打着白旗来到拿骚。他携带着三十只箱子，每箱各有三千西班牙银比索。过了不久，总督秘书约翰·斯诺，从哈瓦那来，也带来了四箱交付私人船货罚金的款项，另外有若干名重要的交换俘虏以及赠给总督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袋四千枚皮斯托耳，一把金柄宝剑，一支金头手杖，许多金带钩和金钮扣，以及其他一些贵重礼品”。

虽然私掠船条例规定全数捕获赏金须在费城分配，但廷克却拒绝在所有债务偿清以前付出任何款项。到这时，大多数水手把他们每人一份的四百五十元都已耗费在饮酒及赌博上，“他们吃过苦头后才知道，既然他们的钱花得一干二净，就不再象从前那样备受礼遇，而是被投入狱，并且还向他们索取过分的费用”。

布鲁斯断言，正是由于廷克苛待费城人，所以私掠船从那时起都避开拿骚，连驻戍军舰的舰长兰兰德也把他捕获的船押送到别处去裁断。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譬如，1746年，一只捕获的西班牙船被押到拿骚，接受了巨额的赎金，为数达十万银比索。布鲁斯所怀恨的是：他从捕获

物中不当地取得四十二担水银，结果他只剩下八担，其余的都让詹姆斯·欧文和另外一些拿骚人骗走。在战争时期，拿骚地方海事法庭所判决的私掠船诉讼事件，计有十几起。

在那个时候，建成炮台所需之款并无从英国拨到的迹象，布鲁斯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几乎不能共处。与此同时，大陆殖民地指望 141
着布鲁斯的工程技术而要求他去，这使他更加下定决心要离开拿骚。廷克不准许布鲁斯这样做，提醒他说，同法国的战争刚刚开始，拿骚炮台依然荒废着，没有很好地武装起来。据抱有成见的布鲁斯说，廷克曾“异常激昂且极其郑重地”声称：“他自己就是这个政府中之王，只要他下令杀掉无论哪一个人，他的官员就得不问情由地绝对服从他。”然而，他终于答应布鲁斯说，防御工事一竣工，他就可离开拿骚。

于是，布鲁斯又一心一意地着手工作了，议会再一次给他以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骚炮台改造得面目一新。到1744年12月，一座新的棱堡，若干隐蔽的炮台和一条出击口均已建成，另外有一座能容纳六百人的兵营以及在紧急时能提

供总督、牧师、军医、炮手与军械士使用的场所。在围墙即围栅内，有三个水井，一处兼作面包房的厨房，一个能存放六百桶火药的军火库兼炮手仓库。除原有的五十四门加农炮外，又架起二十六门黄铜臼炮。

布鲁斯在拿骚所承办的这项防御工事，全部费用达四千镑。这个总数可能不包括军械局于1741年所发送的军需品在内。它同托马斯·莫尔于1734年所估算的（用当时格外精密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四镑九先令十又四分之三便士相比，节省得多了。布鲁斯推定，如果派来一支三百人的警备队来补充一百人的独立连的话，那么，拿骚就会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里最坚不可摧的地方。虽然武装的人员未能象魔术般地涌现出来，但布鲁斯至少可以宣称，自己在巴哈马群岛这个不设防的土地上奠下了防御工事的初步基础。

1745年1月5日，布鲁斯乘着议长弗洛伦坦·考克斯的那只单桅帆船“佩勒姆号”，离开了拿骚。他随身携带“一些水银、染料木和棉花”，其中一半于查尔斯顿至英国的途中被法国人掠

去。他在7月抵达伦敦，正值流传着关于拥戴美王子查理①的起义的消息。布鲁斯的《回忆录》，写到讨伐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战役在英国北部的发生，就告结束了。

回过头来再谈谈拿骚，那个爱吵闹的条顿人布鲁斯一离开，总督廷克一定会感到轻松，如释重负。从此，他任内的其余年代是宁静无争的，而 142
且大部分是繁荣昌盛的。

1748年4月，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廷克能够这样地写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普罗维登斯岛在实力和财富方面增长得最为惊人；拿骚市镇的人口逐渐稠密，那里有许多高楼大厦，在西印度群岛可以称得起豪奢华丽；那里也有停泊所，为私掠船贸易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实际上诱来了几乎所有的冒险者，特别在冬季，他们还把捕获的船送到这里来裁断。"

随着金钱的大量流入，许多弊病发生，这是人们很容易不加注意的。在拿骚，由于私掠船员

① 美王子查理(Bonny Prince Charlie)，是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1720—1788）。——译者

赌博和狂饮，致使物价飞涨。函件递送仍然迟误，复信和供应品很少来到。有一封于1744年8月3日从伦敦发送的函件，直到1745年5月25日才到达。1747年4月，廷克埋怨他在两年时间只收到了一封函件。至于他自己方面，在发信时总是抄成一式三份，以保证国内安全递送。

亚琛和约① 签订之后，拿骚繁荣的假象被揭穿了。在八年来不稳定的和平岁月里，拿骚遭受着不可避免的萧条。廷克预见到了种种忧患，当1749年议会重新集会时，他在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告诫人们说："现在战争已告结束，我们必须依靠勤劳和节俭来克服重重难关。大自然为了充分奖励苦干的人们，已足够慷慨地给与这些岛屿以财富；但是，战争已给我们引进并留下两个可怕的敌人，我的意思是指奢侈和怠惰，我为此担忧。这个地区几乎耗尽了通货，付与商人的报酬太高，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过于昂贵，这些会使得局外人一见就猜想我们在小青山上有金矿。"

① 亚琛（Aachen）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一个城市，法文为Aix-la-Chapelle。亚琛和约是在1748年签订的。——译者

繁荣的逐渐消失，事务活动的日益减少，在那个时期的稀少资料里就已反映出来了。议会未征收租税；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为建成坐落在乔治街的新教堂而征收了一次税款，甚至那一次也是勉强的。没有任何重大的法案被议决，议会因无事可做，几乎渐渐解体。1753至1760年间，确实连一个“议决事项”或议事记录也没有，所以关于廷克的后期政务，我们只好多写些其他活动了。 143

总督廷克寄给贸易部的若干信札，都集中地叙述了拿骚防御工事的衰退情况和重新开战的种种迹象。1752年，他苦诉西班牙人非法没收船只。1754年，他叙述法国人图谋侵占特克斯群岛，这些岛屿离向风海峡很远，但却守卫着这条通往牙买加、位于古巴与伊斯帕尼奥拉之间的航线。廷克写道：“法国人究竟有什么权利来要求特克斯群岛，阁下一定知之甚详。我宁可期待土耳其皇帝把穆罕默德旗帜竖立在那里。”廷克也为伊纳瓜担心，1749年法国人曾在那里暂时登过陆；他同样地为埃克苏马忧虑，因为它的海港在某些方面比拿骚更可取。

1756年，英法两国战争又爆发，连续不断地

正式打了七个年头。最初，斗争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一带，但是，不久拿骚又成为一个私掠船的基地。1761年以前，西班牙表面上表示中立，私掠船的活动也是直接对准法国人的。但是，捉拿西班牙船只和西班牙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终于激起了同西班牙的战争。

到这时，约翰·廷克已经是一个被长期的总督职务弄得心力交瘁的老人，尽管他曾三次回到英国。1758年2月25日，他意气消沉地写了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竟成了他的墓志铭。他在那篇文章里写道："不得不牺牲我一生中那么多岁月于大西洋的一个荒礁上，在许多艰苦的逆境中奋斗，在一群大坏蛋里抗争……我的工作范围很狭窄，那里的大事极少且无足轻重，这些都简直不值得予以详述……现在，这里的人被私掠商船的歪风迷了心窍，在战争时期把那股务力工商事业的热忱都消失尽净。"五个月以后，廷克便死去了。

就较为悠久的英帝国历史而论，威廉·谢利是巴哈马总督中最负有声望的。1758年11月，

他受委接替廷克的职务。1694年，他生于英国，
他以一个年青律师的身分移居到马萨诸塞，在那
里很快就在政界取得了进身之阶。1731年，他充
任王室森林检查员这个低级官员，但是到1734年，
便当上王室首席辩护士，1741年擢升为总督。他任 144
马萨诸塞总督整整十五年，在此期间，颇著声誉。

1745年，总督谢利想方设法，占取了位于圣劳伦斯河河口的法国要塞路易斯堡，这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极为辉煌的勋绩。1748年，路易斯堡归还法国，却引起新英格兰人的强烈不满。1754年，谢利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纽约州沃耳巴尼进行商议，并拟定了一个关于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进攻法国人及印第安人的军事计划。由于这些殖民地的猜忌，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而那时受任为新英格兰总督兼北美统帅的谢利，也落得声名狼藉。1756年，他受到不公平的指摘，要求其对安大略湖畔沃斯威果要塞的失陷负责，据霍勒斯·沃波尔不正确的看法，这个要塞“比梅诺尔卡① 重要十倍”。于是，不幸的谢利受到

① 梅诺尔卡（Minorca）：位于地中海，是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英属岛屿，1755年为法国占领，后被归还。——译者

降级处分，未曾如愿地到牙买加去，而一直谪降到拿骚；那时，他已六十四岁了。

威廉·谢利对自己所受的冷遇并不感觉苦恼，这足以窥见其性格的一斑。新英格兰的损失，正是拿骚的收获。在困难的七年战争期间，谢利的执政不但著有成效，而且很得人心。他办事敏捷，堪称为同僚们的模范；他和议会的交往虽然是坚强的，但几乎是一贯融洽的。

直到1760年初，他才到职视事。据他在他的第一届议会开会时所作的解释，由于缺乏供应品及运输船只，他曾在英国耽搁了一些时候，后又“在其所乘坐的英国皇家军舰‘美人鱼号’中，被漂流到巴哈马的一个岩礁上”。他到职之后，立即投入有关不知疲倦的私掠船员的繁忙事务之中。在他那1760年10月的一篇演说中提到，“新普罗维登斯及其他地区的各种商人，私掠船的指挥员及其有关系的人”，都宣称“在这些岛屿所经营的贸易中，私掠船业是最有裨益的，并且也几乎是唯一能赚钱的生意”。

私掠船员是靠着捉拿法国船只以及那些载货往返于各个法属殖民地之间的西班牙船只而发了

财。自从1759年拉各斯角① 和基贝隆湾海战告捷以后，英国海军便控制了大西洋，所以法属西印度群岛不得不多半依靠西班牙人的救助。例如，1760年3月，有八只西班牙商船被押送到拿骚，被海事法庭宣判为战利品。为着这件事，哈瓦那总督写了一封关于威廉·谢利的具有爆炸性的信件。信里说："应该使这个私生子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无效的，因为在那些与他同类的英国人心目中，总以为充当不被负责当局所触动的海盗，是再安全不过的。" 145

许多来自北部殖民地港口特别是费城的船只，不断经过伊斯帕尼奥拉北部的西班牙港口蒙特克里斯提，同法属殖民地经营间接的贸易，这就使得当时情况错综复杂起来了。谢利估计过，约有八十至九十只商船长期经营这种非法贸易，一年所载运的货物达五百船次之多，那样一来，战争便拖长了。

许多巴哈马人到蒙特克里斯提从事非法贸易，毫无疑问地从中大获其利，他们这种活动必

① 拉各斯角（Cape Lagos）：位于西非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译者

然要经过群岛，私掠船帮伙挑不出除塞缪尔·甘比尔以外的人。此人是海事法庭法官，又是1758至1760年间曾任总督的约翰·甘比尔之弟。在他们的请愿书里，他们声称："该塞缪尔·甘比尔最近从费城派至此地，由有关的费城人付与手续费，发给薪金，并加以雇用，使其负责对这些法国人通信、联络、协助、供应、支持、救济、慰问和援助。他已经在庭内和庭外都公开而坦白地宣称，凡揭起休战旗的船只，都让其进行公平、正当和合法的贸易。"

炮舰"波利号"诉讼事件是纠纷的焦点。甘比尔的前任格尔肖姆·威廉斯已把这艘炮舰宣判为战利品，而甘比尔却取消这个判例，"直接违反了为这个案件所制定和规定的英国成文法，而且中止了有关法令的执行"。另外，甘比尔还被控曾发还过几宗被没收的食糖，并指令过被没收船只的水手工资从没收货物中开支。

假如谢利是个懦弱或贪婪的人，他就会陷入
146 进退维谷的窘境中。私掠船"兰杰号"由蒙特克里斯提开出后，曾因形迹可疑而被捕获。费城人已不断向伦敦控诉了象"兰杰号"事件之类的横

遭没收的情况，所以，谢利是经受不起再犯错误的了。但谢利是这样的一个人，只知尽责任而不图报酬，有个名叫乔治·巴里的人曾试向谢利行贿六十枚周阿尼斯①，吃了大苦头。1760年10月，甘比尔被解除法官职务，同时也被开除出政务会。

在谢利致贸易部的辩解书中，他说明了那位不幸的海事法官曾有“支持并鼓励有关的英国商船主跟法属圣多米尼加岛进行广泛的非法贸易的显著倾向”。甘比尔甚至在法庭确实这样地说过，英国国王无权禁止他的臣民经营贸易，又说国会既没有专为禁止蒙特克里斯提贸易制订出任何一条法令，那么这种贸易就应该认定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益的！更有甚者，在“涉及英王陛下的特权问题上”（这始终是使白厅获胜之点），甘比尔曾对谢利傲慢无礼；他还被控与一个叫唐·格雷戈里奥·何塞弗的人订立合同，以便供应这个西班牙人“大量的巴卡劳〔腌乾的鳕鱼和鲭鱼〕，让他转运往法属岛屿”。

① 周阿尼斯（Johannes）：葡萄牙旧金币。——译者

谢利对待议会也同样地坚持原则。这可以从1762年的约翰·格林事件中得到充分证明。格林被控告“发表了有损于平衡法院声誉的言论”，谢利当时是该法院院长。当格林因侮辱法官罪而被监禁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议会议员而恳求特权。谢利表示异议说，格林未按英国法律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割掉耳朵并上颈手枷示众，已算是够幸运的了。此外，谢利又说：“政府采取轻率态度，不把他提交法院依法严惩”，只会促使“侮辱行为更加严重”。格林急忙谦恭地道歉认错，表示改正，议会全体也因之受了一次明显的惩戒。

威廉·谢利比早先的总督们更加幸运了，因为拿骚正在逐渐地繁荣起来，且没有受敌人侵袭的重大危险。随着老威廉·皮特于1757年受任国
147 务大臣，英国进入了一个节节胜利的时期。1760年蒙特里尔的投降，以及1761至1762年间加勒比海法属岛屿一个一个的陷落，导致了法国在北美的势力的消失。1761年，西班牙人十分愚蠢地控诉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侵害他们的贸易并成倍地没收他们的船只，当时所向无敌的英国人就立即向

西班牙宣战了。1762年，一支巨大的舰队驶经巴哈马群岛，攻取了哈瓦那，掠得价值一百多万镑的战利品和四分之一的西班牙残余舰队。

由于1763年3月巴黎和约的签订，巴哈马群岛的局势更加稳定。虽然布特的软弱无能的外交抛掉了许多曾由皮特的强硬的战争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但巴黎和约标志了英国殖民地势力达到极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丧失了多米尼加岛、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多巴哥，法国在加勒比海的势力随即衰微下来，但仍保留着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圣卢西亚。英国把哈瓦那和马尼拉归还给西班牙，而西班牙回报英国以佛罗里达半岛，在1783年以前它一直属于英国。于是，二十年来，英国控制着佛罗里达海峡的两侧，圣奥古斯丁的要塞再也不能威胁佐治亚或巴哈马群岛了。

然而，巴黎和约并未完全终止法国的威胁。关于特克斯群岛的领有权问题，在1764年就发展成为一个小危机。这些贫困但有战略意义的产盐岛屿，长期以来便是百慕大和巴哈马群岛之间争夺的对象，但是到了那时，法国人似乎要把这些岛

屿攫为己有，借以解决这个争端。法国司令孔泰·德斯坦违反巴黎和约的条款，未曾从西印度群岛撤退。他只退出加勒比海，占领了大特克岛，将鸢尾花形纹章① 竖立在那里。总督谢利向英国提供了某些很有用的情报后，枢密院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1764年11月，枢密院能够通知谢利，德斯坦已被说服而撤退了，还暗示特克斯群岛应该让巴哈马群岛更坚实地掌握起来。不幸得很，委派
148 到那里去的总管，威廉·西默，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心企望自治，直到1772年为止，与拿骚争夺掌管权。

和平再一次给拿骚带来萧条。战争结束时，谢利建议裁撤当时驻守在拿骚的军队的过多兵力。在他失去他那独立连指挥官的薪俸以后，到1767年，他自己已经感到经济拮据，曾向谢尔本勋爵申请补加年俸三百镑，结果获得批准。

私掠商船活动及蒙特克里斯提贸易一告终结，整个殖民地便开始遭受苦难。1766年，约翰·毕晓普因劫掠西班牙船“孤独贵妇号”，被判

① 鸢尾花形纹章：系法国皇家纹章，代表国家主权。——译者

定为海盗行为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和吸引合法贸易，谢利于1767年提出有力的论据，建议把拿骚变成一个自由港。这种意见当然是贸易部重商主义者所厌恶的，因此，谢利的去信被忽视了。

在这不顺利的时候，英国政府企图征收印花税，以便弥补新近的战争所造成的亏空。这项措施在巴哈马群岛及其他各殖民地都未能推行成功，这是有其原因的，可是，关于当时积极对抗的详情，已找不到资料了。

到这时，威廉·谢利觉得自己的活跃生涯已经完结。他引述“近二十个月来受着难治的败血症的折磨”作为理由，于1768年年中辞去了总督职务，离开拿骚到马萨诸塞去。仅仅三年以后，在七十七岁时，他死于波士顿附近的罗克斯伯里。谢利最大的不朽勋业，或许就是他着手对拿骚进行再查勘并填筑其沼泽地，若不这样做，这个城镇是不能向东部扩展的。现代拿骚城市主要街道之一冠上他的名字，这是十分恰当的。

149 第十四章　美国独立

1767—1783

1768年，托马斯·谢利继其兄为总督。他的总督任期内的状况，使我们再一次回想起，不管巴哈马群岛的历史怎样令人感兴趣，但在十八世纪这个雄伟的全景中，它却是微不足道的。和在大部分的国际和平时期内所出现的情形相同，在谢利的任期内，当地也出现过龃龉与不满的状态。但是，总督谢利的争论和问题，与在附近的北美大陆正达到高潮的制宪斗争相比，便显得黯然失色了。

因为这些年代正处于北美大陆开始起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以1765年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群众运动为开端，迄至于十年后的列克星敦战役①。

① 列克星敦（Lexington），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一城。1775年4月19日，马萨诸塞总督兼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派军前往搜寻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的秘密军需库。英军在列克星敦遭到当地民团突击队的阻截。英国士兵四散奔逃。这次战斗是殖民地对宗主国进行公开战争的信号。——译者

在十三个殖民地正征收汤森德关税① 的时候，托马斯·谢利来到了拿骚；1774年，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北美大陆会议的时候，他离开拿骚；当波士顿惨案② 发生的时候，其兄威廉·谢利去世。对这些不朽的事件，遥远的拿骚却几乎听不到什么反响；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巴哈马群岛才开始站到英国一方，那时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原则问题，而是获利问题。然而，尽管巴哈马群岛采取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态度，独立战争终究使巴哈马群岛的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67年至1783年这一时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早在1767年初，当威廉·谢利通知议会议员印花税法案被废止时，他们草拟了一篇议会呈致英王的答辞，其中逢迎讨好地提及，“最热情地感谢他在废止法案上对他的美洲殖民地所充分表现出的父亲般的仁慈”。无论他们怎样忠心耿耿，也究竟不无私利之心，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为

① 1767年，英国国会通过“汤森德税法”，对颜料、玻璃、纸、茶等征收关税，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译者

② 波士顿惨案：1770年3月，在波士顿发生居民和英军的流血冲突事件，居民死伤十余人。——译者

150 了增进巴哈马群岛的贸易，申请放松他们同法国人与西班牙人自由经商的诸种限制。他们已经注意到，特克斯群岛是作为北部殖民地与外国殖民地蒙特克里斯提及圣尼古拉斯角之间走私贸易的基地而繁荣起来的。这一先例，贸易部从与谢利兄弟和威廉·西默来往的信札中了解得十分清楚。托马斯·谢利支持那些主张拿骚成为自由港的议论，为此于1768年12月写了一封冗长的信。但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刻，议会却要求谢利负责，并开始以极其微小的藉口与他为难。约翰·科尔布鲁克的衣钵似乎传给了约翰·格林。格林是东部地区议员之一，从1764年到1776年，几乎连续不断地跟总督闹纠纷。公库是巴哈马人不满情绪的精确标志，到了1768年12月，在公库里存着堂皇的总额一百四十四镑七先令七个半便士。

在特克斯群岛的问题上，争执达到了反抗的程度。1769年4月，谢利命令特克斯群岛总管西默遵行巴哈马群岛的一切法律。西默很不心甘情愿，告诉贸易部委员们说："这里的居民因为怕他们必须……服从普罗维登斯立法当局而恐慌起来，一旦那种情况发生，他们全体一致决定要离

开这个群岛。”

英国政府抱着不同情的态度，它极力反对任何想从重商主义罗网里逃脱的贸易。1770年，希尔斯巴勒勋爵指令谢利为特克斯立法，并向它们征税，虽然这个群岛在拿骚的议会里连一名代表也没有。他宣称：“正如英帝国全体人民由大不列颠下议院所代表一样，巴哈马群岛全体居民则由该地区的议会所代表。”

这种态度遭到巴哈马人的反抗，未必因为它意味着特克斯群岛在巴哈马议会里没有代表而为其制定法律和征收赋税。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人经营特克斯群岛贸易，并且抱着他们这种生财之道不放。1770年1月25日，谢利要求议会议决关于控制特克斯群岛贸易、耙盐和财产保护的各项法令。议会拒绝所求，否认特克斯群岛“以前在任何时候都被确认是属于巴哈马群岛的”。甚至当被告知这是枢密院和国务大臣的命令时，议会 151
仍然拖延下去。10月间，事件爆发了。为了答复总督于10月3日所发给的一个严厉的通牒，议会于10月9日不但拒绝立法，而且还递送了七项措辞强硬的议决案。在这些议决案里，他们否认有

为特克斯群岛立法的权利，建议这个群岛申请议会席位，并对谢利的“威胁与无礼”表示愤慨。谢利给以反击，翌日便解散了议会。他通知议会：“看了你们的议事记录后，我觉得你们正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处理这届议会的事务，并公开地蔑视国王所赐与我的敕令，因而我不能再忍受这样一些行动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771年以后，虽然新的一届议会通过耙盐法，并且有部分租税能够被征收，但特克斯群岛依旧是个棘手的地方。那里是新英格兰不法之徒、百慕大耙盐者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走私商等出没的渊薮。谢利谴责西默与非法贸易，特别是酒类贸易有牵连，他暗讽地说道：“夜色黑暗，沙洲平坦，你们用不着那常戴的睡帽了。”独立战争的爆发，使得纠纷暂告平息，这也仅仅是因为拿骚不打算行使管辖权所致。特克斯群岛一直是走私商的安全地带。1799年以后，巴哈马议会才有特克斯群岛和凯科斯群岛的议员，但是，他们完全代表着地区的利益，并且也不经常出席。到了1848年，将特克斯群岛归并于巴哈马群岛的企图，终于被抛弃了。

纵使还没有人敢提及袭击可能来自何方，巴哈马防务仍然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谢利发现守备部队仅仅有一名炮手和八名士兵守卫着拿骚炮台，四名士兵驻防于蒙塔古炮台。大炮只有十三门可用，那些已生锈的大炮和三百桶炮药都被风雨所损毁；人数少得可怜的九团残部——有二名军官，二名中士，二名下士，一名鼓手以及十六名兵士——已经调驻圣奥古斯丁了，两地因之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以后还将提及。

谢利照例申请支援，要求派遣一百五十名士 152
兵及提供防御工事所需的帮助。就是这一回，事情办妥了。1769年8月，国务大臣写信告知说，他已命令北美总司令盖奇将军派一名技师携带价值一千镑的军需品前来拿骚。1770年，陆军上尉蒙特雷塞到达后，便着手修理防御设备，但其精力远不及布鲁斯。这是一项令人伤心的任务。既无适用的工具，劳动力又缺乏且昂贵。群岛非常贫困，甚至连每月二十镑的防御工事维修费也筹措不起来。

由于贫困，人们对什么事情也就漠不关心了。1771年，谢利提出一项关于改革民团和建立

值夜制度的议案，力图使之付诸实施，但遭到议会的拒绝。于是，议会又一次被解散了，总督谢利说："我不得不告知你们，你们对待国王陛下的政务会如此粗鄙、褊狭和不当，且表现出那么一种流行于你们议会里的狂妄精神，这使我不能期待这届议会采取任何折衷的办法或抱着任何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处理任何事务。"

到1773年，巴哈马群岛的窘境达到了极点。谢利写道，岁入"几乎绝灭，公库竭尽，政府临时经费无着，官吏薪俸未付，法院因之已长期关闭"。因为地权所有人的无理支配不能使固定耕作付诸实施，所以捕海龟、打捞失事船和伐木便成为岛民赖以谋生的仅有活动范围。谢利恳求英国政府予以救助，并援引了佐治亚废除王室授地状后繁荣起来这一事例。在最低的限度上，王室要担负某些主要官吏的薪俸。回答始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以十四团上尉布莱克特连的形式出现的援军在1773年7月到达了拿骚，但是，当1774年初，托马斯·谢利得悉他已被任命为多米尼加总督以此"作为功绩的奖赏"时，他一定是感到欣慰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提升，使他离开

了令人苦恼的拿骚，也使他摆脱了正在北方酝酿着的诸种事件。

谢利的继任者，蒙特福特·布朗，仿佛是一只脆弱的船只，任凭此起彼伏的事态摆布着。在 153
1774年5月5日所颁布的指令中，包括一项关于实施贸易法的命令，但这是难以执行的，因为当时那里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他致国内的第一封信叙述了岛民的凄惨的绝望情景，在那些人看来，失事船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连非法贸易也成了一种减轻困苦的救济。但是，事态就要发生变化了。这封信发出的日期是1775年5月6日，距此恰恰两个星期以前，马萨诸塞的民团曾向往返于康克德途中的盖奇将军的部队开了火，并且英军已经被围困在波士顿。

早在1775年8月，盖奇写信警告布朗说，美国军舰正在作出准备，要来袭击新普罗维登斯，抢掠那里的军需品。因此，他建议派去两只商船和一艘战斗舰把大炮与炸药运到一个安全地方。总督布朗表示异议，提醒盖奇说，巴哈马群岛的防务乃是他的份内职责，只有他，而不是盖奇，才是那里的统帅。在一个脚注里，布朗又说："这

些群岛的居民们，曾不失时机地提供一切证据，以表示他们对陛下个人与政府的那种不容亵渎的眷念和忠诚。”——这段大话，后来证明了它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1776年2月25日，船长安德鲁·肖到达拿骚，带来了一项消息说，一支有八艘小军舰的舰队正在特拉华海面集结，要来袭击新普罗维登斯。这是美国首批舰队在舰队司令官伊齐基尔·霍普金斯指挥下最初的军事行动。

霍普金斯于1月5日接到大陆会议海军委员会的命令，要他集结他的舰队去扫荡切萨皮克湾。那时，他已居然招募来“艾尔弗雷德号”（二十四门炮），“哥伦布号”（二十门炮），“安德烈亚·多里亚号”（十四门炮），“卡伯特号”（十四门炮），“普罗维登斯号”（十二门炮），“大黄蜂号”（十门炮），“黄蜂号”（八门炮）以及一艘快艇“飞行号”。他那一帮各种各样的军官们，只具有捉拿商船的海战经验，约翰·保罗·琼斯便是其中之一。琼斯被号称为“美洲龙”，后来谈及他的一生经历时，他声言自己是这次远征队的智囊——这个狂妄大言倒是和他那矜夸自大的性格相

一致的。事实上，琼斯当时不过是“艾尔弗雷德号”上的一个海军上尉，且对巴哈马群岛一无所知，而不能跟霍普金斯与舰队副司令官索顿斯托尔相比拟。

费城的河面一解冻，霍普金斯舰队立即沿着 154
特拉华湾悄悄南下。在认定切萨皮克湾里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舰队是一支难以制胜的强敌之后，显然是霍普金斯亲自作出关于袭击巴哈马群岛的决定。1776年3月1日，美国舰队到达阿巴科的墙洞，在那里两名当地水手被强募当领港员。以后就在同一天，有个名叫多尔塞特的船长驶进拿骚，带来了这个不好的消息。布朗在某种借口下，要求多尔塞特严守秘密，这或许是因为他希望如果不加理睬，这场灾难就会消逝。然而，3月3日拂晓，七艘美国军舰终于出现在拿骚沙洲外的海面。

关于美国人那次“入侵”的当时最好的一篇报道，在说明事态发展时，对布朗是不怀善意的。据布朗自己的叙述，他谴责许多拿骚人款待了起义者。不过，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无论是美国人，或是巴哈马人，都不急欲真正交锋。在

那一段长时间里，事情的全部过程具有喜剧的色彩。

总督布朗被唤醒后，披着睡衣走到政府大厦门口。政务会的成员们匆匆忙忙地被召到拿骚炮台去。民团把鼓冬冬地敲响，三门大炮并发，向全岛告警。显然只有这三门炮一股劲地射个不停，但也足以使美国军舰不敢近前，它们转帆开始向该岛的东端驶去。

上午7点钟，约翰·甘比尔，“因患痛风，跛得很厉害，不能走路”，骑着马赶到炮台，看见总督浑身发着抖。这样，他还会做些什么呢？甘比尔问他已经作了什么布置。什么也没有——他是否要派钱伯斯船长驾着快艇去转运火药呢？甘比尔认为火药对防御是有用处的。总督同意了。钱伯斯被打发出去侦察敌情，但不久他又折回，说顶风前进做不到。一支民团分遣队奉派前往蒙塔古炮台去了。

在防御方面，情势显得不那么样乐观。民团进行点名时，有些人不到场，即使到了场，大半也没带武器。拿骚炮台里，两门曾用来示警的大炮已被弄得脱离炮架；其余的大炮从轮轴以下都

埋在流沙里，得用十二个人方能旋转炮口。炮台的一面扶墙正在坍塌，诸如通条、海绵扫杆、角 155
制火药筒、起爆线以及填弹塞原料之类的装备物资更是少得可怜。

在这危急关头，布朗反而离开了炮台，“说他无论如何也得回家换换衣服，使自己体面一些”。恰在他离开的时刻，送来一个报告说，敌舰已有三、四百人在蒙塔古炮台以东二哩处登陆，这座炮台所处的境遇比拿骚炮台还要坏得多，既没有一桶火药可用，又没有一门炮适当地安在炮架上。

布朗大概那时已穿上了整套军服，一回来就赶赴蒙塔古炮台，先派陆军中尉伯克而后派陆军上尉沃尔克从蒙塔古炮台出击，和起义者交战。伯克部下的士兵发觉敌军登陆的消息不是谣传时，便纷纷向后撤退，为的是要保卫他们自己在拿骚的财产。他们和正在前进的沃尔克部士兵纠缠在一起，片刻之间，民团不发一弹便土崩瓦解了。一见到敌军，布朗便留下两名兵士去塞大炮火门，然后也回拿骚去了。

到了下午，约有一百五十人在拿骚炮台周围

喧噪奔忙，试作准备以抵抗敌军的围攻。他们很少看见总督，因为他正花费大半时间在政府大厦里收拾自己的家财。总督不再出来点名，也不制定防御计划，甚至连关闭城门的命令都不下达。这样，就很可能让“间谍和心怀敌意的人混进来，看见炮台的情况和形势，从而将其报告给敌军”。当他外出三小时后回到炮台时，他向人们诉苦说：“他曾发作了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使他稽留很长时间。”

下午4点，陆军中尉伯克又到前方去侦察，显然和起义者交谈过。他报告说，他们有二百五十至三百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就要来袭击拿骚。下午8点，政务会、民团军官以及居民头面人物决定：阵地是守不住了，炮台必须解除武装。夜半，把火药装载在钱伯斯的炮艇上，凌晨两点钱伯斯便驶往圣奥古斯丁去了。

早晨，美国人散发传单，许以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居民不要求进一步的保证，便不再进行装模作样的防御。蒙特福特·布朗在政府大厦里就
156 俘，两座炮台也被正式占领。那幅陌生的、有横条纹的美洲大联邦旗帜，连同附在其角边的英国

国旗，在拿骚上空雄姿英发地迎风飘扬。

起义者在拿骚停留了两个星期（不是人们所常说的只呆了一天）。据布朗说，霍普金斯及他的军官"由许多居民头面人物负责照应，并在某些政府官员的住所里受到殷勤的款待"。士兵们狂饮作乐，暴饮着掠夺或送来的酒，以致在返航途中有二百多人病得很厉害。美国人在那里的头等大事，就是拆除炮台设备。3月17日，当他们扬帆驶离拿骚时，霍普金斯运走发射九磅至三十六磅炮弹的大炮不下八十八门，臼炮十五门，榴弹约五千五百枚，炮弹一万一千发以上。他既掠获了那么多战利品，即使觅得火药只有二十四桶，也不感到失望。北美海关总检查长托马斯·阿尔文碰巧也在拿骚，蒙特福特·布朗和他一起被霍普金斯带走，充作人质。这真使约翰·格林感到愉快，他是在监狱里正服一次定期劳役时被霍普金斯释放出来的。

美国人在返航途中，于布洛克岛海面同一艘英国军舰"格拉斯哥号"相遇，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在拿骚不流血而取得的胜利果实，由于这次惨败，变得酸败乏味了。大陆会议里存在着

意见分歧，一方大肆称颂，一方引为羞耻，结果使霍普金斯在同一个决议中，既受赞扬又遭指责。

不久，蒙特福特·布朗跟起义者斯特林勋爵互换获释，但在1778年以前，他并未返回拿骚。他募集军队，并参加困守罗德艾兰的战斗，而后率领四个队的“伤病员”回到了巴哈马群岛。他发现拿骚的局势几乎不可收拾。1778年1月，海军上校拉思伯恩统率另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往压境，在他们扬言要把拿骚付之一炬后，代理总督约翰·甘比尔由于受到恫吓，曾经允许他们进入。两天以后，他们把留下的大炮塞住火门而撤离。从那时起，便有许多拿骚人离开该岛去参加起义活动了。

布朗看出革命形势的不利方面已给居民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议会议长约翰·古尔德率领民团
157 的八十人叛变投敌，并发觉剩下来的人“放肆、贫穷、傲慢而且横霸”。布朗对美国独立宣言有过强烈的反响，他哀叹道：“在他们当中，生命、自由或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约翰·甘比尔，同他兄弟在七年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一样，曾犯有非

法颁发捕拿特许证的罪行，而且那时又组织了一个“同盟”来对抗总督。1月间，他“以获取食物为口实”，请求布朗“批准一项营业执照继续生效，而这项营业执照是他自己因认为适宜而颁发给本地商人，以便同起义者进行自由公开的交易”。布朗未曾答应所求。可是，就在一个月以后，仍然有“五起属于起义者所有的满载的船货”被运到岸上来。

1779年3月30日，布朗解散了他的政务会。这是个没有前例的措置。嗣后不久，他免去了税务官亨特及检察长斯特林的职务。其时，英国同法国、西班牙已发生战争，从弗朗索瓦角而来的袭击正迫在眉睫，布朗抱怨自己“不仅被军界权势而且也被文职官员所完全背弃”。政务会成员也从他们的方面向贸易部控诉说，他们“当前正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之中”。

“一只著名的快速双桅纵帆式帆船‘小塞扎号’”的被没收，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布朗断言，它“由当地英国叛民雇用来供应起义者必需品”，伦敦当局却听从了人们对这位窘困的总督的控诉。一个总督不得议会的支持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事，而他若不与他的政务会协调，就肯定是有错误的。1779年，贸易部建议枢密院，“鉴于巴哈马派别之间的互相仇视”，应该把布朗召回，并认为人们的“控告看来是有根据的”，布朗所颁布的公告是“用意虽好，但判断失当”。这位总督终于在1780年4月被解除了职务，这似乎是不太公平。但是，当他的继任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在同年年末到达拿骚时，他还留在那里。

美国独立战争后三年间的资料贫乏得恼人。不过，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作为一个私掠船的基地，巴哈马群岛享有自己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1780年6月30日，总督马克斯韦尔曾向伦敦
158 呈送一份表报，开列了“捕获后被控告到新普罗维登斯地方海事法庭”的三十七艘美国船只。1782年4月，一份直到那时为止的记述里，有着一百二十七艘起义者船只的惊人总计。押解到拿骚的美国俘虏人数骤增，使得马克斯韦尔无从“维持或供养他们”，从而不得不把他们遣送到最近的美国港口，并予以释放。

显然，拿骚这个基地，严重地损害了起义的美国诸州同其加勒比海的盟国之间的贸易。整个

战争期间，强大的西班牙基地哈瓦那大发雷霆，进行恫吓威胁。就拿骚的无防御状态而论，它能苟延残喘得如此长久，确是令人惊奇的。美国舰队无能到可怜的地步，倒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1781年，法国海军上将德·格雷塞夺取了大西洋的海上霸权，这就导致了康沃利斯在约克镇的投降和大陆战争的实际结束，自此以后，拿骚的寿命便指日可数了。

自从总督马克斯韦尔到职以来，巴哈马群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1780年4月，他第一次出席议会会议时，便告诫议员说哈瓦那的侵犯逼在眼前。他建议召集地方民团，并遣使赴纽约向亨利·克林顿爵士和海军上将阿巴思诺特求援。可是，援助姗姗来迟；西班牙人幸亏也是如此。1781年9月，在进一步告警的情况下，议会才不得已最后通过那盼望已久的民团与值夜条例。1782年4月，马克斯韦尔向克林顿报告说，有两艘运输船运到军需品，以及士兵一百七十名、军医十名、鼓手二名，这样将守备部队增加到三百四十六人。不幸得很，新来者中有二十五人是负伤老兵，马克斯韦尔报告说“把他们留在这里，也就

是等死待埋”。

然而在拿骚，没有一支部队注定要长久留驻。1782年5月6日，总督发出了的一封急件，说他“正遭到两艘（大型）美国快速舰、若干单甲板平底船和四十艘满载哈瓦那军队的运输船的袭击”。这是古巴总督唐·胡安·德·卡希加尔亲自指挥的一支数千人部队。马克斯韦尔乐观地说，三艘英国快速舰可能抵挡得住来犯者。他这样说就等于求助于一次地震。

159 5月7日，美国舰队司令官，海军准将吉隆交给总督马克斯韦尔一份“表示崇高敬意的”通牒，申说投降的明智。马克斯韦尔看到大势已去，只得急忙地认降，并于同日下午在投降条约上签了字。在这些残酷的日子里，人们获悉西班牙人所承诺的各种条款如此宽大仁慈，莫不感到欣慰。那些条款是与五个月以后华盛顿指令康沃利斯勋爵所签订的大致相同。依据给予投降者的恩典，守备部队行军时，准其荷枪、击鼓并举旗。军官可佩带随身武器。所有士兵则可由西班牙人出资搭船到最近的英国港口去。凡军官和居民愿意离开本地者，准其携带家属及黑奴，并给

与十八个月的期限去了结自己的事务。凡愿意居留者，保证其货物与财产受到保护，并保证其享有礼拜自由。最后，只是在率领军队去最靠近的英国港口登陆所需求的时间之内，马克斯韦尔总督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俘虏。

西班牙人的占领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个期间，唐·安东尼奥·克拉拉科充任总督。很不凑巧，当时资料十分缺少，但从总督马克斯韦尔1784年回国后所提到的“暴政之下，凌辱交加，灾难频仍”一段话来看，西班牙人未曾严守投降条款的精神，似属可能的事情。总之，臣服于一个外来权力，不管它怎样宽大仁慈，人们的心情绝不会愉快。那些能够离开的巴哈马人似乎都已离开了，而那些受环境所迫而不得不留下来的人，也似乎很羡慕他们能够离开。1782年，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海战中取得辉煌胜利以后，英国重新控制了加勒比海，因此，驻在拿骚的西班牙人实际上成了瓮中之鳖。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了，只有在1783年收复普罗维登斯以及签订和约之后，这才避免了饥饿而死的威胁。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引人

注目的事件。1783年初，一支法国军队侵占特克斯群岛后，成功地抵挡住英国皇家军舰“阿尔比马尔号”年青舰长霍雷肖·纳尔逊所发动的两梯攻击。那时，纳尔逊正在海军上将胡德麾下西印
160 度舰队服役。因为他以后在艾布基尔湾①、哥本哈根和特腊法耳加②等海战中立下了丰功伟绩，人们便把他那一次微小的挫折置诸脑后了。

1783年1月20日，英、法和西班牙三方在凡尔赛签署了和约的预定条款，其中第五条申明“西班牙国王陛下应归还普罗维登斯群岛及巴哈马群岛于英国，并按照西班牙国王的武装力量入侵时的同样情况进行归还，不得有所例外”。巴哈马群岛及加勒比海的六个小岛的归还，只能作为英国失去十三个美洲殖民地的很小补偿。一般说来，英国国会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议和条款。但是，在拿骚，当有关议和条款的风闻传入的时候，那里的人们一定是欢欣鼓舞的。

---

① 艾布基尔湾（Aboukir Bay）：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东北。——译者

② 特腊法耳加（Trafalgar）：西班牙西南部的海岬，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西端。——译者

议和对东佛罗里达的保王党人来说，也有着利害关系。在北美诸州再也得不到安全的保王党人，听说佛罗里达将要归还西班牙，便在绝望中把视线转移到那几乎是无人占领的巴哈马群岛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个名叫安德鲁·德沃的，原是南卡罗来纳民团的中校，那时正亡命在圣奥古斯丁。巴哈马群岛定在最后条约签署时才予以归还，因而人们不能知道那要等多长时间。事实上，正式和约是于1783年9月3日签订的，可是到了那时，德沃及几个其他冒险家已经先下手为强了。4月间，“一小撮服装褴褛的民团”乘两只武装双桅船启程，驶往巴哈马群岛。他们在哈伯岛召募少数移民与黑奴后，夜间偷偷地向拿骚驶去，在蒙塔古炮台的东边登了陆。

新普罗维登斯的守备部队虽然为数已达七百人以上，但是即将来临的和平状态，使他们失掉了警惕性。蒙塔古炮台上的唯一卫兵很容易地被缴了械；不费一弹又把正在那里酣睡的守备队员俘虏。黎明前，德沃已经把俯瞰拿骚的山脊的最高点占据了。

有一种几乎是同时代的见闻记载，对连续发

生的事件作了有趣的叙述。“那些西班牙人必须与之交战的登陆敌人，使用了一切诡计在队伍的人数和种类上来迷惑西班牙人。乍看起来，一只一只的小船满载着士兵，不断地离开双桅帆船，盪桨划行到岸边，好象是真的上了岸。其实，他们又在小船里卧倒隐匿起来，折返双桅帆船，随
161 即假装是新补充的军队正在继续登陆。据说，好多稻草人被绑紮起来，插在高处，以虚张声势；还有些人为了吓唬那些西班牙人，把自己打扮成跟他们不共戴天的宿敌印第安人。港内的一两只单甲板平底船已被捕获了；德沃中校估计形势对自己有利，向总督夸示自己的庞大兵力，并劝告他投降。总督起初有点犹豫不决，正在考虑的时候，一发炮弹很准确地从一门野炮直朝着总督府射去，德沃中校借此来重申他的投降劝告。据说，西班牙士兵放下武器后，觉察出他们的征服者不仅人数比他们少得多，而且服装和军容也是滑稽可笑的，因而抑压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惶惑。”

他们提给克拉拉科的投降条款，与西班牙人于1782年指令总督马克斯韦尔所订立的相似。政府大厦和一切军需品必须移交，但守备部队可按

寻常的恩典准予撤退。“每天一门炮及两发炮弹，以供升降天主教陛下的旗帜之用”，亦在特许之内。敌军士兵可保留其行李及财物，并被运往哈瓦那，总督则由英国方面出资送到欧洲去。港内的一切西班牙海军船只必须缴出，但船上的私人财产可以归还。西班牙商人获准利用二个月的期限，以了结其在拿骚的业务。

很自然，从这番显赫的开拓事业中，谁都没有比安德鲁·德沃本人得到更多的好处。就地产来说，他在新普罗维登斯东部开辟了一块二百五十噷，又在卡特岛开辟了一块一千噷。议会重新组成后，他便成了一名杰出的议员。在1784年和1785年，当其他保王党人开始涌入群岛的时候，他已经是最早安居在巴哈马群岛的保王党人了，正是从一个被确认的土地占有者的身分之中，德沃得到了莫大的利益。

162

第十五章　保王党人

1783—1788

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保王党人的流入常常被描绘成是巴哈马的一场革命。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一个质量上的变革，还不如说是数量上的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1783年以后的阶段只不过是加速和加强了已经潜在的进程，除了人口的大量增长使这方面的发展成为可能之外，很少有实际上是新颖的东西被介绍到巴哈马去；但是，上述的变化倒是相当真实的。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巴哈马的人口就增长了两倍，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数由原来的二分之一增长到四分之三。许多保王党人在美国南部殖民地拥有种植场，他们的到来意味着种植场制度在巴哈马将有一个巨大的扩展。新普罗维登斯地方太小，而且土地贫瘠，人们因而第一次在几个外围小岛定居下来，这样就扩大了长期以来集

中在拿骚和埃留特拉的政府管辖范围，并引起了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

保王党人决定居留在英国殖民政权之下，并且选择了朴素单纯的巴哈马群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忍受超出他们习惯限度的王室控制，或情愿接受比他们在大陆时所过的还要低得多的生活水平。

正象A·B·马尔科姆所指出的那样，现在议长所用的权杖①于1799年的获得，也许就是独立和负责新精神的象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地
表现在开辟新居留地、创立新教区、建设新教 163
堂、开办学校以及兴建漂亮的私人住宅等方面，还表现在第一份报纸《巴哈马报》于1784年8月间的出版。保王党人的来临并没有使巴哈马的生活得到变革，但是，它却给死气沉沉的殖民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旺盛的精力。旧帝国的衰亡是巴哈马历史上现代时期的开端。

大批在美国统治下生活感到不适意或不利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北移居，移居到新斯科舍和上

① 权杖：指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议会议长或其他官员所持有的一种手杖，象征着尊严、权力与地位。——译者

加拿大。在那里，作为英帝国的保王党人，他们对加拿大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切斯特勋爵盖伊·卡尔顿——连任的加拿大总督和北美英军总司令，担心这种大规模移民流入的后果，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将巴哈马未归属于国王的土地赐给来自南部殖民地而不愿迁往寒冷地带的保王党人。

于是，工兵中尉约翰·威尔逊于1783年被派来进行考察。他在报告中陈述道：巴哈马群岛人口稀少、生产很不发达，虽然岛上岩石很多，但土质肥沃，尤其适于种植棉花。威尔逊言外之意是，巴哈马原来的居民、政府和经济只有从保王党南方居民的迁移浪潮中得到好处。

在乔治三世于1783年 9 月签署的一份谕告中明确宣布，国王打算从土地贵族手中购买巴哈马群岛。巴哈马总督受命把那些无人占用的土地进行分配："每个户主四十英亩；每家白人或黑人中的男子、妇女和小孩每人二十英亩，每年每百英亩缴纳地租二先令，但对于那些从大陆来的保王党难民，这些土地则是免费配给，并在授地之后免收代役租，为期十年。"

1784年2月7日，东佛罗里达总督帕特里克·托尼恩在一项公告中援引了上述钦定条款，宣布凡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者可以获得十八个月的宽限。东佛罗里达陆军司令亚历山大·麦克阿瑟准将奉命把难民运送到他们在巴哈马的新居，一 164
切费用由英国负担。第一批大约有六百五十人，来自纽约，1783年9月他们从圣奥古斯丁乘船到达阿巴科。他们称其新居留地为卡尔顿，他们的一位领袖从那儿向其保护人多切斯特勋爵写信，满怀希望地恳求“提供一小队官兵，暂且用来保护他们以防歹徒劫掠财产，为了能更好地进行自卫，供给他们几门大炮、一些弹药等等；指派一名测量员来规划城镇，测量土地……运来一船家畜：牛羊和几匹马；——并且，这个岛屿不能建立锯木厂，为了开垦土地，还请求供给横锯和长锯，此外，还需要两套铁匠使用的工具和一些煤……”

卡尔顿（可能就是现今的霍普镇）显然是一穷乡僻壤，它非常象埃留特拉的一个边塞小镇或最早的居留地。如同早先的冒险者一样，卡尔顿人不久就互相争吵起来了。1784年3月麦克阿瑟

将军几乎用内战的字眼对此作了描述。当局从圣奥古斯丁调进军队来恢复秩序，并建立了审讯法庭。结果，一些民团军官被解职，费城的斯蒂芬斯上尉承担了指挥。主要的反对者离开了这块居留地，到马什港建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城镇。

整个1784年和1785年春，一批难民象无从抑制的洪流一样涌进群岛，他们一弄到运输工具，便赶紧启程，没人去组织他们，从来也没人准确地知道有多少人已去了，最恰当的估计是，包括奴隶在内大约有八千人。这方面的细节材料可以从《巴哈马报》查到一些，该报当时登载了圣奥古斯丁和拿骚之间的经常航行的次数，但这家报纸于1784年8月才创办，并且第一年的合订本也是不完全的。托尼恩总督曾记录过1784年到达拿骚的七只典型的难民船，它们运载着三百名保王党人和一千七百名奴隶，以及原木、木板和其他建筑材料。代理总督鲍威尔于1785年2月宣布了最后一次的官方航运，从那以后，这种难民的移入逐渐减少，成为一股细流，到1789年则完全停止了。

马克斯韦尔总督于1784年春回任，看到难民

的移入达到了高潮，1784月4月4日，他在议会所作的第一个演说中，慷慨地希望议员们应“仁慈地关怀你们同僚臣民的不幸处境，由于效忠国王和不幸的遭遇，他们被迫在本群岛寻求一处避难场所”。包括一个代表西部的议员安德鲁·德沃在内的议会，当时许诺支援这些难民；那项新的奴隶管理法显然是针对着新移殖者和他们的上千奴隶而制定的。此外，议会经过一番努力把新来的人安置到各外围小岛，到1784年年底，又作出了规定，接纳来自五个新的外围小岛选区的议员。 165

系统研究在拿骚的土地册中所记载的授地情况将是大有裨益的，虽然，1787年以前的土地使用情况既是混淆不清，1790年前的记录又是极不完整，使得这项研究工作要花费一辈子时间。A·T·贝瑟尔在他第一版（1914年）和第三版（1937年）的杂乱无章的著述中，列举了十六个岛上的一百一十四份授地状，总计四万二千八百二十九嗽，平均每份三百八十二嗽，这些授地面积大小不定，从新普罗维登斯的十三点五嗽的小块耕地到阿巴科的一千四百六十嗽的大地产。

表1： 1784—1789年保王党人所获的授地状

项目 / 地区	授地份数	平均嗽数	合计嗽数
新普罗维登斯	32	224	7,186
长岛	25	488	12,203
埃克苏马	16	482	7,710
阿巴科	14	256	3,580
卡特岛	7	674	4,720
埃留特拉	5	292	1,460
克鲁克德岛	3	733	2,200
华特林岛	3	133	400
其他诸岛：阿克林、安德罗斯、腊姆岛、比尔斯礁、高礁、北礁、霍格岛、罗耶尔岛	9（或者7）	481	3,370
总计	114	382	42,829

这份保王党人所获授地状表（表1）虽然不完整，但应该与1783年和1784年人口图表（表2）相对照，后者表示着人口的巨大增长及其分布情况。

表 2： 巴哈马诸岛人口表 166

地区	1783年			1786年		
	白人	黑人	合计	白人	黑人	合计
新普罗维登斯	755	1,739	2,494	1,572	4,019	5,591
埃留特拉	476	310	786	486	315	801
哈伯岛	360	144	504	365	149	514
埃克苏马	17	15	32	66	638	704
长岛	33	78	111	41	99	140
卡特岛	6	9	15	59	305	364
特克斯群岛	75	41	116	75	41	116
阿巴科	—	—	—	282	384	666
安德罗斯	—	—	—	2	59	61
总计	1,722	2,336	4,058	2,948	6,009	8,957

到1789年，人口总数增长到一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约有八千黑人。一个十分贴切的事实是，原有的土地所有者的家族在巴哈马的事务中仍然很显赫，实际上占着支配的地位。贝瑟尔在其所列举的大约有六百三十名保王党人的完整名单中，几乎把每个现代巴哈马人的姓氏都包括在内了。在他所列举的一百一十四名土地所有者当

中，几乎每个人的名字都可在1962年的海湾路商人和政府成员的名单中找到。

这些新来者并没有象安德鲁·德沃那样顺利地站住脚。显然，原有的居民愤恨他们，并千方百计地虐待他们。在保王党人中就连一半人都没有愿意被遣送到各外围小岛，在拿骚终于发生了严重的摩擦。1784年夏，马克斯韦尔总督给西德尼勋爵写信，在这封很有见地的信中，他把保王党人分成两类："(一）农民，他们都携带着人数众多的家庭以及十至一百个奴隶，在外围小岛定居下来，这部分人值得特别重视；(二)官吏、商
167 人和希望和平后再返回大陆的人——任何东西也满足不了这些人，他们急于取得各种东西——土地、衣食和职业，事实上他们几乎希望要接收政府。面粉是非常缺的。美国人暂时还供应面粉，但有些保王党人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并企图撕毁美国船上的国旗。"之后不久，马克斯韦尔称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最不知足的人们"。

大约在此前后，一个有才智的保王党人散发了一份广告传单，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普遍的不

满情绪。

出 售

> 当保王党人出城寻找土地时，随便哪一天。为了偿付开支这一好象有理的目的——要守秘密——出售一批牛肉和猪肉（绝不要对保王党人评议会的任何成员透露此事），以便使我能得到一笔佣金，并且，本城的老居民（在他们背后，我常常咒骂他们是该死的恶棍）也能分得一杯羹。

关于撕毁停在港内的美国船的星条旗一事，马克斯韦尔总督发表了一份布告，他还指令那些前来采购食品的美国水手，每值星期天要呆在船上，以防在安息日发生争吵。

到1784年6月，这种骚闹已达到了严重的程度，马克斯韦尔给麦克阿瑟将军写信说，他甚至预料保王党人要发动一次政变。次月，他又呈请西德尼勋爵遣派一团军队和三艘单桅帆船来保护政府，并附寄一份印行的传单。这份传单通知于7月29日“在约翰斯顿先生的宅第举行从北美大陆来的保王党人全体大会”。有十四个著名的保王党人在传单上签名，其中包括詹姆斯·赫伯恩，他曾任东佛罗里达的检察长，此时自封为

"保王党人评议会主席"。

"评议会"于9月3日会见了总督，几乎是公开地谴责他偏私和无能。马克斯韦尔总督一定会懊悔当初对待保王党人那样仁慈和宽厚，而这些保王党人似乎只是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总督再次呈请国内给予援助。当一切希望落空时，马克斯韦尔勉强地抛开了他的职位，于1785年2
168 月离开巴哈马前往英国。詹姆斯·爱德华·鲍威尔作为代理总督留下来对付那些愤懑不平的人们了。

议会起草了一份给马克斯韦尔的致谢书，因而激起了绝大多数保王党人的愤怒。3月5日，《巴哈马报》刊登一则持有异议的声明，由一百三十六个"目前恰巧在拿骚城里或附近的"保王党头面人物签署，其中宣称，"我们这些读者……认为有必要公开声明对这份致谢书全然不了解或者不同意；我们完全有理由反对马克斯韦尔先生重返本乡，因为他是一个可能降临于本群岛的最大灾难……"

马克斯韦尔曾召开过重新改组的议会，这是他政治活动中的最后一着。在这届议会中，埃克

苏马、阿巴科、长岛、安德罗斯和卡特岛的议员都是第一次出席；在十一名新议员中至少有九名是心怀恶意的保王党人。虽然新普罗维登斯、哈伯岛和埃留特拉的议员人数已由二十四名减到十四名，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定居的移殖者，其中八人自从1784年普选以后就一直充任议员。

很快地，保王党那一派人开始挑剔旨在剥夺他们在新的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那种手段。诉状被提到议会上来，控告保安司令约翰·贝克不顾保王党侯选人已获大多数选票的事实，而擅自宣布六个定居的移殖者当选为拿骚和新普罗维登斯西部地区的议员。作为对保王党人的一次回击，在安德罗斯的选举中落选的那些候选人宣称，保王党人在最后一刹那转让了七十到八十块土地，通过这种办法使他们支持者的投票成为有效。当有人提议暂缓考虑保王党人的诉状并得到附议时，在卡特岛议员詹姆斯·赫伯恩的带领下，七个保王党议员未经议长准许就退出了议会。

代理总督鲍威尔命令议会休会两星期，正如他在1785年 4 月20日重新开会时所讲的，希望这样一来，他就“和缓了似乎一点就燃的怒火和仇

怨”。他的希望竟成了泡影。没有一个保王党人
出席议会，当一个信使被派出召集他们时，他回
169 来报告说：“詹姆斯·赫伯恩先生已到卡特岛
去，彼得·迪安找不到了，詹姆斯·莫斯去西南
礁了，乔治·米勒去安德罗斯岛了，詹姆斯·里
德利和休·迪安去阿巴科了。当召集到约翰·佩
蒂时，他为了答复不出席的原因才回来，他回答
说，当议会里还有非法挑选出来的人在时，他就
不打算出席。”

更有甚者，约翰·佩蒂和彼得·迪安散发一份抗议书，它激怒了出席议会的那些议员们。4月25日，议长下令让治安绞刑吏在法院门前公开焚烧一份抗议书，并严厉地谴责了印刷人约翰·韦尔斯。议会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有关选举的诉状不予考虑，因为这些诉状在新的一届议会开始时未曾重新提出。

5月9日，保王党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简直就象一个革命的裁判所。它“决定，既然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在本届议会中没有代表权，当然就不受议会可能通过的任何法律的限制”。鲍威尔总督接到请愿，要求他解散议会，并准备

发令举行一次新的普选。鲍威尔并没有接受这个要求，而是又一次宣布议会休会，这次休会长达四个月之久。

在7月份鲍威尔接到来自英国的关于如何对待这些不满分子的指示。在这项指示中，建议他暂停詹姆斯·赫伯恩、罗伯特·约翰逊和约翰·韦尔斯的现有一切职务，并拒绝关于举行新普选的进一步呼吁。当1785年9月20日议会再次召开时，到会的十三个议员感到已有足够的力量通过法案来对付那些顽抗的保王党人。9月26日，彼得·迪安、约翰·佩蒂和詹姆斯·莫斯被驱逐出议会，原因是他们参加过反对议会的请愿和抗议，这种行动被看作是对议会的轻蔑。三天之后，另外五个极端分子由于拒不到会，也被驱逐出了议会。

"老警卫"①所获得的胜利似乎是彻底的。既然从1785至1794年间议会没有被解散过，人们就自然会说，保王党人在整个这段时期是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事实也不尽然，凡是通过补选产生

① 这里指的是早期来巴哈马定居的移殖者，他们反对保王党人。——译者

出来的新议员，虽然比起他们的前任是沉静和安分得多了，但他们本身——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170 ——却都是新来者。仅仅是那些极端分子才被排除于议会之外；象在卡特岛重新当选的赫伯恩这样的人，根据他以前被开除的情由，被宣布无被选举资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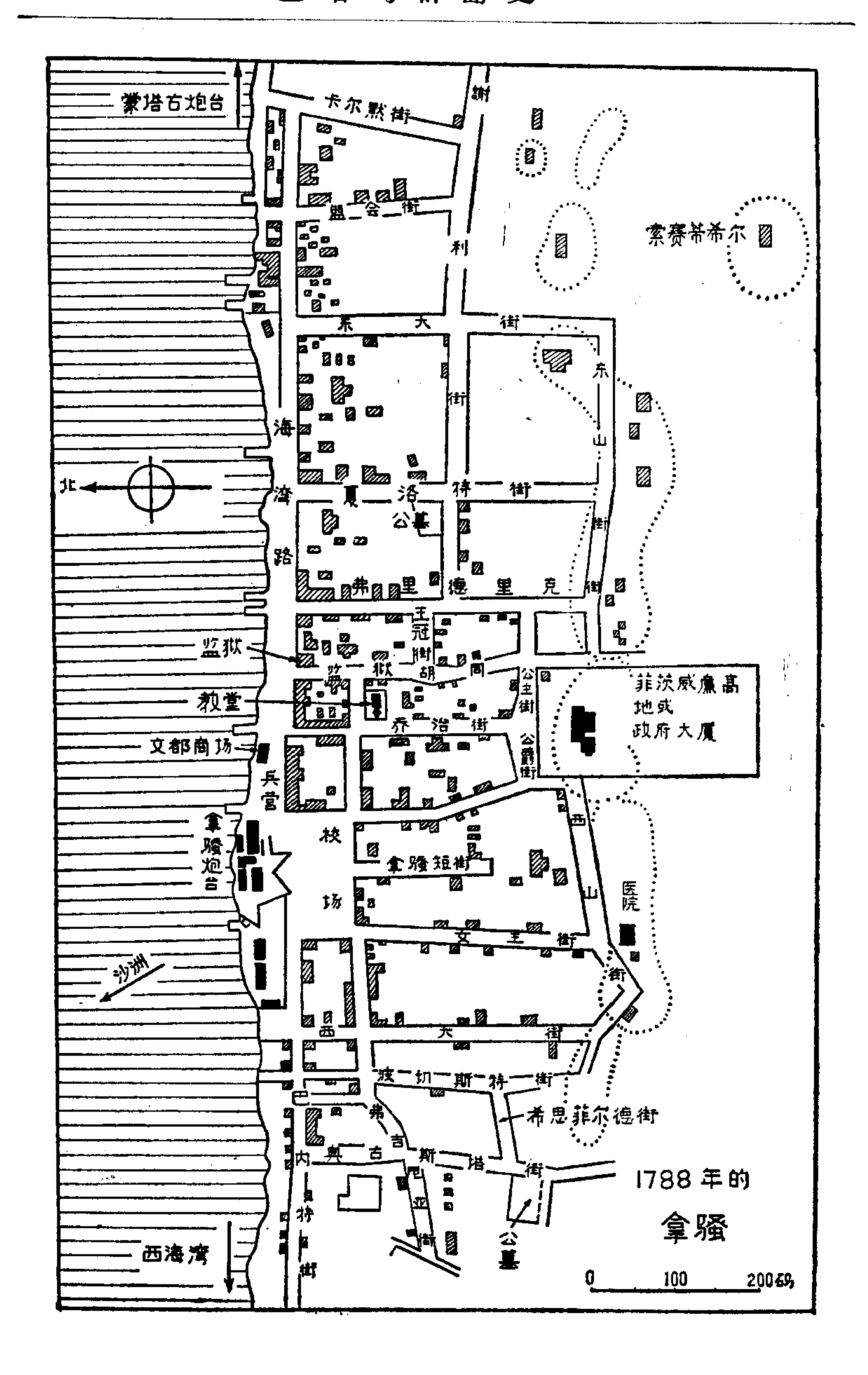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消逝，死亡和辞职抽去了议员的一部分，巴哈马的“长期国会”比较真实地显示出一个代表群岛所有居民的机构的样子。议会既未受过政府的控制，也不曾被党派纠纷所分裂，而是变得更团结一致了，在削弱总督职权的过程中，议会不断地增强了自己的权力。

1786年和1787年，争吵与倾轧逐渐消失了。这主要应归功于代理总督鲍威尔，他的才智和魅力透过政府文书的陈词滥调而闪闪发光，从而把被马克斯韦尔所触犯的各种人物争取过来了。当他于1786年2月突然去世的时候，人们普遍为他哀悼。他的临时接任人，政务会主席约翰·布朗也是个颇受欢迎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的一个颂扬者所说的，布朗是“一个老居民、一位深受尊敬的人士……他仅仅几次召集过议会会议，这样

做也只是为了延续那些行将期满的法律，他未曾遇到请求解散议会的困扰；党派争执也平息了，他的政府是巴哈马人民前所未见的最安稳最兴旺的政府”。

经济繁荣与亲善和好并肩而来，历来如此。1786年和1787年是巴哈马十八世纪最繁荣的和平岁月。在1788年棉蛉虫及其他害虫作祟以前，保王党人棉花种植者的前景是乐观的。威尔逊中尉所注意到的肥沃的黑色的垆埆土，证明是最适于种植长纤维的“海岛”棉花。到1785年年底，已经种植棉花二千四百七十六嗽，出口棉花达一百二十四吨；1786年种植面积增加到三千零五十嗽，出口棉花达一百五十吨；1787年，在四千五百嗽土地上生产了二百一十九吨棉花，总值达二万七千三百九十三镑一先令三便士。其他商业的数字更为可观。就1773至1774年间的进出口情况而论，出口额总共只有五千二百一十六镑，进口额也只有三千五百九十二镑；但到1786至1787年间，出口额竟骤增至五万八千七百零七镑，进口额也增至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九镑。

当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年幼的北美


蒙塔古炮台
卡尔默街
盟会街
利
索赛蒂希尔
东大街
东山街
海湾路
特街
夏洛公墓
弗里德里克街
王冠街
监狱
监狱胡同
公主街
教堂
乔治街
菲茨威廉高地或政府大厦
文都商场
公爵街
兵营
拿骚炮台
校场
拿骚短街
西山街
医院
沙洲
文王街
西大街
波切斯特街
希思菲尔德街
弗吉斯塔街
内特街
亚街
公墓
西海湾
北
1788年的拿骚
0 100 200码

合众国虽是巴哈马的近邻，但有它自己的纸币问题，当然对巴哈马很难给予帮助。以拿骚的食品 172
价格①为例，在1784至1786年间增长一倍，面粉最高涨到八元一桶②；黄油、干酪和肥皂涨到每磅一先令三便士；从附近的西印度群岛运来的糖，价格更是昂贵得惊人，每磅达一先令二便士至一先令五便士。连甜酒的价格也上升到每加仑十个半赖耳！

无论如何，当1787年国王最后赎买了土地贵族的产业时，混乱和不满的一种根源便消失了。根据3月19日签署的财产转让契约的规定，原来六家土地贵族的每一个继承人获得二千镑，以便将其权力完全交给国王。除此以外，众议院于1784年和1786年曾经通过为数七千八百五十镑和六千三百五十六镑的两次拨款，以便从土地贵族手中为保王党人购买土地。

保王党人对他们所受的待遇全无怨言。到了1787年年底，他们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心满意足了。不幸的是，他们的好景不长，不到

① 见本书附录各种货币价值部分。

② 桶（barrel）：容量单位，约为36加仑。——译者

一年的时间，害虫毁掉了他们的庄稼，同时又来了一个总督，使保王党人回忆起他们在大陆时所经历的最残暴的统治。

第十六章　邓莫尔勋爵 173

1788—1815

1789年4月，一位作者在《巴哈马报》上撰文哀叹棉花生产的衰退。由于棉蛉虫的贪婪胃口，也可能是由于贫瘠土地的过分使用，1788年收获的棉花只有一百一十二吨，而不是所期望的三百九十四吨；产量减少了一半，而不是增加一倍。因此，一种泄了气的乐观气氛从一开始就笼罩着邓莫尔勋爵的执政时期。这位苏格兰伯爵也不象是个能冲淡幽暗的妙手，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性急而放荡的乡巴佬。

邓莫尔伯爵约翰·莫里是查理二世所赐爵位的第四任占有者，邓莫尔虽做过弗吉尼亚的最后一任直辖总督，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应有的尊贵。他生于1732年，1770年被派往纽约任职，两年之后，又被派往弗吉尼亚。他的统治拙劣得出奇，其为人傲慢放荡，他的才智不能与帕特里

克·亨利那样卓越的爱国者们相比。他与俄亥俄的印第安人所签订的条约，在弗吉尼亚正象诺思勋爵的“魁北克法案”①在马萨诸塞那样不得人心，其原因大体上都是一样的。1775年邓莫尔企图没收储存在威廉斯伯格的民团的火药，这是对盖奇向康克德进军的一种轻率响应，同时也促进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在起义中联合起来。邓莫尔在叛乱初露征兆之际就抛弃了他的首府而逃走，并且，他把一艘在约克镇外安全停泊的军舰宣布为政府的办公地点，这是保王党人所厌恶、共和派所讥笑的事。他于1776年在海上断断续续地工作之后便长期赋闲，直到1787年10月来到拿骚，那时，他已五十五岁了。

威廉·怀利作为邓莫尔的对手在巴哈马历史
174 舞台上出现了。怀利生于1757年，后来获得律师的资格，他曾以保王党人的身份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并于1787年移居到巴哈马。从那时起直到1828年去世，他在巴哈马的事务中，一直是个有

---

① 1774年英国国会通过。该法案承认加拿大的法国民族性，目的是防止法国籍的加拿大人与北美南部殖民地的起义者合作，起来革命反对英国。——译者

影响的人物。

1787年和1788年怀利是副检察长，邓莫尔的行径和任用人选很快地使他恼怒了，他以“格雷律师协会律师”的笔名写文抨击总督，称他“天生就是固执和粗暴”，其“能力逊于庸人，缺乏教育的熏陶，对英国的法制一无所知……他是一个苏格兰小氏族的贵族暴君”。“他在私生活上的道德败坏，并不比他在公德上的缺陷更少地受到责难。”

在怀利的评述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敌意，如果没有其他人的确证，这种敌意就可能被人们认为是夸大了。另一个作者描绘邓莫尔所任用的人是“一群破产者、乞丐、恶棍和他的姘妇之夫”。审判长是个“江湖医生”，关税检查员是邓莫尔与之私生孩子的一个女人的不幸丈夫。

怀利自称，审判长马特森曾偷偷地拜访了他，并提醒他应“参加党派”，那就是说，应忠诚地支持政府。当他拒绝以后，一项捏造的起诉使他被捕，指控他曾称审判长为“该死的撒谎者”。这次审判是一场吵吵嚷嚷的滑稽戏。怀利的辩护人罗伯特·约翰逊建议两个法官尽量互相

商量，“也许一个人失之于正面，另一个人则得之于反面。如果弄到一瓶白兰地酒，边饮边商量，就会有更好的效益。”怀利因为原告证据自相矛盾而获释，从而继续进行反对总督的追击战。

邓莫尔为这种反对势力火上加油。1789年2月他劝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默里参加拿骚的补缺选举，与托马斯·布朗互相竞争，后者是在审讯怀利时出庭作证的辩护人之一。在一场派别问题的激烈争执中，默里以四十一票对五十四票而落选，但他在下一个月很快地又作为代表埃留特拉的议员回到了议会。邓莫尔任命他另一个儿子为特克斯群岛的殖民地代办，1793年又把他从特克斯群岛召回，不愿费力去请示伦敦就擅自任命他
175 为副总督，这样就越来越近于公开的门阀主义了。这种行经曾引起了国务大臣的尖锐训诫，幸亏儿子们远比他们的父亲得人心，否则，邓莫尔偏袒、徇私的做法，就很可能使他自己面临公开的反抗了。

另一个引起不满的根源是对国王地产的分配，邓莫尔把它完全看作是一种施恩手段，这种

作法非常象纽卡斯尔在英国所干的那样：给政府的支持者们封官加爵、供禄无差，以此为酬劳。1790年以后，当对保王党人的自动授地最后停止时，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除此之外，在土地册上，在他名下记载了无数次的转卖土地事宜，从而明显地看出，邓莫尔是巴哈马土地投机商的长名单中的头一名。

在总督和人民之间的裂痕很自然地在议会中呈现出严重的程度。1791年，邓莫尔质问两个议员为什么不向他申述原因就辞职，议长对此很有礼貌地但断然地回绝了他。不久之后，关于控制开销一事又引起了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1791年10月，在讨论拨款议案时，议会议决，它应对所征收税款的开支加以监督。这种权力受到了政务会的挑战，邓莫尔勋爵随即宣布议会休会，直到一年以后，拨款议案才成为法律。

虽然对岁入的需要变得十分紧迫，但邓莫尔还是于1792年7月向议会传递了国务大臣邓达斯的一封信，信中说，议会监督经费开支将等于侵犯王室特权。邓达斯建议，“如果在提出公共帐目时，在开支上出现弊端，议会就有权随时向国

王一枢密院陈奏，以求补救办法。”这个建议根本不能满足议会的要求，因而议员们拒不退让。在1792年8月3日，邓莫尔被迫签署了拨款议案，尽管他认为其中有几项条款是违宪的，但他还是签署了，因为钱是多么欠缺呵！

1793年，争执达到了顶点。8月26日，议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案，决定“一切关于为维持政
176 府而拨给经费的议案，或者为此目的而指定进行筹款的议案，在法制上都必须由本议会提出，这也就是作为民众代表的议会所享有的当然的和独特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英国国会惯例所确认的)：在上述的议案中指导、限制、分派那些拨款和数额的目的、依据、限度以及条件，使其不致被政务会所更换或变动。”议会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无论是总督还是他的政务会，不允许他们查看拨款议案所凭依的帐目或付款单据。

虽然邓莫尔勋爵再一次试用停止议会的手法，但他在这一局中已经输了。对法国的战争又一次爆发，公库中总共只存款四千五百镑。1793年9月10日，邓莫尔重新召集议会，五天后，他签署了那项引起争论的议案，从那天起，直到

1828年，虽然总督未曾正式承认这个事实，但实际上议会已经控制了巴哈马的财政预算了。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进展，议会吵吵闹闹地要求解散，并进行普选。早在1792年议会就通过一项限定议会任期议案，但邓莫尔对一些请愿的答复是：伦敦的枢密院仍在考虑研究此事。经过难以避免的拖延之后，这项议案于1794年被批回，其中附着这样指示：倘若议会任期不少于七年，该议案就可以成为法律。既然议会任期已达九年，邓莫尔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它。1794年9月所举行的那一次普选，消除了议会中亲总督派别的一切迹象，同时也消除了认为保王党人在议会中代表名额仍然不足数的任何怀疑。

就邓莫尔的愚笨设计来说，其最持久的纪念物就是他所经手建造的炮台。这些炮台看起来好象牢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然而它们从未放过一声响炮。为了向乔治三世王后表示敬意而命名的夏洛特炮台，从1787年动工，其节约的造价预计为四千镑，到1789年邓莫尔已使用了七千六百三十六镑，并耗尽了当地的资源。他向西德尼勋爵呼吁，述及当时的守备部队四七团的苦境，说他

们居住在棕榈茅舍之中，象苍蝇般地死去。邓莫
177 尔在炮台四周保留了一百嗽土地（这些土地至今仍是公地），“以防止在它附近建造房屋，并用来操练部队，并给部队提供各种蔬菜，在那样气候条件下，这对保证他们的健康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价格昂贵，他们得不到新鲜食品。在和炮台接壤的小山上给部队建造兵营也是绝对重要的：第一，因为他们现在所住的房舍已是处于倒塌的状态；第二，因为这些营房设在城里，士兵们可就近获得摧残自己的甜酒；第三，因为目前的兵营距离炮台太远。我敢冒昧断言，如果让士兵们宿营于小山上，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而现在的情况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尽管得到的是令人泄气的回答，邓莫尔勋爵仍然开始修建一座兵营，给夏洛特炮台加上了一个中间棱堡。他以自己的另一个称号来命名这个棱堡，称之为斯坦利炮台。1791年，陆军大臣派一个叫达西的中尉前来调查人力、物力消耗的情况，那时总督已经着手修筑西边的棱堡了，虽然他很狡黠地把它命名为达西炮台，但这位刚强的中尉并未受到打动，照样向他的上司呈送了一份

轻蔑的报告。在其他方面，达西注意到，兵营恰恰位于炮台和它要保卫的城镇之间的火力网之内。陆军部非常勉强地拨付完成炮台工程所需的一万七千八百四十六镑。

兵营于1794年完工，花费了一万零七百八十四镑，使邓莫尔的开支达到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七镑，大约为当初所估计的九倍。兵营原来设计容纳六连军队，但它从未被充分利用过，就在这些建筑竣工时，因疾病而死亡的，在四七团中达一百五十人，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死亡一百零九人。这些没有战略意义而且妨碍观瞻的营房于1835年因有碍卫生而被拆除，迁到已被拆掉的拿骚炮台的位置。直到1891年西印度团最后离开拿骚时，这些兵营还一直存在着。夏洛特炮台本身在它全盛时期曾配备有四十二门大炮，至今也保存下来了，虽然很壮观，但却没有什么用处，对于好奇的游客们，它象块磁石一样具有吸引力。

尽管他在初期曾经铺张浪费，当战争于1793 178
年爆发时，邓莫尔勋爵又在温顿、霍格岛和波特
礁建造了一些炮位，并开始建造另一个炮台，它
位于那带丘陵脊背的最高点，俯瞰着拿骚，状如

一艘搁浅的明轮汽船。总督根据他长子所持有的子爵头衔而给它起名为芬卡斯尔炮台。1794年2月，按照邓莫尔的描绘，这座炮台“配备有二门发射二十四磅炮弹的、二门发射三十二磅的大口径短炮，二门发射十二磅的大炮，一门榴弹炮，大炮的射程不仅包括霍格岛的炮位，而且也包括全城和通往东端的道路，而东端则很可能成为敌人的登陆点”。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拿骚虽然再也不会受到袭击，但是，防御工事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靠了。然而，这些多余的防御工事并未满足邓莫尔大兴土木的狂欲。靠近新普罗维登斯的东端，他又建造了一座小巧的乡村别墅，叫做隐士之庐（现在是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宅邸），在他整个总督任内，邓莫尔扩大和改建了坐落在非茨威廉高地的政府大厦，同时他还一直叫嚷着要在稍高一点的位置上再建造一个新的建筑物。另外，邓莫尔勋爵建议建立一片全新的政府机关建筑区，其中包括：议会、政务会、法院和监狱。所有这一切改进都实现了，不过是逐步实现的，并且这是在邓莫尔离开这个殖民地以后的事。

邓莫尔总督对哈伯岛很感兴趣，在巴哈马群岛中它是第二个人口最稠密的居留地，他在人所熟悉的营盘山上给自己修建了一所避暑别墅，借以躲避拿骚的忧郁和吵闹，在那里又修造了必不可少的防御工事。1791年10月5日，他设计了邓莫尔镇，它至今仍是中心城镇，办法是把他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分成一百九十份，把这些块土地分派给每个主要的移殖者，每份土地每年付代役租二先令六便士。由于哈伯岛土地不甚肥沃，因而住在那里的许多居民只能越海到埃留特拉主岛的田产上去耕种。

法国革命战争的消息于1793年6月传到拿骚，战争给巴哈马带来了通过私掠船而重新繁荣起来的前景；但是给处于困境的邓莫尔勋爵却只是带来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一艘可能是叫“伏兵号”的法国兵舰在霍格岛外巡逻数周，并有效地封锁了港口。令人不安的消息从美国传到拿骚，179
说M·热内——“自称是驻美国诸州的法国公使”——正在煽动反英情绪的余烬，征集一军团美国部队，并组织任命私掠船。1793年9月间，英国驻美公使哈蒙特和费城的领事邦德警告巴哈

马将遭到一场全面的攻击。

一如既往，巴哈马居民们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不加警觉，反而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限制政府开支，拒绝支援民团，而一心想从私掠船的活动中获利。许多人公开赞助美国人，后者正在支援着法国人，譬如，1795年5月，邓莫尔不得不报告，审判长斯蒂芬·德兰西离开群岛而向美国投奔了，此人是在1791年一次争吵之后被邓莫尔从政务会中清除出去的。

守备部队的负责军官彼得·欧文上校，申请派遣增援部队来，与此同时，他尽最大努力布置兵员、巩固新的城防，并且增加了海军防务。白厅对他申请的唯一答复是滚滚而来的备忘录，责难邓莫尔挥霍浪费。

乔治·查默斯于1792年在伦敦被任命为殖民地代办，他成功地担任此职达三十四年之久，凭他对事态的敏锐观察，他断定，邓莫尔是拿骚一切纠纷的总祸根，并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他撤换了。1793年初，一个叫做英格利斯的商人估计，“与群岛有关系的社会名流当中，几乎任何一个人的申奏都可能使总督下台”。欧文上校在此前后也

报告说：“邓莫尔勋爵近来遭受几起丑恶的抨击，此刻正被一个来势汹汹的沉重抨击所苦恼着。”1796年，哈伯岛的约翰·克利尔作证：邓莫尔总督“根本无缘无故”地打他的脑袋，把一根手杖都打断了。仅仅事隔九天之后，除了尊贵的勋爵本人之外，对任何人也不惊奇的事来到了：邓莫尔总督奉波特兰公爵之命返回英国。尽管他几次请求允许重返巴哈马，但他再也没有被委任任何实际的职务。他于1809年死于苏格兰。

在埃克苏马占有一处庄园的保王党人约翰·
福布斯被指派为代理总督。他很简洁地概括了
不幸勋爵的反对派观点，说这位苏格兰伯爵“靠 180
花费英国国库的大量金钱（冒充修建城防、战船等等的项目）来笼络议会……包庇拥有美貌妻子的、失职的司库们……当地下流的白种人简直是亡命之徒，是海盗的后裔，虽然他们的职业或许冒称打捞失事船或从事私掠船等不同名目，但他们还没有摆脱其祖先的本性。在我的前任和这些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徇私的关系，以及一种互相纵容的默契——一方违法乱纪，另一方侵吞英国的公款”。

邓莫尔的离职并没有使形势马上好转，在1796年冬，灾难性的飓风蹂躏了巴哈马群岛，紧跟着又发生过可怕的黄热病，这种病是由怀特将军从圣多明各调来休整的五百人分遣队给传播来的。在数以百计的死者中就有代理总督福布斯。政务会主席罗伯特·亨特填补了这个空缺，直至1798年威廉·多德斯韦尔来到继任邓莫尔勋爵的职务。在那一年，约翰·韦尔斯① 能够报导说，拿骚正在“沿着古老而平静的道路稳步前进。”

这只是一种谨慎的说法罢了。保王党人的到来和邓莫尔的高压手段所引起的怨恨业已消失了。与法国的战争于1815年结束，这场长期战争末期的经过情形可以简述如下：几届总督：多德斯韦尔、约翰·霍尔基特——他于1802年上任、查尔斯·卡梅伦（1804—1820年），他们平庸得几乎达到无声无臭的地步。尽管他们喋喋不休地表示关心，但棉花生产一直不断地下降着。1803年，丹尼尔·麦金农注意到，在克鲁克德岛，各种植场“绝大部分都荒芜了”，1812年，一个参观者记

① 《巴哈马报》发行人，参见本书附录三。——译者

载，在阿克林岛只有两家种植场主还积极经营着。只是由于在长礁设立了巴哈马邮政总局，因而行驶在伦敦和金斯敦之间的邮船，在它们通过克鲁克德岛海峡时停靠在那里，所以才使这些岛屿免于沦为无足轻重的境地。

在棉花市场最兴旺的时候，长岛曾拥有一条长达一百哩的畅通的运输道路，在1795至1803年
间，在这个岛上却有“八家到十家种植场完全停 181
止了经营，另外十三家呈现部分停业状态”。麦金农敏锐地观察到，由于缺少家畜来提供粪肥，贫瘠的土壤一经耕种，地力就再也不能恢复了。虽然采用了轮作制，然而，一旦某一种植场的可耕土地全部种完，那么这个种植场也就随之毁灭了。1800年，五十家棉花种植者向国王提出申请要求救济。1802年，地产处受权再一次免费分配国王土地，这样使棉花种植业又恢复到一定程度，并使这一行业的彻底破产往后推迟，一直到了1838年废除奴隶制的时候。

虽然不能完全指望靠打捞失事船过日子，但它毕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援助。在航海盛行的岁月里，由于精确的航海图尚未出版，灯塔也没有

设立，在巴哈马触礁遇难的船只数目是不可想象的。有时整个船队遇难覆灭，例如，1800年8月，英国皇家军舰“洛斯托夫特号”及它所护航的八艘牙买加船，全部在伊纳瓜海面遇难。麦金农记录了他和一个“海螺”（巴哈马白人）①失事船掠夺者的一场生动谈话，后者来自“伊卡梅的菲利明戈海湾”（即埃克苏马的弗拉明戈海湾），正在动身“从事打捞失事船②的航行前往库比”（古巴）。这位没经验的访问者问这个饱经风霜的老水手，是否有很多水手从事这种活动：

答：在四个月中沿佛罗里达海岸和我们在一起停泊的共有四十只船。

问：四十只？那么你们一定有很多机会对通过墨西哥湾的船只给予必需的帮助，指引他们躲开危险的地点，不就是你们的任务吗？

---

① 海螺（Conch）是巴哈马人的绰号，参见本书511页。——译者

② 打捞失事船（wreck）：英文原意也作营救失事船或掠夺失事船解；所以从事这类活动的人也称失事船救助者、失事船打捞者或失事船掠夺者。——译者

答：不是那么回事——过往船只一般是在夜间航行。

问：那样的话，你们或许已经适时地警告他们了，在岸上设立灯塔，或向他们提供灯光，对吧？

答：不，不（大笑）：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我们晚上总是把灯火熄灭。

问：但是，警告他们何处危险，那不是更合乎人道吗？

答：我到那儿去不是为了什么人道，我是去掠夺失事船的！

和以前所有的战争时期一样，从事私掠船的勾当是一桩比打捞失事船更有利、更稳妥的营业。1812年美国愚蠢地向英国宣战之后，上述情况尤其是确实的了，当时"拿骚的一切都处于忙 182
乱之中，因为这些岛屿在战争期间是最繁荣的"。战争的消息一传到拿骚，马上就有十几只船在港内被没收。1812至1814年间的通讯和报纸塞满了关于没收船只的新闻报道，例如，1814年1月14日到3月17日这段时间，《英国皇家官报》登载的拍卖记录中列有从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手里没收的

四艘双桅纵帆式帆船、两艘横帆二桅船和一艘单桅帆船。其中只有一艘是被英国海军的一只舰艇俘虏的，在这些成功的私掠船长中，至少有一位是巴哈马人，即“詹姆斯和夏洛特号”船长约翰·西蒙内特。

英国控制了海洋，尽管巴哈马临近敌对的美国，而且缺乏地方自卫武装，但拿骚在整个战争中并没有遭到报复。唯一不良的结果是通货膨胀，以及缺乏通常从大陆获得的供应。早期的卫理公会传教士W·道森牧师记述，“面粉每桶涨价到二十五元，玉米面每蒲式耳涨价到二十六先令，均为巴哈马货币”。当一艘被捕获的船押到埃留特拉的罗克桑德时，当地居民按捺不住去抢掠它所装载的面粉，为了这个罪名，七个人被驱逐出卫理公会。

关于巴哈马在1812年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过一项引人兴趣的侧闻：将近1813年年底，卡梅伦总督收到两个红印第安首领的几次来信，说美国南部有一万到两万印第安勇士已经准备就绪，如果英国政府给予援助，他们就向美国开战；然而，英国政府却是如此慢条斯理地接受这个建

议，以致1814年8月间，当计划派出一支远征部队支援这些印第安人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如果说不是靠种植场的收益，至少是靠私掠船的获利使拿骚的地位逐步地得到发展了。可是，与新英格兰殖民地及埃留特拉的冒险者所提倡的清教徒的共和政体不同，巴哈马直至十九世纪还几乎是一个不信上帝的境界。海盗精神和抢掠失事船的恶习既是根深蒂固，始终难免复发。对于奴隶们，许多奴隶主认为基督教所传授的平等概念很可能使他们道德败坏，因而宁愿叫他们 183
在其模糊记忆的非洲宗教迷信中留恋徘徊。1802年，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D·W·罗斯牧师记载，许多埃克苏马的黑人——大概是曼丁哥人——是"穆罕默德的信徒"。欧比阿①的风习一直在一些落后地区悄悄地存在，并延续达百年以上。

少数无能的传教士中，第一个是威廉·盖伊牧师，他是1731年由福音布道协会派来的，他在拿骚建立了一个小巧的木教堂，设法给一百二十八人施行洗礼，但是，尽管他两次主持圣餐礼，

① 欧比阿（obeah）：是流行于西印度群岛黑人中的一种原始非洲迷信活动，参见本书326页。——译者

然而陪餐者①总共也没超过二十人。第二个传教士威廉·史密斯牧师能够在1733年报告，拿骚已有一个拥有十二名成员的教区会。1754年，在今天的基督堂位置上重建了教堂。古老的版画上画着一个小巧的木建筑物，带有一个古雅的尖顶，看来象一座宝塔。1768年，在哈伯岛创立了一个新教区，为了修缮拿骚教堂的尖顶，总督托马斯·谢利于1770年往波士顿运去十八桶酒。然而，1782年西班牙人入侵时，牧师巴克先生却是第一批逃离拿骚的人之一。在这段没有牧师的空位期间，一个身份不明的英国国教反对者特雷布纳先生，被允许在这个教堂中传道，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人们可以猜想到，保王党人的到来对殖民地的宗教生活有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托利党人历来是英国国教的坚定支持者，除了长老会教徒——他们在1810年建立了圣·安德鲁教堂——以外，保王党人一旦在议会中取得权力，他们便想方设法把英国国教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

① 指受过洗礼因而有资格受圣餐的基督教徒。——译者

来。1789年，詹姆斯·布朗牧师埋怨说：他那一年节俭的开销二百三十七镑，远远超过了他从一百八十五镑的会费中所提取的低微收入。但1795年的一项法案规定，教会得从酒业执照税中获得收入，教区会受权监督度量衡及管理市场。同年，根据另一法案规定，在全巴哈马群岛创立了五个新的教区。

在此关键时刻，圣公会开始失去地位。议会
的法案不能唤起宗教热诚，这是一个道德颓废
的时期。除此之外，在1807至1835年间，福音布
道协会几乎垮台，无力再派出传教士，在这阶段 184
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巴哈马经常只有一个牧师。
使宗教没落的第三个原因是英国国教不愿意让黑
人改宗换教。英国国教的反对者就没有这样的疑
虑，他们反而发现，在奴隶和自由黑人中间，有
迫切要求宗教改革的因素。

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究竟是浸礼会传教士还是威斯莱教派传教士首先在巴哈马播下了反对英国国教的种子。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来自卡罗来纳的黑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上述两派教义。1796年，一个名叫约瑟夫·保罗的勇敢黑人在拿

骚的西区建立了威斯莱教派教堂，地点是今天圣公会的圣玛丽教堂的位置。1799年，西印度的福音传教士托马斯·科克博士向卫理公会在曼彻斯特的会议恳求，给巴哈马派去一位传教士。1800年10月22日，三十九岁的巴巴多斯人威廉·特顿牧师来到拿骚，开始他的牧师职业。在同一年内，第一个浸礼会小教堂在会议街建立起来，俯瞰着德兰西镇。争取皈依者的竞赛已经展开了。

不同于在其他奴隶殖民地的传教士，特顿没有遇见公开的暴力对抗，但是在开始时也不得不忍受“诽谤、半迫害和无礼的官吏作风”。由于没有一个人胆敢借给他房屋，因而他最初的几次公开礼拜式是在户外举行的。他所争取的第一批皈依者太穷而无力修建教堂；但到1804年，在拿骚炮台废墟对面的拿骚短街奠下了一个礼拜堂的基础。这个朴实的建筑物于1813年毁于飓风，直到1821年才又重建起来。到那时，约翰·拉特利奇牧师和威廉·道森牧师已经与特顿共事，并在埃留特拉、哈伯岛和阿巴科有了众多而固定的会众。显然，开始时威斯莱教派的传教士向黑人传

教相当成功，但他们的教义对当地白种人——尤其是对那些比较穷困的白种人——有更大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卫理公会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或种族分歧。

在浸礼会教徒中，从来没有过种族分歧，因为他们经常是百分之百的黑人。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团结一致过。浸礼会教派象荒火那样自发地 185
扩展着，但却缺乏组织性。直到1833年，浸礼会传教士协会才派出以约翰·伯顿牧师为首的第一批传教士，他们建立了非国教派的教堂。到那时，至少已出现两个兴盛的支派：一支是最初传教士的后继者；另一支是一个名叫斯彭斯的美国人于1814年所建立的圣·约翰派，它后来名义上变成了主教派。今天浸礼会教徒在巴哈马各种教派中虽然是人数最多的一派，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体，而是分裂为无数教义不同的派别。

虽然早期的反国教派的礼拜堂很少是宏伟的，而且今天也没有一座保存着它们当年的规模，但拿骚本身却在保王党人时代的末期变化得更引人注目了。麦金农描述说，这个城镇“与我在西印度所见的任何城市建筑得同样出色”，当时

的木刻画所描绘的这个地方远比伍兹·罗杰斯和彼·亨·布鲁斯时代更加堂皇富丽。许多漂亮的殖民地楼房——现代拿骚如此引人入胜的一个特征——就是在1800年至1815年这段时间建筑起来的。绝大多数公共建筑物也是在那前后兴建起来的。文都商场，现在是巴哈马电力公司的所在地，昔日为买卖奴隶和一般商品的场所，大约建在1787年。今天的大教堂就是1840年在教区教堂的旧址上兴盖起来的；但是，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教堂——圣马修教堂，是由有才华的约瑟夫·伊夫于1800至1804年间设计、建造的，所有费用则是经过议会通过而拨给的。

现今的政府大厦建于1803至1806年间，其地基是议会在1799年花四千镑从保罗·德鲁姆戈尔德手中购买过来的，尽管是这样，至少从邓莫尔勋爵时开始，总督官邸就曾坐落在那个地址上面。关于现今西大街的天主教修道院一度曾是总督府的传说，似乎是不可信的，因为1788年出版的精确地图表明那条街上没有房屋。修建或者说重建政府大厦，包括修花园、砌围墙及盖门庭等，费用总共是一万镑。著名的哥伦布雕像从台

阶上俯视乔治街，那是史密斯总督于1830年设立的。

在拿骚，最引人注目的新增添的建筑物，就是
坐落在国会广场周围的那些公共楼房。昔日的监
狱，今天的公共图书馆，这一古雅的八角形建筑
物是于1796至1800年间建成的。旁边有个救贫
院，后来就不见了。在一个面朝着海湾路的广场 186
上，三面都有漂亮的建筑物，那是议会、政务会
和法院的所在地。这些楼房早在1803年就动工，
直到1812年才完成，其样式是模仿北卡罗来纳首
府新伯恩的公共建筑物而设计的，因而使许多保
王党人带着一种思乡的心情来怀念这个城市。

除了罗森总督任内增添的克朗码头（1865年）——使船只在码头前面可直接停靠到海湾路——以及后来修建的最高法院新楼和警察局（1920年）之外，拿骚的行政中心自从1815年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今天，这些建筑物具有一种尊严和古色古香的魅力，它恰恰是现今这个“铬镀的”时代所缺少的。1815年，这些建筑物就都现代化了，比起德国人舍普夫于1784年所描述的情形又前进了一步。他写道：“一个教堂、一座监狱和

一幢议会楼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公共建筑。”回顾一下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虽说是逐渐的实则是巨大的进展，1815年保王党人的子嗣们就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父辈的事业而感到骄傲了。

第十七章　奴 隶 制 187

1815—1834

奴隶解放运动在英国一经获得支配地位，并开始使其影响波及殖民地，那么，农场主阶级和他们的商人朋友就感到1784年以后得之不易的进展受到了威胁。对于统治者阶级来说，种植场制度是巴哈马经济的基础，也是他们自己财富和地位的依靠。尽管奴隶制的概念从现代思想来看是可耻的，不过人们必须认识到，廉价的奴隶劳动对于种植场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农场主们在各个方面与奴隶解放运动作斗争，因为他们知道，解放奴隶意味着他们所要维护的一切将大部分归于毁灭。

解放奴隶将意味着在殖民地生活中的一场革命，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和法国不久前发生的大骚动。为了能用正确的眼光来观察这场革命，我们必须考察奴隶制和1834年以前巴哈马种植场

制度的真实情况，考察在议会中对奴隶解放运动所进行的拚命然而是无希望的抵抗，以及考察1834年以后的年代废除奴隶制的效果。

1831年，巴哈马有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九个黑人，以三比一的比例超过白种居民，等于其三倍，在这样的多数居民当中，二千九百九十一个人是自由人，比1789年仅有五百人的总数增长了五倍，但是，剩下来的九千二百六十八人，即几乎占整个群岛人口三分之二的人，则都是奴隶。从法律的眼光来看，奴隶仅仅是人，也可以说是能劳动的动产：是他们主人所占有的财富，如同其他任何财产一样，可供买卖或遗赠。在我们看来，他们好象曾被看作是有用的、相当值钱的牲畜。这个估价公平到什么程度呢？

188 绝大多数奴隶来自刚果以北的西非，但这个地区本身就比欧洲还要大，并具有更多的互相分离的民族和各不相同的语言，大多数黑人所居住的稠密森林对于交通来说是一个实际的障碍，他们生存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单位和部落单位之中。实际上，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是愚昧无知和原始野蛮，他们是比较发达的（因而也是更善于掠夺

的）民族侵扰的天然对象，后者如阿拉伯人、阿散蒂人和达荷美人，这些民族都学会了如何从一地区向另一地区迁徙的本领，而且比较起来是有良好的组织的。

曼丁哥人、弗拉尼人、豪萨人、伊博人、伊哲人、约鲁巴人和其他许多部落对非洲民族大迁徙不自觉地做了贡献，最盛时移民一年可能达到十五万人。不管怎么样，奴隶制度给这些非洲人带来了初步的统一。很快地，他们的种族本体趋于解体了；他们不清晰的语言面对着单一欧洲语言的整体而消亡；他们的风俗习惯面对着单一法律的整体而演变；他们的宗教在基督教的诱惑力或有组织的强制力面前，也很快地分崩瓦解了。在巴哈马群岛，今天没有任何姓名或者很少的风俗习惯可以实有其事地追溯到非洲，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在圣诞节或新年仍然伴随古姆贝鼓的敲打，举行着生动而兴奋的约翰·卡诺埃舞或叫琼卡努舞。用木料和羊皮制成的和古姆贝鼓相似的鼓，在牙买加叫做加姆比，在百慕大叫做戈姆贝。帕森斯的《安德罗斯岛民间故事集》（1911年）说明了迷信和离奇的民间传说在那个落后的

岛屿上一直流传到二十世纪，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说，暗地施行的原始非洲魔术欧比阿，尽管在牙买加仍存在着，却终于在巴哈马消失了。

虽然黑人向巴哈马的迁移——即便是时断时续的——一直持续到1834年或甚至迟到美国奴隶制的结束(1864年)，但是，今天许多巴哈马的有色人无疑是第一批永久移殖者所带到这些岛屿上来的奴隶的后裔。大约在1666年，当第一次大批移殖者到达新普罗维登斯之际，英属西非洲的奴隶贸易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六年之后，皇家
189 非洲公司开始了袭断经营，1713年与西班牙签定的英西条约① 所许诺的条件又把这种经营加强了。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第一个确切的移殖者名单，其编制时间初步断定是1671年，包括四百四十三个不具名的奴隶，占整个人口的40%。

把经常的航路这一因素也考虑在内，绝大多数巴哈马黑人很可能是来自西非更靠北的部分。人们可在那里见到褐色皮肤的曼丁哥人、弗拉尼人和豪萨人，和南方更为纯粹的黑人相比较，他

① 根据乌特勒支条约（1713年），英国第一次获得每年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送一定限额奴隶的权利。

们的头发比较更直而不卷，脸比较更长，鼻子比较更尖。牙买加的黑色“科罗曼庭人”和在海地发现的达荷美各部落人都是来自象牙海岸和几内亚湾。

驶向哈瓦那的奴隶船，常常首先停泊在巴哈马，这样就给予了巴哈马农场主优先买奴的好处，一经运到拿骚，奴隶就被标价拍卖，并且总是在文都商场出售。当然，奴隶主之间对奴隶匠人也进行经常性的交易。《巴哈马报》1785年10月1日刊登了一则出售奴隶的广告：

拍 卖

若干有用的年轻黑人

时间：下礼拜一，十二点

这几个奴隶中，有：

几名木匠、

一名桶匠、

几名家庭女仆——出色的厨子和洗衣工、

一名利落的年轻姑娘——可充当女侍、

几名青年——长于船活和捕鱼等等。

所有上述黑人均为确实无疑的合法财产，可运往美洲任何地方。连同拍卖证明书一并交付买主。

斯特林

麦肯齐

拿骚

1785年9月28日

丹尼尔·麦金农亲眼看见过1803年一次拍卖一大批奴隶的经过，他的描述改变了关于奴隶境况的极端见解。他报道说，拍卖“对于奴隶来说，是在比我原来预想的更有礼仪的情况下进行
190 的。大多数奴隶是分组拍卖的，每组有五至二十人；但有些青年男女是分别卖掉的。每个奴隶颈上挂着一个标签，写明卖主提出的标价，根据年龄、体力、性别等差别，价钱在二百至三百元之间波动。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船货总是由不同民族、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语言的奴隶所组成的。奴隶们普遍感到有些焦虑不安，以为他们是被运来喂养，以供宰杀，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消除他们的疑虑。有一次，在拍卖交易后的第二天，我有机会在慈善的主人们那里见到了被买来充当家仆的两三个奴隶，看来他们对仁慈的待遇及境遇的改变，都感到特别高兴，他们不是赤身裸体，而是穿着羊毛衣服，他们的伙食是他们从

未有过的上等伙食；他们在异常舒适的宅院里住宿，有些住宿的条件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在街道上，他们观察了许多和他们肤色一样的人，后者的外表、友谊和欢乐对他们有非常有力的影响，致使他们对生活的新境界深为满足并感到幸福。”

麦金农继续谈到，虽然有时奴隶们从非洲来到时情况很可怜，并受到监督人的虐待，但是一经考察了“黑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许多“西印度群岛的公正而开明的陌生者”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就经历了一次变化。麦金农很得意地做出结论：“当我们想到他们终身受奴役这一观念的时候，无论怎样出自正义之心而感到恐怖，我们却将记住，他们不是经常具有那种独立精神和情感上的尊严，而二者使上述的观念变为宽宏为怀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了。”

丹尼尔·麦金农还出色地描述了阿克林岛一个棉花种植场的耕种情况，他于三月间到了那里，正值棉桃绽裂，奴隶们忙于摘桃的时节。这种受到称赞的品种是从背风群岛的安圭拉岛传来的，据计算，这种棉花每六啷需要一个奴隶的劳

191 动，与此同时，一个奴隶则只能照顾四嗽来自佐治亚的那一种棉花。麦金农注意到，虽然男人是受着某些动机的刺激而劳动，而妇女们通常却是更加敏捷的，譬如，有一个出色的女奴，劳动时背着孩子，一天还摘了四十至五十磅棉花。

棉桃一经收集入仓，便将其放入“轧花机”里去，使纤维与棉子分离，这种简单机器——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这种机器对棉花工业是一次革命——主要包括两个平行安置的、向相反方向旋转的滚子，靠着这两个滚子来搅动纤维，以促使棉子脱落。拿骚的约瑟夫·伊夫发明过一种改进的普通轧花机，为此受到了立法机关的奖励。在没有流水的情况下，这种机器还可以借助风力而动作。

每嗽棉花的平均产量据说大约是一百一十二磅，主要是在3月份收获，夏天虽有第二次收获，但不很可靠。在个别种植场，每个在棉田劳动的奴隶可望收净棉一千五百磅，至于其他的种植场，如果每个奴隶可收上述数字的六分之一，那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很清楚，每个奴隶的生产能力和土质的肥沃程度是同样重要的，而且就是最天真的观察者也必然会看出，生产能力最强的奴隶就

是那些最心满意足的奴隶。

麦金农写道："巴哈马群岛的黑人一般说来比西印度南部各地的黑人显得更有精力，更勤于劳动。这也许可以归因于爽快的气候这一自然条件，但我相信，更主要的是由于奴隶们所处的环境。每天按体力给他们单个地分配农活；如果他们是特别勤奋，因而提前完成了任务，那么，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则归他们自己支配，从事娱乐或者干私事。主人自己也经常亲自监督奴隶工作，因此，这和一大群奴隶在代理人或监工的指挥下劳动的情况不一样，他们较少地受到皮鞭的管束。"

即使在植棉业尚未衰落之前，巴哈马庄园也很少是规模很大的。读者可不要想象广连天边的田野，数以百计的奴隶群，以及宏伟的种植场大 192
院。只有一小撮奴隶所有者占有超过百人的奴隶，他们的种植场房屋也不坚固牢靠，没有一所完整地保留到今天。

华特林岛的查尔斯·法夸尔森的种植场是一个典型的巴哈马种植场，他1831年和1832年的日记很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了。法夸尔森的庄园包括

两千嗽地，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已经被开垦过，其余绝大部分则是沼泽、丛林和顽石。从事劳动的奴隶总共有五十个，但其中干同样活的奴隶很少超过十二人。棉花仍是最重要的商品农作物，然而在这两年中只出口了十二包棉花。此外，外运销售的物产包括家畜、愈疮木、柑桔和一些燕麦。很明显，查尔斯·法夸尔森很难成为一个大富翁。

关于华特林岛庄园的最引人注意的事，就是它能做到自给自足，如法夸尔森的日记所提到的，那里从拿骚进口的商品只是面粉、甜酒、家具和布匹。主要农作物燕麦多半是用来喂养奴隶；其他几种食用农作物是豌豆、山芋、菜豆、甘兰和南瓜；为了制药之用也种植了蓖麻子、猫薄荷和鼠尾草。看来奴隶们很少尝到庄园里饲养的羊、猪、阉牛的肉食，但是日记上却提到了母鸡、火鸡和"大拖网捕骨鱼"。骡马是为了运输的目的而饲养的。

奴隶们所从事的劳动是数不胜数的。由于那里地力耗尽，经常用巴哈马特有的砍伐、堆积和烧毁丛林的方式，准备好新的耕地。耕种时使用

锄头，家畜厩肥也尽量地被利用。当作物开始生长时——如果开始生长——则要进行间苗和“补种”、锄草和修剪枝叶的工作。

由于有着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收获是个错综繁杂的、也是个几乎连续不断的过程。玉米棒要掰并剥皮，燕麦要收割并脱粒，豌豆要摘荚，棉花要摘桃，秣草要收打，山药和山芋要刨，猫薄荷要拔。其后，当这些收获物用马驼运或用奴隶背运完毕时，棉花又要轧弹、捆包，蓖麻子则要磨炼成油。当收获工作稍松下来时，男 193
奴又可能被派出去捕鱼或砍柴。

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一部分奴隶还要看管那些牧放在岛上的牲口，建造和修补篱笆围墙，以设法把它们圈住。其他奴隶专门从事筑路、编造茅屋顶和篱笆，或修建供奴隶居住的简陋木房。为了建筑比较耐久的房屋，一部分人从事采岩石、烧石灰、运沙子及备制灰泥等工作。少数奴隶是胜任的泥瓦工和木匠。偶尔机会，当船只进港或离开时，奴隶们还要把货物从几哩以外搬运到码头上去。打捞失事船这样令人兴奋而且有利可图的事情是罕见的。

关于奴隶的实际状况，我们必须从揣测中获得了解。尽管那时奴隶解放迫在眉睫，但法夸尔森的日记却未曾提到奴隶的骚动或闹事。虽然法夸尔森片面地控告几个奴隶装病逃避劳动，可是关于他们的过失或对他们的处罚，却没有充分的记载。奴隶们虽然在圣诞节有三天的例假，礼拜天也很少从事劳动，但仅就他们的礼拜和教育方面，也是只字没有提到的。查尔斯·法夸尔森被认为是一个称意的主人，大多数简单无知的奴隶不仅仅以在他的保护下混日子为满足。干旱、火灾、飓风和疾病大致都被看作比奴隶制度更可怕的灾难，但就连这些灾难，在这样朴实、自足的社会里，都是由人人全力共赴的。

废除奴隶制虽然是值得赞美的，可是事实上这个运动（正如已经暗示过的那样）不是从殖民地内部发动起来的，而是由外界强加于殖民地的。对白种人统治者来说，废除奴隶制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奴隶境遇的改善也将引起不满，而不会博得感戴。当然，国内当局不应干涉他们自己

确实不懂的事情。十个愤怒的奴隶主于1823年向
殖民地代办写信说：“用圣经的词句来说，他们
是我们的钱财。违反我们的意志而把钱财从我们
手中夺去……坦白地说，这不是别的，简直就是
抢劫……废奴主义者有这样一种说法：奴隶们象 194
驮兽一样成群地被鞭打着去劳动，在皮鞭下死守
着劳动的场所，然后又被驱赶回栏舍。我们庄严
地向你们宣布：他们这种令人厌恶的说法在本群
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任凭他们表示道义上的愤慨，并使用圣经的词句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然而废奴主义者的指责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这些奴隶主们正在采取着背后守卫的手法来掩饰真实情况。萨默塞特诉讼案（1772年）发生后，在英国废除了奴隶制，从此，在整个英帝国彻底废除奴隶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废奴主义者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根据1807年3月25日通过的一项法案结束在英帝国内部的奴隶贸易，这一法案又通过1811年法案得到补充和加强，后者判处从事奴隶贸易的人以流放罪，另有第三个法案，即1819年的法案，规定贩卖奴隶与

海盗行为同罪。这些法案对巴哈马的奴隶主们所造成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种植场的衰退意味着没有必要再不断输入新的奴隶。其实，在拿骚，奴隶的市价在1810年至1815年之间很显著地下降了，到1825年，据说奴隶的价格已跌落50%。由于解脱奴隶身分的自由黑人的来到，劳动力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些自由黑人是从被捕的奴隶船上截留下来的，在1807至1830年间总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人，依照1807年的法案，他们立约成为奴隶主的契约雇仆。

直到展开奴隶全部注册登记运动——废奴主义者的第二个战役——的时候，巴哈马的奴隶主们才开始与英国政府相抗衡。注册登记的主要意图是防止从某地区向另一地区非法贩运奴隶，既然一万个巴哈马奴隶分散在十六个岛屿长达六百哩的广阔地域之内，注册登记便被看作是一桩特殊的麻烦事了。和在百慕大一样，许多巴哈马奴隶被当作水手来使用，在登记明细表上，他们的身分是不清楚的。虽然根据枢密院敕令注册登记于1812年首先在特立尼达实行，并且在1815年也通过了布列颠条例，但是一直到了1822年，巴哈

马议会才通过一项注册条例，即使在那时，这项条例也未曾有效地加以施行。

在巴哈马群岛，注册登记运动的持久反对者是和“怀利事件”紧密相联的，而这个事件使已 195
存在于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裂痕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威廉·怀利，长期担任过这个殖民地的检察长，据传说，他早已转变为废奴主义者了。人所共知，他曾邀请威廉·道森到他在克利夫顿的种植场向奴隶们讲道，并且还与在伦敦新成立的遭人憎恨的非洲协会有通讯联系。最后，在1816年后期，他公开地向奴隶主的权威提出了挑战。1809年，一个名叫修的女奴从佐治亚被带到拿骚，1816年，她的主人来到拿骚，并带来一个叫桑迪的男奴，当他回佐治亚时，他打算把修和桑迪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全带回去。这一对奴隶逃走了，当他们被抓住时，检察长怀利下令：桑迪和小孩可以领回佐治亚，但修却得留下来。

议会决定查究检察长的行为，并召他出席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怀利拒不出席，因而以轻蔑议会的罪名，马上被逮捕入狱了。审判长于是从普通法院领取了一份人身保护状，使怀利获得释

放。议会谴责审判长，并请求总督卡梅伦撤换检察长，总督不但没有照办，反而下令解散了议会。

三天之后，即1817年1月31日，举行了一次公众大会，会上，议会的行动受到一致的支持，而总督遭受了谴责。议会被称为该群岛最高的法院，也是议会惯例及其特权的唯一解释者。整个1817年春夏两季，形势十分紧张，到9月份新的议会开会时，仍然没有什么好转。这届议会的组成和它的前届几乎一样，它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英国政府的责难。议会通过一项议案，取消了普通法院对怀利案件的裁决，但政务会否决了此项议案。注册登记议案起草完毕后，经议会三读通过，但采取那样一种形式，以致它必然得不到总督或政务会的承认。拨款议案直接了当地删掉了检察长
196 和普通法院法官们的薪金。总督在绝望中宣布议会休会，并立即前往伦敦与枢密院磋商。

代理总督不是别人，恰恰是议会曾攻击过的审判长芒宁斯，当他召集议会宣读摄政王手谕——支持普通法院的行动——的时候，议会的唯一反响就是命令检察长于1818年7月14日出席议

会作证。芒宁斯在议会厅谴责了议会成员，随后便再次解散了议会。

1819年3月进行调解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当时议会成员们被约充当陪审委员而进一步感到愤怒。一直到1820年，陆军少将刘易斯·格兰特前来就任总督，怀利事件才开始得到解决。由于议长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才把一项“和解法”通过了。该法案指出，无论是逮捕怀利还是普通法院释放他这两方面的举动，都不能被用来作为限定议会或普通法院的有关特权的判例。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拒绝发给检察长薪金，并确认它自己今后有权逮捕任何违犯特权的人，在这以后，议会虽然于1820年12月再一次被解散，但是危机总算是已经过去了。在后来的一期议会中，通过了一项切实可行的注册条例，根据这项条例，奴隶们在各岛之间可以进行有限度的移动。

但局势还不能使奴隶主们轻松。在注册登记的抗争中获得胜利之后，不倦的废奴主义者又把注意力转向奴隶境遇的“改善”方面去了。英国国会在1824年又通过了一项新的奴隶法典，仅仅拖延了两年之后，其大部分条款在巴哈马都变成了

法律。这次遇到的反对比较微弱，其原因之一，就是巴哈马群岛的状况已较其他殖民地良好了。人们同样地意识到，在地区这样分散的殖民地，这些条例也不可能很有效地加以实施。

包括1826至1829年间所通过的八项条例的修正法典，第一次详细规定了主人对奴隶所承担的义务。每个年满十岁的奴隶每周要领到一配克①玉米面，每年领到两身“合体、够穿的衣服”；成
197 年奴隶还可得到在房屋周围的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蔬菜。与他们的主人相反，奴隶不得种植棉花、饲养家畜、耙取海盐，但允许他们经营杂货之类的买卖，这样一来，少数奴隶就第一次开始使用货币了。

奴隶们依照习惯法的规定，可以占有资产，并且把它遗留给后人。他们仍然必须先得到主人的许诺，然后才可结婚，但到1827年以后，除了圣公会的牧师外，其他牧师也可以合法地为奴隶主持婚礼。在对奴隶移动实行限制之前，据说许多主人反对其奴隶结婚，他们认为，不受婚姻拖累

① 配克（Peck）：英国计量单位，一配克约合 1.09 公斤。——译者

的奴隶比较容易转卖。根据1826年法律的规定，使夫妻分离是犯法行为；对不满十四岁的孩子，不得从他们公认的父母身边领走。

虽然自由黑人于1807年已得到了选举权，但奴隶们当然还未曾被允许这样做。虽然在战争的压力下，自由有色人从1804年起就已经获准入伍，但是奴隶们却不得在民团中服役。

最能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关于准许奴隶们出庭作证问题。大多数白种人都深深地感到这样的危险：无论在刑事案件或民事诉讼方面，黑人将持不友好的态度或以伪证出庭作证指控他们。如果白种人因为自己的奴隶或不久前还是他们奴隶的黑人出庭作证，而使他们被骗走土地，甚至被送进监狱的话，那么，这该是多么邪恶不公啊！在1784年的法规中，有着一点稍为进步的规定，这就是准许奴隶们在刑事诉讼中出庭作证，指控原为奴隶、后被释放的人，在债务诉讼中指控一切债务人，但是这些奴隶却必须是基督教徒，并且具有宣誓的能力。

1822年、1824年和1829年的法案进一步巩固了上述的进展，到那个时期，奴隶被准许在几乎

所有的民事诉讼中出庭作证。但这一规定是附着那么多条件，以致使人们怀疑它是否生效过。土著非洲人和其他在殖民地居住未满五年的奴隶都被排除了。奴隶们必须证明自己是基督教徒，使牧师或法官确信他们能理解誓词，他们不能在诽
198 谤案件和关于处理奴隶所有权的诉讼中作证。似乎还不只如此，如果证明任何奴隶是歹徒，法院还可以否定他的作证。最后，对提供伪证的处罚被定为鞭打五十下和在皮肤上打一个“P”字烙印。

替奴隶制辩护所常用的理由之一，尤其为罗马天主教辩护者们所强调的，是它给了异教的非洲人以某种改信基督教的机会。除了少数可赞颂的例外——如威廉·怀利和华特林岛的威廉·奈恩，后者每早举行家奴参加的祷告——一般奴隶主迄今是不关心或者敌视他们奴隶的精神福利的。这可以说明非国教传教士为什么能获得巨大胜利，而许多奴隶主认为这些传教士是如此危险。1829年通过的法律陈明，“一切奴隶主或奴隶所有者……必须……在基督教信仰方面尽力指导他们的奴隶，必须尽力使他们适合于接受洗礼，并且，只要条件方便则必须使所有对上帝和

基督教教义有所感知的奴隶都接受洗礼”。无疑地，奴隶主们最喜欢引用的是圣经中的那一段话，其中讲到圣保罗宣布奴隶万西马斯已回到他主人菲力蒙的身边去了①。

从1800年始至全部奴隶的解放，释放奴隶逐步地变得容易了，并且自由黑人在人数上有了很大的增长。1784年以后，只要是奴隶主愿意，就可以释放奴隶；但由于要交付九十镑的释放金，就很少有奴隶主利用这种特权了。一直到1827年，改收一种有名无实的注册费，才把释放金取消了，但是到那时候，已经公认奴隶们自己可以与主人订立协议，以便赎回自由。很显然，许多不乏劳动力的比较贫穷的奴隶占有者利用了这个便利，经过封印、作证、登记等繁冗手续，签订了释放奴隶的证书。下面是这种释放奴隶证书的一个典型例子：

巴哈马群岛

兹立契约，诸君鉴察，今有立约人新普罗维登

① 圣经故事，大意是叙述奴隶万西马斯从他的主人菲力蒙身边逃走，逃往罗马，在那里他遇见圣徒圣保罗，后者向他布道，使其信奉基督教，然后把他送还给主人菲力蒙。——译者

斯岛乡绅乔治·布鲁克，在此申明确得本群岛合法之货币一百镑，系吾黑女奴名贝尔者以其个人名义
199 交付鄙人名下收执，已足数核收无讹，据此，鄙人业已释放上述名贝尔者女奴及其子女，令伊自由、除其约束。依此文书，鄙人正式宣布释放其身，令伊自由、除其约束及一应服役。

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云云

乔治·I·布鲁克（签字）

1823年1月3日

A·T·贝瑟尔写道，在注册档案里1819至1834年间共收存了五百份这类文件。

1805年的一项法律允许关于要求释放奴隶的诉讼提交普通法院审理，但一直到1824年，建立了由两个法官和五个陪审员组成的特别奴隶法庭，从那时起，任何奴隶方可不顾他们主人的意愿，而有效地申请自身的释放。奴隶为了要求赔偿损失，可以提出诉讼，但必须是单独地提出，并且赔偿从来就是有名无实的。奴隶也可以赎买或请求释放他们的妻室子女，但不满十四岁的孩子非经他们主人的许可是不能释放的。根据1824年的法律，年老体衰的奴隶不能获得释放，因为他

们将可能成为殖民地的负担。1827年，这项规定业经更改，允许他们获得自由，但原来的主人仍有义务供养他们，直到死亡为止。

在巴哈马群岛，奴隶逃亡事件是屡见不鲜的，但既然他们从不能跑远，因而通常是受到宽大处理的。私逃十天，逃出八哩远，被判为犯法行为，最多处以鞭打五十下。主人丢失了奴隶，通常是张贴启事，悬赏寻奴。下面是刊登在1786年1月份的《巴哈马报》上的一则启事：

寻　奴　启　事

10月12日逃走一个强壮的黑人汉子，名为杰克逊，年约三十，脸上有少许天花麻子，此人为本镇所熟知，与几个私逃黑人有联系，后者落脚于医院后边某处树丛之中。哪位向本启事者交来上述黑人，将得到奖赏西班牙银比索十二枚。

约翰·莫里斯

接着出版的几期报纸描写了这一小伙逃亡者在小 200
青山附近突然出现和被捕的经过，在一次扭打中，其中一个黑人被杀死。

与西印度奴隶境遇的普遍改善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奴隶反叛，这些反叛发生在巴巴多斯

(1816年)、德梅腊腊[1](1823年)和牙买加(1831年)。巴哈马奴隶主们常常是很机敏地指出，在这个群岛里从来没有过成功的奴隶暴动，他们把这件事很不合逻辑地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宽厚仁慈以及刑法的有效执行。每当人们提出变革的建议时，他们总是横加抵制，有证据说明，在奴隶解放时期以前，奴隶主们不断加强了普遍的严酷统治，以防止奴隶骚动的增长。最早控告奴隶所有者们残暴行为的起诉是在史密斯总督任内(1829至1831年)发生的，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普通法院否决了总督所提出的三个案例。

违命不轨的举动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依照1784年的法规，任何白种人均有权使奴隶缴出武器；如果奴隶袭击白种人，就要判处死刑；即使是口头上的辱骂，也要罚款十五镑，或者受到相应的肉体上的惩处。1827年间，这种惩处曾被限定为鞭打五十下，然而，就是在1830年以后，奴隶如果用危险武器袭击白种人，还要被判处死刑。

---

① 位于圭亚那东北部。——译者

1827年，切断手足以示惩罚，使用铁项圈、重物、铁链和皮鞭去促使奴隶们劳役等均被禁止，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被看作是剥夺主人的权力。鞭笞奴隶依然是对犯罪的一种普通惩罚。尽管在1824年有过这样的规定：一天之内对同一个奴隶最多只能打三十九皮鞭，并且非经主人许可，监狱看守或救贫院监督人不得鞭打奴隶，但是，奴隶所有者们却似乎仍然按照自己的判断使用其施加肉体惩罚之权。

在鞭笞女奴这个问题上，奴隶所有者们在议会里提出过最强烈的抗议，以反对改善奴隶状况的运动。1829年，约翰·卡迈克尔·史密斯被任命为总督，他是一位坚强的废奴主义者。虽然他曾祝贺议员们自从1826年以来通过那些宽大的有关管理奴隶的法案，但因为助理法官利斯和违警 201
罪法庭推事邓科姆下令鞭打一女奴，史密斯停止了他们的职务，因而激怒了议员们。但在这一点上，史密斯是遵照国务大臣发下的指令行事的。1831年议员约翰·怀尔德古斯曾下令鞭打他的禁闭在救贫院里的一个女奴，为了这件事，史密斯要求议会停止他的职务，当时也惹起了一场危

机。

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监狱和救贫院的情况，委员会报告说总督史密斯曾不断插手惩处案件，甚至还在法庭上干涉诉讼。议会以十三票对四票议决，申请钱多斯勋爵召回史密斯，这一行动受到当时的报纸《巴哈马观察报》的积极支持，大批人签了名，然后把请愿书呈送上去。

史密斯的反应是解散议会，以诽谤罪名对《巴哈马观察报》的编辑提出起诉，并向伦敦发送一札函件，为自己申辩。他在其中一份呈文中写道："阿巴科和其他地方许多不明真相的白种人签名请愿反对他，因为他们受着拿骚海湾路的商店老板们贿赂的影响。"

当1832年议会复会时，反对派甚至更加强大了，只有两名议员敢于支持史密斯总督。关于英国政府改善奴隶状况的全面计划的消息传到拿骚时，议会大发雷霆，颇有激起叛变之势。对总督咨文的反应粗鲁无礼，在议会史上已达到了极点，议员们通过了几项史密斯所不能签署的议案，于是再一次向伦敦申请召回史密斯，其结果是议会再度被宣布解散。

从那时开始直至他于1833年被召回伦敦为
止，史密斯在没有议会赞助的情况下继续在巴哈
马执政，尽管议会两次会期均未把拨款议案变成
法律。史密斯改组和加强了他的政务会，其办法
是对诸如审判长芒宁斯等人予以免职或不加理
睬，这些人与反对派随声附和，或者为着薪金而
依附于议会。史密斯依照邓莫尔勋爵所实行过的
办法，恢复了盐税和船舶的吨位税，并能够在 202
1832年年末宣布，所有殖民地官员的薪金将照发
无缺。

在鞭笞女奴这一比较微小的事件上，惹起了两次解散议会，奴隶所有者们损人利己，自食其果。在这一年半中间，议会没有开过会，巴哈马完全有效地被置于总督—政务会的统治之下，而英国政府也坚定不移地朝着彻底废除奴隶制方面前进。1833年8月1日奴隶解放法案被通过而成为法律了。当代理总督鲍尔弗重新召集议会的时候，展现在心怀不满的奴隶所有者面前的是既成的事实了。

203 第十八章　奴隶解放

1834—1840

奴隶解放法案定于1834年8月1日开始生效，但它并没有立即使黑人得到彻底的解放。首先规定要实行强制性的“见习”阶段，其内容与过去的契约劳工制度相似，仅仅是名称不同而已，这种制度直到1840年8月才最后加以废除。事实上，原先的奴隶于1838年8月1日就已充分自由了。

在理论上，英国政府也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解放法案首先要经过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批准。但是，各殖民地要从国会议决支付的两千万镑赔偿金这个可观的数目中分享一份，就必须靠着奴隶殖民地对法案的批准来确定，因此，这些奴隶殖民地都急忙接受了这个必然出现的事实。牙买加能够得到赔偿金的大部分，便于1833年12月成为第一个接受者；但是巴哈马也不

算太靠后。用来完成奴隶解放以及见习制度的巴哈马各项法案，早在1834年8月1日之前就已列在法令簿册之中了。

付给奴隶占有者的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是十分巧妙的。国会事务专员们先确定每个奴隶殖民地的出口总值，然后以该地的奴隶人数相除，这个比例代表了各殖民地所拥有奴隶的每人平均经济价值，各殖民地从赔偿金总额中所应分得的数目就是以这个比例推算出来的。

巴哈马在以往的三十余年中，出口额不断减少，这块殖民地在这次分配中便吃了亏。巴哈马有一万零八十六名奴隶，只获得了十二万八千二百九十六镑，每个人头平均约合十二镑十四先令六便士。在所有的十九个奴隶殖民地中，这个平
均数算是最低，尤其不如平均数为五十二镑的英 204
属圭亚那和平均数为五十镑的特立尼达，甚至比牙买加也不如，那里有三十一万一千名奴隶，平均数为二十镑。

在巴哈马，分配赔偿金是由当地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的。奴隶主须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然后把这些要求公开发表，以便解决关于所有权

的争议。1834年8月至12月期间，在《巴哈马观察报》上发表的十一份清单对这个行将结束的制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析材料。据以提出赔偿金要求的一万零一百一十名奴隶是属于至少九百四十六名奴隶主的财产，平均每个奴隶主占有十点七名奴隶。只有十一名奴隶主拥有百名以上的奴隶，其中约翰·罗尔勋爵单独地占有三百七十六名，比其他十个奴隶主中任何人都几乎多出一倍。

家用奴隶和工匠奴隶的估价比外围小岛的劳工要高。为每一奴隶所付的最高价款为三十二镑。“低等的农田劳工”，或称耕奴，是按每人十九镑的价钱付给。不满工龄的童奴和病弱奴隶的付金便有名无实了。因为赔偿金的大部分为商业债主或抵押债主所侵吞，所以在面临破产的惨局中得以解救的奴隶主为数极少，尤其居于外围小岛的奴隶主前景更不妙。

代理总督鲍尔弗在向1833年再次召集的议会宣布解放法案时，解释道：这个法案是帝国政府在英国舆论压力下制定的。这种坦率的声明未能使愤怒的拿骚人冷静下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

十六项布告中就有十五项被撕毁了。赔偿金和实行见习制度问题曾引起了一片纷乱，人们担忧随时会发生奴隶暴乱。在埃克苏马群岛和特克斯群岛，不断发生惊扰，武装部队已调遣到那些地区，因而使拿骚的防卫大为削弱，形势显得危急。尽管如此，奴隶的实际解放以及向见习制度的过渡总算平稳地实现了，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看来，被解放的奴隶们并不显得兴高采烈，疑虑不安大致是其普遍的心情。

1834年的各项法案规定，原先的奴隶分为两
大类：一为“耕奴”，一为“非耕奴”。耕奴的 205
见习期定为六年，非耕奴则为四年。实际上，四年以后所有原先的奴隶都摆脱了约束。非经执政官允许，不得将耕奴调离农田；但不满十二岁的儿童不得视为耕奴。

雇主们仍有责任维持原来奴隶的生活，可是通过协议可用良田来抵偿衣食。对患病者及年老者的抚养也是原先的主人的责任。至少在理论上，所有原先的奴隶，除了必须遵守见习制度外，均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然而，在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如史密斯所称的“西印度群岛最

专横的关于流浪罪的法律①”。此法律于1835年业经修订，其中规定：禁止“无特别合法宗旨的”集会，禁止“在酒巴间闲混、酗酒……高声唱歌、吹口哨，在公路上或其近处放风筝，在市场上大声叫嚷招徕顾客”。最大限度的处罚为拘留五天。雇主对劳工采用的体罚仍在法律中予以保留，但必须首先得到执政官的允许方可实行，事实上并没有保持下去。逃亡者必须强制归还雇主，未经许可的外出达七个半小时就构成了犯罪行为。

新法制最优良、最持久的一个特点是有关原先主奴之间订立合同的规定。这些强制性的条文在条件方面往往是宽大的，在劳动定额的分派上尤其是如此，因而，到1838年以后，许多黑人还是甘愿继续照办。合同期限不能超过一年，需有两人适当地作证，双方都必须理解其全部条文。每个种植场须将所签订的合同记录成册，以备特派

①英国在十六、七世纪对流浪罪的法律规定，除年老或无劳动能力者外，一律不准流浪和乞讨。违法者受鞭笞和监禁，或卖与私人为奴。为奴者服苦役，任凭主人体罚及支配，若逃跑被捉回，则处以严刑。——译者

官员前来检查。合同规定的最大工作量为每周四十五小时，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日出到日落，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与星期日则完全由黑人自行支配。

见习制度规定的条款要由伦敦委任的特派官员负责执行，黑人的权利也要受着他们的保护。他们就是现代的两位受俸的巡回执政官的前身，今天的这两位官员则在各外围小岛的事务官协助下负责当地的法律事务。1834年，委任了三名特派执政官，分别驻在新普罗维登斯岛、埃留特 206
拉岛和特克斯群岛，但是，他们对于必要的巡视和种种事务应付不过来，地方上的治安推事还要协助他们工作，而大多数地方推事本人就是原先奴隶的雇主。1835年，代理总督科尔布鲁克宣称这个体制不公正，于是迫令十八名地方推事辞职。他依照巡回体制改革了普通法院，并要求增加特派执政官。到1838年，特派执政官增至六名，新体制效果良好。

在牙买加及其他诸岛发现救贫院和监狱条件极为恶劣，这就促使见习制度提前结束。在巴哈马，情况还不致如此，那里反省院里的人数不

足，判刑率不断地下降。以实行见习制度的最后一个月——1838年7月为例，特派执政官温德尔报告说，在新普罗维登斯没有发生过任何诉讼事件。

1838年7月，议会请求科伯恩总督继续推行见习制度，直至期满；然而，这个制度的提前终止也未必会使许多种植场主蒙受额外损失。这种改变还是平平静静地为大家所接受，其原因是，在这个群岛上廉价的劳动力还不感到缺乏。大部分外围小岛的种植场都解散了，黑人有的成为独立的农民，也就是擅自定居于公地的人，有的成为愿意签订合同从事任何工作的后备劳工。例如，早在1838年，第一批在巴哈马以外寻找工作的合同劳工就投奔到德梅腊腊。这场劳动力的竞争大有利于雇主，但却给雇工带来了困难；又因为黑人不断流入，从而加剧了这场竞争，这类新来的黑人是在1830至1840年间从非法贩运奴隶的商船上获得、而后被安置在巴哈马群岛上的。

英国在1807年废止奴隶买卖之后，皇家海军保持着一支特种舰队，以遏制这类贸易。从1830年起，凡在公海上截获的奴隶，一律给予绝对自

由。1832年9月，第一批这样的船货运到拿骚，当局把三百七十名黑人安置在海博恩礁、五百一十四名安置在离拿骚六哩的卡迈克尔、一百三十四名安置在位于新普罗维登斯西南的阿德莱德。1833年，发生了严重干旱，在海博恩礁的黑人被遣送到新普罗维登斯，并在赫德夸特斯定居下 207
来，此地恰与拿骚“一丘之隔”，即今天的格兰特城所在地。

1833至1838年间，至少又有装在六艘船只的被释放的奴隶运送到拿骚。例如1836年3月，“维吉伦特号”载有二百三十名患病的奴隶抵达这里，仅仅一个月后，接着有一艘“克雷奥尔号”又运来三百一十四名黑人。1837年11月，一艘捕获的奴隶船在哈伯岛外遇险，仅有少数黑人得救。1838年春，有不下一千零四十三名黑人陆续运至，几乎每人都处于悲惨的境况。

被释放的黑人得到休息、营养以及一切可能的医疗，这些费用全部由英国政府担负，随后，便在各个新的居留地范围内被配给了小片土地。卡迈克尔和阿德莱德从不为人们所向往，那里的就业机会极其缺乏，可是，赫德夸特斯却兴旺起来

了。那里，排干沼泽地，辟建花园和修筑街道，在很短时期内，居留地现出了秀丽的土著村落风光。更多的居留地正在贝里群岛的威廉斯顿和维多利亚，卡特岛的本内特港，长岛的拜特一格雷特港，以及在腊姆岛和拉吉德群岛上开发出来。

1840年后，非洲移民象细流般不断地进入巴哈马，他们原来都是由英国船只载运驶往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最后一次经过记载的捕获是在1860年，但是英国军舰对奴隶贩子进行的警戒巡逻始终没有间断，直到1888年在巴西废止了奴隶制时为止。

除去希腊人、中国人、英属西印度人和美国人是重要的少数民族之外，巴哈马这个民族熔锅到1860年已经具备了巴哈马民族的主要成分。从那以后，就渐渐而又几乎不易觉察地经历着一个黑白人种的混合过程，因而，不出一百年，只有很少的家庭能够自称是“纯白种人”或者“纯黑种人”了。这使得任何种族歧视的想法显得那么荒诞，正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访问者所感受

的那样：

上帝普祐白人，
　——尔且聆听；
恩泽也施黑人，
　又有何妨！
黑白如何识别？
　——主祐众生！
　我实无能辨分。

除了必然的阶级划分之外，把现今居住在巴 208
哈马的人分成“巴哈马人”或“非巴哈马人”，是唯一恰当的分类。属于后者的一个人可能会重述麦金农在1803年写的一段话：“……假如以肤浅的印象根据当地人现在和过去的性格来判断的话，我几乎一定会把某种共同点归因于气候的调和作用。因为我确实在一些突出的事例中观察了那种温和、仁慈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古代卢卡伊人的表现颇为一致。他们那端正的五官也并非不能在现代一些人的面庞上体察出来。恐怕很少的国度能象这儿及其毗邻的某些大陆地区那样对女性美貌如此有利。在别处，我还没有发现过比他们更加优美而同时又充满着活泼的表情。”

如果说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巴哈马黑人的确表现出一些卢卡伊人懒散怠惰、无忧无虑的天性，这些特质对他们却是十分可贵的。毫无疑问，在十九世纪一般自由黑人的命运比之奴隶制后期一般黑奴的命运更不如。事物的逻辑是无情的。奴隶制的废止意味着种植场制度的最后崩溃；种植场经济的结束又意味着普遍的贫困和生活无靠，受害最深的就是原先的奴隶。即使不存在歧视，巴哈马黑人的命运也必定是可悲的，因为穷人总是得不到任何特权的保护。

对于黑人，没有什么领薪的职业可寻，从事赖以生存的农业活是唯一的出路。土地占有制度极为混乱。主人理应把优良土地配给他们原先的奴隶，许多人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所占有的土地也很无保障。由于大片的土地是那样贫瘠或已经耕种过度，他们总是习惯于开垦无主荒地，对这种土地他们没有什么占有权。再则，在现金十分缺乏的殖民地，最普通的方法是通过代役租来保留土地。大量的土地按理都是付给一种名义的代役租而向国王租借的，租金往往低到一畷地每年一便士。事实上，

这些租金经常不付；不付租金则土地应该仍归国王所有，当然不会赠送给原先的奴隶们。

1831年，代役租欠额高达五千镑，虽然1833 209
年宣布了一次豁免，但到了1835年，据估计，有十万噉土地由于欠租未付，按照国王“改换交租办法”处理。1845年，八百镑一年的代役租到期，只有其四分之一左右如期收齐。1846年，议会付清了三千镑拖欠的代役租，从而使许多土地转让的疑案合法化，这对大部分小土地所有者是一种恩赐。无论怎样，这只是土地的绝对自由占有制的一个拙劣的代替办法。豁免债款总不如根除欠债的起因有价值。

解决土地占有权这个棘手问题的权柄显然是握在国王手中。依照官方的深谋远虑和宽大策略，一个稳固的小农阶级应当已经形成。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外围小岛的居民始终在饥饿的边缘上过着可怜的生活。王室在保守势力的阻挠下，对于土地的分配是十分吝啬的。被解放了的黑人在他们新奇的地位中既未得到什么物质利益，也极少受到训导。1846年的蓝皮书埋怨地写道：“整个群岛上几乎没有一犁一镰。巴哈马农

夫虽然种植、但不管理他们所需要的作物。不灌溉、不施肥、也不整理土地，作物轮种，尚无所闻。”

此外，英国政府热衷于最早为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所提出的政策，这就是国王土地只能让那些付得起“足够代价”的人去开发利用，不得无偿赠与。即使到现在，国王土地也只限于授给有能力开拓的人。

注册法案于1834年重新颁布后，人们获得确实的土地权便非常不容易了。除了把居留地的一些小片土地划分给从奴隶商船上截获的黑人耕种以外，国王再也没有免费分配过任何土地。1836年，格莱内尔格勋爵下令规定，国王土地每噷售价不得少于一镑。1839年，一项公告又规定，四十噷作为可以公开出售的最小单位面积；尽管后来拉塞尔勋爵于1840年允许小至二十噷的土地按每噷十二先令的价格出售，但对于绝大多数原先的奴隶说来，这个条件仍是过分苛刻的。

210 1838年后，相当数量的新兴小土地所有者成为公地占有者。到现在，一些土地所有权仍是根据1847年的英国法律而取得的，这项法律允许凡

在任何一块土地已耕种六十年而未遇到异议的人都享有所有权。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表明了由于岛屿极为分散、耕作方法变化无常以及法律程序错综复杂，因而国王对此不感到什么兴趣。虽然如此,公地占有者却是不可能安然无事。迟至1923年，还有一位过分热心的王室地产处官员能够依据法律剥夺了许多埃克苏马穷苦农民的土地权；在1962年的鲍氏案件中，另有二十八户埃克苏马人因与其土地所有者分享收成而被否定了公地占有权。

在对原先的奴隶分配土地的阴郁景象中也出现了几个光明的例外，其中一例就是，位于新普罗维登斯东部的桑迪兰兹庄园于1838年被慷慨地分配给了解放的黑人。今天，坐落在新普罗维登斯东部中心的狐狸山这锦绣如画的村庄不禁令人回想起废奴主义者所摹想的村落典型。在外围小岛上，与此相反的光景比比皆是。但是，在埃克苏马，罗尔勋爵把他广阔的土地全部立契出让给他的奴隶们及其子孙，成为他们的共有田。只有这个事实，而不是领主权利的狂妄运用，才能解释为什么埃克苏马将近半数居民都自豪地取用了

他们恩主的姓氏。在罗尔维尔、罗尔城、汤普森山及拉姆齐居住的人们，虽然还很穷困，但有着足够耕种的田地。大多数岛屿上都有其共有田，特克斯群岛也有六千畝以上的公用土地，那是1840年花了一千美元从国王手中购得的。

可能在教育方面，黑人最受忽视。好嘲笑的人们一定会观察到，保持黑人愚昧无知对占支配地位的白种人是有利的。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是事先筹划的策略，不如说是下列诸因素的综合结果：无人关心，贫困不堪以及各教会之间就民众教育由谁控制、甚至权利分享问题喋喋不休的争吵等。

民众教育的倡导者是1800年后的卫理公会
211 传教士们。虽然史密斯总督在卡迈克尔和阿德莱德的新辟居留地建立了几所学校，但是直到1835年，帝国政府才赐予二万五千镑用于殖民地教育，使教育事业有了真正的开端。就在那一年，组成了以总督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指派了各地的地方委员，又提出了创办一所师范学校的倡议。

教育委员会后来竟成了教派争论的焦点，成

了当时开始分裂殖民地的宗教纠纷的小场所。起初，英国国教的势力最为强大。“英国国教不列颠与海外教育协会”对殖民地发生兴趣，制定了规划，准备与英国国教所创设的机构之一伦敦皇家学院建立联系。在学校中，实行“马德拉斯”体制，其内容包括礼拜仪式、教义问答摘要以及鼓励学生到国教教堂做礼拜。

1839年，委员会经过改组，成了各教派势力的混合体，既有英国国教、长老会的牧师，也有威斯莱教派、浸礼会的上层会众。这样只能使教派的争吵更加激化了。于是，1841年颁布的教育法案规定：任何牧师不得充任教育委员会成员；如果父母表示反对，也不得强令其儿童学习教义问答。这些措施使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但是，到了1844年，与在各学校设学监一职的同时，又在教育委员会增派了副监督，旧的疮疤从而重新揭开了。1847年，委员会重新改由凡俗的成员组成；1864年的一项法案又规定：委员会的成员应是总督和五名立法机构的成员。无论如何，关于控制权问题仍然引起争吵，虽然于1869年废止了英国国教制，但争吵始终没有平息。

在此期间，教育状况的改进极为缓慢。1847年，罗克桑德的一位校长陈述道，尽管新朴次茅斯的居民既健康又伶俐，但是二十人中大约仅有一人能够读和写。这个校长在唯一可用的房子里办学，那是从威斯莱教徒们手中租来的宽十八呎长二十一呎的一个简陋屋子，有八十五名儿童挤在里面，他们只占渴望求学儿童的一半。屋顶裂
212 了缝，但是威斯莱教徒和教育委员会都无力修缮，学校也根本没有教学设备。

到了1859年，私办的公学达到二十六所，但只有三十九名教师。1864年，在三万六千人的总人口中，公立小学学生为数达一千五百七十名。公立小学教师的全部薪金一年总计为一千九百二十镑。教育委员会无可奈何地依仗着“互教法”来进行教学，这就是由高年级的学生教授比他们年级低的学生。虽然这一方法因其效能低而于1840年在英国被废除了，可是它在巴哈马迄今还实行着。

1877年通过了一项义务教育法案，但起先只限于新普罗维登斯一地。1889年，这个法案被认为可推广到外围小岛，1897年正式地规定离校的

年龄为十四岁。但是，早在五年以前，为私办的公学募集教育经费的计划就已中止了。

几十年间，民众中识字的人数不断地增多，到了1953年，已达到了占人口比例89%的令人满意的水准。可是，在十九世纪，英国政府仍无筹办中等教育的意图。虽有几次比较良好的开端，但结果连一所长久性的师范学校也没有建立起来。有一所官办的中学直到1925年刚刚建立，其校舍设备于1960年才算完善。1957年，小学生与中学生的比例为六十七比一，较之包括海地在内的加勒比海任何地区都超出了两倍。

由于贫困和忽视，教育规模从来也赶不上人口的增殖。甚至到1961年1月，一位新闻记者还报道过一所小学情况，那里的二百五十名儿童挤在一间五十平方呎年久失修的屋子里上课，缺乏书籍和教材，其卫生设备还不如中世纪的监狱。他认为，在巴哈马的七百七十名“教师”中，有六百二十八名是完全未受过训练的。

奴隶解放以来的一百二十四年间，教育事业那么微小的改进，对于巴哈马在那个时期的统治阶层来说，恐怕就是最严厉的诉状。白种人对黑

人所实行的压制，其程度之深更难于估计。在某
212 些地区可能有些夸张，但仍然不失其真实性，甚至近在1962年，很深的怨忿还存在着。

很长时间以后，解放的黑人才得充当陪审员，因为很高的资格限制把穷人有效地排除在外了。为了取得大陪审团的席位，一人须具有一千镑财产，甚至作为小陪审团成员也要持有一百镑财产。值得注意的是，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在1834年黑人解放的几周内就已草就了。此项名单表明，在基督堂教区只有一百零八人具有充当陪审员的资格，在圣马修教区则有一百一十七人。在这二百三十五人中，又只有六十一人符合于大陪审团的资格。

就司法事务本身而言，由伦敦派来的热心的法官们往往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与拿骚的成规发生抵触。前任的受俸巡回执政官波尔斯在他所撰的动人心弦的《粉红色的珍珠之国》(1888年)一书中，描绘了由他自己所引起的一场巨大风波。1887年2月，他判处了白种人詹姆斯·莱特伯恩一个月的徒刑，因为他殴打了一个有色的仆人。这类事例过去从来没发生过，因此种族情绪激昂，势

将酿成一场骚乱。

他写道："当然，黑人高兴了，到处喊着：正义终究从英国来到了。同时，当地的白种人拿起了武器。他们的一些言谈话语——是天真，还是无耻，我实在难说——确实使人吃惊。

"在我正要离开法庭时，一位有名望的白种公民向我跑来，他问我：'莱特伯恩该是放走了吧？'我说：'不，没走。我判他一月徒刑，他已向审判长提出申诉，现在保释出狱了。'

"他又问：'他的申诉会不会提到陪审团？'我给以否定的答复。

"他说：'可惜，可惜！要是到了陪审团，我们就能保管他没事。'"

1887年5月3日，审判长撤消了波尔斯的判决，甚至不要求罚款就把莱特伯恩释放了。在判决书中，他竟然这样写道："指控象莱特伯恩这样一位可尊敬的人，无论有多少黑人出庭作证，波尔斯都不应该相信。"

莱特伯恩案件的结局，使波尔斯在统治阶层 214
中弄得名声扫地，但在黑人中却得到了民众的拥护。议会否决了他所申请的某些津贴，布莱克总

督则要求他离职，理由是，他“挑起了一场种族纠纷”，因而使他“在殖民地的作用已到了尽头”。

有必要公正地提一下，波尔斯是一个直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他自己承认，许多事情由于他的不慎使已经显得微妙的处境更加尴尬。他是一家黑人激进报刊《公民报》的热情支持者，并且在许多场合人们听他说过，他“不会相信卫理公会教徒的发誓”。既然莱特伯恩及大部分议员都是保守派刊物《拿骚卫报》的捐助人，又是卫理公会的教徒，因而，他们之间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了。随着波尔斯的离职，激烈的情绪看来也几乎消失了。在二十世纪，司法方面一直是公正不偏的模范。值得指出的是，在巴哈马，私处死刑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选举权方面，是贫困而不是公开的种族歧视，使巴哈马黑人得不到投票的机会。况且，同其他英属西印度殖民地相比较，巴哈马的状况还不算那么不公平。例如，1855年，圣基茨人口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一人，其中有投票权者一百六十六人。在1854年度的选举中，有选举权者四十

七人，二十二人当选。在1863年的牙买加选举中，人口为四十五万，其中投票者一千四百八十二人。在所有其他英属西印度殖民地，除了百慕大、巴巴多斯两地之外，那些年来，代议制政体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趋于衰微。从1866年的牙买加起，到1898年的安提瓜和多米尼加，这些群岛相继变成了"直辖殖民地"，也就是说，采用了完全由指派成员组成的议会一院制了。此后，牙买加直到1884年，特立尼达直到1924年，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体才重新恢复起来。在这整个时期，巴哈马却保持着自己原来的议会，这对巴哈马人来说，虽然不感到惊讶，也应该引以自豪。巴哈马的议会是保守的，但是却连续不断地活跃着；它通过行政会的渠道，并借助于日益频繁地使用议会的特权以及委员会制度，从而实际上不断地增强了自己的权力。

1864年，巴哈马有五千九百四十九名注册的 215
选举者，占全人口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七人的16.9%。这个比例构成了在二十八个席位中平均每二百一十四名投票者占有一席；与全人口相比，则平均每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占有一席。如果能知

道选举名单中白种人与黑人的比例数，当然是有益的，但是这不可能做到，因为巴哈马的人口调查统计表一向不包括注册的选举者这一项，再则，继1826年一次人口调查之后，直到1943年才作了另一次种族分析的调查。

不过可以肯定，1806年选举法案所规定的较高的财产资格——此法案直到1886年才废止——保证了巴哈马白种人在投票名单中的比例远远超过其按人数所应占的数字。重要的是，大多数选举人最密集的选区都是白种居民比例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在哈伯岛，人口共一千九百九十四人，由三名议员代表，参加投票者占人口的22.1%；但是，在邻近的埃留特拉也有三名议员，代表着五千二百零九人，投票者只占人口的9.3%。由于各个选区的大小不一，不公平的情况更加突出。1864年，居住在新普罗维登斯的居民还不到全巴哈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到十九世纪末期，此区的人口却几乎占了整个群岛的半数。尽管发生了这样情况，大部分比较富裕和有文化的黑人所居住的新普罗维登斯，却一直只允许选举八名议员。黑人解放以来，外围小岛的二十或

二十一名议员中仅有少数居住在他们的选区，回顾一下这种情况，就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在二十世纪，只有两名议员曾在外围小岛住过。最后一位是（安德罗斯岛）伊齐基尔·贝恩，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任议员一年。

外围小岛的纯朴居民很容易受到来自拿骚的狡猾访客的愚弄，这些人许了好多愿，收买他们而捞取选票。正如经济落后使他们长期贫困一样，缺乏教育使这些穷人无知。L·D·波尔斯在1888年写道："这种弄虚作假的代议制，是世界上最大的滑稽剧。在少许财产资格的限制下，有色人虽然也得到了选举权，但是，他们对于怎样行使这种权利，却是一无所知。选举是采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但是，行贿、贪污、威胁等手段恰恰就在主持选举的官员们面前厚颜无耻地进行着。司空见惯，没有人感到不正常；因为这些有色人还没有学会运用政治组织的艺术，他们也 216
就无能为力来保护自己。其结果，议会差不多等于拿骚白种人的一个家族聚会，他们之间几乎都有亲属关系。法律简直就是为着这个家族利益而制定的；另一方面，有色人却遭受了蹂躏和压

制，其所达到的程度是对英国国旗的一种耻辱。”

这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官员的极端见解。波尔斯又曾在其他地方不得不记述道：巴哈马的黑人，假若不是实际上在忍饥挨饿的话，便可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的指责的确含有真情的实质。朴素而无奢望的黑人由那些至多不过持着温情主义态度的人们代表着，或者说是统治着。整个十九世纪，议会的权力在不断地增长着，如果有些变化，那无非是更加专横而已。有色人要进入那个独揽拿骚贸易的小圈子是困难的；一个穷人要想持有自己独立的政见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巴哈马，少数人的统治已是根深蒂固了。白种巴哈马商人的统治地位很可能是由他们自己的优越感来维持着，然而，这种优越感是一种愚蠢的神话，特别是当它靠着强制的不平等来保持的时候。毫无疑问，巴哈马黑人多少年来得不到平等的机会。近在1885年间，在哈伯岛还有五个黑人因为大声吵架而被判了罪，并且，仅仅因为通过只许白人走的大门进入卫理公会教堂而每人被罚款二十先令。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仍有些俱乐部和教堂禁止黑人参加，有些学校不愿招

收黑人子弟，有些大楼，除非是作为仆人，也不许黑人入内。到1956年才通过了一项反对这类歧视的法律；甚至今日，形势还不是那么和谐。还没有一届议会能够制定出反对种族偏见的法律。

废奴主义者既不愿看到西印度群岛在经济上对奴隶制的需要，也不愿看到任何温情主义的优越性，而他们妄自幻想，以为1838年8月奴隶彻底解放既已告成，自己的长期斗争就随之结束，任务也就完成了。但就巴哈马和其他奴隶殖民地而言，黑人的彻底解放问题只不过是呈露端倪而已。

217 第十九章　美国南北战争

1840—1865

十九世纪，巴哈马历史的基调是希望落空而不是逆来顺受。这块殖民地虽然总算躲避了灾难的结局，但却摇摆于渺茫的希望与阴暗的失望之间。当英国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时，这块在它得心应手的统治下的帝国的小小断片，正象一个挣扎于泥潭里的人，越来越被人们忘掉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很大的希望曾寄托于产盐业，结果只是一场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偷越封锁线的走私活动演奏了一段华美而短促的繁荣插曲。晚近的工业以及菠萝、海绵、西沙尔麻等的生产展示出富裕的前景，但是这些仅仅是转眼即逝的、玄虚的闪光而已。只是刚刚兴办的游览业，还使人感到有发展前途；可是二十世纪将出现什么奇迹，还是不可预测的。活着的人深深

地记得：当年的拿骚是个穷苦地方，尚未被现代进步潮流所触动；外围小岛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原始的贫困的遗迹。

奴隶实际解放的阶段是在沮丧与怀疑的平静中度过了。但是，这场无情的运动和它的不愉快的结局在一部分居民中引起了愤懑的余波，从此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所有行动都不愿信赖。黑人解放后，在1839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议会上，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尖锐地、相等地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科伯恩总督；另一派跟政府对立。

为了对政府支持派表示奖励及便于咨询，科伯恩建议把总督的政务会分立。这个建议于1841年付诸实施，根据这项法案，行政会与立法会分 218
别成立，各由总督提名的九人组成，此外，殖民地秘书、检察长、总收税官为行政会的当然成员。两会开会时，法定人数为三人；议会的议员可以参加行政会，但不得参加立法会。

总督的意图是要在立法机构中增加行政机构的权力。准许议会的议员参与总督的上述两会，实际上却是增强了议会在行政机构里的影响。只有靠着总督小心谨慎地行使其对两会提名的权

力，一个不很稳定的均势才能保持得住。这种组织两会的方式在巴哈马一直沿用到今天，但在整个英帝国却是独一无二的。在议会中，几乎总存在着一股支持政府的势力，派系斗争因而一定要增多，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又有一项异乎寻常的条款规定：殖民地秘书、检察长、总收税官可以做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这样就使派系斗争更加剧烈了。

经济萧条及其造成的暗影和冷落局面有效地使相互倾轧的怒气缓和下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正是忧闷而悲观的岁月。马修在1848年接任了科伯恩的总督职务，在马修总督任内，议会度过了整整七年的任期，这在十九世纪还是第一次。由于销路不畅，或是意见不一，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善于开展争论的《巴哈马观察报》消失，而被温和而亲政府的《拿骚卫报》所取代，该报在巴哈马现今发行的三家报纸中是最老的。

《拿骚卫报》的创始者是一个伦敦人，名叫埃德温·查尔斯·莫斯利，他于1838年作为一名助手随《巴哈马观察报》编辑从英国到来，因不

同意该报宗旨，很快就辞职了。他充当一段无甚获益的教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报界，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莫斯利曾在伦敦《泰晤士报》及《约克郡邮报》当过学徒，因此能够使《拿骚卫报》比以前的各报办得更加充实、生动。在这份双周刊上，枯燥无味的新闻报道通过文艺短文、诗歌、甚至谱曲的歌词等被润饰起来了。然而，要不是在1845年政府当局许以签订合同承印官方印刷品的良机，恐怕《拿骚卫报》也不能渡过经济萧条 219
的难关。有了这样的倚靠，此报在一家人相继充任编辑的情况下，能够比其他十几家报纸办得都持久。此报编辑自其创始者(1844—1885年)起，经过他的两个儿子P·J·莫斯利和A·E·莫斯利(1885—1904年)，传至他的见到此报百年纪念的孙女、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玛丽·莫斯利小姐。莫斯利小姐于1948年退休，尔后，《拿骚卫报》变为议会多数党的机关报，该党就是以后的巴哈马联合党。

如果利用按期收藏的《拿骚卫报》和该报刊印的官方文件：议会决议、各种法律和议事章程、预算和决算、人口调查报表、各委员会及各

部门的工作报告、行政事务表报以及蓝皮书等等，就可以编写出一部1844年以后完整的巴哈马历史。可是，这项研究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并需要一位教授及一大帮研究助手。一般的历史学家只能尽量从表面上浏览，否则，就要被淹没在浩瀚的故纸堆中。

莫斯利小姐在1944年11月23日百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文章，出色地概述了在她的家族报纸上所刊载过的千百桩事件，并附有一张引人入胜的1844年拿骚的图景。当年的拿骚是个无声无息的城镇，居民人口大约七千，大部分都分散地住在北山坡上，居住区还未延伸到西大街以西，向东不逾越圣马修教堂。当地老百姓全是“具有航海习气的游手好闲者”。街上还看不到马车，诚然，为数不多的来访者可以一天花四到六先令租一匹马来骑。那里有四家小公寓，最兴隆的一家是“弗伦奇记”，膳宿费一天八先令四便士，“酒资在外”。这家大产业坐落在西山街的“政府大厦附近”，店主为了保持收支平衡，还得靠销售鲜牛奶，因此，在院子里养了几头牲口。

做礼拜的地方倒不缺少。圣公会除了有两

座教堂外，还有四座小教堂。圣安德鲁长老会
礼拜堂、两座卫理公会小教堂和两座浸礼会小教
堂在几年前先后建成。有许多家酒馆，也有一所
好监狱，就是没有民众集会大厅，也没有银行。
没有银行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全部流通货币是二 220
万一千零六十九镑十一先令八便士，其中只有五
十镑金币。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金币还可以自由使
用。

贸易萧条不振。菠萝是出口商品之一，于1844年第一次在伦敦大菜市上出现。其他出口商品从葛根粉、皮张、角制品、帽子直到手推车等，都属于有趣的货色之列。但这些商品的价值总额仅达七万三千五百三十三镑，所以还是无足轻重的。进口额却超过一倍，达到十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一镑。殖民地的全年税收为二万五千五百零七镑，比之英国政府用于守备部队的开支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五镑要少得多。当地政府的开支总数为二万三千六百五十镑。

马修总督在呈交伦敦的公函中报告说：“法令全书只适用于十八世纪；加于外来人的人头税阻碍了贸易；拿骚的贫民院是唯一的公益机构；

民团则名存实亡。”马修在公开演讲中，一再号召厉行节约。在他短短的任期内，不仅能使微小的预算保持平衡，而且也使公债额降低了，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此外，他兴建了一所医院和一处药房，开设了一条群岛间的船舶航线，扩建了公共图书馆，并使民政机关和民团建立在有效的基础上。不幸的是，这些革新并非不需要什么花费，而且，政府开支的某些措施也招致了一派人的反对，他们就是以总收税官为首的心怀不满的公务人员。

副主教特鲁是总督最直率的抨击者。由于夸大了个人的宿怨，这位易怒的牧师指责总督与有夫之妇通奸，他甚至写信给殖民大臣和《泰晤士报》进行告发。这场争吵一直闹到1848年。尽管多数议会议员和牧师，甚至牙买加主教都反对这位副主教，支持马修总督，但是国务大臣格雷伯爵却断言说什么无风不起浪。他听说马修利用其影响帮助过他被指责与之有瓜葛的女人的丈夫，因此决定把这位总督召回。1848年11月16日，格雷写道：“由于您利用职权为一个卑鄙的女人效劳，女王陛下对您在运用任命权方面所寄

托的信任将由此而全然丧失。此事若为世人所 221
知，那么您将不可能使殖民地臣民对您的施政权力继续给予尊重，而这种尊重是为正确实现您的职责所不可缺少的。”当时马修接到了简略的通知：继任者将立即派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尽快离开巴哈马。马修于1849年2月离开了拿骚。

马修总督治下最为突出的功业，是把特克斯和凯科斯两群岛从巴哈马分离出去，这事件发生在他返回英国之前不久。拿骚对特克斯的统治从来是既不得民心，也未见实效。虽然自1827年到1847年中间，盐税收入大约占巴哈马岁入的四分之一，但是据认为：为了增进特克斯岛民的利益所用的花费，无论如何还不到这些钱的半数。再则，盐的市价已在1845年跌落到了三又四分之一便士一蒲式耳，但是，盐税仍然是按照原来一先令三便士的市价所规定的税率征收的。

关于盐池管理的1781年各项训令及1824年与1844年的法案遭到了特克斯岛民的一致唾弃。在后一个法案中所规定的长期租约行之无效；其不良的后果使不满情绪达到了高峰。从理论上讲，

特克斯群岛在议会中享有代表权，但由于交通不便，特克斯的议员很少出席，即使是出席了，他也感到自己象个异乡之客来到了不友好之邦。

特克斯和凯科斯的居民说，他们唯一能见到的巴哈马人就是收税官，因此，他们的情绪是能够被谅解的。从拿骚启航的邮船远达长礁，每月开驶一次，可是延长到大特克的航行一年却只有四次。航行于英国和牙买加之间的船只却经常在那里停靠，很自然，当地岛民感到对金斯敦比对拿骚要亲近得多。

从1837年到1846年，特克斯群岛的居民三次上书国务大臣，提出了他们的申请，但一概被搁置起来了。殖民地代表要求申述意见，也遭到拒绝。马修总督起先也反对这一变动；1847年间，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于是不得不勉强提出
222 分离的主张。依照1848年的法案，特克斯和凯科斯两群岛将遵照国王一枢密院的敕令，在牙买加总督的监督下，由一个长官及其政务会进行治理。

失去盛产食盐的群岛之后，一个有趣的后果就是人们转而寻求替代物。赫尼奇盐池公司于

1849年建立，目的在于发展伊纳瓜的盐池，它成了设在巴哈马的第一个联合股份企业。以后十五年间，盐价日益上涨，高达七个半便士一蒲式耳；在腊姆岛、拉吉德群岛、埃克苏马以及新普罗维登斯邻近的罗斯岛开辟了新的盐池。产量达到高峰时，伊纳瓜每年出口一百五十万蒲式耳，腊姆岛至少出口五十万蒲式耳。可是，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物价暴跌，这些交易受到了挫折。伊纳瓜的人口在1847年仅为一百七十二人，到了1871年上升到一千一百二十人，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年里又趋于下降了。

在约翰·格雷戈里（1849—1854年）、亚历山大·班纳曼爵士（1854—1857年）和查尔斯·贝利（1857—1864年）诸任总督平凡无奇的执政期间，人们的大量精力都消耗在宗教争论上。看来，宗教争论总是趁着空闲阶段而盛行起来的。1840年以后的若干年，圣公会在福音布道协会的激励下又活跃起来，但为时太晚了。浸礼会传教士已在自由的黑人中扎根很深；卫理公会也已经打入社会各阶层。而只有圣公会和长老会算是“国教”，并且得到议会的资助，对于这样的一个现

实，那些充满活力的新兴的会众表示愤恨，并且进行了抵制。

在前章提到的有关学校控制权的纷争出现之后，又由于公共茔地问题而发生了新的摩擦。从奴隶制时期以来，非国教派的牧师允许其主持婚丧仪式，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在公共墓地主持殡葬仪式的权利。1851年，在两次殡葬仪式上，发生过很不光彩的场面。非国教派教徒通过教会执事提出了请愿书，当总督对这项请求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时，一场骚乱几乎一触即发。接着，又有一份八百人签署的请愿书，由议会责成一个委员负责审理，如果不是牙买加主教及时干预，那份请愿书就很可能被搁置起来了。他提出了一项议案，
223 要求给予所有合法的牧师以平等的主持葬礼权利，那一年底，这项议案终于在议会勉强地被通过，因此，互相仇恨的气氛也就暂时地平息下来了。

这是各个对立教派进行重新组合、扩张势力的时期。时世虽然十分艰难，各个教派却不遗余力地修建和扩充。埃比尼泽卫理公会教堂初建于1840年，又于1848年用石料加以重建。在整个群岛

上，卫理公会和浸礼会的小教堂到处出现，其外表往往不比周围的破屋壮观多少。国教教堂自然得天独厚，其建筑也比较宏伟。格兰特城的圣艾格尼丝小教堂于1845年竣工，这一年，斯潘塞主教主持了新基督堂的奉献仪式。圣安德鲁长老会礼拜堂于1847年得到资助，1850年重新改建，又于1863年重修一次。改建的特点之一就是取消了教堂的老式高背座椅，因其容易使会众在听道时入睡。1852年间，圣公会在议会的协助下，在狐狸山建成了圣安妮教堂，扩建了在西区的圣玛丽小教堂，又在盛产食盐的伊纳瓜建起了另一座教堂。

1854年，根据圣艾格尼丝教堂首任牧师W·L·伍德科克——卒于1851年——的遗嘱，在贝恩城的黑人居住地区设立了一所圣公会学校，这所学校一直开办至今。1857年，牙买加的考特尼主教授予五名巴哈马教会执事以牧师圣职，从而使巴哈马圣公会牧师达到了空前的十三位。在这场宗教霸权的竞争中，圣公会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于1861年受到特许设置拿骚主教辖区。新主教辖区是从1824年建立的牙买加旧主教管区划分出来

的，其地域不仅包括整个巴哈马群岛，而且连后来分离出去的特克斯和凯科斯也在其内。根据同一的特许状，小小的拿骚升格为府城①的尊位。神学博士查尔斯·考尔菲尔德从1858年起已经担任副主教，此时又在伦敦的兰贝思被授予巴哈马的第一任主教圣职，于1862年5月23日返回这块殖民地。他的荣耀是昙花一现的。6月17日登上圣座，9月4日他便患黄热病死去，这无疑地成了非国教派的人们的话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拿骚已听到了邻近的美国各州面临悲惨冲突时所发出的第一阵沉闷的鼓声，然而，很少人预料到这个突然引人瞩目的
224 焦点会使这个平凡的首府变得空前富足和显要起来。1857年这一年，官吏薪俸事实上已经拖欠了几个月，另一项经费削减法案使公务人员薪金总额减少了两千镑；与此同时，民团步兵大队也被视同浪费的奢侈品而被遣散了。

1857年第一台缝纫机到达拿骚，埃留特拉的菠萝第一次装了罐头，可是这些新奇事物都没有

① 此处是宗教管辖的区域之称，并不是地理或行政的名称。——译者

显示出立即获利的希望。这已是蒸汽机时代的开端，也可说是蒸汽机时代的先声，很大的希望曾寄托于这种能使轮船逆大风而行驶的新动力。在有远见的人看来，很明显，仅仅是交通工具问题使拿骚不能成为北美的冬季休憩胜地。

早在1851年就通过了一项鼓励开设纽约与拿骚之间的轮船航线的法案，可是，1851年5月20日到达的第一艘试航的轮船“犹太女人号”着了火，吃水线以上几乎烧尽，于是这项计划便不提了。1857年，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当时一位有企业心的海湾路商人蒂莫西·达林先生设法卖给了政府一处地基——恰好位于监狱之南——用来建造一座饭店，以容纳可能来自寒冷北美的冬季游客。

1859年，是第一套巴哈马邮票出现的一年，巴哈马当局就拿骚与纽约之间的班船事宜，与横渡大西洋航线的轮船业巨头塞缪尔·丘纳德先生订立了一项明确的合同。以每年贴补一千镑为条件，丘纳德同意载运由拿骚进出的邮件和乘客，至少每月一次。1859年11月，“科西嘉号”轮船在去哈瓦那途中向拿骚靠岸，这是此船上百次访问的

头一次，返回时又停靠了一次。纽约到拿骚的航程一般需用三至五天，票价五十美元，往返票价九十五美元。为了建造一座以后命名为皇家维多利亚饭店的建筑物，政府发行过一笔公债，1860年夏季，开始在那块地基上动工。

盼望已久的与北美通航，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是与局势发展背道而驰的。皇家维多利亚饭店预定要给来自冰天雪地的北美各州冬季游客安排住处。假若仅是依靠这一用途，那么它很快就
225 要遭到破产。然而很幸运，南北战争即将爆发，这座新建的饭店注定要成为战争期间美国南部的跃跃欲试的封锁线偷越者的大本营。

1861年4月12日，南部同盟的部队向查尔斯顿港口的北部联邦的炮台开了火，从而在美国挑起了四年流血的内战。叛乱①的各州几乎没有工业，这样就要依靠进口货物来进行战争。为了从海外获取军需和物资，南部同盟必须不断输出南部各

① 当时北部联邦称南部各州的行动为叛乱。——译者

州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产品——棉花。

林肯总统在开战的第一周就宣布封锁南部各港。这个行动甚为仓卒，因为不仅是联邦海军对于实行封锁毫无准备，而且总统宣言给予了叛乱者以交战国的地位，这样倒有助于他们从同情的欧洲国家那里得到援助。除了一些顽固的废奴主义者外，英国对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示冷淡，但是兰开夏的棉织业者却力图激起对南部的一些支持，这种支持又由于北方佬在“特伦特号”事件①中的高压行动而大大地增强了。随着战争的进展，造船商、船主、冒险家等被偷越封锁线带来的暴利所吸引，纷至沓来。

起初，偷越封锁线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欧洲与美国南部各港的贸易仍保持着战前水平。晚到1862年，驻查尔斯顿英国领事还报告说：“封锁线偷越者生意兴隆，看来没有人觉得有丝毫危险”。当北方动员起来的时候，封锁就控制得较紧了。“所有种类的船只：渡船、游艇、捕鲸船、捕鱼帆船以及老朽快船，一律征作军用，略加武

① 参见本书396页。——译者

装后，被派往南部诸港的周围海域去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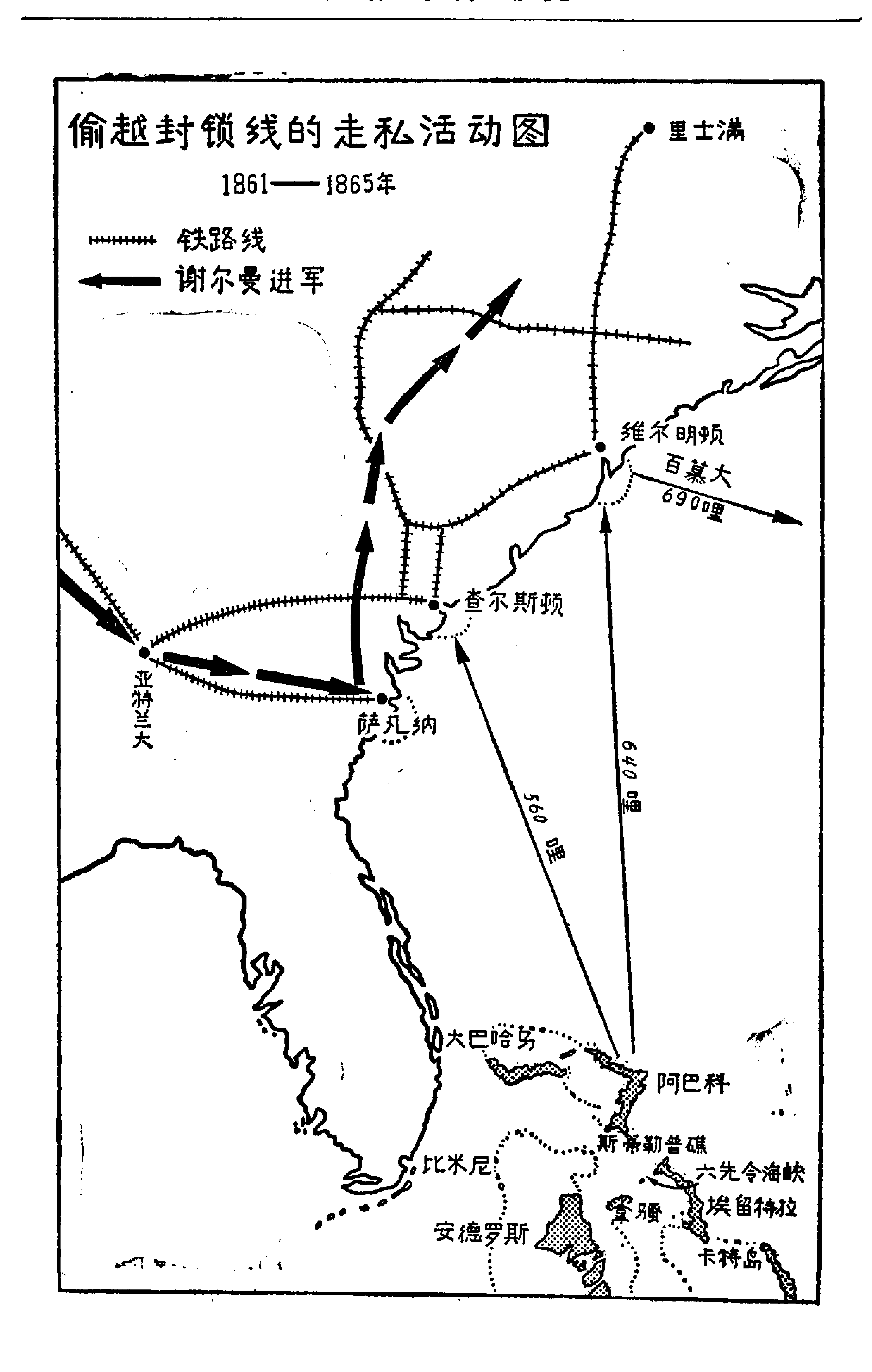
偷渡的轮船仍然可以象被驮马所追逐的猎犬一样，躲避那些笨拙的警卫船只。但是到了1862年底，北部联邦正在赶造专供封锁的舰只，并终于造出了一批舰只，其中包括二十四艘浅底螺桨炮舰和四十七艘“首尾同形”舰——无需转湾调头的独木舟式明轮船。到了1865年，北军舰队已拥有
226 将近七百艘舰只。1862年4月，法拉格特攻占了新奥尔良之后，北军能集中兵力去袭击南部同盟的几处港口，因此，偷越封锁线就越来越带有危险性了。仅仅是封锁查尔斯顿与维尔明顿两港，就调用了一百五十多艘舰只。

迫于对国外物资的绝对需要，同时又受到巨大利润——有时一次往返航行的利润竟达三十万美元——的诱惑，偷越封锁线者继续不断地进行活动。在欧洲，到处搜罗能够在夜幕笼罩下疾驶于北军舰只之前或者之间的船只，1862年年底，甚至在伯肯黑德、巴罗及克莱德沙德也造起船来，因为当时认为，如果能在被捕前往返三次，造船费用就可赚回，甚至还有赢余。这些船的类型“大多是船体瘦长、底部浅平、轮叶装在两侧的

轮船，这种船善于疾驰，涂上青石色，免得被察觉；烧的是无烟煤，因而不至使冒出的烟把自己暴露给敌方舰队”。

为了便于避开封锁舰艇，船只必须造得象猎犬那样轻快。由于不能多载货物，这类舰艇必须寻找两三日之内可到达的中立港岸。拿骚就在这样的场合露面了。在封锁期间，查尔斯顿和维尔明顿是最繁忙的两港，距安全地带阿巴科群岛分别只有五百六十哩与六百四十哩。百慕大比较接近北方海军基地，而且距离被封锁的港口比拿骚还远一百哩左右。

1862年1月，英国政府指令贝利总督，要保持巴哈马中立，“尽力防止将女王陛下的港湾、港口、海岸以及女王陛下领土权管辖之下的水域被用于援助交战国任何一方的战争目的”。除非有如起火、严重漏水、桅杆断落等极端危难情形，交战国船只一律不得进入。总督在1862年3月11日宣布了这些指令，但很快地便被人们曲解了，社会舆论把这些旨意解释为：这个群岛只是拒绝战舰去利用，至于所有偷越封锁线的商船一旦进入巴哈马领海，就得确保其安全。实际上，


偷越封锁线的走私活动图
1861——1865年
铁路线
谢尔曼进军
里士满
维尔明顿
百慕大
690哩
查尔斯顿
亚特兰大
萨凡纳
560哩
640哩
大巴哈马
阿巴科
斯帝勒普礁
六先令海峡
埃留特拉
比米尼
安德罗斯
卡特岛

贝利总督在议会的一次讲话中，对与南方交易所 228
取得的繁荣现象，表示喜悦之情，他甚至祈求不要由于北部海军的优势而造成损失。

1862年初，贝利不许美国军舰“弗拉姆博号”为从随航煤船上加煤而驶入拿骚港。美国驻伦敦公使C·F·亚当斯先生立即提出抗议，以示报复，指责拿骚已被用作南部同盟的战争物资集散基地。拉塞尔勋爵只是对封锁线偷越者发出警告：他们在公海上遭到美国人搜捕时，将不再受到任何保护。

1861——1865年偷越封锁线情况一览表

	进口（镑）	出口（镑）	入港船次		离港船次	
			帆船	轮船	帆船	轮船
1860	234,029	157,350				
1861	274,584	195,584	2	2	1	3
1862	1,250,322	1,007,755	74	32	109	46
1863	4,295,316	3,308,567	27	113	48	173
1864	5,346,112	4,672,398	6	105	2	165
1865			0	35	0	41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北部联邦方面不幸地发生了“特伦特号”事件：当时北军从一艘英国船“特伦特号”上捕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外交官。英国的观点倾向于反对北部联邦。虽然纽卡斯公爵告诫贝利不要进一步触怒美国，但是封锁线偷越者却开始泰然无事地利用拿骚。

“特伦特号”事件发生后，美国当局没有认真地表示和解，因此，北军的巡洋舰一贴近英国领海，英军便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以此作为报复手段。例如1863年5月，贝利总督声称，英国船“玛格丽特与杰西号”在距埃留特拉不到一哩的海面上，遭到了美国军舰“罗德艾兰号”的炮击。此外，北美又因其船只使用伊纳瓜、埃克苏马以及其他群岛给船上水，而多次受到了控告。1864年1月，《拿骚卫报》津津乐道地报道：“北部联邦巡洋舰在此殖民地海域的不断出现，引起了英国国内当局的强烈不满，因其有犯王室政府极
229 愿保持的介于交战国之间的中立政策。”战争后期，虽然由于“阿拉巴马号”以及南部同盟的其他英制的舰艇对北部联邦的袭击，使北部的反英情绪沸腾起来，但是美国人始终没有感到有足够

的力量来侵犯巴哈马海域。因此，只要查尔斯顿和维尔明顿能被南部同盟据有，拿骚也就能保持繁荣。

布鲁斯·卡顿曾经估计过，在南北战争期间，约有一千六百五十艘船只完成了大约八千次往返南部诸港的航行。从1861年12月1日，第一艘来自查尔斯顿载有一百四十四包棉花的船靠岸起，到1865年3月为止，共有三百九十七艘船从被封锁的港岸驶进拿骚。在此期间，由拿骚启锚驶往南部诸港的航行也有五百八十八船次，其中轮船占四百二十八船次。

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损失是巨大的。1863年以后，驾帆船偷越封锁线简直是使鬼唤神的把戏。即使驾一艘新式时速为十五浬的螺桨轮船也等于是一场赌博。由拿骚开出的轮船中，有四十二艘遭捕，二十二艘被击沉。但是，只消查尔斯顿八美分或十美分一磅的棉花三日后到拿骚能以一美元价格出售；或在拿骚购得六千镑日常必需品到里士满①换回二万七千镑价值的黄金，那么愿

① 里士满（Richmond）：美国南部一个城市，在南北战争时期，曾经是南部同盟的首府（1861—1865年）。——译者

意铤而走险者就不乏其人了。1864年，派出一艘装八百包棉花的船只去维尔明顿，往返一次付出了大约五千镑的代价。当时船长获得一千镑佣金，并享有为他自己捎带十包棉花的权利；领港员也获得一千镑，享有捎带五包的权利；事务长和驾驶长的酬金为三百镑，各人可以捎带两包；甚至那些即使被北军掳获而不会受到更多惩罚的一般水手们也领得月薪二十镑，每次航行归来，另赏十镑。

1860至1865年间，拿骚的进出口数字记载着当年偷越封锁线的史话。1860年，进口价值为二十三万四千零二十九镑，出口为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镑。到了1862年，进出口值分别上涨到一百二十五万零三百二十二镑和一百万零七千七百五十五镑；1864年，分别达到五百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一十二镑和四百六十七万二千三百九十八镑的惊人高峰。仅是1864年1、2月份，就有二十艘船载有价值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一万四千一百八十二包棉花偷越封锁线，抵达拿骚。

在拿骚历史上，那是空前绝后的极盛时期。

J·H·斯塔克可能并不夸张，1891年他写道：“在此战争年代，人们激动若狂。商店里货物堆 230
积如山，包件、货箱、琵琶桶充斥街头。发财致富，只消几周、几月之间。人们挥金如土，奢侈无度。美国南部的难民、偷越封锁线的船长及水手拥塞市镇，摩肩接踵。户内户外，可用之地无不被占用。走廊、墙、屋顶、地面均有人卧。金钱是充足的；水手登岸时，往往携带着一千五百美元的硬币。工资倍增；酒浆横溢，一般劳动者都可享受佳酿美馔。上溯到早年海盗冒险、掠夺的时代，从未见过巴哈马有如此盛况。偷越封锁线成功所获的利润超过了世界商业史上任何合法事业的盈余，为数可与海盗从西班牙大帆船上所掳掠的巨资相比拟。”

战前的拿骚港，全年来访的船只很少达到过十余艘，然而，在现存的一张最早的照片上，却可看出港里拥挤着二十余艘高烟囱的轮船。很可能，其中就有威尔金森大名鼎鼎的“罗伯特·E·李号”，这艘船曾经二十一次越过封锁线，创造了独特的记录；或许还会有泰勒的“班西号”，泰勒曾经二十八次冲破联邦封锁线，其中有八次

是乘着“班西号”的。

动人的《偷越封锁线》（1896年）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泰勒，南北战争爆发时才二十岁，就成了最有经验的封锁线偷越者之一。一家利物浦棉商雇用了他，于1862年初，第一次派他乘一条破旧的运牲口的船只“德斯帕奇号”驶往拿骚。后来，发现这条船太笨重，躲避不了封锁舰艇，于是雇主们就给他准备了“班西号”。这艘船是在伯肯黑德特制的，长二百一十四呎，载重仅有二百一十七吨。这艘细长的轮船吃水量只有八呎，是前所未有的第一艘钢制的远洋海轮，船体用薄片钢板造成，其易于弯曲变形以致渗水的程度是十分惊人的。

这艘新奇的船只经过几次冒险和惊恐之后，于1863年3月经由马德拉抵达拿骚。在此，泰勒将船上索具及甲板上构造物加以消减，使之仅剩两根短桅，并把船漆成淡灰色，根据以往的教训，这样，就可使其夜间航行在百码以外难以分
231 辨。泰勒雇用了一个叫斯蒂尔的船长，此人曾被北军捕获过，后来又被释放了。“他胆大包天，从不惊慌，能当机立断，有备无患，又象慈母那样

细心，是个极为理想的封锁线的偷越者。”机械师厄斯金也是一名老手，此人“遇险而不慌，临难而多智；稳重有如潮水涨落；当危急来临时，敢冒任何风险而奋斗到底”。泰勒的第一个领港员名叫巴勒斯，维尔明顿人，虽无经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在偷越封锁线的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为非凡的人物之一。“他对所赴之港了若指掌，极端艰难的形势或弥天炮火从未使他失去理智，或者搅乱他自制的神志。他有一种近乎天才的本能以胜任职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他总能比任何人早几分钟察觉出封锁舰艇；他的感觉发展得极其敏锐，因而曾经流传过一句俗语：汤姆·巴勒斯没见到巡洋舰，但早就闻出其味了。”

为“班西号”配置的这些勇猛无畏的船员，似乎是供儿童阅读的冒险故事里的角色，而不象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真人。“满载着武器、火药、皮靴和各种各样的私货，月亮刚一升起，‘班西号’就第一次偷偷地溜出拿骚港，尽快地向维尔明顿进发。”这段路并不难行，全程只需两三日的航行，但“班西号”总是异常的小心谨慎，因此

花费的时间要长多了。“只要天色有亮，桅顶横桁上总要有一人值勤，一旦发现帆影，‘班西号’立即调向，让船尾朝向对方，直到所见的舰只消失在地平线以外为止。瞭望者凡发现一帆，可得一元赏金，以资鼓励；如果甲板上的人先看见了帆影，则要处罚瞭望者五元。”

一出拿骚，风险立即开始，因为北军巡洋舰已惯于近在贝里群岛的斯蒂勒普礁和戈特礁埋伏。但是，由于这些战舰阵容分散，偷越者还容易设法躲避；只是在接近查尔斯顿或维尔明顿时，真正的紧张场面才开始。

有一名乘过威尔金森的“李号”的封锁线偷越者记述道：“当我们与舰队接近时，谁如果透
232 露出一点亮光来，就有可能就地处以死刑；四角各站着一名沉着的、稳重的测水员，负责测量水深；一名强干的老舵工掌着舵；每一船角悬挂着一小锚，系在坚固的大缆上。所有灯火全部熄灭，锅炉室舱口盖上一块油布，罗盘盒上面也装有盖罩，仅留着一个小圆孔，舵手就通过这个小圆孔察看罗盘。”

维尔明顿位于克普—菲尔河口几哩之上，有

两个河口相距不到半哩，分别由卡斯维尔炮台和费希尔炮台守卫着。泰勒写道：

这时候，最有利的躲避方法，是一直向上航行，到达克普—菲尔以北十五到二十哩的地方。这样是为了绕过封锁舰队最北头，而不是直接穿过中间分舰队猛冲过去；然后，再沿着拍岸的浪头向南徐徐而下，直到河口为止……〔这样行动使紧张阶段拖长了，当然，需有一名练达的领港员。〕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往前开，大家鸦雀无声，只听见引擎的振动声，船桨的击水声，在那寂静的黑夜，这些声音响得使人心烦；水手们都在甲板上，蹲在舷墙的后面；我和船长及领港员站在船桥上，瞪着眼睛，往黑夜深处看。不一会儿，巴勒斯不安地动了一下，我听见他低声地说："船长，扔个测锤吧！"斯蒂尔喃喃的命令声传入机舱话筒，作为答复。然后，"班西号"缓慢下来，终于停止了前进。一个模糊的影儿蹑手蹑脚地向着船前锚练走动，这会儿真叫人提心吊胆。因为引擎骤然刹车，常常会有蒸汽爆炸的危险，这样地响起来，多少哩都能听得见，我们很可能就完全暴露了。过了一两分钟，传回报告说："十六㖊——沙底带黑斑。"巴勒斯说："船长，现在不是象我原来想的

那么靠里；我们还远远在南边。舵向左转两度，走稍快些。”他解释说，我们一定要超过黑斑沙底的北头，才能平平安安地开往海岸。船又开了。大约过
233 了一小时，巴勒斯悄悄地要求再来一次测水，船又慢慢地停了下来，这次他满意了。船长命令道：“左舷，前进，别慌。”我们又前进了，万籁无声。尽管船行慢如蜗牛，桨片有节奏的击水声还是响得那样厉害。巴勒斯突然抓住我的手臂——

他低声地说道：“来了一艘，泰勒先生，在右舷船头方向。”

我使劲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真是枉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不一会儿，我听到斯蒂尔压低嗓门说：“行了，巴勒斯，看见了。稍向右舷转舵，稳住！”命令一直传到了船尾。

等待一会儿，我才看出来一个又长又低的黑影儿，它在我们右舷那边，一动也不动。会不会看见我们？是个问题；可是——没有。我们开过去了，虽然距离那条船最多有一百码，但是始终没让它发现。我松了一口气。我们刚把这条船甩开，没多久，巴勒斯又低声地说——

“轮船，在左舷船头。”

我们又看见了一艘巡洋舰，离我们很近。

“向左舷转满舵！”斯蒂尔说。我们的船调了头，把我们的朋友也带到我们的船侧。这回又没有被发现，我们悄悄地行驶着；忽然间，第三艘巡洋舰就在我们正前方的幽暗里显出形状，正慢慢地横过我们的船头航行。

斯蒂尔随即说：“停车。”我们都卧倒，就象死了一样，而敌舰继续走着，在黑暗中消失了。现在明白了，准是什么地方计算错了，我们实际上正在穿过封锁线中央，而不是绕过其尽头。事已如此，巴勒斯的看法是，我们是到了中间分舰队的范围以内了，他主张要直接朝着陆地开去。于是，我们又“缓速前进”了，直到可以模糊地辨别出低卧的海岸和拍岸的浪头的分线。我们还是不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拂晓将近，越来越让人心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沿着拍岸的浪头而下，鼓起勇气尽量往里靠，尽量加速。突然听到巴勒斯说：“好！我看见‘大山’了！”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大山”是一座小丘，大约只有一棵橡树那么 234
高，可是在这光秃无物的岸边，在数哩以内，它倒是一个极其夺目的特征，能准确地告诉我们离费希尔炮台还有多远。真幸运，我们是很靠近了。天已放亮，我们还没来得及驶到费希尔炮台的前面，就

发现六、七艘炮艇快速开来，向我们疯狂地射击。子弹随着就落在我们周围。当你意识到在你的脚下装着好几吨火药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到不安的。更糟糕的是，这一队北军截路者迫使我们转变方向，离开海岸往远处开去。看样子，要倒霉！正当这时，岸上忽然闪出一道亮光来，接着是一声巨响——在我们听来好象是音乐似的，一发炮弹从我们头上掠过。那里就是费希尔炮台了，它保持着警惕，告诫炮艇回避，而炮艇发了一阵舷侧炮，怒气冲冲地逃出了射程。又过半小时，我们安全地过了关口。炮台上放出一条小船，然后——嘿！香槟鸡尾酒的日子到了，连威士忌加苏打水都不在话下。一个人并不是天天都跑封锁线嘛……

不是所有的船都象“班西号”那么幸运，也不是每个船长和领港员都象斯蒂尔和巴勒斯那样熟练和大胆。1873年，J·H·斯塔克访问维尔明顿时，发现“沉没的船只在海滩上排列着，船身深陷于沙滩中，有些船的烟囱及动梁仍然完整地立着”。甚至“班西号”在第九次航行的途中，在哈特勒斯角水域被追赶一阵之后，也遭到捕获。斯蒂尔和其他船员在一所北部联邦监狱里

被关押了八个月之久。尽管这样，据泰勒的估算，“班西号”已经报答了船主投资款的700%。

“班西号”失掉以后，又有“班西二号”、“透里斯探畅想号”、“怀尔德·戴雷尔号”、“流浪者号”、“海燕号”、“夜鹰号”、“鬼火号”接踵而来，这些船的航速，用准确的标准测定，曾一度达到惊人的每小时十七点五浬。

一到了维尔明顿或查尔斯顿，封锁线偷越者就赶紧装货并立即返航。人们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一般用二十四小时卸完货，再用三天的时间 235
装上棉花。为了追逐财利，就不顾一切，甚至在甲板上也得摞上三层棉花包，高高地堆积起来，正象马车载运干草似的。

比起夜间靠岸并同时躲避封锁，出港就要容易得多了。斯蒂尔惯用的策略，是冒冒失失地贴近停泊的敌方旗舰而驶，旗舰往往是配有六十门炮的快速舰。据他所知，巡逻炮艇总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因而希望旗舰上的瞭望者会把“班西号”误认为北部联邦的船只。如果是大白天，那是另一回事了。很少的船只能在途中不被第二道防线上的北军巡洋舰追击过一两次而顺利地到达

拿骚。因为封锁者所获得的赏金并不少于偷越封锁线者的获利，所以北军巡洋舰的追击必然要严紧了。1862年7月，美国军舰“木兰号”捕获了“孟菲斯号”，海军上尉每人获得赏金三万八千三百一十八美元，甚至普通海员每人也得到一千七百美元。

关于惊险幸逃的传说在拿骚不足为奇。例如，《拿骚卫报》在1864年1月9日有过报道，叙述一艘英国船“汉萨号”如何被北部联邦的一艘明轮艇“范德比尔特号”从阿巴科差不多一直追到拿骚。“汉萨号”挨了连续两小时的炮击，为了加快速度，把甲板上堆积的七十包货物扔进海里。后来，锅炉压力突然下降，“汉萨号”只得穿过位于六先令礁里边的一条险道，才得幸免，让“范德比尔特号”焦急不安地停留在外面的海洋中。

托马斯·泰勒讲述了许多关于被追击的事例，其中包括“班西号”几乎惨遭失败的第六次航行的经历。当时离阿巴科还很远，“班西号”遇上了撑满风帆、开足马力的“詹姆斯·艾杰号”的顺风追赶。敌船靠得十分近，以至泰勒可

以看见船桥上穿制服的北军军官了，“毫无疑问，每人都在计算他那一份赏金，这笔钱眼看就要到手了。”在最后一霎那，斯蒂尔命令“班西号”调头向北，逆风而行，这样，“艾杰号”不得不收缩风帆；由于厄斯金及火夫们狂热的努力，“班西号”终于慢慢地远驶而去了。在连续十五个小时内，这条小船顶着波涛前进，弄得船身的脆薄钢板发出轧轧响声，引擎轴承也热得发红。甲板上所有的货物都抛进海里，总算摆脱了 236
追击者，这时“班西号”已经远离航道一百五十哩了。煤快完了，到达阿巴科群岛的隐蔽处需要花三天时间，在这三天里，“班西号”的锅炉耗尽了可以找到的每一小片木头，甚至包括主桅、舷墙以及甲板舱室的壁板；所烧掉的还有剩下的一部分棉花和松节油等船货。

潮涌一般的现钱骤然流入，使拿骚大为改观，仿佛一个穷困的老处女刚好得到一大笔意外的遗产。海湾路加宽了，花费了一万三千一百三十镑，并首次镶上了街道边石，安装了路灯。既在路北建造了一排栈房，又提出了另建新船坞的计划。其他新建筑物象雨后春笋般出现。四万七

千七百八十六镑的公债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还清，公务人员的月薪增长了25%。根据1864年的一项法案，成立了巴哈马警察部队，其成员起初包括一名督察、两名警长、九名巡官、五十二名一等警察、三十二名二等警察。地产价格飞涨到300%或400%，临海地段的地价尤为昂贵。皇家维多利亚饭店在南北战争第一年用十三万多美元建造起来，后来变成了夜会的场所。在这儿，拥塞于这座城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熙熙攘攘的喧闹狂欢中，使人看不到次日的疲惫和无聊。“南部同盟的陆、海军官；利用封锁线偷越者的身分出入于他们被围困国土的外交家；各种各样的新闻记者和广告员——当然，流氓恶棍也混杂其中；以及为捞取金钱而被引诱出来的一些领取半俸的军官们——英国海军的精华……”

拿骚从未在同一时期麇集过如此一群冒险家，在现代，当然培育不出这类人物。当年，有罗伯茨船长，他后来做为霍巴特督军在俄土战争中统帅过土耳其海军；还有休伊特，他曾在克里木荣获维多利亚勋章，又因出任约翰国王当政时的阿比西尼亚大使有功，荣授爵士尊位，以后担任

国内舰队总司令以及维多利亚女王游艇船长。战时记者的一个领袖是身材魁梧的弗兰克·维泽特利，他向《伦敦插图新闻》提供的画片为我们最精妙地描绘了拿骚战争年代的情景。他曾先后被
派驻北军和南军，于1863年年末来到拿骚，二十 237
年后在苏丹死于希克斯督军身边。

那些年代里，使危险和不安加剧的另一因素是疾病。黄热病是一种特殊的灾患，1864年夏季侵害了拿骚和维尔明顿。根据泰勒记载，一天早餐前，他估计有十七批出殡队伍走过他的窗前；又有一次，一日之内他埋葬了三个亲近的朋友。在维尔明顿的六千人口中就死去了两千五百人。泰勒自己也得了这种可怕的病，后来被迫到哈利法克斯去疗养。

他返回时，偷越了封锁线，并乘火车从维尔明顿到南部同盟的首府里士满。在南部，耳闻目睹的事实使他受到震惊，于1865年1月15日在给他的上司的信中写道：

"总的看来，我认为，南部同盟政府前景不妙了。如不加小心，同盟本身也要跟着垮台。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妙的情景。我看，春天就要结

束了他们……”李①告诉泰勒说，维尔明顿一旦失守，里士满也要接着丢失，那么，他就只能撤退到田纳西去。很奇怪，就在泰勒写信的那一天，费希尔炮台挨了一阵猛烈炮轰之后被特里将军所攻破。下月间，谢尔曼继续进行着由萨凡纳出发的闻名的进军，长驱直入地穿过南北卡罗来纳二州内部。查尔斯顿和维尔明顿已是孤军无援，到3月，两城陷落，从此，偷越封锁线的时期就结束了。罗森·W·罗森于1864年接替了贝利总督的职务，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1865年1月和2月有三十二艘船从封锁线那边出发，其中二十艘到达了拿骚，但是2月份以后，总共只来了三艘。

1865年4月9日棕树主日②，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将军③投降，从而结束了战争。可以这样恰当地认为，拿骚及整个巴哈马群岛在美国南北战争的灾难中发过横财，但最后还注定要与战败的南部同盟共遭厄运。

① 李（Robert E.Lee）：是南北战争期间南军总司令。——译者

② 棕树主日是宗教节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译者

③ 格兰特(Ulysses S.Grant)：是南北战争期间北军的总司令。——译者

第二十章　被忽视的殖民地 238

1865—1914

偷越封锁线的活动一经结束，就使拿骚的经济如同气球泄气一样骤然萎缩下来。萧条是那么样严重而持久，致使大多数巴哈马人感觉到自己还不如当初没有享受过那种昙花一现的战时繁荣为好。1869年，军医队长巴科特曾提出疑问："炫耀一时的繁荣究竟给巴哈马带来了什么好处？不用说饮酒作乐是司空见惯的事……水手们的钱多得不知怎么花掉，并且他们的品德十分败坏，有许多女人把她们的堕落归罪于这些轻浮鲁莽的水手们离奇的引诱。一小撮殡葬承办商很可能发了财，因为那里疾病相当流行而且是无法医治的。政府虽然设法偿还了少许的债款，但是，所赚来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这还是一个谜。"

有些人由于封锁而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绝

大多数是外国人、商业代理人、船长、领港员，这些人在此期间成群地涌入拿骚，到维尔明顿陷落时，就立即开始离开了。极少数的巴哈马人从战争中获得利益，南部同盟的货币的大量流入造成了通货膨胀，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某一点上，外围小岛算是受害最轻，因为它们从短暂的战争岁月中获利也最少。对于这些小岛来说，生活就象一场漫长的酣梦般度过。

拿骚的骤然发展曾经促人过分乐观。一旦缺少棉花和军需品，新建的仓库就空闲达五十年之久。由于战时的暴发户不再到来，皇家维多利亚饭店只得标价拍卖，结果却无人问津。不仅如此，连海湾路上的三十四盏新置的路灯也总是关熄着。

239 好象要着重说明拿骚之陷于绝境似的，1866年又出现了可怕的风暴和疾病。美国南部各州的人离去时所留下的最后遗物是伤寒病，它夺去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生命。并且，同年10月1日袭击新普罗维登斯岛的飓风，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破坏性最大的一次。没有一座建筑物免遭破坏，象约翰·圣乔治的崭新货栈等某些建筑物都被彻

底地摧毁了。重建或修缮房屋已使拿骚公私两方面的资财耗费殆尽。到了1869年，甚至政府的信誉也受到了威胁，尽管官方对经费开支进行了一次调查，公务员的薪金还拖欠了三个月之久。

巴科特在对南北战争结束四年后的拿骚的描述中，未曾反映出战争的痕迹，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已回到了古老年代的城镇："这个城镇面临着港湾，商业区分布在海岸一带；可是，被棕榈树和果树环抱着的富人别墅却坐落在高岗的顶上和斜坡上，这道高岗将这个城镇和沼泽般的内地分隔开来。拿骚很明确地显示出沿海城市的特色。商店里摆满了绳索、滑车、柏油、熏青鱼以及腌渍食品；就连船木做成的房屋的椽子也时常令人想见海上的风险。为一些教堂准备的宗教橱窗已被失事船打捞者弄到手，充作一家食品店的窗框了；纪念碑上的陶瓮被用来装饰一所舒适别墅的门柱。拿骚是一个安静的、沉闷的、凹陷的地方，那里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洁白的街道；在碧蓝的大海里，浪涛起伏，闪耀着波光；小巧而悦人的双桅纵帆式帆船经常活跃着海面，有的刚打捞完一只失事船返航归来，有的又启航去打捞另

一只。”

因为偷越封锁线的走私活动已成过去，巴哈马水手又恢复了打捞失事船的活动，这是他们持续多年的赖以谋生的营业。1865年，维纳布尔斯主教报告说，比米尼居民全都从事于这种可疑的行业，看来他们“几乎是我所见过的最可鄙的人”。1858年，曾有过领到执照的失事船打捞者三百零二家，雇着二千六百七十九人从事打捞活动，这个数目在南北战争后最初几年已被赶上或者被超过了。他们把失事船看做是一种经常的、十拿九稳的财源之一。1864年，有四十八只船失事、十九只被损毁；1865年的数字分别为三十只
240 和三十一只；遭受飓风灾害的1866年的数字则分别为六十三只和三十一只。1855至1864年间，共打捞了三十七只船，价值为五万九千九百五十八镑，平均每只一千六百二十镑。此外，从五十九只漂流的船只中获得的物料，价值总共为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八镑。这些都是官方发表的数字，无疑还有许多触礁船未曾计算在内，譬如在1866年，有六十三只船失事，但其中只有三十四只已经完全调查清楚，至于其他船只的下落，据官方的引

述，则是“无从查考的”。

1866年的飓风灾害为打捞失事船的人们带来了大丰收，不过他们的好日子却已屈指可数了。尽管遭到激烈的反对，帝国灯塔管理处照旧建立了一些灯塔和灯标，海军部也绘制了第一张精确的巴哈马水域航线图。早在1816年，拿骚港口建筑了人所熟知的白色灯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安装了三支低功率的信号灯。然而主要航线上的第一批真正高功率的信号灯，却是安装在下述的那些地方的：大伊萨克斯（1859年）、罗勃斯礁（1860年）、斯蒂勒普礁（1863年）、阿巴科的埃尔鲍礁（1863年）、卡斯尔岛(1868年)、伊纳瓜（1868年）及鸟岩（1876年）。

帝国灯塔管理处的第一艘供应船是在1857年购置的，第一批自动的信号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采用。到了后来，在诸岛之间安装了三十七处自动乙炔信号灯，于是多数危险的水域都受到了导航灯标的照耀。此外，蒸汽和发动机的普遍应用一步步地减少了穿过巴哈马航行的危险。触礁的船只数目逐年减少，其价值也相应地降低了，而在这个时候，失事船打捞者的人数大

为缩小，他们挨着饿，并对他们所能找到的东西互相争夺。

当时有一位作者讲述了有关某一巴哈马牧师的有趣但不足置信的故事。有一次，正当做礼拜时，传来了行船失事的消息，这个牧师竟把他的布道草草结束，让会众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堂。一般地讲来，教会是反对打捞失事船的活动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坏事，而尽最大努力来鼓励节制和基督徒的勤勉精神，这两种概念对巴哈马打捞失事船的人来说，却是格格不入的。遗憾的是，那些正当的人所得的报酬并不比邪恶之徒所得到的更多。

与南北战争时期的短暂繁荣同时发生的更加
241 短暂的现象是各个对立的教派之间争相加紧其建筑活动，但相继而来的萧条又引起了一场危机。1865年，议会议决拨款二千二百镑来建造圣艾格尼丝教堂，甚至还拨给同样的款项用以修建卫理公会的三一教堂，这座教堂终于在1865年4月2日落成，费用共达八千镑。原在1835年创建的浸礼会教堂也在同年 8 月27日重新开始使用。

1866年10月的飓风摧毁了数以百计的建筑

物，新建成的卫理公会三一教堂就是其中之一。到了这时，议会的许多议员都是卫理公会教徒，但是却不能指望议会象前一年那样慷慨地拨款了。财政处骤然出现了亏空，对于议会中失望的国教反对者来说，要继续对圣公会给予资助以渡过难关的想法，是不能接受的。

1867年3月，R·H·索耶先生在一项向议会发起的提案中，建议在巴哈马废除英国国教制。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由其起草一项议案，在议会中以四票之差的多数获得通过，但这项议案却被立法会所否决了。议会再度利用了一派控制的投票，决定请求罗森总督解散立法会。总督对此拒不同意，而在紧接着发生的激烈辩论中，既是国教教徒又是政府的支持者的乔治·安德森议长辞了职。他的继任者王室律师奥蒙德·马尔科姆议长宣布议会休会三个月，这是几乎等于造反的一种举动。

罗森总督决定在这一时刻返回英国，这对殖民地的安宁来说是很幸运的，随着总督的更迭而来的是普选。1869年3月，废除国教制议案再一次被提出来，这一次则为议会和政务会两者所通

过。从此以后，如同在怒涛中不带救生圈的游泳者一样，互相敌对的教派便在平等的基础上相处了。

很显然，圣公会的实力最差，几乎趋于没落。由于巴哈马财政处不再供给其资金，圣公会不得不依靠福音布道协会以及贫穷的教区民。在国教制废除了十八年之后，波尔斯记述了卡特岛的教区长、勤劳的巴罗·马修斯牧师的艰难处
242 境："马修斯的前任是属于国教的牧师，一年可得二百五十镑的资助，可是，他只能得到一百五十镑，其中一半来自福音布道协会，另一半来自平民。1886年，这两方面都穷得连会费都付不起，马修斯只好少得三十镑。所有自从废除国教制以后被委派的牧师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总共加起来，巴哈马仅有十三名圣公会牧师，他们负责管辖相当多的教区，对这些教区尽力地进行着巡视。在他们缺勤时，他们的职务由传道师（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代理，这些人被允许有诵读祈祷文、讲道、施行洗礼和主持婚礼的权力。在我所到过的地方，只要有个威斯莱教派的牧师，他就必定住得很好，并受着周到的照顾，这一切主要

都是通过英国的威斯莱教派会议的作用而取得的。”

但是，圣公会不仅仅是受到贫困的困扰。自从1869年废除国教制直至本世纪，由于国教受到冷遇，冲突显得有所和缓，但圣公会本身又被仪式问题的争执所纠缠。

根据1869年的法案规定，设立了一个教会委员会管理教务，该委员会由主教，基督堂、圣马修和哈伯岛三个教区的牧师，以及五名非教会人士组成。因为基督堂的斯旺牧师和圣马修的桑德斯牧师都是坚持使用祈祷书的人，委员会中的非教会人士又同样是保守派，因此，毫无疑问，这个团体成了大多数牧师所不欢迎的羁绊。在每年举行的教务会议上，争执是经常发生的，在这样的会议上，所有的享有圣俸的圣职人员，与来自每个教区会的一名俗人会员都一样具有表决权。在1871年和1874年之间，关于仪式问题的争执达到了严重的关头，因为保守派坚持：隶属于英国的巴哈马教会必须遵守英国珀切斯案例中关于反仪式主义的判决。显然，对于主教和他的仪式主义者同僚来说，唯一的出路是摆脱英国的教

会而取得独立。

第二任的主教阿丁顿·维纳布尔斯（1863—1875年），在巴哈马的圣公会教史上是最出色的人物。他是受过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培育并由其提拔而取得了职位，曾当过克德斯登和牛津两地方的牧师。因而，他成为牛津运动①的热心皈依
243 者，并且在他的主教任内，发现在其所属的教堂之内——如果不是在大教堂本身里边——有法衣、香和其他仪式主义的装饰品。在许多人看来，每个新来的教士似乎都比其前任更加“天主教化”。

维纳布尔斯主教和新仪式主义运动共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精力充沛。罗斯考·谢登主教讲过，有一次，他的前任为了赢得十先令的教会基金而与人打赌时，曾跳过了五条横木的栅栏门。维纳布尔斯是个过独身生活的、普通体格的人，为着其常常不领情的教徒服务，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本是不善于航海的人，但为了传教的目的，却买了一只快艇，命名为“和平福音号”。对于精神上被遗弃的外围小岛说来，这只快艇却

① 自1833年始于牛津的一种改革国教礼拜仪式的运动。——译者

成了一个为人们所熟悉而且受欢迎的来访者。

1874年，教会委员会对外围小岛传道师拒绝支付薪俸，维纳布尔斯主教则自愿承受这个负担。同年，在多事的教务会议上，属于低教会派的对手们责难他隐瞒收入并强迫他辞职。尽管如此，主教和大多数忠于他的教士们在和保守派的斗争中仍然取得了优势。次年，巴哈马教会已经实现自治，仅在名义上忠顺于牙买加大主教。一个只具有世俗权限的托管社团已经建立起来，以代替教会委员会，并且由教务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教规。虽然在名义上反对仪式主义，可是实际上对每个牧师来说，这些教规却具有更大的伸缩性。然而，维纳布尔斯对非教会人士在宗教会议上掌权，却感到十分不满，并且正确地预测到他的继任人所要遇到的争端。他为着应付对手而耗尽了精力，终于在1876年死于美国，时年四十八岁。正如谢登所说的，他是一个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真正殉道者。

克拉默-罗伯茨（1875—1885年）和爱德华·丘顿（1885—1900年）巩固了维纳布尔斯开创的事业，但是进展是十分缓慢的。直到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仪式主义的争论始终是很激烈的，当时，谢登主教不得不诉诸法律以维护他的神圣权威。到那时，人们几乎认不出圣公会是原来的国教了。圣马修的桑德斯牧师死后，只有基督堂的
244 保守派仍坚持使用祈祷书。甚至在主教大教堂本身的法坛上也出现了蜡烛和十字架，主教偶尔也穿起罩袍，戴上法冠。大约在此前后，许多显赫的拿骚白种人家庭都脱离了圣公会，企图分裂出去，从国教大教堂转到卫理公会的三一教堂去参加福音传道的礼拜仪式。

黑人皈依者热切地填补了他们的空位。1887年，波尔斯写道："仪式主义者每天都在黑人当中增加影响，争取信徒。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无可否认的，他们的信条在日常生活中有了表现。他们生活在黑人当中，而且和黑人一起生活，心里不存在着肤色界限的观念，所以人们逐渐地爱戴和信任他们了。"正象在五十年前由于心灵上的空虚而被基督教简单的箴言所吸引的那样，这些黑人又被多采多姿的仪式迷住了心窍。以后在连续几任坚强的主教和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士们——

如海绵采集者的布道使徒韦戈尔神父——的主持下，圣公会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声望；在这以前，当它与奴隶制及国教体制联系在一起时，在普通群众中曾经失去了人心。

在安德罗斯，神父巴罗·马修斯牧师至少建立了十二所教堂。1901年，福音布道协会的历史学家C·F·帕斯科有一段记述，很明显，指的是巴罗·马修斯的工作情况。他写道："除了他们本职工作以外，牧师们还充任教区医生、公立小学督学、治安推事、种痘医生，同样还兼办私人争端调解人的职务，同时他们负责代写书信和遗嘱，以及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因为除了执政官以外，他们是人们在整个沿海一带所能见到的仅有的白种人。"当亨利·丘顿主教于1940年悲惨地溺死于长岛的时候，人们把他看成象圣哲一样地表示哀悼。得知亨利去世的消息之后，其兄"爱德华主教"的神圣旨意从英国传到了巴哈马人民中间，其价值等于一百遍关于"并非孤儿"的训诫。可是，意味深长的是，仅仅在四年之前，拿骚教会还在恶意地攻击爱德华·丘顿，因而迫使他辞职，同时又使对其弟亨利的任命推延了整整

两年之久。

与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天主教传入巴哈马显然是
245 相当晚的。自1845年以来，天主教僧侣偶尔到该群岛访问，其中包括吉本斯神父，他后来成为著名的红衣主教，于1853年在大巴哈马航行中遇难。1858年，罗马教皇名义上将巴哈马归并于南卡罗来纳的主教辖区，但是，直到1885年才派遣一个教士乔治·奥基夫神父常驻巴哈马，并在西大街为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奠下了基础。六年以后，明尼苏达州科利季维尔地方的圣约翰修道院院长，把圣本尼迪克特勋章获得者克里索斯通·施雷纳神父送到巴哈马去休养，以期其从严重的肺病中恢复健康。施雷纳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第一年又在康塞普申岛附近的船只失事中脱险得救，所以他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巴哈马。他一直活到1928年，死后葬于圣萨尔瓦多，就是在哥伦布在新世界举行首次弥撒的地点附近。

1893年，施雷纳神父购置了天主教堂隔壁的邓莫尔楼。这所房子于1842至1891年间曾当作西

印度团的军官餐厅，在十八世纪时也可能做过总督官邸。此时，这所巴哈马传统式样的带有阳台的楼房已经改为修道院。巴哈马自始就与圣约翰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保持着联系，而且直到现在仍被视为天主教的传教领域。1889年，慈善团的四名修女在西山街建立了圣弗朗西斯学校，从那时起，天主教传教会便和教育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了。1892年，在开办第二所学校的时候，有二百八十名儿童注册入学，而天主教徒的人数则只有七十七名。今天，天主教会拥有十二所以上的学校，其中包括两所高中；在校的儿童人数超过五千人。

在外围小岛，天主教徒以军事行动的效率来做吸收新信徒的工作。他们的确解决了圣公会教徒由于热心不足和资金缺少所不能充分满足的那些需要。罗马天主教选择了某些经济萧条的岛屿，如卡特岛、长岛——对其他岛屿则不予重视——在那里建筑了华丽壮观的教堂。神父和修女们英勇地工作着，举办了当地居民所急需的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事项。他们的成就是显著的，致使新的皈依者从所有其他教派

中被吸引过来了。

1946年，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天主教修道246 院在狐狸山落成。这些给人印象很深的建筑物是由约翰·霍斯——为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杰罗姆大师——设计的，他是卡特岛上的隐士。修道院建成后，他退隐到建立在巴哈马最高的山丘上的一个住所，在1952年死去以前，一直住在附近的洞穴内。

1932年，圣本尼迪克特勋章获得者，伯纳德·凯文霍尔斯特尔主教被委任为巴哈马的第一任教皇代表。1950年，圣本尼迪克特勋章获得者，伦纳德·哈格蒂主教接替了他的圣职。1960年7月5日，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把巴哈马的地位升格为传教团主教管区，伦纳德主教被任命为该管区第一任主教。1961年，至少有二十名天主教神父在巴哈马工作，还有七个修道会中的一些修女。据估计，巴哈马群岛今天至少有一万六千名天主教教徒。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当中，巴哈马经

济萧条极为严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1886年的殖民地及印度展览会的西印度分馆经理奥古斯塔斯·阿德利爵士，是在二十五年之内，因其为社会服务而受爵士位的六名巴哈马人之一。他曾写道："群岛资源的开发还差得很远，该岛资源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产，远远超出了当地居民所想象。"巴哈马的土特产和工艺品，如：食盐、巴西木、龙涎香、草制品以及贝壳工艺品等在以下各个地方都曾展出过，如：伦敦的水晶宫（1851年）、维也纳展览会（1873年）、费城百年纪念馆（1875年）以及1866年的一次展览会。这些展品只不过是曾暂时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已。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巴哈马开发出许多可供交易的产品，但是，那时所出现的一系列挫折似乎却要夺去巴哈马长期寻求的经济上的繁荣和稳定。

作为巴哈马的一种特产，海螺壳曾经风靡一时，它向法国和意大利出口，用以制作宝石别针。海螺壳的出口值突然由1855年的七百九十镑激增到1856年的二千四百镑和1857年的六千三百五十一镑。以后社会风尚改变了，在四年之内出口数字又降回到原来的起点。虽然在二十世纪宝 247

石又流行起来，但是珍珠母或塑料代替了不走运的海螺。

自1875年开始，在巴哈马种植了相当数量的烟草。1878年出口了第一批雪茄烟，但是其质量劣于古巴、甚至牙买加的产品，因而始终没有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发现，西红柿——1876年出口了第一批共十二箱——象野草一样地丛生在卡特岛和埃留特拉的沙性垆坶土上，但是装运工作却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出口额达到1879年的八千一百三十箱的高峰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开始为止，西红柿的收获量始终在下降。

与百慕大相比，巴哈马造船业从来没有兴旺过，但却很难看出其所以然来。在阿巴科、大巴哈马、安德罗斯和新普罗维登斯，都始终盛产着松树，而且百慕大的杉木也可以不费事地输入。从1855年到1864年，在阿巴科建造了一百零八艘船、在拿骚五十九艘、以及在其他诸岛六十三艘。可是它们的吨数总共仅有五千四百一十六吨，平均排水量仅有二十三吨半，并且这些脆弱的单桅帆船也很少到巴哈马水域以外的海上去冒险。

今天，一般人并不了解，巴哈马是第一个大规模地把菠萝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地方。在古巴、佛罗里达以及夏威夷的菠萝生产得到发展之前，巴哈马出产着世界上最好的菠萝。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个群岛的名字就是这种外来的水果的同义语。第一批巴哈马邮票在图案上很醒目地加上了一个菠萝和一个海螺壳；事实上拿骚所提供的原始雕刻暗示着一种民族水果的描画必将取代传统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

1802年，麦金农注意到拿骚西边有一个很好的“菠萝温室”，并惊异地报道说，这种在英国极其昂贵的水果在拿骚价格低廉，一百只才卖一元。几年后，人们发现埃留特拉和卡特岛上的红色的垆坶土完全适合于种植菠萝，每嗽产量能达到三万六千个。人们喜欢的是“英格兰”和“塔糖”这两个品种，虽然“小西班牙红”品种的菠萝被认为是适于远途运输的。

1898年，前总督威廉·鲁宾逊爵士曾对伦敦的皇家殖民学会说过，在拿骚售价一个半便士的菠萝是“比英国一家温室中所培育的菠萝好得 248
多，而后者至少要一金镑的代价才能买到”。不

幸的是他在宣传着一种衰落的事业，因为菠萝的兴旺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1842年，巴哈马向美国出口了第一批菠萝，1857年，巴尔的摩的亨利·伊万斯先生又在总督港开设了第一个罐头厂。1864年出口了二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六打菠萝，共值二万一千二百九十九镑。到了1873年，这些数字业已上升到三十八万一千二百二十二打，共值三万六千五百九十五镑，此外又出口了一百万盒以上的罐头。那年，由于美国关税表的排印上的错误，巴哈马菠萝种植者遇到了一次大抢购。这个错误出现在免税货物表上面，“果树秧”(fruit-plants)被误印成“水果、植物”(fruit, plants)，一位作者在《拿骚卫报》上撰文估计，这一简单的字眼上的代用，使巴哈马菠萝生产者一年得到五万美元的好处。

1876年，J·S·约翰逊在拿骚所设的工厂开业，到了1892年，在总督港、哈伯岛、阿巴科及罗克桑德又创办了一些工厂。布拉西夫人于1885年对早期制作罐头的工序作了有趣的报道，她写道：“这里总是称为‘苹果’的菠萝是这样加工的：首先剥去叶子，然后很快地将皮剥掉，很敏

捷地再将柄和眼儿去掉，将上等品全扔进装满着热糖汁的铜釜里，煮沸达十次之多。然后，将单个的菠萝装进马口铁罐，随后牢牢地封闭好。二等品切成薄片，再按上述的办法处理；三等品则切成方块；四等品仅仅是刮拢到一起的碎屑。不过无论几等品都要经糖汁煮沸后再装进饰有夺目彩图的马口铁罐里去。”

1892年是巴哈马菠萝生意最好的一年，当时的出口量约为七十万打，价值近六万镑。虽然，在存货过多的1900年里，出口的菠萝总量达七百二十三万三千零一十二打之巨，但是，其总值却没有超过1892年产品的价值，这表明菠萝的平均价格每打由一先令八个半便士下跌到二便士。此外，1898年的麦金莱关税法规定每一千个菠萝征税七美元，这也促使巴哈马的贸易萎缩不振。到了1902年，出口的鲜菠萝下降到五十二万一千四百八十二打，价值为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七镑，另有价值九千五百一十五镑的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二箱罐头。从那时以后，这个行业进一步逐渐地 249
下降了。1946年，出口额还不到二万打，总共值四千八百二十镑，这个数字仅为出口总额的大约

1.2%，而1902年菠萝出口总值曾经是出口总额的28%。

菠萝行业总是为特殊的艰险所困扰。1855年的美国领事麦克莱恩先生对这项贸易曾做过专门研究，他告诉布拉西夫人说：“如果每件事都顺利的话，可以获得厚利；但是一遇到逆境，就会引向彻底破产：也许是雨量太大或者是遇到了旱情；有时田鼠和陆蟹向菠萝地侵袭，一两个晚上就能把整块田地上的果木全部吃光；丛林的荒火常常烧毁种植场；菠萝行市也可能一直低疲。即使没有上述的情况发生，并且货物安全地装上船，海上航运过程中还可能受到狂风巨澜的袭击，逆风和恶劣天气会使整船的货物腐烂。即使遇到最快速度的航运，平均的损耗也很少低于33%。此外，某一货船也许在航行中一路顺风，并且平安抵达港口，不过，啊！却发现恰好在它的前面还有其他货船，市场存货过多，船上易腐烂的水果只能随行就市低价销售了。为了节省时间赶紧将鲜果运往市场，一般船只宁愿在大宗生产菠萝的外围小岛直接办理出港手续，所以仅有小部分菠萝从拿骚装船向外运出。”

在菠萝的培植过程中普遍存在不内行和无组织的状态。每一个菠萝生产者竞相使菠萝在理想的季节成熟，因而造成了市场上存货过多的现象。土地得不到充分的肥料或歇息，也不采取任何轮种措施，结果地力大体上消耗殆尽，在五年时间内损失50%的生产能力，而不得不停歇十五至二十年之久。虽然在菠萝的种植过程中有过一些协作管理办法，某些拿骚商人向种植场及罐头厂也进行了投资，但在装船起运过程中鲜果的损坏情况仍然极为严重。1905年，巴尔的摩地理学会的C·N·穆尼把菠萝出口额的下降归咎于种植者和出口装运商，他写道："对他们说来很明显，将水果散装运往市场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市场上要求产品装璜美观、吸引顾客，因此，只 250
有采用适合的包装才能解决问题。只要花费少许成本就可以买到枝条编成的篓子，并且如果细心地把菠萝包装好，就会使其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更能保证售得较好的价格，损失减到最低的程度……几个发货量比较小的种植者试用了这个办法，结果除了赚回附加的工本外还获得了更多的盈利。"

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采纳，因而，巴哈马逐渐地被排挤出世界贸易的行列了。佛罗里达不缴纳菠萝税又能用火车把果品运往市场；古巴备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食糖用以制作菠萝罐头；甚至连牙买加也享有班轮货运的便利，多少可以摆脱海上大风突然袭击的威胁；夏威夷在被授与特惠关税待遇并于1898年并入美国版图之后，虽然距离市场较远，但具有其他方面的优点。贪婪的冒险家如多尔和斯普雷克尔斯利用了那里的理想的土壤、充足的食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所幸的是，巴哈马曾经避开了外来利益所造成的商业掠夺的恶运，但是，凡尝过新摘下来的埃留特拉“塔糖”种菠萝的人，想到这样曾经闻名一时的名贵果品竟逐渐地被埋没的时候，就不得不将这种事实看做是巴哈马的一场小悲剧。

1898年，前总督鲁宾逊把巴哈马农业一直歉收归咎于“农民的劳动态度”。他虔诚地说道：“我已恳求他们不要忘记权威所说的‘不劳者莫得食’，但是我担心所有这样的呼吁都不会受重视。这是为了什么啊！”他接着讲：“安德罗斯在冬季能够单独地供给美国一大部分地区新鲜蔬

菜。”斯坦福德伯爵在回答这个天真的评语时，理解得更深刻些，他建议：“只要居民从农业教育中收到裨益，并且对工业的多样化和协作方面懂得更多一点，巴哈马就还是大有前途的。”在整个巴哈马历史上，凡是任何一种农产品或工业品显得有暴利可图时，人们就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项产品上，对其发展前途则很少关心。西沙尔麻的种植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1845年，殖民地秘书C·R·内斯比特把用来制造绳索的第一批西沙尔的龙舌兰麻介绍到巴哈马来，可是，直到安布罗斯·谢伊爵士担任总督 251
（1887—1894年）时，才开始大规模地生产。政府设立的考察团被派往墨西哥的尤卡坦去进行考察。考察团报告说，那里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和巴哈马非常相似。1889年，当局通过了几项条例：对外国进口的西沙尔麻征收20%的关税，同时又给本地所生产的大麻每磅一分的奖金，这些规定一直实行到1895年。为上述的那些条件及美国免征大麻进口税的事实所吸引，几伙英国资本家在圣萨尔瓦多和安德罗斯建立了种植场。其中最为显著的人就是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钱伯林，其

倒霉的儿子内维尔担任了设在安德罗斯的家庭种植场的经理，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困难的年头。

到了1899年，每年出口了大约四百吨西沙尔麻。一吨麻的生产成本大约为十二镑，只要市价稳定在二十至二十五镑，就能获得很大的商业利润。在1898至1902年间，美西战争影响了菲律宾麻业，使该项产品的价格上涨到每吨三十八镑，因而在巴哈马至少有二万噉土地种植了西沙尔麻。为了洗涤这种纤维，曾建立了十四座机械洗麻厂，到了1902年，产量提高到将近一千吨，价值为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四镑。

1903年，穆尼能够写道："巴哈马的麻业大有前途"，但是，事实上这种短暂的景气已经消失了。菲律宾人在美国资本的帮助下重整旗鼓，其麻业得到了复苏，国际市场价格因而不断地下跌。巴哈马的几家大种植场——其中许多是不适当地设在不良的土地上，而且劳动力又不充足——先后遭到破产，并且工厂也随之倒闭了。由于在小片土地上种麻很不经济，而且用手在咸水中捣麻粗糙不堪，巴哈马麻的质量和价格都进一步下降了。关于监督麻的生产及评定其等级的政

府法令已成了具文，巴哈马的西沙尔麻远不如在印度和东非大量生产的那样优良。虽然1923年的出口量超过了二千吨，但每吨价格尚不到1902年的一半。巴哈马的生产者又陷入全面不景气的局面。到了1946年，尽管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再度暴涨到每吨三十八镑，但是，他们只能够拼集为数不多的一百六十五吨以供出口。

与西沙尔麻相比，遭受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 252
影响较小的是海绵采集业，因而这种行业为巴哈马的经济稳定展示了比较确实的希望。同时，这种行业也为过去靠打捞失事船为生的人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这些不幸者，正象浮木般在无潮汐的绝望的海洋边缘漂浮着。早在1841年，一个曾在巴哈马遇险的法国人居斯塔夫·勒努阿尔用邮包往巴黎输出了一些巴哈马海绵，那里人们觉得巴哈马的海绵从“羊绒”，到“天鹅绒”等各个品种都比地中海的海绵质量较为优越。勒努阿尔的女婿爱德华·布朗先生对海绵出口贸易大力扩充，因而使大巴哈马沙洲充分开发的途径被打通了。绰号为“泥浆”的大浅滩，长一百四十哩，宽十至四十哩，是世界上最大的海绵床之一。那里，海

水是那样浅，人们只靠着叉子和潜水望远镜就可以在停船处轻易地将海绵钩上来，用不着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可缺少的附加的曳网和复杂的潜水设备。

当巴哈马海绵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立足点时，在小巴哈马沙洲、南埃留特拉水域和阿克林湾都开辟了更多的海绵床。在拿骚，海绵交易所也开设起来了，与此同时，有不少精通这个行业的希腊人从那个古老的国家移居到巴哈马，并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它们至今仍然被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冒昧地说一句，也许会被认为是不严肃，巴哈马人可算是天生的海绵采集者。只有在海洋中生长的巴哈马人才能够解释反复无常的海水中出现的千变万化的颜色、天气和潮水所展示的奇性怪癖；只有他们才能长期地彻夜不眠和坚持烈日下的劳动。当基韦斯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海绵业中心而兴建起来的时候，这座孤城的早期人口大部分是由巴哈马"海螺"所组成的。1892年，基韦斯特的人口是二万五千人，其中就有八千巴哈马人。

1901年，在巴哈马海绵业发展到最高峰的时

候，就有二百六十五只载货量高达四十三吨的双
桅纵帆式帆船；三百二十二只载重量高达十六吨
的单桅帆船以及二千八百零八只没有甲板的船只
从事采集海绵的活动。当时有五千九百六十七个
男工和童工，换句话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利用
的劳动力被雇用着。海绵的出口数量与价值都稳
定地上升。在1855年和1858年之间，平均每年出口
量为二十五万五千磅，到了1869年出口量已上升 253
到六十二万五千磅；到了1883年，海绵出口价值
一年超过了六万镑；1900年，出口海绵高达一百
万磅，在五年以后出口就达到一百四十八万六千
一百磅的高峰。在1902年出口了价值九万八千镑
的海绵，其中半数运销美国，其余数的四分之三
则运往荷兰、法国和德国。

1938年，一种极其微小的毒菌造成了严重的灾害，致使大西洋西部所有的海绵及巴哈马的全部“天鹅绒”品种的90%都受到破坏，在这之前，海绵在巴哈马的经济领域内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项目。1917年，出口值总计起来已达到了十五万二千镑的记录。虽然在1923年，主要由于代用品塑料海绵的发展，这个数字下降为十一万二千

三百镑，到1938年，总重量下跌到了六十七万磅，但就是这个数字仍然几乎等于地中海八个传统海绵产区加在一起的产量，占世界生产的27%。

虽然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时期内，海绵业是巴哈马经济上的支柱，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项生意中大发其财。即使把最好年景的海绵总值在采绵人中平均地分配起来，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的也只不过是堂皇的二十五镑，实际上，象在以前打捞失事船的时代一样，这些采绵船只都属于拿骚的商人或哈伯岛、阿巴科的巴哈马白种人所有，他们收取了海绵采获量的三分之一，其余的才分配给船长和水手。

采集海绵的航程通常历时五至八周。每次采集的数值大小，几乎全靠采绵者的技术和天气的好坏情况而定。采集者到达水深八至二十四呎的海绵床后，即能把满满一船的黑色海绵钩上来，然后，将其卸在附近海岛的咸水“围栏”内，直到死去的生物体被冲洗干净才取出来。在返航的途中，采绵者将海绵剪断、分类，然后挂在绳索上晾干，采绵船返航时所散发的臭气叫人不易忘

掉。一旦返回拿骚，立即拍卖给纽约、伦敦、巴黎各厂家的希腊代理商。海绵出售以后，要进一步加以整理和打包以便出口，有时还要进行漂白加工。

L·D·波尔斯在其1887年的记载中，描述 254
了黑人采绵者令人难忘的悲惨命运。在这个记载中，他发泄了对巴哈马白种商人阶级痛恨的心情，把巴哈马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他们。虽然，四十年后谢登主教在其著述中对波尔斯的观点表示异议，但是，这样却没有使对方的论据失去分量。波尔斯写道："让我们从头看一看这些不幸者当中一个人的境遇吧。他向船主申请一条用于采集海绵或捕捞海龟——通常是两者同时并用——的船只出海采集。他的报酬不是以工资形式偿付，而是从收获物的盈利中提成，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就成了船主的伙友。凶恶的毁人机械就这样地开动了，它折磨着这个人，成年累月地并且往往是终身地把他当作奴隶来摧残。他的顾主总是自己开设着一个商店或者暗中和开设商店的某人合伙，这个商店主要是为掠夺雇工而开设的，商店内备有一些美国市场上不值钱的

破烂货，而这些破烂货在任何其他地方也推销不了。任何人一经被雇用，就必须在水手契约条款上签名，这样就得随时奉执政官的命令上船出海。就在这时候，他便被鼓励，实际上是被强迫接受一笔预付的款项，作为他将来所应得的利润提成。”

据1885年的一项条例，这笔预付的款项限制在十先令以内，可以用“实物或现金”付给。波尔斯继续写道：“不须说，这些垫款一般都是用实物折付的，实物包括面粉、食糖、烟草、衣服或者是雇主的存货中的其他一些破烂货。海绵采集者很可能不需要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他总是需要多给家里留些钱用，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按原价减半卖掉这些货物……”

波尔斯引证了关于以面粉折付黑人工资的一个事例，这种面粉“连喂猪都不行”，而发票上开价却为每桶一镑十六先令。他还从激进的《公民报》上引用了一段冗长的文字：其中曾估计，有六十多个巴哈马船主和出海装备用品商，每人一年从这一行业中赚来的钱大约达四百镑；而每个水手仅仅得到九镑。波尔斯法官的一个不幸的

朋友曾讲过，他和伙伴们在一次出海采绵中打捞、洗净并晾干九百根绳索的海绵，每根绳索上有九个，总计有八千一百个。这些海绵，在拿骚交易 255
所中出售，共得十一镑，每个平均约半个便士，但是这些海绵在伦敦每个却可卖到六便士至五先令的高价。

《公民报》的社论撰写者用一种特别令人想起波尔斯的独特风格写道："海绵采集者的处境日益难堪，他们当中最好的、最诚实而且最富有精力的人正迁往美国南部各州去；并且，强加于他们的万恶制度所造成的低生活水平，使他们及其家属的体格逐渐地衰弱下去，这是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特点。"

如果，有人对拿骚和外围小岛海绵采集者的处境的描写有所怀疑，只要看一看摄有他们可怜的窝棚及其褴褛衣服的旧照片，就能懂得比较清楚了。把罪责归给谁呢？那就不好说了。我们既不能完全同意这位愤愤不平的爱尔兰人波尔斯的尖锐抨击，把一切罪责都归之于海湾路的商人；也不能赞赏奥古斯塔斯·阿德利爵士心安理得的态度，他向皇家殖民地协会讲过，"他很赞成已经

取得现在这样自治权的当地政府继续下去。巴哈马商人是善良而诚实的人，他们对任何社会都会有好处。”

从1865年起，贫困成为巴哈马群岛特有的地方病。任何一个居留地或阶层都没有逃脱过这个灾难，甚至商人也可能受苦最大，因为他们的生活下降的程度最大，并且他们缺少那些勉强糊口的人们所具有的愉快的适应能力。拿骚处于资本枯竭、精力耗尽、希望丧失的绝境。尽管是个小城镇，但它经常是入不敷出，其债务与日俱增。1876年，公务人员的薪水拖欠达数月之久，《拿骚卫报》甚至建议，对年收入超过一百镑者要征收每镑三便士的所得税。1885年，五十年前建立的国民银行以一万二千多镑的亏欠而倒闭了。处境极困难的政府也不得不加以解救。虽然，在1886年开办了一个邮政储蓄银行，三年后又开设了“拿骚银行”，但是巴哈马首府的金融确实已经濒于瘫痪，直到加拿大皇家银行在1908年开办了拿骚分行时才趋向稳定。

尽管为贫穷所迫，巴哈马人口仍然不断地增
256 长，不过在1871至1921年间总的增长率每年低于

1%，并且，在许多外围小岛，人口实际上有所下降。在1911年以后的十年间，人口总数下降了四千零七十三人即5.49%，许多岛屿减少了10%的居民，这些人移居到美国，特别是移居到佛罗里达去了。在此期间，伊纳瓜由于移民的关系减少了30%以上的人口，可是，不幸的伊纳瓜人怎样维持得这么久，却是令人很难想象的。1887年，有一位巡回执政官视察了马修城，描述了由于美国的高额保护关税所造成的盐业破产的后果。他写道："这个岛的光景较之巴哈马其他岛屿也许更为悲惨，因为仅在几天之前还好象是已走上成功之路，可是到现在，岛上的一切都充满着凄凉之感。通往海岸的运盐电车轨道及运河都经常闲置着，而且被毁坏得十分严重。大多数房屋已空无人烟，几年以前，城镇大部分被火焚毁，人们既没有充足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复。"

但是，最凄惨的也许还不是伊纳瓜岛上的居留地，而可能是西班牙井和阿巴科的霍普镇的"纯白种人"镇区。1903年，巴尔的摩地理学会的一个考察团访问了这些岛屿。那里可怜的人们

——高傲的保王党人的后裔，正处在绝望沮丧的境地，他们以一种顽强的态度维护着他们的种族完整，就象保存着最后传代的家产一样。其结果当然是可悲的。在西班牙井，黑人不得建造住房，甚至不允许过夜，不断的血族结婚已使人口中普遍出现侏儒症以及脊髓痨、白内障等病症。医学博士 C·A·彭罗斯简略地写道："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地方许多居民的智力是相当低的。"

在霍普镇，情况甚至更加严重，那里仅有十二个黑人混居在一千个白种人当中。几乎所有的居民——马龙、拉塞尔、阿尔布里和基等家族都是一位女保王党人怀安妮·马龙的后裔，这位妇人于1785年带着子女从南卡罗来纳来到那里。其居民血缘关系是如此之亲近，以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退化的后果。彭罗斯写道："在马龙家族的早期历史上尚无退化的迹象，但是自他们的第四代
257 起则开始出现退化现象，以后又迅速地加剧起来，一直达到一家之内出现五个白痴的顶点。他们的始祖显然是优秀的，但是，当前子孙的状况却是可悲的。"

在这个居留地有不少白痴、耳聋、哑吧等病

例，几乎10%的人患有脊髓痨，一些人带有先天性失明和多指的病症，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麻疯病。悲观的彭罗斯总结道："输入新血液的问题刻不容缓地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如果任凭老百姓自行解决，就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今后会比过去比较有所作为。他们的后代将比目前陷入更加退化的状态。"很明显，这个与世隔绝的、可笑地自认为比其有色人种的近邻优越高贵的白种人社会，正在面临着种族灭亡的危险。

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处于多数地位的巴哈马黑人沉陷于难以脱身的贫穷和愚昧的泥沼中。历史上和经济上的偶发事件使属于少数的土著白种人取得了优越地位，可是，他们似乎也没有力量去进行领导，而且，由于他们的偏狭性和岛国习气，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似乎注定要遭受劫难的。

幸好，有一些比较美好的事物在前面等候着。两次世界大战、禁酒时期、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地使巴哈马发生了它所渴望的变化。新的要素和见解以及新的财富一步一步地使巴哈马群岛复活起来了。二十世纪的特点是交通事业的大

发展。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巴哈马从这一大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好处。一句话，它使巴哈马经历了一次最新的和最大的变革。

第二十一章　二十世纪 258

1914—1945

闪烁的千里沙滩、碧蓝的大海以及冬季的气候——就连严肃的殖民地报告也称这三者“最为宜人”——始终是巴哈马最宝贵的潜在财富。第一个描写巴哈马的英国作家乔治·加德纳，于1651年称巴哈马的空气“很新鲜，且有益于健康”，诸如约翰·格雷夫斯、乔治·芬尼、彼得·享利·布鲁斯和丹尼尔·麦金农等早期作家们对此见解都有过共鸣，并作了补充的叙述。在1869年写过文章的少校军医巴科特第一个做了关于拿骚的气候条件和健康环境的科学评论，他认为拿骚的环境对旅游者是近乎理想的。疟疾已经绝迹了，但巴科特曾把十八世纪末军队的大量死亡除了归咎于“甜酒和酷热”以外，同时还归咎于疟疾。黄热病、霍乱、天花和伤寒看来也在逐渐地

减少。的确，最后一次严重流行的黄热病和伤寒病是分别在1864年和1866年发生的。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吸引旅游者前来巴哈马群岛，这一问题，在巴科特之后历时五十年还未得到解决。有希望的促进措施并不缺少，巴哈马当局在1851、1857和1879年，通过了鼓励航运事业的法案，并在1851、1859和1879年与轮船公司连续订立合同。然而，早年所做的这些努力都受到了挫折。除“犹太女人号”于1851年被毁坏以外，在1895年前，另外还有五艘游览船失火焚毁或触礁失事了。在1872年，发生了“密苏里号”不幸事件，那时，这艘大西洋轮船公司的班轮在驶往拿骚的途中失火烧毁，九十六名旅客中八十四人死亡。在这些人中，有二人是美国总统格罗弗·克
259 利夫兰的兄弟，其中名叫路易斯的是去拿骚经办皇家维多利亚饭店的。跟着这个不幸事件，又连续发生了以下几起事件：“黄道带号”于1875年在首次航行中失事；“利奥号”于1877年沉没；“奥地利城号”于1881年遇难以及沃德轮船公司的“西恩富戈斯号”于1895年在哈伯岛触礁。

二十世纪以前，旅游业最兴旺的一年是1873

年，当时有五百名冬季游客来到拿骚，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北美的北方人开始发现佛罗里达有引人入胜之处，于是，鲁宾逊总督建议巴哈马应该设法将正在一年一次去苏瓦尼河以南的十万旅游者中的一些人吸引过来。于是，在1898年，议会第四次通过了极为重要的饭店与轮船法案，并和既是迈阿密的创始人又是当地的“沙皇”H·M·弗拉格勒签订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合同。弗拉格勒除以一万镑购买了皇家维多利亚饭店和以同样公平的价格购置了位于拿骚炮台的军队兵营地基以外，又同意建造一座新饭店并提供一艘与佛罗里达沿岸通航的班轮。那座难看无比的建筑物——殖民饭店于1899年开始施工，转年开始营业。

这座新的饭店，和弗拉格勒经营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开设并不逢时，生意从来也没有兴隆过，1921年3月31日的一场大火将这座建筑物烧得片瓦无存，幸而有这场火灾才使这家公司免于破产。靠美国禁酒而增加收入的政府将那块地基又重新买回来，发行了四十三万镑利息3%的公债，又和作为芒森轮船公司的子公司的巴哈马饭

店公司签订了一项十年期限的合同。这座按照仅能称之为拿骚拜占庭式的风格而建成的新殖民饭店于1922年7月动工，竣工时正赶上1922至1923年间的冬季使用。四年后，用当地筹集的十五万镑公债，在蒙塔古炮台附近，又盖起了一座具有同样建筑格式的、拥有二百多个房间的大饭店。

与纽约之间的主要航运，在1879至1917年间曾由沃德轮船公司维持，到1917年以后，则由芒森轮船公司继续经营。按照为期十年的合同，他们从一月份到四月份提供每周一次的定期班轮，其余的月份则规定每两周一次，每年津贴金为三万五千镑。1921年，皇家邮船公司每月一次的班轮开始往返于英国和巴哈马之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又在巴哈马和加拿大之间开始建立了定期航运。早在1880年，就有人建议订立巴哈马—
260 加拿大互惠通商协定，甚至建议将巴哈马纳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不过一直到了1920年，当巴哈马成为加拿大—西印度贸易条约的签订者时，这种联系才得以实现。依照1925年另订的一个条约，加拿大将向拿骚提供一艘能载五千吨货物并

至少能运送一百名旅客的轮船，以每年二千镑的资助金作为报酬。巴哈马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继续扩大，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英帝国特惠关税制之后。到了1938年，巴哈马与加拿大每年的贸易额达到四十万镑以上，或者说几乎占其全部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不过，其贸易对手加拿大是处于很不正常的出超地位。

到这个时候，拿骚的眼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在1873年的一项未获成功的措施之后，1891年通过了电报法案，第二年在拿骚的凯布尔滩和佛罗里达的丘辟特之间建立了电报联系，这样便可以从拿骚直接向美国甚至英国拍发电报了。到1914年，当海底电缆失去效能时，拿骚和佛罗里达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已保持一年多了。在拿骚本地，私人经营屡次失败后，政府于1907年建立起电话系统，两年后又增设了适当的供电装备。

但是，也许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使巴哈马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了。不仅是上千的巴哈马人走出了他们的狭窄港湾，首次到梦想不到的地方去游历，而且许多外围小岛的岛民在此期间也来到或路过拿骚，因而开扩了他们的眼

界，并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最初，1914年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影响还很小，牵涉到的问题也不紧迫。当地各种报纸忙着讨论关于新轮船航运合同、西沙尔麻最新价格以及即将在索冷特海峡①举行的美国优胜杯锦标赛中英国快艇“沙姆罗克号”的胜负等问题，因而使它们所刊载的关于那位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②的简短电讯也就被淹没了。英国于8月4日宣战的消息迟了一天才传到拿骚，但是，仍然受到具有传统爱国精神的人们的欢迎。在《拿骚卫报》及《拿骚每日论坛报》上披露着主战者的论调；总督乔治·哈登－史密斯爵士公开宣讲了英
261 国参战的目的；立法机关匆匆通过了宣战法案和紧急救济条例。到了9月底，总督所组成的战时救济委员会从社会上征集了二千镑款项，并有二百二十五名巴哈马海绵采集者自愿充当英国皇家海军捕获队的船员，然而，这些爱国的海绵采

① 英国怀特岛与陆地之间的小海峡。——译者

② 指奥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炸死一事，德奥集团利用这一事件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集者却从未被征集去服役，到1914年12月，当哈登－史密斯总督被调任向风群岛的总督时，这种初期出现的参战热忱也就逐渐消失了。

实际上，整个战争中仅有的一次重大的境内事件是在最初几周发生的，并且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战争爆发时，发现一艘德国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潜行在阿克林岛和马亚瓜纳岛之间的普拉那礁附近，由于受到英国皇家军舰“萨福克号”的突然袭击，该舰被迫放弃她所携带的一只小船，几周以后，这只小船顺风漂流到阿巴科的霍普镇，并被宣布为战利品。航速七点五浬的“卡尔斯鲁厄号”借助于幸运和精湛的航海术，千方百计地躲避了速度较慢的“萨福克号”、“布里斯托尔号”和“贝里克号”，并且，就在她安全地逃往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以前，还乘机在舌形海峡的格拉西克里克礁从一艘德国煤船上进行加煤。“卡尔斯鲁厄号”于1914年11月神秘地在巴巴多斯附近失踪，很可能是在一次偶然爆炸中毁掉了。

在巴哈马，只是在战后人们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1915年中期，当欧洲国家在弗朗德勒战

斗方酣时，战争的严重性在遥远的殖民地才显露出来。人力第一次感到不足，于是陆军部提议从西印度召募一千人。1891年曾被解散的英国西印度团又重新建立起来，名义上有二千人的兵力。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共有一万二千人在该团服过役。新任总督威廉·阿勒代斯爵士提议巴哈马招募一排兵员，并号召人们从军入伍。第一天就有十一人自愿报名，第一个报名的人是威廉·F·阿尔布里，以后他被任命为军官。总共有七十人应召报名参加第一个分遣队，从中选出了三十名适于航海的人，巴哈马分遣队基金会征集了一千三百一十五镑款项，把这些人装备起来送往法国。

经过匆匆忙忙的训练，这“三十名勇士”，
262 在1915年9月9日举行了动人的仪式，之后，举着大英帝国之女协会赠献的锦旗，乘双桅纵帆式帆船前往牙买加。此后，于1916年5月以前，又相继派出两支分遣队，一支一百零五人，另一支八十七人，并且，在巴哈马群岛作战分遣队法案被通过（1916年）之后，于1916年8月和1917年9月之间，又同样派出总数为二百六十五人的五个特遣队。

总计起来，共有一千八百名巴哈马人入伍服役。除去四百八十七名被派往牙买加，又从那里与英国西印度团调到埃及和法国以外，大概有五十三名巴哈马人是从英国入伍的，五十名是从巴拿马（他们在那里从事运河包工业务）入伍的，并且，至少还有八十名是在加拿大和美国入伍的。除了威廉·F·阿尔布里这样极个别的情况之外，所有在英国西印度团服役的人都是有色人种，法国人称他们为亲爱的黑战士。大多数服役的巴哈马白种人，包括三十六名女王学院的研究生在内，是和加拿大军队一起参战的。出征作战的六百七十名巴哈马人中有五十人阵亡。如果英国政策是要更广泛地使用有色人种部队在前线作战，那么这个比例数就会更大了。多数的巴哈马人被用来充当工兵，在防线的后面修筑道路或准备炮位，虽然他们也经历并承担了大部分的恐怖和艰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赞扬他们的强壮体格和乐观精神，艾伦比和黑格[1]对他们特别赏识。

---

① 艾伦比(E·H·H·Allenby)和黑格(Douglas Haig)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两个英国将领。——译者

在后方，直到战事接近结束时，战争还没有造成真正的困苦。严格实行但往往是多余的灯火管制被人们看成是一种严重的负担。虽然，1914年在贸易方面出现严重的衰退，出口额降低了四万镑以上，但是，在1915年，海绵和西沙尔麻又兴旺起来，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维持着很高的价格，甚至旅游业在1916年冬季以前也一直没有衰落过。

遭受苦难最大的岛屿是不幸的伊纳瓜，因为它是最经不起苦难的。战争前夕，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德国船以及某些荷兰船经常停在马修城去挑选码头装卸工人。战争一爆发，这个值得重视的行业突然中断了，伊纳瓜只是由于战时救济委员会采取了行动，才勉强地避免了真正的饥馑。

为了作出共同努力，以保证战争胜利，巴哈马总共筹集了四万七千余镑的款额。与英国本身所筹集的款数相比，这个数字似乎是微不足道
263 的，但是，在巴哈马的经济上却是极其重大的负担。拿骚银行于1916年12月突然破产，同时，由于美国在1917年4月的参战，接着而来的乃是食品及其他主要供应品的严重缺乏。银根较以前任何时候都吃紧，与此同时，物价也开始上涨到空前

的水平。

在金融吃紧的紧急关头，绰号叫“地方消费部队”的地方防守部队，于1917年6月14日被解散了，但这并不能解决食品缺乏的问题。有一个时期，据估计拿骚的面粉只够一个星期用的，面包房有两天没生产面包。

总督很有信心地对这次危机采取了措施。凭借宣战法案所授予他的紧急处理权，总督通过战时救济委员会征用了库存食品，规定了面包、面粉和煤油的价格，并命令零售商保持供应。1918年5月，救济委员会下令规定：所有的面包应掺入20%的裸麦或玉米面，有几起“黑市活动”受到了举发。1918年7月，有二千五百名合同工被招募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去从事港口安装工作，这就使当时的危急情况有所缓和。然而，确实使巴哈马人真正感到欢乐的，是他们于11月11日星期一当地时间下午3点25分所听到的战争结束的消息。

弗兰克·霍姆斯在1924年写道：“惊人的消息似乎在同一时刻传到该城的每个角落，教堂的、火警的、轮船的以及各种各样的钟声从四面

八方传来，久久不停地响着。犹如变魔术一般，到处出现迎风招展的彩旗，同时，街道上立即挤满了带着胜利欢笑的游行人群，他们随着吹吹打打的乐队，举着随风飘扬的旗帜，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城镇之中。头上带着花环的女商贩高兴地跳着舞，汽车、马车和步行者都拥挤在一起，形成一个纷乱而又热闹的场面。总督和他的僚属都活跃在人群当中……”

1919年初，一届新选出的议会召开了；前一届议会自1910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它在巴哈马历史上是最长的一届议会。第一批巴哈马分遣队的
264 士兵在1919年4月回到巴哈马，两个月之前，两架美国水上飞机曾从迈阿密前来访问，这是在巴哈马群岛第一次见到的飞机。处于困境的议会议决，归来的士兵每人被慷慨地发给五镑奖金。除此之外，议会再无能为力了，公债已达六万九千四百二十三镑，较之1914年多出50%。由于士兵和合同工人的归来，以及海绵和西沙尔麻的价格可能全面下跌，巴哈马完全处于灾祸的威胁之中。

“神祐”——拿骚所在的岛屿新普罗维登斯①是如此适当地以它命名的——再度出现了。1919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战时法案，即禁酒法，作为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这项把大部分本属于无辜的美国人判定为伪善者和罪人的不合理而且不幸运的法律，竟然将制造、输入或出售酒类的活动都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于巴哈马来说，它乃是一个不加隐讳的福佑。从1920年到1933年之间的“酒类走私活动”成了巴哈马的一项获利甚大的行业。它体现了私掠船只、打捞失事船和偷越封锁线等铤而走险的传统。

巴哈马距美国海岸最近的地方不及五十哩，是向那些嗜酒各州私运酒类的一个天然基地。然而，最初岛上的经济缺乏必要的复杂组织，同时当局对这样不可靠的出口贸易还未必给予应有的注意。1920年和1921年的出口额没有大量超过前十年内大约三十万镑的稳定的平均数字。直至1921年年末，巴哈马政府才愈益明显地不再积极支持美国国产税事务。在拿骚几乎一夜之间就涌现出

① “神祐”的英文是 Providence，读普罗维登斯；“新普罗维登斯”可作“新的神祐”解。——译者

二十多个大酒类经营公司，快速汽艇也开始从大巴哈马沙洲和比米尼偷偷地驶过墨西哥湾到达佛罗里达海岸，同时有些包租的双桅纵帆式帆船向北驶到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附近海面的“私酒驳运地”，去进行更远和更险的航行。有时甚至利用飞机，从比米尼起飞，在佛罗里达的沼泽地深处僻静的湖水上降落。

1922年的酒类再出口价值为一百六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二镑，较1921年的数字增长了十倍。
265 1923年的总额为一百五十九万一千五百三十八镑，从1922年到1932年的十年之间平均数字大大超过五十万镑。从巴哈马港口出港的船只数目，从1919年的四百八十六艘载重量八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吨，上升到1922年的一千六百八十一艘七十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吨。在那一年内，分别有七百一十四艘从拿骚，五百六十七艘从大巴哈马沙洲，还有三百零六艘从比米尼出港。凡是能用的船舶均投入工作，在这个时期有一件最有趣的事情：那艘“和平福音号”被美国海关人员所捕获，该船曾一度为主教的快艇，但是，在前一个时候曾被罗斯科·谢登卖掉，又被酒类走私商所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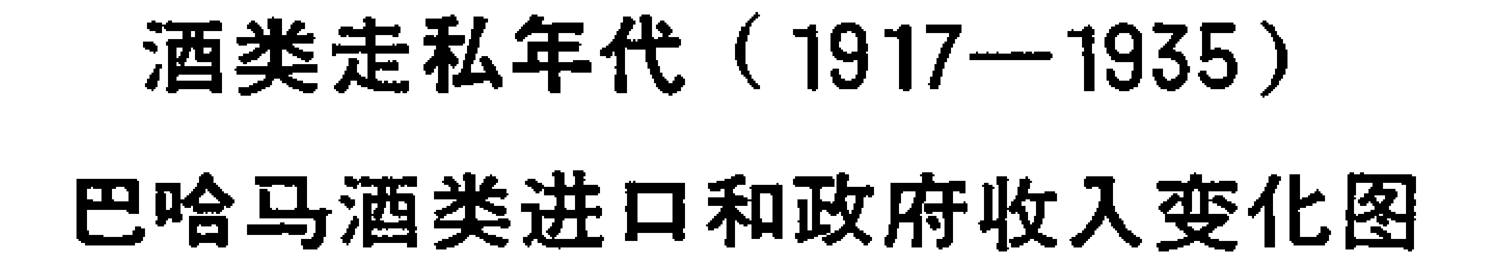
处于困境的巴哈马政府是美国禁酒运动下最幸运的获利者之一。1919年的关税法案，对进口酒类课以较重的关税，随着贸易额的骤然增长，政府的岁入相应地上升了。每加仑标准酒精度的白兰地纳税二十四先令、甜酒八先令、威士忌酒十二先令或每十二“夸脱”（不保足重）二十四先令。海关收入直线上升，从1919年的十万零三千四百九十二镑增加到1921年的三十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九镑，又上升到1923年的六十四万零七百九十八镑，而这仅仅是流入拿骚的一小部分财富。在1920年以前，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金库从未见到过百万元，但是到1929年，外间谣传说，当一伙古巴亡命徒即将突袭拿骚抢劫该银行的时候，金库里塞满了存款，据估计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拿骚当局在银行周围布置了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的警察，结果“强盗们”并没有出现。但是，那些走私归来、口袋里装着一“卷”五万元钞票、在外面寻欢作乐的酒商，却一直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无赖和赌场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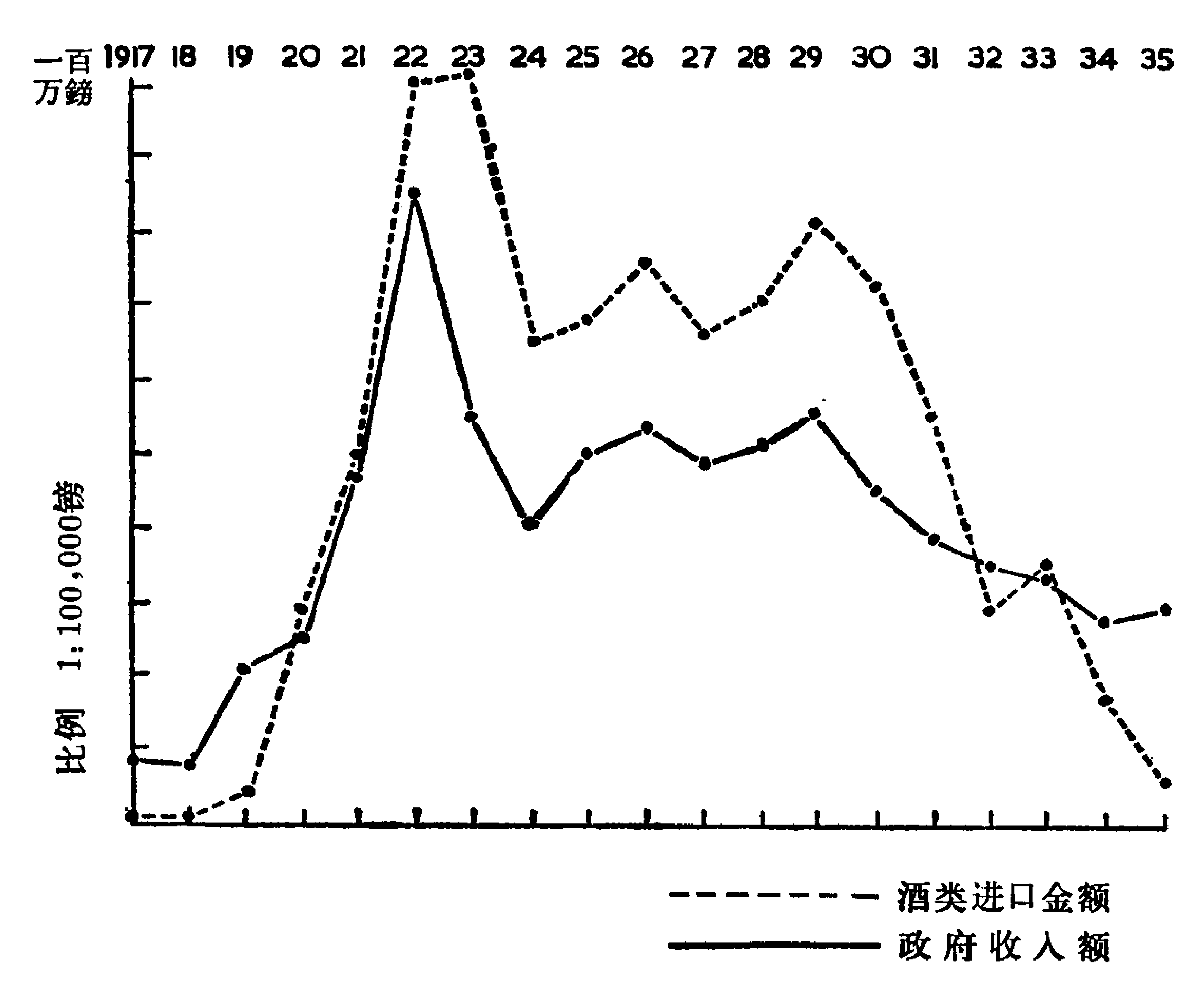
海盗时代的许多歹徒的冒险场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又改换形式再度出现。H·麦克拉

克伦·贝尔写过："在旧日海盗所修建的街道上到处涌现出一股由嫌疑分子、酒类走私商、盗匪头子、拐子、骗子等所组成的人群；与此相对照的是，与他们摩肩同行的是一些外出游逛的私办公学的教师和从未怀疑过自己身边过客的女旅行家们。虽然，那些敌对的匪徒相遇时曾往往掏出枪来，可是，没有什么粗暴行为可述，也没发生过凶杀事件。英国法律的尊严控制了海滨酒吧里发生的骚乱，使其不超出小规模的斗殴。通令上写道：'在拿骚禁止开枪'，意思是说，在那个地方不准掏出枪来。"

266 "……私酒贩子在一堆堆空箱子上面玩扑克，以百元钞票赌输赢；在码头上，用金币作掷钱游戏；当他们乘车去码头搭船航行时还高声齐唱。胆小的人夜间不敢出家门，传教士假借上帝的愤怒来威吓所有的人，曾有人企图在'好人'和贩酒的暴发户中间画一条社会界线以示区别，但是，钱能通神……"

私酒贩子的大本营设在两处：一个是露瑟恩饭店，这座三层楼房目前在弗雷德里克街上仍可找到；另一个是乔治街上的被称为"血桶"的楼





房，这座楼房于1942年在一次整条街的大火中烧毁了。露瑟恩饭店的老板娘是个从新英格兰来的中年妇女，那些私酒贩子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老伯母”。这家饭店是一年一度的舞会和晚会的举行地点，这种集会现在被称作酒类走私商的舞会而被传奇般地传说着。

拿骚的气氛无疑地是在沸腾着，或沸腾到了

极点，这一点只有老年人才能记得。在某一限度上，整个巴哈马从美国禁酒狂热里捞了一大笔钱。正如贝尔在1934年所写的："被忽视的教堂
267 用贩酒赚来的钱加以重修，慈善事业也重新获得了资助，一般生活显得毫华和宽裕了。"政府的债务偿清了，文官的薪俸提高了。黑人劳工的工资增加到每天六元。除了新修建两座饭店外，港口加深了，码头也扩充了。水电的供应以及下水道系统都现代化了，汽车开始增多，因而重建的马路显得拥挤了。如果外围小岛一如既往地还是落后的话，那么，拿骚已经开始第一次呈现了现代化城市的面貌；可是，它却没有丢失其"古老殖民地的迷人色彩"。

然而，如果硬要说在这丰裕的岁月中赚得大部分利润的不只是极少数人的话，这就会是无稽之谈了。少数幸运者所得利润的大小，可根据范·德·沃特的一本有趣的书——《真正的人》（1931年）中提供的数字来估计。一条双桅纵帆式帆船装载的五千七百箱苏格兰威士忌酒，在拿骚付过税后的成本为十七万元，一运到纽约或波士顿附近海面上停泊的船只上去，就立即值三十四万二千

元，在美国上岸后它的价值已加倍到六十八万四千元。再等到这种宝贵的液体到了真正饮酒人的手中时，就很可能值二百万元了。依照纽约州塞讷卡地方的威廉·麦科伊的估计，他在四年中从拿骚装船运出了十七万五千箱酒，仅在一次航运中他就净得纯利十三万元。但是，发最大横财的人很可能“从来没有作过一次航行，或者连一品脱酒也没有卖给过美国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无须乎走得很远，买酒的自然会涌进他们的办公室，把酒直接运到租用的船只上去，然后启航而去。”

由于外国投资受着严格的法律管制，酒业大亨的地位总是被现有的巴哈马商界人士所占据，在他们当中赫赫有名的为贝瑟尔、克里斯蒂、柯林斯、凯利、桑兹和西蒙内特。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这些人在殖民地的立法机关中是有权势的。不管是由任何成分组成的议会，如果它制定法律来抵制这样的意外收入，那么它就会是眼光短浅的，但是，美国禁酒所造成的繁荣，也给巴哈马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化进一步加深了。

1920年的关税修正法案(第二号)规定，从殖

268 民地再出口的酒类准许退80%的税款，只要商人交出证件来，说明它已卸在巴哈马以外的港口并且不再掺其他酒料。1923年的关税法又公布英帝国领地内制造的威士忌酒减税50%。伪造统计表和船只载货清单，在巴哈马商业活动中是常有的事。据一种随意虚构的神话所说，大部分从巴哈马再出口的酒类都被运到纽芬兰海岸附近的法属小岛密克隆去了。巴哈马向密克隆的出口额是这样：1920年为零，1921年为二万五千镑，1922年则为一百二十万零八千七百一十八镑！1922年的数字占该年巴哈马出口总额的66.2%。无须说，官方发表的酒类再出口数字仅仅代表贸易额的一部分，不仅有一大批数量不详的酒类从该殖民地私运出去，而且还有一大批作为私货偷偷地运进来，这批货物从来也没有扣存在保税仓库内估过价。

酒业大亨的发财致富和房地产投资业务从一开始就有着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巴哈马的土地投资出现了繁荣局面，这种投资实际上不过是，在喧嚣的十年间对佛罗里达土地的疯狂投机的扩展而已。1929年，泛美航空公司设立了从迈阿密起飞，历时两个半小时航程的每日班机，

接着，富有的美国游客便开始在这个用几小时即可从美国各地到达的地方购置地皮，兴建住宅。意味深长的巧合是，巴哈马航空事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先在酒类贸易中发了一笔大财，然后又在房地产方面巩固了自己的产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新普罗维登斯的东大街、格罗夫、普罗斯佩克特·里杰和凯布尔滩（一度曾为J·S·约翰逊的菠萝种植场）等地方，都点缀着美国暴发户用灰泥粉饰的高楼大厦。在比米尼建造了一家新饭店、一所射击俱乐部以及一些现代化的房屋，甚至连许多小岛也被乐观派的投机商买来买去。在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间，据估计，在巴哈马的房地产投资额总计竟达四、五百万美元。

巴哈马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它的消失注定和它的到来是同样快的。1929年10月开始的全世界物价大暴跌使巴哈马的新投资活动停顿下来， 269
但是，当禁酒法仍然有效时，总有一笔稳定的——即使是在下降的——贩卖私酒的钱流入。仅在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第一届总统任期的第一年，根据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撤销了禁酒法

时，这笔资源才枯竭了。1935年的“不分类的再出口”贸易总额已降到微不足道的十二万一千镑。正如H·M·贝尔在1934年引用一个爱尔兰人——老露瑟恩饭店的酒吧男侍者托姆·拉维尔，在他遗憾地最后一次配制航行中旅客饮用的改制酒时所说的一句话：“伙计们，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得开始工作了！”

从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公布时起到1941年12月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的年代里，巴哈马经历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即使人们对其情况很熟悉，也未曾使它变得比较可以忍受些。虽然本地生产的食品不算少，而且价格便宜，可是，即使有工作可做，工资却已下降到不能维持温饱的水平。如果一个劳工每星期能稳定地得到十先令，那他就算是个幸运的人了。家庭佣仆辛勤地劳动，往往仅赚得自己的食宿。新的建筑停止了，地皮价格正如上涨时那样迅猛地下跌，新房子空荡荡地无人居住，砖瓦崩塌，墙皮剥落，不断滋生的灌木把新开辟的土地侵占了。1938年

的出口额勉强地达到了十八万二千镑。海绵业在1939年初刚刚瓦解，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紧接着爆发，这个生命力迄今还很顽强的巴哈马似乎已经受到了双重的致命打击。在外围小岛上，实际的饥饿情况并不是人们不知道的。

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失去信心，他想巴哈马将会出奇地重新获得繁荣。这个人就是H·G·克里斯蒂，他于1896年出生在拿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加拿大的英国空军供职，是巴哈马群岛上从事土地开发的一个先驱。他最初于1927年作为卡特岛代表被选入议会，是巴哈马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开发局的第一任局长。他那从未动摇的狂热理想“至少是要把这个不足道的地方变成世界富翁的麦加①，成为一个富丽豪华得足以使国际风尚从里维埃腊、比亚里兹和棕榈滩②被吸引过来的世界都会。”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贫穷岁月里，实现这 270

① 麦加为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城市，穆罕默德诞生地，此处借喻富翁仰慕的目标。——译者

② 里维埃腊（意大利）、比亚里兹（法国）和棕榈滩（美国）都是位于海滨的疗养胜地。——译者

个理想似乎是希望不大，但是，甚至在最不景气的年月中，哈罗德·克里斯蒂却获得了小小的成就。在1934年，他曾设法吸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为其服务过的国家里最富有的公民哈里·奥克斯先生（以后封为爵士）到巴哈马来，并使其成为巴哈马的居民和大投资家。从1934年到1943年期间几乎可以称作奥克斯时代，没有其他人对二十世纪的巴哈马生活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奥克斯是一个谜，而且是个自相矛盾的谜。他怕出名，可是在其一生中他却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上千篇的故事讲述着他的事情，但是，人们却很难辨明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慈善家，但有时却吝啬到刻毒的程度。他是一个有鉴赏能力的艺术品蒐集家，但其行为之粗鲁有时会达到戏剧化的地步。虽然他时常打扮成加拿大育空河流域金矿地的一个老探矿家，实际上他是出身于缅因州一个富裕家庭的美国佬，并且在美国东部最好的学校之一——包多因学院读过书。他出生于1878年，当他还在求学时期，就决定去淘金以求发财致富。他从阿拉斯加到刚果，又从澳大利亚到

安大略[1]的北部去探查世界金矿达十四年之久。艰苦的岁月折磨了他，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具有自立精神的人，当他的事业有所成就时，这种自立精神就变成了冷酷无情。

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把奥克斯的奇妙成就归因于偶然的事件。据说，他因为穷得分文无有，曾在安大略的原野上，被一位乘务员从火车上推下来，就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他长期寻求的私有金矿。实际上，他对累克绍尔矿的发现以及从1914年起的开采是富于经验的计算的结果，而这种计算又是在他的近似狂妄的决心支持下实现的。这个西半球第二个最富的金矿——累克绍尔，使得哈里·奥克斯成为拥有数百万财产的大富豪。到1930年，除了在缅因的巴尔港的一幢巨宅外，他在克克仑一累克[2]、安大略、尼亚加拉瀑布城、棕榈滩、伦敦的肯辛敦以及苏塞克斯的托廷沃斯公园都置有房产。

虽然奥克斯自愿地给慈善事业以慷慨资助，但是他对加拿大政府在他的财产上所征的重税深

① 安大略是加拿大南部的一个省。——译者

② 克克仑一累克位于加拿大东南部。——译者

271 为怨恨，在理查德·贝内特的保守党于1931年执政后，奥克斯估计他的85%收入将从他的口袋里被窃取去。虽然他在1924年已成为加拿大公民，但是，他在四十八岁那年结婚后却表示要离开加拿大，在1934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他在棕榈滩遇到了哈罗德·克里斯蒂，受其劝告将巨大的财产转移到渴望新投资的地方——巴哈马。由于他的离去，加拿大报纸上出现了如下带有抱怨味道的大标题：

家财数百万的逃税老手
对巴哈马是个圣诞老人
对养肥他的国土心冷如冰

哈里·奥克斯仅在新普罗维登斯一地就购置了七千瞰以上的土地，这些土地在拿骚的西南，从那里可俯瞰肯宁哈姆湖。在他所购置的许多房产中，他最心爱的一所住宅是韦斯特伯恩，即现在属于巴哈马乡村俱乐部一部分的一所华丽大厦。他以一个青年人的热情，投身于总额达四十多万美元的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雇用了许多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当地劳工。

年青时很喜爱树木的奥克斯却变成一个以猛烈破坏新普罗维登斯的荒林而闻名的人。在韦斯特伯恩附近，他开辟了一个壮观的新高尔夫球场。无疑的，他经过其密友克里斯蒂劝说后，在拿骚西南两哩的地方铺设了奥克斯机场，即巴哈马的第一个飞机场。

在奥克斯的所有事业中，再没有比他购置那所令人烦恼的新殖民饭店——后来由他改名为英国殖民饭店——更富有传奇性了。如果传说是真实的话，有一天他穿着探矿者式样的服装去饭店，遭到了闭门羹或者受到了冷遇，第二天他便把这家饭店买过来，以便能够解雇那个对他遭受难堪负有责任的人。事实的真象是，奥克斯和克里斯蒂一样，总是十分重视未来的。当奥克斯于1943年死去的时候，他在拿骚的财产价值共达三百六十七万一千镑。如果他再活十几年，他将会亲眼见到他在新普罗维登斯的地产至少要增值十几倍。

甚至在一些慈善事业中，奥克斯也不是没有做某些利己的考虑。他长期雇用着一千五百名左右可能失业的劳工，因而使他在拿骚逐渐地深得人心。在1938年，他被选为议会议员，作为总督 272

的一个亲密朋友，他已成为巴哈马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后来他又被选为立法会的成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英国款待客人和捐助慈善事业时，选择对象都加以适当的考虑，例如，他曾慷慨地捐助给圣乔治医院一笔五万镑的款项。1939年6月8日，正当国王乔治六世访问奥克斯的故乡时，他被授以准男爵的勋位。

以后，不到三个月，英国对德宣战，巴哈马再一次和一个与它未曾结怨的敌人进行战争。英国已经发觉在整个的萧条年代所能够给巴哈马的帮助是极其微小的，针对这一点来看，巴哈马对盟国事业的一片忠诚确实是不平凡的。

在战争期间，虽然仅于1944年征募了一支分遣队与北加勒比团一起到海外服役，而且仅有十四个巴哈马人在现役中牺牲，但是却曾经有将近一千一百人服了兵役，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地方自卫的。此外，巴哈马为战争所提供的财政支援肯定不少于五十万镑，这种支援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如：无息贷款、战时慈善事业基金的建立、飞机和坦克的购置以及由作战物资委员会对二十船有用物品的征集。

然而，必须承认巴哈马不仅免受了战争的恐怖，而且战争对其经济的影响几乎是完全有利的。例如，在动荡不定的1939年一度不振的旅游事业，到1940年的冬季又出现了小小的繁荣。配给制直到1942年才见诸实施，并且执行得不很严格，因而在欧洲、非洲和亚洲正在进行着的生死搏斗，就好象远处的暴风雨一样不受注视；虽然雷电交加，但是波及此地的只不过是边缘的阵雨而已。

欧战对巴哈马的第一个直接影响是一群避难的富人的蜂拥而入，他们为了免遭物荒和战祸而从被围困的英国逃脱出来，这样就出现了一些迹象，预示着房地产价格将要暴涨，拿骚上层社交人物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了。前英王爱德华，此时的温莎公爵①，偕夫人（以前的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来到这里就任总督，这样就更助长了这种气氛。

① 爱德华八世（1894—1972）于1936年1月20日登英国王位，因其与非贵族出身的已婚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婚，以致引起王室及首相的异议，致使其于同年12月11日被迫让位。以后英王乔治六世封他为温莎公爵。——译者

在战争的第一年，这位公爵正旅居在葡萄
273 牙，当时他曾经成为轴心国驻里斯本的外交使节们策划的一件阴谋的无辜对象。温斯顿·丘吉尔唯恐他被扣为人质，甚至被立为傀儡国王，于是派遣沃尔特·蒙克顿爵士劝说他返回英国。过了几个星期，他被委任为巴哈马总督，这个职位他从1940年8月一直担任到1945年5月。

不久以前，温莎公爵夫人曾写文章，把她自己和公爵在拿骚的寄居说成是一个违背本意并有些令人不愉快的放逐。在私人通信中，她提起新普罗维登斯时，甚至使用了厄尔巴和圣赫勒拿①这样的字眼。可以想象，这种态度在拿骚不会被人们满意地加以接受。对于那位受人拥戴的总督，邓达斯市政中心的创建者，查尔斯·邓达斯爵士来说，这种态度也是不公平的。这位总督在其任期未满时就被迫离开了巴哈马。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以高尚风格掩饰了失意的心情，但是他内心的苦楚是可以理解的。拿骚的一位编辑谈过，在查尔斯爵士得知其立刻被召回的消息后不久，他

① 厄尔巴（地中海内一个小岛）和圣赫勒拿是拿破仑两次被流放的地方。——译者

曾和这位爵士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他已经被委派到另一半球的乌干达去任职了。

他在离开拿骚时曾表示失望，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拒绝这个新职务？"

他答道："我不能拒绝。为了给某人腾位子我才被调离此地。我不能告诉你此人是谁，可是，过不了几天就会发表，那时你就会明白了。这将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稍停一会儿，他抑制不住一阵怒火，用尖刻的语气讲道："我真不懂为什么为了给他腾位子就应该把我挤走。"

虽然巴哈马这个殖民地在1937年国王放弃王位的争论中出现过意见分歧，但是它仍情愿效忠于这位仪表非凡的新总督。在一个雾气蒙蒙的八月天，这位新总督，在一艘驱逐舰护送下，乘坐着加拿大皇家军舰"萨默斯夫人号"抵达此地。在整个任职期间，公爵本人较之其常常直言不讳的妻子更为人们所欢迎，毫无疑问，他在这个意料不到而又是陌生的殖民地总督的卑微职位上，曾经竭尽所能地工作。然而，看起来很不合情理的是，事实证明充任这个没有内阁大臣作为辅佐

的职位，较之身居英国王位，更加困难重重。

在温莎夫妇未到之前，巴哈马议会已经决议
274 通过拨款一千五百镑来修缮政府大厦，使其成为现代化的建筑。公爵夫人召来一个她所熟识的纽约著名的房屋装饰师，并全权委托他来承办这项工程，在此期间，她和公爵先后在弗雷德里克·西格里斯特爵士的公馆和奥克斯的韦斯特伯恩寓所作客。等到政府大厦已经失去维多利亚时代的外表，修饰得更加舒适可居时，账单上的费用已达到了五千镑之数，这笔款项议会是带着几分苦笑来付清的。

温莎公爵最可贵的功绩是组织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职务。这个唯一的由总督亲自主持的政府机构或委员会，现在仍以外围小岛一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存在着。为了防备一次——实际上并未出现——食品危机，公爵曾发起提高外围小岛农民生产力的方案，并且在青山路建造一所迫切需要的婴儿福利卫生所。

公爵或许是因为在放弃王位的危机期间或者危机之后，一些地区对待他的态度使他感到伤心，所以他不喜欢当地报纸对他所提出的批评。

有一次，他提醒艾蒂安·迪皮什，在英国批评王室亲族不是寻常的事情；可是迪皮什却肯定地回答他说，他是作为殖民地总督而不是作为亲王而受批评的。此后，公爵不只一次地利用紧急战时权力法案所授与他的特权，根据“为了保证安全的理由”，拒绝报界接触许多非军事的活动，其中包括1941年被杀害的肯特公爵的追悼仪式。

1942年6月1日发生了在这个殖民地历史上无比严重的骚乱事件，当局根据比较充足的理由，小心谨慎地把它掩盖起来。虽然在皇室律师阿利森·拉塞尔爵士主持下，进行过一次国会调查并由英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但这一事件却大半已被人们忘记或被掩饰起来了。在1940年8月，据宣布，为了换取五十艘陈旧的驱逐舰，英国政府把巴哈马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埃克苏马岛的乔治镇上一大片土地，租借给美国人作为海军基地，期限为九十九年。以后不久，美国海军开始在那里修建一个水上飞机场，他们几乎按照美国的工资标准雇用了当地的劳工，这样就给贫困的埃克苏马人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1942年初，当美国——此时已经参战——决 275

定扩充奥克斯机场，并在新普罗维登斯的西端建设一个新空军基地时，其所带来的利益又大大地扩大了。普莱曾特维尔公司获得了承包任务，并准备按照每日至少二美元的美国黑人工资标准雇用二千四百名巴哈马人。这个标准若和1936年巴哈马工人的平均工资每日二先令相比，简直有点象是一次革命。承包人几乎被所有健壮的巴哈马人所包围。

面对经济上的混乱状态，可能是由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建议，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被“固定”为每天四先令。在这项“工程”中巴哈马黑人开驶卡车，每小时挣得工资一先令，而干同样活的美国白种人每小时至少可赚到一点五美元，结果造成了一片混乱。经过几天的吵吵闹闹之后，数以千计的愤怒人群象漩涡似的蜂拥到“山丘上”集合，然后直冲到下面的海湾路，捣毁了门窗的玻璃，并抢掠了那些被认为是“骗局”制造者的大老板们的商店。官方当局出动了那时驻防的苏格兰高地连进行弹压，宣读了暴乱取缔法，并且颁布了戒严令。接着又持续了两天，在驱散人群和维护秩序时有二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工人们

压抑着怒火复了工。两周后他们的工资增加到每天五先令。

这次骚乱引起了一个意料不到的悲惨反响。过了不到四个星期，不满的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一个异想天开的纵火犯，本身是个经济上行将破产的商人，放火烧了他自己在海湾路西头所开设的商店。烈火以惊人的速度猛扑到乔治街并越过马路，威胁着拿骚整个商业区，幸而从空军基地开来的消防车作出了英勇的努力，才把这场大火灾控制住。温莎公爵，为了抢救海岛商店货架上的货物，象囚禁中的奴隶一样地投入了劳动，从而挽回了一些其在骚乱事件中失去的声誉。纵火犯知其罪行严重，惊惶不已，接着就被捕归案并判刑七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骚在1939至1945年这一时期发生的最为惊人的事件，都和战争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另一桩类似的事件是哈里·奥克
斯爵士的被谋杀。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 276
1943年7月7日的大风之夜，它使世界各地报纸上关于战争的大标题为之让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无法捉摸的一个谜。

奥克斯的妻子已经离开家到巴尔港去躲避潮湿的夏季，而奥克斯与哈罗德·克里斯蒂及另外两个人在韦斯特伯恩寂静地度过那一夜晚，到了11点钟左右，那两个客人回自己的家去了。独身汉克里斯蒂没有走，被留住在与奥克斯的房子仅隔一间的备用卧室里。这两位朋友在11点半左右互道晚安后各自去安歇。公馆里没有一个仆人。当克里斯蒂在清晨7时许醒来时，他发现哈里·奥克斯爵士被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头部被打烂了，尸体被扔在床上，喷上了易燃的酒精，点燃了起来。

温莎公爵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运用他自己的新闻检查权力，但是做得已经太晚了。那位曾同奥克斯和克里斯蒂早已约好见面的艾蒂安·迪皮什首先听到这个凶杀事件，并且已将这则消息用电报通知世界上各个遥远的角落。作为下一步的措施，公爵抛开当地的刑事调查处、美国联邦调查局或附属于拿骚军队的非常能干的犯罪学专家，而向迈阿密打电话请求两名他所熟悉的警官梅尔彻恩和巴克给予协助。梅尔彻恩是一个有经验但或多或少地缺乏想象力的

侦探；两人中体格比较强壮的巴克则是一个恶棍，后来染上了吸毒嗜好，他本人于1952年遭到暴死。

梅尔彻恩和巴克把当地的警察排挤在一边，坚决地开始工作。在7月9日晚间，南希·奥克斯的丈夫，毛里求斯人马里·艾尔弗雷德·富凯罗·德·马里尼"伯爵"就捕，并被控以谋杀岳父的罪名。对德·马里尼提出控诉时所陈述的理由似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人们都知道哈里爵士和夫人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因而德·马里尼和他们很疏远，可是他对自己于7月7日夜间不在现场这一点，提不出无可置疑的申辩理由。事实上，据了解在午夜以后他曾到过韦斯特伯恩的附近。当他的住所被搜查时，他找不到他在凶杀案发生的那个夜晚所穿的衬衣。巴克检查了德·马里尼的胳膊和胡须，声称毛发有烧焦的迹象。六天后，当巴克宣布他已发现哈里·奥克斯爵士的卧室的窗帘上有德·马里尼的指纹时，这个不幸的毛里求 277
斯人看来就要被送到绞刑架上去处死了。

1943年10月16日举行了轰动社会的审判，审判长奥斯卡·戴利爵士及全由男子组成的陪审团

出席审讯。这次审判延续了三个星期之久。德·马里尼的辩护人为戈弗雷·希格斯先生及副手W·E·A·卡伦德先生。审判的关键是对巴克进行的历时三天的盘诘，在盘诘中希格斯实际上迫使这位迈阿密侦探不得不承认他伪造了作为罪证的指纹。11月8日下午7点20分，在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陪审团刚刚退席一小时就以九比三的表决宣判无罪，可是，又前后矛盾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德·马里尼应该被驱逐出这个殖民地。

在谋杀案的审判期间，几乎无人注意到新普罗维登斯的两个飞机场已于1943年11月间全部建成。尽管当局削减了工资，承包人在十八个月内用于雇工方面的经费仍达六十二万九千九百七十八镑，同时通过本地商人又支出了将近二十五万镑。工程结束后，未曾象过去那样出现萧条景象，因为从1943年到1945年期间大约有五千名巴哈马工人长期被美国雇用，从事农业劳动，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这种临时工的外流现象也不断地发生。

在拿骚有许多人替两个新空军基地承办膳食

而发财致富。从1943年到战争结束期间，新普罗维登斯由于担负下述几种任务而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英国空军技术训练的据点、横越大西洋运输线的中间站，以及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反潜艇战役期间海洋巡逻和空中—海上救援工作的基地。对巴哈马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在战时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拥挤着数以千计的空军休假官兵的首府拿骚，当时呈现出一座驻防城市的景象。

虽然有些人以某种不同的感情来看待这个给巴哈马带来很多好处的战争结束，但是庆祝战争胜利的活动是足以使人心悦诚服的，1918年11月11日的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又在1945年8月14日，即对日本战胜日，重新出现了。

278 第二十二章　今日和未来

1945—1963

战争结束了，人们如此欢欣鼓舞地进行了庆祝，继此而来的并不是惯常出现的物价暴跌。确实，1945年以来曾经出现了一个有显著发展和成就的时期。在开发局看来，仅就旅游及投资两项高涨的数字及相应增加的政府岁入来讲，这个时代也是吸引人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很重要的，但还不能说明一切。近年来，在生活水平、教育和政治觉醒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进，特别在拿骚更是如此；但是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许多情况来看，最近的发展来得太快了。当权者只顾眼前，思想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无权者往往成为激进分子，缺乏明确的改进办法。紧随着个人主义之后势必将出现空虚的理想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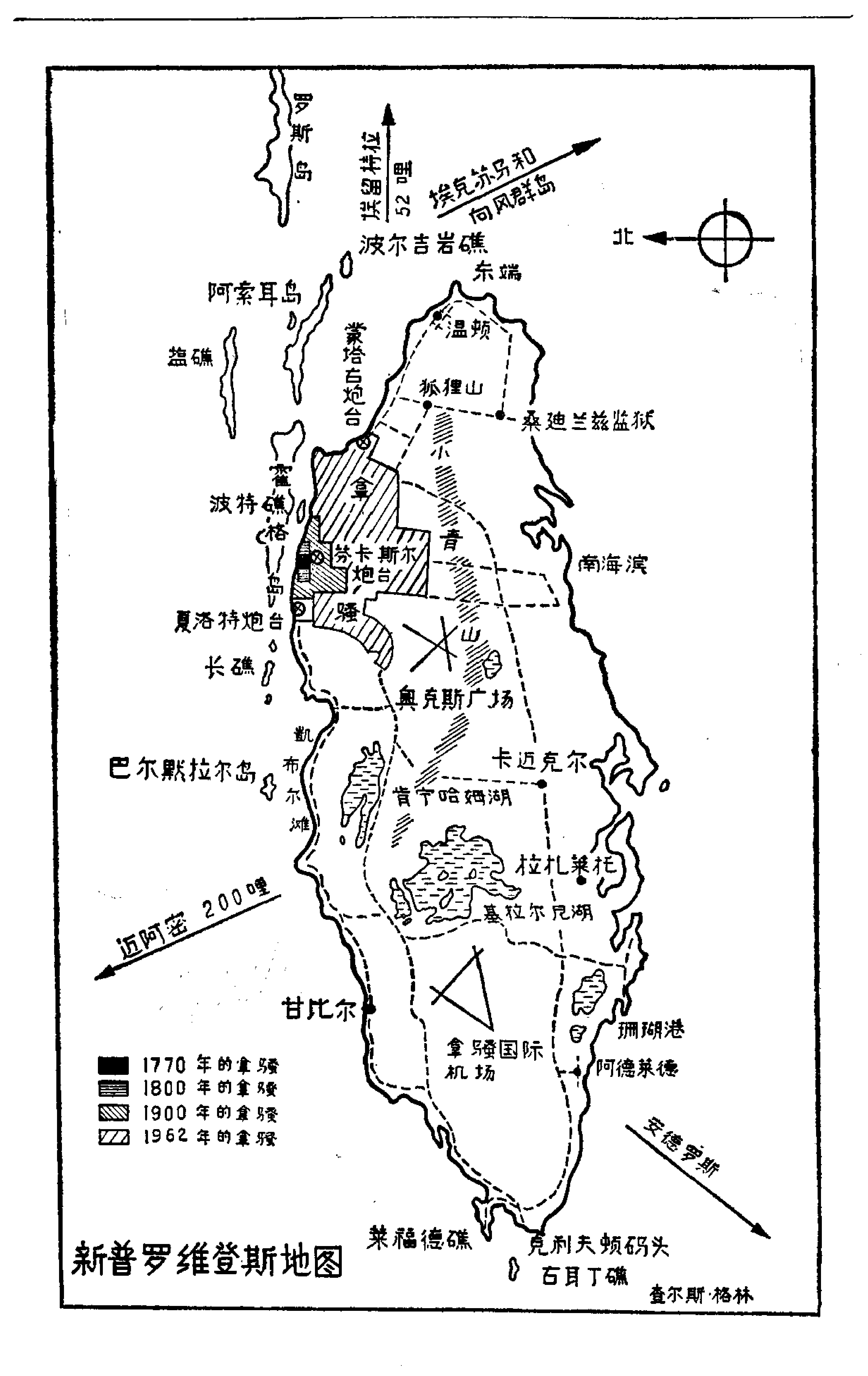
在巴哈马还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当占大多

数的巴哈马黑人的社会与经济解放达到高潮时，就会在“平等”的旗帜下产生一个颠倒的种族歧视的运动。其次，这个诱惑人的口号——自治，可能引导巴哈马人忘记与英国保持关系的好处，从而使巴哈马处于多风暴的国际事物海洋中的一叶扁舟的地位。况且，近一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带有潜在危险的对近邻美国的经济依赖。如不趁大好时机去改革经济使之多样化，其结局将会和政治上的强硬不妥协的态度一样地遭到厄运。

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旅游业的惊人的发展。就巴哈马而言，在战时遗留物——两个现代化航空港的帮助下，航空运输事业大有改进，从而使这个风景幽美的群岛，与一个正处在经 279
济繁荣阶段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度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佛罗里达人口过分拥挤，古巴处于动乱之中，因而，“古老”拿骚的比较来说未被损坏的魅力，以及廉价的奢侈品也都在吸引着来自邻近大陆的假日游客。现在，每天穿梭般地来往于拿骚和佛罗里达之间的飞机多达三十架，五十分钟一趟，往返票价低到八镑十五先令。并且整个群岛

有二十一座飞机场。二十多家饭店和备有宿舍的俱乐部——其中有十二家是1949年以后建成的——每天可向五千名在拿骚游览的游客以及外围小岛一千六百名游客供应膳宿。

毫无疑问，一直吸引旅游客人到拿骚来的唯一最大因素，是巴哈马开发局所办理的促进旅游事业的广告。在一位赫赫有名的巴哈马律师、实业家、(无须说)也是议会的议员斯塔福德·桑兹的主持下，开发局根据它自己的条件参加了美国广告业的剧烈竞争活动。这项投机所付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旅游人数能够证明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证明，这笔开支是完全正当的。1949年，有三万二千零一十八名游览者来到巴哈马，开发局花费了不到十万镑。同年，举行了一次普选，新的议会议决将分配给开发局的经费差不多增加一倍。1950年，旅游者的数目上升到四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转年又增至六万八千五百零二人，五年以后，即1956年，开发局的经费已上升到四十七万五千二百四十二镑，远远超出欧洲以外的任何其他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同时，旅游者的总数也上升到十五万五千零三人。除了1958年略有收缩


罗斯岛
埃留特拉 52哩
埃克苏马和向风群岛
北
波尔吉岩礁
东端
阿索耳岛
温顿
盐礁
蒙塔古炮台
狐狸山
桑迪兰兹监狱
小青山
拿骚
霍格岛
波特礁
芬卡斯尔炮台
南海滨
夏洛特炮台
长礁
奥克斯广场
凯布尔滩
巴尔默拉尔岛
卡迈克尔
肯宁哈姆湖
拉扎莱托
基拉尔尼湖
迈阿密 200哩
甘比尔
珊瑚港
阿德莱德
拿骚国际机场
1770 年的拿骚
1800 年的拿骚
1900 年的拿骚
1962 年的拿骚
安德罗斯
莱福德礁
克利夫顿码头
石目丁礁
查尔斯·格林

新普罗维登斯地图

外，这一显著的增长速度已经维持住了。1961年，一年到头，每天都有一千旅游者来到这个群岛，开发局为此付出的费用大约为七十五万镑。

游览季节不再局限为冬季的两、三个月，而使饭店在其余的月份都关门歇业。仿照佛罗里达的一项类似的新作法，巴哈马也采用饭店按特殊“经济”的比率收费的办法，在炎热的夏季招来一批新游客。例如1959年7月间来到拿骚的游览者有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七人，仅较旺季的3月份少七千五百人。

与旅游事业的兴旺并行的，或可能更为显著的是在巴哈马掀起的一股投资浪潮，投资者大都 281
是美国人。饭店业享有鼓励饭店业条例所规定的非常有利的条件。除饭店业之外，不知有若干百万的巨款都倾注在巴哈马的建筑事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上。由于政府不收所得税或公司税，而仅征收4%名义上的立遗嘱人不动产税，巴哈马享有所谓“有益的金融气候”的好处。对逃税者提供方便，已成了巴哈马最能赚钱的事业。土地投机商之间的竞争使房地产价格上涨到梦想不到的高度。现在拿骚商业区的土地，按房子前沿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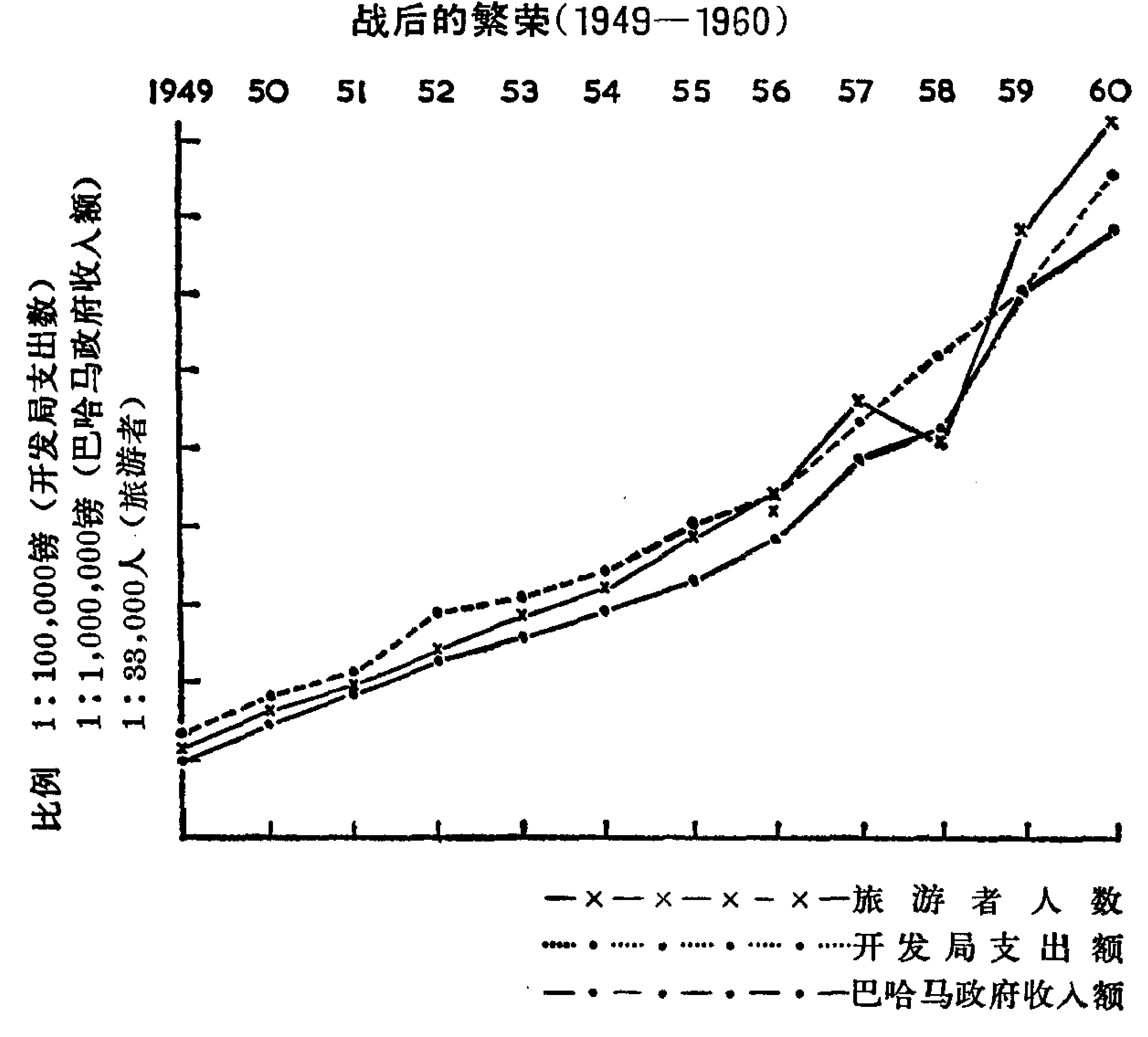
度计算每呎约值一千五百镑，或每平方呎十至十五镑。1924年，在凯布尔滩以每块(宽一百呎、长四百呎）二百镑的价格售出的若干块土地，现在一转手房子前沿每呎就大约能卖同样多的钱。甚至在外围小岛，土地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也已经上涨十倍之多。

在小小的新普罗维登斯，海滨土地变得如此奇缺，以前那些海滨私人住宅为了图清静，在其周围留有一嗽土地也不算浪费，现在在那里，却象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一排排大规模的联合公寓。这些公寓总是在竣工之前就已售出，价格最低六千镑，高至三万五千镑，有时还要高些，此外，房主每月还要付出二十五至三十五镑的维修费。

巴哈马的投资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世界百万富翁的有趣的横切面。这些投资者之中包括在安德罗斯拥有九万嗽土地的瑞典实业家阿克塞尔·温纳-格伦博士，和美国铝公司的九十多岁的董事长阿瑟·维宁·戴维斯，他在埃留特拉岛的罗克桑德也拥有上述数目的土地。除去奥克斯家族外，新普罗维登斯的最大投资者就是加拿大的啤酒大亨E·P·泰勒，他花费了三百万镑以上的

资金开发莱福德礁，那里的地价每一嗽半高达二万七千镑。1959年，纽约铁路实业界巨头亨廷顿·哈特福德以三百六十万镑买下霍格岛，并开始了成本将达二千万美元的十年建筑工程。在安德罗斯北部，钢笔、墨水大王肯尼思·S·帕克已开办了一处八千五百嗽的草莓、蔬菜农场。巴哈马一些小岛屿的所有者当中有环球航空公司的霍华德·休斯和得克萨斯州的煤油大王小克林特·默奇森。

然而，在所有的工程设计中，最为雄心勃勃并
282 使人鼓舞的要算是沃利斯·格罗夫斯富于理想的创作——大巴哈马的弗里港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这位在巴哈马经营木材公司的格罗夫斯就曾抱有一个幻想的计划——在玳瑁溪附近灌木丛生的荒地和栲树滩上兴建起一个巨大的自由港和工业中心。1955年，巴哈马政府授与格罗夫斯的大巴哈马港口管理处五万嗽土地，并且使它对另外五万嗽土地享有买卖权。同年的一项法案保证，在1985年以前，免征所得税、资本增益税、房地产税或私人财产税；在2054年前，免征一切关税及国产税(个人用品不在此例)。除此之外，



港口管理处曾经提出保证，防止不合理的竞争或对劳动力的争夺。

由于被这些慷慨大方的条件所吸引，大约有四十家美国企业已经利用了土地买卖权，并且有几家企业已经开始了建造。当油船大亨D·K·路德维格在日本得到了更优惠的条件时，他便撤销其在弗里港建立一个巨大的造船厂的计划，但是到这时，他已经在这项工程上花去了二百万镑，283

用于建造一个带有六百呎转向船坞的三十呎港湾。在这离佛罗里达海峡——世界上大航道之一——没有多远的理想位置上，弗里港船用燃料供应公司于1959年夏初开始向船只供应免税燃料。由于一艘船从弗里港装载五百吨燃料能节省将近一千五百美元，因而弗里港立即成了北美东部最受欢迎的船用燃料供应港了。在开业的最初三周，弗里港船用燃料供应公司就售出了二百五十万加仑柴油，并且，经常有许多船只排队等待着卸油或装油。

到了1961年，弗里港已经很自豪地拥有五十哩公路和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一家诊疗所、一座现代化学校、几家大商场以及一个合乎标准的航空终点站。沃利斯·格罗夫斯在这项工程中已经花费了约六百万镑，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想象到一座迟早将会建成的城市，它将有十万居民——几乎相当于1961年整个巴哈马的人口——并拥有“宽广的林荫路、漂亮的商店、餐馆和完整的舒适住宅”。

拿骚的“海外”公司或“皮包”公司的发展虽然不如弗里港这样的工程计划那样显著，但

是，对巴哈马来说也是同等重要的。这些公司只是旨在逃避美国和英国关税的法律上的虚设机构。目前，美国的公司可以在巴哈马组成无法课税的分支机构，它们可以将销售出口货物所得的全部利润储存起来。因为这些公司最能迷惑人的有利条件之一是活动隐蔽，所以它们的业务量只能凭推测而得知。正如一个投资业的经纪人不加隐讳地表述的那样："由于巴哈马和任何其他政府之间没有订立关于交换经济情报的协定，所以这种公司在拿骚某家银行或股票经纪人的帐簿上开立的户头不受外国当局检查。"同时，巴哈马政府也不要求这些多半是虚设的股权公司呈交财务报告书。

在拿骚，海外公司数目增加的一种迹象就是银行的大量出现。在1946年，一家加拿大皇家银行本来就足以满足巴哈马金融业务上的需要，可是到今天，拿骚却有不下十二家不同的银行或信托公司。除非肯尼迪总统对美国的税法实行巨大 284
的变革，不然的话，由于处于美元和英镑区之间无人管理的有利地带，拿骚很有可能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虽然，1949年的英镑贬值和

由此产生的外汇管理办法，使巴哈马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国家都严重，但是，拿骚不久就公然开始实行一种非正式的双重货币制了。商店的货价及饭店的费用更多地用美元而不是用英镑支付，甚至连巴哈马邮局也允许用美金购买邮票。到了1960年，美元和英镑之间实行官方兑换，已使巴哈马每年总共获得三千万以上美元，成了英帝国之内唯一最大的美元赚取者。

但是，正如巴科特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关于美元的早期流入巴哈马的情况所说的，这究竟给巴哈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从战后的大浪潮中谁得到了利益，或者说，谁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人们常说："财富越是更多地汇集于拿骚，巴哈马全体居民就越富裕繁荣。"这种说法是太令人怀疑了。如此大量外资所产生的压力，显然造成了可怕的通货膨胀。在整个群岛上，靠市场繁荣而发财致富的实业家和投机商以及靠丰厚的诉讼费养肥了的律师，无疑地，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而受益不少。但是，普通的巴哈马人所得到的好处，较之他们来说就微乎其微了。

一如既往，工资的增长赶不上扶摇直上的通

货膨胀。拿骚的生活费用高于纽约，而开发局于1958年所做的关于加勒比地区生活水平比较的调查报告，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这一事实真象。虽然，普通巴哈马人不需要在饭店交付每天八镑的旅游宿费或一月一百镑的现代化公寓的租金，但是，他们的生活费用指数却在1950年后的十年中大约上涨了一倍。1959年年末，一打鸡蛋索价七先令，一品脱牛奶二先令三便士，六盎司咖啡粉十二先令，一个苹果九便士至一先令。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虽在1957年增加一倍，但仍只不过是每小时四先令四便士，一个女佣人每星期平均只挣得四镑十先令；政府部门的下级公务人员薪水微薄得可怜。甚至在1961年，一个职员开始工作时每年仅挣三百五十镑左右，一个小学教师仅挣二百四十五镑。

薪俸低薄的文官比起其依靠工资生活的同胞来说有其优越之点，这就是保证能够连续供职。 285
很大一部分巴哈马劳动力——可能是50%——从事旅游服务行业或建筑业。这类职业虽然赚钱，但不很固定。一般地讲，自从1950年以来，职工就业率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即使是稍懂礼貌的男童都

能在饭店找到工作，半熟练的工人也可称自己为工匠。然而，刚一开始出现经济衰退迹象时，工人和饭店雇员马上就轻易地被解雇了。对于普通巴哈马人来说，美国物价的每次大暴跌都会成为他们切身的灾难。不过，只要巴哈马人继续获得优厚的工资，他就不会考虑未来如何了。

正如我们经常见到的，巴哈马人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因袭已久，并且是很普遍的。由于这种鼠目寸光的政策而受害最深者则是巴哈马政府。地区虽富足，政府却很贫穷。由于巴哈马不征收直接税，因而90%以上的政府收入均来自进口税。战后，政府岁入稳步增加，从1946年的八十四万镑一直升至1961年的九百万镑，但是增长速度却赶不上旅游事业的发展，更不能与外国投资的畸形增长相比了。除了开发局这个唯一的机构之外，政府其余各部门均受保守态度和保守预算所束缚，民间的有关方面正在修建若干哩长的现代化道路，而公共工程处却把有限预算的大部分用于修补路面的坑穴。为人口骤增而深感痛苦的拿骚，连一个得力的城市建设规划机构都没有。正如《经济学家》杂志的情报组所报道

的："目前，在英国的领土内，只有巴哈马缺乏为协助解决中、下层社会人们的住房问题而制定的政府规划。"虽然那里居住着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但新普罗维登斯却未拥有一套适当的上下水道系统。1959年，仅有13%的巴哈马居民住房具备卫生设备；而77%的民房都不供应自来水。

1958年，在克利夫顿码头，开始兴建了一座革新的蒸镏和发电工厂，计划在1962年完成，但是，这座工厂是新的巴哈马电力公司的宏伟的计划项目。在《拿骚每日论坛报》编辑的兄弟尤 286
金·迪皮什的强有力的指挥下，原来的电力管理处摆脱了政府的严峻的管辖。1957年，开发局对来到该殖民地的每个游客花费了二镑十七先令，可是在同年，教育委员会对每个在校学生却只能提供四镑四先令的费用。甚至连1959年新开办的那所设备较好的中学，也是经过十年计划才修建起来，并且，这项经费是出自一笔三十一万二千镑公债，而不是出自政府岁入的。

外围小岛的命运总是比新普罗维登斯要坏得多，旅游事业只局限于几个幸运的岛屿。根据

1950年7月签订的一项协定，在大巴哈马、埃留特拉、圣萨尔瓦多及马亚瓜纳建立了美国导弹追踪站，因为这些追踪站本身是独立自足的机构，所以它们给当地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农业和渔业是巴哈马大多数岛屿的经济支柱，当遇到经济破产之际，它们就必然成了整个巴哈马的经济支柱了。不过，在计划管理和合作经营方面，比前一个世纪还进展不大。帕克在安德罗斯岛上的地产曾显示出，只要在水利灌溉上进行投资，并制定一个周密的用水分配方案，那么，巴哈马无论在什么季节都可以种植任何农作物；但是，农业及水产局是一个贫穷政府中的最贫穷的部门。如果与牙买加和特立尼达进行比较，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后两地的农业处多年来都是处境最为优越的部门。

政府对外围小岛的农业缺乏支持，其所以如此，最简单的解释是：议会中强大的商业势力，正象历来不支持替巴哈马黑人办高等教育一样，也不愿意看到繁荣的农业经济。既然从美国进口水果和蔬菜可以获得厚利，为什么还要对农业进行价格贴补呢？对于这种责难，回答总是：外围

小岛的农民极为懒惰、多疑善防并且不合作，既不能从已经实现的措施中得到好处，更谈不到从可能实现的措施中获益了。例如在1960年，在一次造成严重破坏的、被命名为“唐娜”的飓风袭击之后，如果对安德罗斯当地人不付报酬，有些人就拒绝替救济船卸货，另外，还有一些人卖掉了那些为他们运来修缮房屋的木材。

必须承认，巴哈马人遇事惯于批评而不愿做 287
出决定，喜欢讨论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而不愿从事实际工作。在战后比较安适的岁月中，政治已成巴哈马人最为流行的嗜好，在1963年的普选中，政治活动看来要演成一场危机。人们希望繁荣将继续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中起着它常起的缓和作用。

过去选举的腐败，特别是在1949年普遍采用秘密投票法①之前，已是臭名昭著的了，行贿、威胁以及极小的选民人数，使巴哈马的选举和十八世纪英国的选举相类似。进步自由党成立后，在1956年的普选中出现了政党方面的斗争，使选举

① 它于1939年在新普罗维登斯开始采用。

前进了一大步。进步自由党致力于改革和消除腐败习惯,在选举中它获得了六个席位,接着在它的联合战线主张激怒之下,于1958年成立了多数派的巴哈马联合党,这个党在议会中控制着十九个席位。不幸,党派分歧已表现在种族问题方面,并且,只有三个无党派议员是"骑墙派"。人们期望,对立的双方均能够有所克制,但是,到了1961年,种族问题方面的紧张气氛并未和缓多少。

极左翼的领袖为兰德尔·福克斯,他是黑人的工会领袖,相貌非凡,与列宁相似。福克斯原属进步自由党,1957年,他从这个党分裂出去,自己另外成立了一个组织——巴哈马劳工联合会,这个组织对1958年1月发生的大罢工事件负有主要责任。这次罢工是关于从温莎机场上新建的拿骚国际航空站运送旅客的争端所引起的;但是,这次罢工也确实是人们对劳动条件普遍不满的结果,这种不满情绪一度达到了沸腾的程度。

1958年1月12日,新航空站开始营业,当天早晨,出租汽车工会会员反对用旅游公司的汽车运送航空旅客,于是他们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

路，航空运输业因之立即停顿。数月来一直忙于组织工会的巴哈马劳工联合会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以示同情；虽则仅仅有部分建筑业及饭店业工人参加了“罢工”，但这足以使旅游业及一切建筑工程陷于停顿。在两天的紧张生活中，客人们 288
都出来帮助准备饭菜、洗刷杯盘，过了两天以后，所有饭店都停止了营业。

在拿骚，人们私议着暴动，一时谣诼纷纭。对1942年的骚乱记忆犹新的总督雷纳·阿瑟爵士向牙买加拍了电报。1月14日清晨，武斯特团的一个全部武装的分遣队从金斯敦飞抵此地。这一震惊整个拿骚社会的行动无疑的是太轻率了。据宣布，在一个重要的接电箱的附近发现了未装引线的炸药，并且在几周之内，巴哈马联合党的《拿骚卫报》大楼出人意外地被火烧毁——这次失火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已是第二次了；虽则如此，实际上却未发生暴力行动。军队的到来引起了黑人普遍的愤恨；关于出租汽车罢工事件的谈判，在互不信任的云雾笼罩下，仍然在进行着。

十九天之后，罢工结束了。出租汽车司机们

所争取的条件大部分都实现了，但是，最初看来巴劳联以及整个巴哈马经济似乎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佛罗里达的广播电台及报纸夸大了拿骚的混乱状况，旅游者由于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仍然不到巴哈马来。1958年的旅游者总人数出现了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一批批参加罢工的建筑业职工被解雇；饭店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继续失业。巴劳联及其领导人普遍地失去人心。

这次罢工，就其比较长远的影响来说，还是很有益的。报纸的报道和总督的公文已将巴哈马的问题反映到伦敦，直到办事拖沓的伦敦的殖民部。四月，殖民事务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先生从国内飞往拿骚，经过一系列决定性的会见之后，明确地表示，不管巴哈马议会组成的成分如何，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支持巴哈马大多数人的意见。遵照殖民部的建议，巴哈马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劳工议案，规定成立劳工局，增设一位劳工联络官，关于重要的选举改革的意见也坚决地提了出来，财产方面的选举资格和双重投票制等规定被废除了，拿骚在议会中又增加了四个代表席位。当1960年举行补缺选举

时，这四个新增的席位全部由进步自由党候选人 289
获得了。由于进步自由党另一名候选人在大巴哈马的补缺竞选中获得成功，这个反对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几乎增加了一倍。

1960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妇女有投票权并有被选为议会议员的权利。同年，公布了殖民部所汇编的两个重要报告：霍顿关于教育的报告、休斯关于医务的报告，两者都提出了彻底改革的建议。

在1961、1962两年内，显然巴哈马在它的历史上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预言未来是否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范围，这一点至少是可以争辩的；但是，下列四点似乎是肯定无疑的，它们将足以证明在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一点自由见解是必要的：

第一，1963年的普选将是一次决定性的力量显示。因为进步自由党已和在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完全结合起来，成年人现在又普遍有了投票权，所以，进步自由党看来有可能在议会中赢得绝大

多数席位。甚至，一党政府的老问题又可能在不同形式的掩盖下重新出现。一个全由黑人组成的政府是否能够不记前嫌，从而在施政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还得留待将来再看。

第二，在以后几年内，将会发生一种变化，使巴哈马趋向更大程度上的自治。大多数巴哈马人的意见与殖民事务大臣伊恩·麦克劳德1960年发表的谈话精神是一致的，这次谈话表明英国希望最迟将在1965年解散"帝国"。但目前，独立的形式是人们难以摹想的，各种可能的形式本身都存在着问题。据说某些商业界人士主张巴哈马与佛罗里达和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1955年玛格丽特公主和1959年菲利普亲王① 对巴哈马的访问充分显示，大多数巴哈马人绝不想舍弃英联邦。

第三，显而易见，巴哈马人只管今日不顾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今昔一贯的生活态度是注定要遭到唾弃的。时间不容掩延了。但是，有

① 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妹。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是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译者

些模糊迹象显示，1963年后巴哈马政府将开始为今后的前途提供一定的保证，那时它将使流入巴哈马的更多的财富都汇集到巴哈马财政处去。现实的巴哈马繁荣和美国膨胀性的兴隆紧密地联系 290
着，并且，旅游业和投资也经受不了任何危害了。然而，只要好年头能够继续下去，总可以找到温和而妥贴的办法使巴哈马岁入增加一倍甚至两倍。凭借这些财源，政府将能够投资于以下几个方面：清除贫民窟、解决廉价住房问题、改进教育和医疗事业；同时还可以兴办轻工业以及改进耕作技术，这样，一旦再遇坏年头，就可以使巴哈马免遭巨大灾难。

最后，肯定地说，无论何种挫折或不幸落到巴哈马及其人民的头上，他们总会象皮球弹跳似地再次振奋起来。巴哈马历史告诉我们，由各个种族所形成的巴哈马人民具有惊人的天赋的精神恢复力，这也许正是他们所爱好的辣椒拌鲜海螺这盘菜——在赐给他们以“海螺”的绰号的同时——所赋予他们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也许是他们的幽美岛屿所具有的“清澄的海水和闪烁发光的沙滩”以及几乎长年充裕的阳光所赋予他们的灵

感。正如H·M·贝尔在1934年所写过的，"'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呢？'经历了海盗劫掠、战时私掠商船、打捞失事船、保王党人大规模蓄奴、偷越封锁线以及酒类走私等活动——然后，还会发生什么呢？巴哈马可能不会再在富有风险和魅力的各种事物的中间出现吗？很难说不可能……

"巴哈马确实是六月之岛，它使逃脱生活战场的苦闷者得到慰藉……使疲倦者心旷神怡。更重要的，它是人间的乐土——使人恢复坚强的毅力，焕发着我们中间潜在的创造精神。"

1961年夏于拿骚

史料及参考书

一、一般性资料

(一) 主要部分

H·C·贝尔和D·W·帕克合编的《伦敦和英属西印度群岛收存的关于群岛档案资料指南》(BELL, H. C. and PARKER, D. W. Guide to British West Indies Archive Materials in London and the Islands,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1926)一书，是查阅伦敦公共档案局现存大量文件所必需的指南。这部书将贸易部通信原文(1717—1780年)、国务大臣通信原文（1696—1815年）、贸易部登记簿（1717—1784年）、巴哈马法案汇编（1729—1781年)、巴哈马议会记录（1721—1794年）及巴哈马船舶统计表（1721—1755年）都编列出一套完整目录，并将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做了概述。这部珍贵的书，也把（1925年）在拿骚可以找到的，包括在注册处，总督、殖民地秘书和检查员的办公室，行政会、立法会和议会的图书室，以及最高法院和海事法庭的档案中所存的文件，编列出一套目录。

C·M·安德鲁斯和F·G·达文波特合编的《英国博物馆等处所藏1783年以前美国历史的资料手稿指南》(ANDREWS, C. M. and DAVENPORT, F. G. Guide to Manuscript Materials for United States History to 1783 in the British Museum, etc.,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1908)一书，把英国皇家学会、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上议院和在英国博物馆所藏英王、埃杰顿、斯龙文件及其他手稿中所能见到的许多重要巴哈马文件也收编在目录之内。

这两本书所列入的文件在卷数颇多的《政府公文编年目录》中的《殖民地》部分和《美洲与西印度群岛》部分 (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1574—1660,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1661 on) 中也几乎全部被列入目录并加以摘述。

H·马尔科姆（爵士）所编《关于巴哈马群岛的历史文件汇编》(MALCOM, (SIR) H.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Bahama Islands, Nassau, 1910) 一书用途很大，因为它把某些重要文件完整地提供出来了。

在拿骚所发现的文件中，注册处的那些文件最为重要，且最便于采用。它们的原件是对开本大小，编号从A到Z；从A 1到Z 1，依次编排下去，直至从A23到Z23，大约在1850年时始有“新辑”出现。最早的索引编于1815年，是关于财产转让证书方面的。1956年，注册处曾将其当时所存的全部资料缩小影印出来，其中包括财产转让证书、授地状、契据、遗嘱、财产清单、普通法院与平衡法院记录、获释黑人名册(1740-1834年)、奴隶审判记录 (1785—1789年)、行政会议事录(1789—1802年) 及殖民地秘书记录 (1733—1751年)。不幸的是，对开本原件收藏和保管都不妥善，并且有些早期卷册于缩小摄制后业已遗失。在巴哈马群岛至今还没有一个官方档案保管员。

《巴哈马法规》(The Statute Law of the Bahamas, Nassau, 1956) 共有九卷，它是修订本的现行法案汇编。更早一些的法典，先后于1803、1843、1850、1862、1877、1901及1929年编成。

《议会决议》(The Votes of the House of Assembly) 是刊印的议会记录，在十八世纪末首次出版，刊载着从1729年直到目前的议会议决事项，可惜的是，在这项记录中，既未详述议案的细节，也未开列表决者的名单。

自保王党人约翰·韦尔斯于1784年8月出版《巴哈马报》以来，有许多报纸陆续出版。下面是巴哈马报刊杂志的初步目录，其中注有*号者，全部或部分合订本收存于拿骚公共图书馆内。

《巴哈马报》* 1784—1857 Bahamas Gazette

《皇家公报》* 1804—13 Royal Gazette

《巴哈马观察报》* 1831—c. 40 Bahamas Argus

《巴哈马人》 1838 The Bahamian，后为《观察家》The Observer

《拿骚卫报》* 1844— Nassau Guardian

《巴哈马先驱报》* 1849—77 Bahama Herald

《巴哈马时报》 1850s Bahama Times

《雅典女神神殿报》 1850s Parthenon

《拿骚广告报》 1861—65 Nassau Advertiser

《新笨拙报》 1864 Young Punch

《拿骚时报》* 1868—93 Nassau Times

《我们的杰姆》 1879—80 Our Jem

《公民报》 1886—89 The Freeman

《巴哈马新闻》* 1898—1901 Bahamas News

《警卫者》 1901—06 The Watchman

《拿骚每日论坛报》 1904— Nassau Daily Tribune

《目击者》 1908 The Witness

《观察家周刊》 1922 Observer Weekly，后为《拿骚向导》 Nassau Leader

《巴哈马新闻》 1935 Bahamas News

《镜报》 1938—40 The Mirror

《拿骚先驱报》 1940 Nassau Herald

《呼声》 1940s The Voice

《解放者》 1944 The Liberator

《巴哈马文摘》* 1951 Bahamas Digest

《拿骚杂志》 1955— Nassau Magazine

外围诸岛报纸

《埃留特拉棕榈报》 Eleuthera Palm (Governor's Harbour)

《探照灯报》 Searchlight (Inagua)

《伊纳瓜记事报》 Inagua Record

《比米尼号角报》 Bimini Bugle

（二）次要部分

G·L·贝恩（文学硕士）：《巴哈马群岛1730年前早期史》 BAIN, G. L.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1730… (MA London, 1959)

H·贝尔（民法硕士）：《巴哈马：六月之岛》 BELL, H. MCL. Bahamas; Isles of June (London, 1936)

A·伯恩斯（爵士）：《英属西印度群岛史》 BURNS, (SIR)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 1950)

J·卡尔默：《巴哈马诗集》 CULMER, J. A Book of Bahamian Verse. (London, 1930)

R·A·柯里：《巴哈马民俗》 CURRY. R. A. Bahamian Lore. (Paris, 1928)

C·D·卢卡斯：《西印度群岛历代地理》 LUCAS, C.D.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 Indies (Oxford, 1905)

E·S·麦卡琴：《岛上歌集》 McCUTCHEON, E. S. The Island Song Book (Nassau, 1927)

M·莫斯利：《巴哈马群岛手册》 MOSLEY, M. Bahamas Handbook (Nassau, 1926)

J·H·帕里与P·M·舍洛克合著：《西印度群岛简史》

PARRY, J. H. and SHERLOCK, P. M.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960)

E·C·帕索斯：《巴哈马安德罗斯岛民间故事集》 PARSONS, E. C. Folk Tales of Andros Island, Bahamas (Boston, 1918)

A·D·佩格斯：《巴哈马群岛简史》 PEGGS, A. 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ahamas (Nassau, 1955)

C·沙勒(哲学博士)：《巴哈马群岛人口的增长》 SHARER, C.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Bahamas (PhD Michigan, 1955)

J·H·斯塔克：《巴哈马群岛的历史与指南》 STARK, J. H. Histoy and Guide to the Bahamas (New York, 1891)

A·J·韦克菲尔德：《关于巴哈马群岛农业发展的报告》 WAKEFIELD, A. J. Repor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Bahamas (Nassau, 1942)

二、各章参考书目

第一章

至今尚无一部综合性的巴哈马群岛自然史，然而仍有范围相当广泛的书目可供参考，下面是简要书目：

A·阿加西斯：《巴哈马群岛勘查记》 AGASSIZ, A. A Reconnaissance of the Bahamas (New York, 1894)

M·凯茨比：《南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及巴哈马的自然史》 CATESBY, M.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arolinas, Florida and the Bahamas (London, 1731)

C·B·科里：《巴哈马群岛鸟类概览》 CORY, C. B.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Birds of the Bahamas (Boston, 1890)

C・S・多利:《巴哈马群岛植物初定目录》 DOLLEY. C.S. Provisional List of the Plants of the Bahamas (1889)

G・F・弗里克和R・P・斯特恩斯合著:《马克・凯茨比:殖民地的鸟类学家》 FRICK, G. F. and STEARNS, R.P. Mark Catesby. The Colonial Audubon (Urbana,di Illinois, 1961)

G・C・克林格尔:《海洋之岛》 KLINGEL, G. C. Ocean Island (New York, 1940)

A・R・诺斯罗普:《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位博物学家》 NORTHROP, A. R. A Naturalist in the Bahamas (New York, 1910)

"里伯斯":《巴哈马渔场官方手册》 "REBUS" Official Guide to Bahamian Fisheries (London, 1883)

E・L・里格:《巴哈马群岛》 RIGG, E. L. The Bahama Islands (New York, 1957)

A・罗森:《巴哈马动物志初稿》 ROSEN, A. Contribution to the Fauna of the Bahamas (1911)

W・萨维尔-肯特:《关于巴哈马海绵的报告》 SAVILLE-KENT, W. Report on the Sponges of the Bahamas (London, 1883)

G・B・沙特克(主编):《巴哈马群岛》 SHATTUCK, G. B. (Ed.) The Bahama Islands (Baltimore, 1905)

A・汤普森:《巴哈马群岛简明地理》 THOMPSON, A. A Short Geography of Bahamas (Nassau, 1944)

A・J・韦克菲尔德:《关于巴哈马群岛农业发展的报告》 WAKEFIELD, A. J. Report on Agricural Develop-

ment in the Bahamas (Nassau, 1942)

F·G·沃尔顿-史密斯：《大西洋上的珊瑚礁》 WALTON-SMITH, F. G. Atlantic Reef Corals (Miami, 1948)

P·A·扎尔：《狩猎红鹤》 ZAHL, P. A. Flamingo Hunt (New York, 1952)

第二章

非常需要对卢卡伊人做充分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是几乎还没被人们触及到的领域。

W·K·布鲁克斯：《论卢卡伊印第安人》 BROOKS, W.K. On the Lucayan Indians (Washington, 1899)

T·德·布埃：《凯科斯群岛上的卢卡伊人遗迹》 DE BOOY, T. Lucayan Remains in the Caicos Islands (Washington, 1912)

J·W·富克斯：《波多黎各与其邻近岛屿的土著居民》 FEWKES, J. W. The Aborigines of Porto Rico and the Neighbouring Island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07)

T·A·乔伊斯：《中美洲与西印度群岛的考古学》 JOYCE, T. A. Central American and West Indian Archaeology (London, 1916)

B·德·拉斯·卡萨斯：《西班牙人在美洲首次航行及发现记》 LAS CASAS, B. DE An Account ot the First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Spaniards in America …(London, 1699)和《印度群岛史》 Historia de las Indias (英文译本题名《印第安人之泪》 The Tears of the Indians J. Phillips, London, 1965)

S·洛文：《泰诺文化的起源》 LOVEN, S. The Ori-

gins of the Taino Culture (Goteburg, 1935)

C·R·马克姆：《克里斯托佛·哥伦布航海日记》 MARKHAM, C. R.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London, 1893)

彼得·马特：《新世界》 MARTYR, PETER. De Orbe Novo (1511, trans. by F. A. McNutt, New York, 1912)

第三章

论述哥伦布各种经历与发现的书籍甚多，其中S·E·莫里森的杰作《海上大将》(MORISON, S. E.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New York, 1941) 被我看作是一部几乎始终不可少的指南。如有人想要更全面地探讨哥伦布的航行及关于其初见陆地地点的争论问题，则应参考：

A·B·比彻：《哥伦布初见陆地记》 BECHER, A. B The Landfall of Columbus (London, 1856)

F·哥伦布：《海上大将克里斯托佛·哥伦布传》 COLUMBUS, F.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London, 1867)

R·克罗瑙：《哥伦布发现美洲和初见陆地记》 CRONAU,R.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the Landfall of Columbus (New York, 1921)

C·简（主编）：《哥伦布四次航行史料选编》 JANE, C. (Ed.)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Four Voyages of Columbus (London, 1930-33)

J·B·默多克：《哥伦布巴哈马群岛航行记》 MURDOCH, J. B. The Cruise of Columbus in the Bahamas (New York, 1884)

第 四 章

对西班牙档案，特别是对存于塞维利亚的印度群岛各方面档案，显然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此，长期孜孜不卷的努力和通晓西班牙文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关文件最有可能来自下列资料：

S·蒙托多（主编）：《西属美洲历史未刊文件汇编》 MONTOTO, S. (Ed.)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Ibero-América (Madrid, 1927)

M·F·德·纳瓦雷特（主编）：《西班牙历史未刊文件汇编》，《旅游文集》 NAVARRETE M. F. DE (Ed.)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Madrid, 1842-95), Colección de los viajes… (Madrid, 1825-37)

J·F·帕切乔（主编）：《关于西班牙在美洲和大洋洲的领地的发现、征服及殖民方面未刊文件汇编》 PACHECHO, J. F. (Ed.)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relativos al descubrimiento, conquista y colonización de las posesiones españolas en América y Occeania (Madrid, 1864-84)

F·德·埃雷拉：《西印度群岛通史》 HERRERA, F. DE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occidentales (1601)，英译者J·史蒂文斯(船长)：《美洲大陆与岛屿的通史》 STEVENS, (CAPT.) J.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Vast Continent and Islands of America… (London, 1726)

E·W·劳森：《佛罗里达的发现及其发现者胡安·庞塞·德·莱昂》 LAWSON E. W. The Discovery of Florida and its Discoverer Juan Ponce de León (St. Augustine, 1946)

I·A·赖特《古巴早期史,1492—1558年》 WRIGHT, I. A. The Early History of Cuba, 1492—1558 (New York, 1916)

第五章

C·M·安德鲁斯:《美洲史中的殖民时期》 ANDREWS, C. M. The Colonial Period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37)

J·N·贝兰:《英属安的列斯群岛地理志》 BELLIN, J. N.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des Isles Antilles Possédées par les Anglois (Paris, 1758)

W·P·卡明:《早期地图中的东南方》 CUMMING, W. P. The South East in Early Maps) (New Jersey, 1958)

R·哈克卢伊特:《英国民族主要的航海、旅行、交通及发现》 HAKLUYT, R.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c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1589)

H·威尔金森:《百慕大冒险事业》 WILKINSON, H The Adventures of Bermuda (London, 1933)

I·A·赖特(主编):《关于英国人航行的西班牙文件汇编,1527—1568年》,《关于航行的文件汇编,1569—1580年》,《关于英国人向西属美洲的航行续志,1583—1594年》 WRIGHT, I. A. (Ed.) Spanish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1527-68 (London, 1929), Documents Concerning Voyages, 1569-80 (London, 1932), Further English Voyages to Spanish America, 1583-94 (London, 1951)

《英国人名大辞典》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

graphy）中有几条关于罗伯特·希思及塞缪尔·瓦萨尔的可供参考的论述。

第六章

前面所列的英国文件都是以冒险家开始的，这些是研究直至十九世纪巴哈马群岛全部历史不可缺少的依据。

A·T·贝瑟尔：《巴哈马群岛的早期移殖者》 BETHELL, A. T. The Early Settlers of the Bahamas (Nassau, 1914 and 1937)

J·H·勒弗罗伊（爵士）：《百慕大编年史，1515—1685年》 LEFROY, (SIR) J. H. Memorials of Bermuda, 1515—1685 (London, 1877—79)

W·H·米勒：《巴哈马群岛的拓殖，1647—1670年》 MILLER, W. H.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Bahamas, 1647—7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January 1945)

J·温思罗普：《新英格兰史》 WINTHROP, J. History of New England (Boston, 1825)

《英国人名大辞典》中威廉·塞尔一条

第七章

J·奥尔德米克逊：《美洲的英帝国史》 OLDMIXON, J.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America (London, 1708 and 1741)，其中一部分以《普罗维登斯岛史》History of the Isle of Providence (London, 1949)为题再版。

第九章

H·C·克里斯蒂：《黑胡子，一部巴哈马群岛传奇史》

CHRISTIE, H. C. Blackbeard; A Romance of the Bahamas (Nassau, 1930)

J·格雷夫斯：《编年史》 GRAVES, J. A Memorial (London, 1708)

C·约翰逊：《海盗史》 JOHNSON, C. The History of the Pirates (London, 1726)

D·C·塞茨：《在海盗的黑旗下》 SEITZ, D. C. Under the Black Flag (New York, 1925)

R·E·斯诺：《海盗和海寇》 SNOW, R. E. Pirates and Buccaneers (New York,1944)

H·威尔金森：《老帝国时期的百慕大》 WILKINSON, H. Bermuda in the Old Empire (London, 1950)

G·伍德伯里：《西印度群岛海盗活动的全盛时代》 WOODBURY, G. The Great Days of Piracy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1951)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B·利特尔：《克鲁索的船长》 LITTLE, B. Crusoe's Captain (London, 1960)

W·罗杰斯：《环球巡航记》 ROGERS, W. A Cruis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1712), 1928年再版，附有G·E·梅因沃林所作的有趣味的序言。序言重版时，则改称《伍兹·罗杰斯，私掠船长和总督》 Woodes Rogers,Privateer and Governor (London,1957)

《英国人名大辞典》中伍兹·罗杰斯一条

第十二章

《剑桥英帝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是一部关于老帝国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

G·L·比尔:《旧殖民地制度，1660—1754年》 BEER, G. L.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60—1754 (New York, 1912)

H·马尔科姆（爵士）:《巴哈马群岛议会史》 MALCOLM, (SIR) H. History of the Bahamas House of Assembly (Nassau, 1921)

L·M·彭森:《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代办》 PENSON, L. M. Colonial Agents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 1927)

H·朗:《西印度群岛政府》 WRONG, H. Government in the West Indies (Oxford, 1923)

第十三章

P·H·布鲁斯:《回忆录》 BRUCE, P. H. Memoirs (London, 1782),其中一部分再版，名为《巴哈马群岛插曲》 Bahamian Interlude (London, 1949)

《英国人名大辞典》中P·H·布鲁斯及托马斯·谢利两条

第十四章

L·F·阿米塔奇:《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自由港制度：关于商业政策研究，1766—1822年》 ARMYTAGE, L. F. The Free Port System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 Study in Commercial Policy, 1766—1822 (London, 1953)

S·E·莫里森:《约翰·保罗·琼斯》 MORISON, S. E. John Paul Jones (New York, 1960)

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B·E·H·克里福德（爵士）:《历史上的拿骚炮台》 CLIF-

FORD, (SIR) B. E. H. Historic Forts of Nassau (Nassau, 1952)

H·马尔科姆(爵士)：《拿骚炮台史要》 MALCOLM, (SIR)H. Historical Memoranda Relating to the Forts in Nassau (Nassau,1913)

L·萨拜因：《美国革命时期保王党人传略》 SABINE, L.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Loyalis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oston, 1847 and 1864)

J·D·舍普夫：《联邦游记，1783—1784年》 SCHOEPF, J. D. Travels in the Confederation, 1783—4 (Philadelphia, 1911)

W·H·西伯特：《美国革命传统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及巴哈马群岛的影响》 SIEBERT,W.H. The Leg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nd Bahamas (Columbus,Ohio, 1913)

W·怀利：《巴哈马群岛简述》 WYLLY, W. A Short Account of the Bahama Islands (London,1789)

《英国人名大辞典》中邓莫尔伯爵第四约翰·默里一条

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

作者不详：《生活在阳光下；到巴哈马群岛去的非洲部族简史》 Anonymous. Living in the Su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frican Tribes Who Came to the Bahamas (Nassau,1939)

W·L·伯恩：《英属西印度群岛黑奴的解放与见习制度》 BURN,W. L. Emancip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London,1937)

L·克尔等人：《巴哈马群岛通讯员致殖民地代办乔治·查默斯阁下的公函……》 KERR,L. and others. An Of-

ficial Letter from the Commissioners of Correspondence of the Bahama Islands to Geo. Chalmers Esq., Colonial Agent... (London, 1823)

A·德·洛雷因：《巴哈马群岛信札》 LORRAINE, A. DE. Letters from the Bahama Islands (Philadelphia, 1827 and London, 1948)

D·麦金农：《漫游记述》 McKINNEN, D. A Tour (London, 1804)

W·L·马西森：《英国的奴隶制及其废除，1833—1838年》，《英国奴隶解放，1839—1849年》 MATHIESON, W. L. British Slavery and its Abolition, 1833—38 (London, 1926), British Slave Emancipation, 1839—49 (London, 1932)

L·J·拉加茨：《英属加勒比地区种植场主阶级的没落，1783—1833年》 RAGATZ, L. J.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1783—1833 (New York, 1928)

J·M·赖特：《巴哈马群岛史》 WRIGHT, J.M. History of the Bahamas (Baltimore,1908)，该书引自G·B·沙特克的一部分，业已印成单行本，对奴隶境遇的改善与奴隶解放时期做了专门论述。

第十九章

作者不详：《浸礼会传教士协会，一百周年纪念集，1792—1892年》 Anonymou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Centenary Volume, 1792—1892 (London, 1893)

T·科克：《西印度群岛史》 COKE, T.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810)

霍巴特（"督军"）：《我的生平散记》 HOBART ("PA-

SHA") Sketches of My Life (London, 1886)

M·莫斯利（主编）：《拿骚卫报一百周年专刊》 MOSELEY, M. (Ed.) Nassau Guardian, Centenary Edition (1944)

A·D·佩格斯：《道森的日记》 PEGGS, A. D. Dowson's Journal (Nassau, 1961)

I·彼得斯：《封锁线之偷越》 PETERS, I. Blockade Running (London, 1946)

T·E·泰勒：《偷越封锁线》 TAYLOR, T. E. Running the Blockade (London, 1896)

第二十章

H·W·奥斯汀：《巴哈马群岛审判长十年，1880—1890年》 AUSTIN, H. W. Ten Years Chief Justice of the Bahamas, 1880-90 (London, 1890)

S·巴科特：《巴哈马群岛素描》 BACOT, S. The Bahamas: A Sketch (London, 1869)

A·布拉西（夫人）：《信风，热带及大西洋风暴地带》 BRASSEY, (LADY) A. In the Trades, the Tropics and the Roaring Forties (London, 1885)

E·T·丘顿(主教)：《巴哈马的岛上传教士》 CHURTON, (BISHOP) E. T. The Island Missionary of the Bahamas (London, 1888)

A·D·德弗赖斯：《在一个被忽视的殖民地里》 DEFRIES, A.D. In a Forgotten Colony (London, 1917)

W·F·H·金：《阿丁顿·维纳布尔斯主教回忆录》 KING, W. F. H. Memoir of Bishop Addington Venables (London, 1877)

R·兰顿-琼斯：《沈默的哨兵》 LANGTON-JONES,

R. Silent Sentinels (London, 1946)

G·莱斯特：《在阳光灿烂的群岛上》 LESTER, G. In Sunny Isles (London, 1897)

A·麦克米伦（主编）：《西印度群岛图说》 MACMILLAN. A.(Ed.) West Indies Illustrated (London,1911)

D·莫里斯：《巴哈马的西沙尔麻业》 MORRIS, D. The Sisal Industry of the Bahamas (London, 1896)

《拿骚卫报年鉴》 Nassau Guardian Almanacks (annual, 1876—1911)

G·J·H·诺思克罗夫特：《消夏胜地素描》 NORTHCROFT, G. J. H. Sketches of Summerland (Nassau, 1906)

C·F·帕斯科：《福音布道协会二百年，1701—1900年》 PASCOE, C. F.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S. P. G., 1701—1900 (London, 1901)

L·D·波尔斯：《粉红色的珍珠之国》 POWLES, L. D. Land of the Pink Pearl (London, 1888)

R·罗森（爵士）：《关于巴哈马群岛的报告》 RAWSON,(SIR) R. Report on the Bahamas (London, 1865)

W·鲁宾逊（爵士）：《巴哈马群岛》 ROBINSON, (SIR) W. The Bahamas (London,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 1900)

E·谢登：《巴哈马群岛的里里外外》 SHEDDEN, E. Ins and Outs of the Bahama Islands (Norwich,1930)

R·谢登（主教）：《一个西印度群岛主教管区的盛衰》 SHEDDEN, (BISHOP) R. Ups and Downs in a West Indian Diocese (London, 1927)

W·斯特罗恩：《自传》 STRACHAN, W. Autobiography (London, 1855)

第二十一章

E·M·培根：《拿骚见闻》 BACON, E. M. Notes on Nassau (Nassau, 1926)

G·博卡：《哈里·奥克斯爵士的生平及死亡》 BOCCA, G. The Life and Death of Sir Harry Oakes (New York, 1960)

A·伯恩斯(爵士)：《一个殖民地的文官》 BURNS, (SIR) A. Colonial Civil Servant (London, 1954)

A·D·德弗赖斯：《幸运岛》 DEFRIES, A. D. Fortunate Isles (London, 1920)

德·马里尼：《不是圣人，乃是魔鬼》 DE MARIGNY More Devil than Saint (London,1946)

欧仁·迪皮什：《奥克斯谋杀案审判记》 DUPUCH, EUGÈNE The Oakes Murder Trial (Nassau, 1958)

F·霍姆斯：《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哈马群岛》 HOLMES, F. The Bahamas in the Great War (London, 1924)

A·E·霍纳：《来自"海上之岛"》 HORNER, A. E. From the Isles of the Sea (Nassau, 1919)

A·拉塞尔：《巴哈马群岛1942年 6 月骚乱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RUSSELL,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disturbances in the Bahamas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1942 (Nassau, 1942)

范·德·沃特：《真正的人》 WATER, VAN DE The Real McCoy (New York, 1923)

J·W·范德库克：《加勒比亚地区巡游记》 VANDERCOOK, J. W. Caribee Cruise (New York, 1938)

第二十二章

迪皮什（主编）：《巴哈马群岛手册》 DUPUCH (Ed.) Bahamas Handbook, 1960 and 1961 (Nassau, 1959 and 1961)

J·H·理查森：《巴哈马群岛经济状况及战后各种问题评论》 RICHARDSON, J. H. Review of Bahamia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st-War Problems (Nassau, 1944)

作者不详：《加勒比地区的比较生活水平》 Anonymous. Comparative Living Levels in the Caribbean (London, EIU, 1959)

年报：《巴哈马群岛》 Annual Reports: Bahamas; 1946; 1947-48; 1949-50; 1950-51; 1952-53; 1954-55; 1956-57; 1958-59 (London, H. M. S. O.)

伯恩斯的关于巴哈马群岛行政事务的报告；霍顿的关于巴哈马群岛教育的报告；休斯的关于医务的报告

附　　录

附录一　巴哈马群岛历届总督一览表

（一）　自治殖民地时期

1648年　威廉·塞尔
1661年　纳撒尼尔·塞尔

（二）　业主殖民地时期

1670年　休·温特沃思
1671年　约翰·温特沃思
1676年　查尔斯·奇林沃思
1680年　罗伯特·克拉克
1682年　罗伯特·利尔伯恩
1687年　托马斯·布里奇斯
1690年　卡德瓦拉德·琼斯
1693年　尼古拉斯·特罗特
1696年　尼古拉斯·韦布
1700年　伊莱亚斯·哈斯克特
1702年　爱德华·伯奇
1707年　罗伯特·霍尔登

（三）　直辖殖民地时期

1718年　伍兹·罗杰斯
1721年　乔治·芬尼
1729年　伍兹·罗杰斯

1733年　理查德·菲茨威廉
1738年　约翰·廷克
1758年　托马斯·谢利
1768年　威廉·谢利
1774年　蒙特福特·布朗
1780年　约翰·马克斯韦尔
1787年　邓莫尔勋爵
1796年　威廉·多德斯韦尔
1802年　约翰·霍尔基特
1804年　查尔斯·卡梅伦
1820年　刘易斯·格兰特
1829年　J·C·史密斯爵士
1835年　威廉·科尔布鲁克
1837年　F·科伯恩爵士
1844年　乔治·马修
1849年　约翰·格雷戈里
1854年　A·班纳曼爵士
1857年　查尔斯·贝利
1864年　R·W·罗森爵士
1869年　J·沃尔克爵士
1873年　J·波普·亨尼西爵士
1874年　W·鲁宾逊爵士
1881年　蒂莫西·卡拉汉
1882年　C·C·利斯爵士
1884年　亨利·布莱克
1887年　A·谢伊爵士
1895年　W·海恩斯-史密斯爵士
1898年　G·T·卡特爵士
1904年　W·格雷-威尔逊爵士

1912年 乔治·哈登-史密斯
1915年 威廉·阿勒代斯
1921年 哈里·科尔多
1927年 H·奥尔陆军少校
1932年 比德·克利福德爵士
1937年 C·C·邓达斯阁下
1940年 温莎公爵殿下
1945年 威廉·墨菲爵士
1949年 陆军少将罗伯特·内维尔爵士
1953年 兰弗利伯爵
1957年 雷纳·阿瑟爵士
1960年 罗伯特·斯特普尔登爵士

附录二 巴哈马币制

在十七、十八世纪，巴哈马群岛没有本位货币，英国货币很缺，当地使用法国、西班牙及荷兰的金银币，按重量定其价值。十八世纪中叶，最通用的铸币和计价单位是便士penny、赖耳ryal(real一词的误用)、银比索piece of eight、银元dollar和基尼guinea。

在1786年，一赖耳折合巴哈马货币九便士，或英国货币五又四分之一便士；一银比索值八赖耳或英国货币三先令六便士；一基尼，自然等于英国货币二十一先令，也就是值六银比索或四十八赖耳。

莫伊多moidore（约值英国货币二十七先令）、周阿尼斯Johannes(值三十六先令)和达布隆doubloon(值六十六先令)，其价值高昂，因而在巴哈马群岛较为罕见。

到1790年，为了促使巴哈马币制本位化并力求与英国货币划一，曾做过多次认真的努力，然而，巴哈马货币一直到了现

代，才开始同英国货币一致起来。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有粗心大意的游客向街头小贩买货品，被索价“英国货币三便士”，结果等于花“流通货币”即巴哈马钱六便士。在同一时期，“切克”check仍是一又二分之一便士的代用词，这显然是从西班牙旧金币希昆chequeen一词演变而来的。

附录三　约翰·韦尔斯与《巴哈马报》

《巴哈马报》于1784年8月7日问世，它是最早的巴哈马报纸。该报的箴言，“决不对任何主人的话发誓听从”（nullius addictus jurare verba magistri），至今仍被《拿骚每日论坛报》当做座右铭。《巴哈马报》的发行人约翰·韦尔斯，原系查尔斯顿的一位保王党人，最初，曾在东佛罗里达办过一家报纸，1784年，他携带印刷机从查尔斯顿移居到拿骚。他的印刷所设在拿骚的乔治街，在印刷所的前面他经营了巴哈马唯一的书店兼文具店。韦尔斯除了办《巴哈马报》以外，每年还出版《巴哈马年鉴》及数种教育用书。

创办之初，《巴哈马报》是对开四版的新闻周刊，订阅费包括邮费在内每年为一基尼；到1790年改为双周刊，订阅费增至每年三镑。欧洲的新闻约占一个版面，经常是四个月以前的过时消息；“美国消息”稍为及时一些，但也都是两个月以前的陈旧新闻，它一般要比巴哈马新闻所占的篇幅多些。广告约占四分之一的版面，第四版通常是刊登选自英国杂志的文学作品。

由于新闻和稿源缺乏，《巴哈马报》刊登美国和英国来信时，也致以酬金。每艘船只的到港日期都及时加以宣布，并经常附带刊登一些从船长和旅客那里搜集到的新闻短讯。有的时候，如1789年11月28日，当《法国革命宪法》的细目传到拿骚时，该报还发行过两页版的免费增刊。

附录四 1648—1960年巴哈马人口统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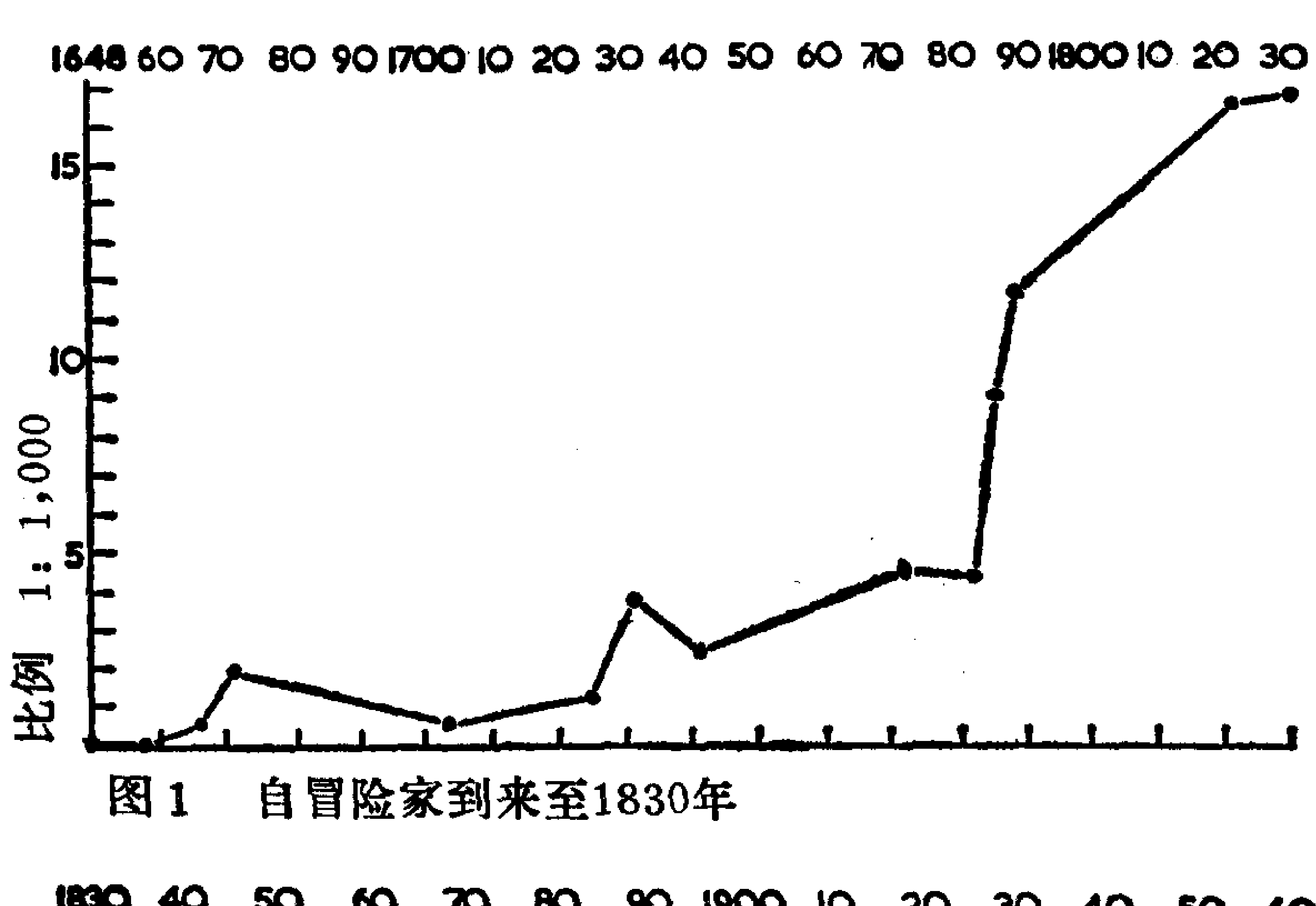


图1 自冒险家到来至18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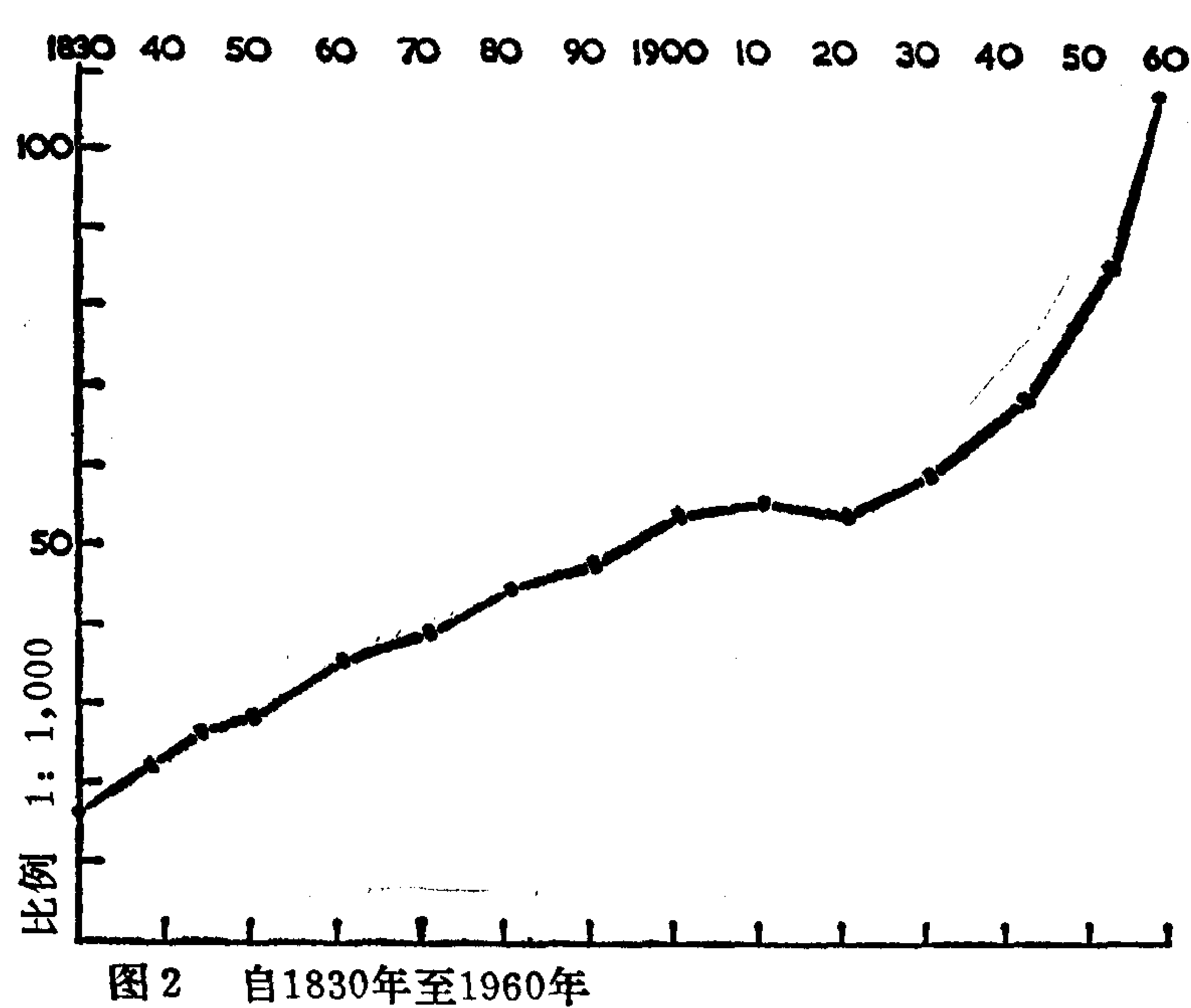


图2 自1830年至1960年

索　引

（所附数字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附于正文页边）

二　画

三　画

四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 一 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十七画

十八至二十一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哈马群岛史　（上、下册）
作者＝［英］迈克尔·克拉顿著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校
页数＝５８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１９７３年4月第１版